

原 火
熊 星



革命回忆录

陇原星火

革命回忆录

甘肃人民出版社

说 明

一、本书是我社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丛书之一。这套丛书主要收集老干部撰写的革命回忆录和革命斗争史料，当前着重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甘肃省发生的重大革命斗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英雄在我省活动的事迹；同时也选辑广大老干部撰写他们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革命经历及其整理的革命史资料，陆续出版，用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同心同德进行“四化”建设。

二、这本革命回忆录所选的材料，有的反映陇东地区早期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有的从一个侧面再现了战争年代老干部戎马倥偬或从事地下斗争的战斗生涯；有的追忆了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先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含辛茹苦，艰苦创业的事迹，以及他们“满腔热血洒遍地北天南”的崇高品德。这些文章是我党领导的千百万革命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真实写照；其中有的文章尽管在文字上精刻细雕不够，但其内容不乏璞玉浑金。这本回忆录因选辑有关本省革命斗争材料较多，所以取名《陇原星火》。

三、本书所选材料，大多经作者反复核实，但有的事情毕竟发生在几十年前，仅凭记忆，难免有疏漏之处，加之我们经验不足，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〇、十一

目 录

- 井冈山红旗映亮了陇东高原.....郭洪超 (1)
- 回忆营救红西路军二、三事.....吴鸿宾 (15)
- 平东工委的地下斗争.....张可夫 (26)
- 虎穴往来.....王立成 (42)
- 越狱纪实.....李铁轮 (53)
- 八十里地下红线.....董虎山 (61)
- 陇东“抗总”前期的活动.....冀志安 (68)
- 春满子午岭.....王九九生前口述 (77)
- 巧用计古井拌板徒.....周 儒 (89)
- 宋总司令率四方面军过草地.....董 邦 (99)
- 王维舟在庆阳.....李有义 (106)
- “暴刀逞一快 何惜少年头”
——追记王孝锡烈士.....王干城 巩世锋 王维藩 (123)
- 缅怀马锡五同志.....李世俊 (143)
- 高健君同志在陇右地下党活动的片断.....毛得功 (158)
- 英雄虎胆斗顽敌 鲜血浇灌自由花
——回忆郭化如同志.....杨友柏 (165)
- 扶眉战役中的罗局截击战
.....高锦纯 刘懋功 左 爱 姚知一 (180)
- 一个难忘的冬春.....沈仰之 (189)

“抗大”精神永放光芒.....	刘焕文(206)
参加大生产情景点滴.....	金仲华(212)
艰苦而愉快的生活	
——忆寨子湾开荒.....	赵寿轩(218)
延安保卫战中的武工队.....	贾俊英(222)
绥德游击队活动片断.....	乔兴和(235)
陕甘苏区的红色堡垒——南梁(革命史料)	
.....	武敬东 高文 巩世锋(239)

井冈红旗映亮了陇东高原

郭洪超

照金，是我党坚持井冈山道路，在陕甘交界地带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边人民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就是从这里点燃的。

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首先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建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但由于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使陕甘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起先是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后来叛变革命）推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刘志丹等同志坚持搞武装斗争是什么“左倾盲动”，对革命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又是陕西省委书记兼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杜衡（后来叛变革命）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梢山主义”，硬要刚刚兴建起来的红军远离根据地，南下终南山，结果使这支队伍受到严重损失，全军覆没。革命斗争的失利，使刘志丹等同志更加坚信井冈山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经过许多艰难曲折，刘志丹同志又回来了！井冈山的红旗又映亮了陇东高原。

宣传发动群众

一九三三年秋，刘志丹同志从终南山回来后，和习仲勋等同

志一起，在陇东的华池县南梁堡召开了党、政、军代表大会，以“失败后向何处去？”为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批判了杜衡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克服了存在于一部分同志中的失败主义思想，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举起了井冈山的革命红旗，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第二路陇东；第三路关中。当时陇东的新正（正宁）和新宁（宁县），同陕北的赤水（旬邑）、淳耀（淳化和耀县）等县，都划归关中游击区。

我的家乡正是陇东新正县鞞头塬的鞞子村，座落在子午岭边沿梢山地带。那时，我只十四岁，家里很贫穷，成天跟着大人下地干活，还不懂多少事情。在这之前，刘志丹同志带领的红军，经常在鞞头塬、三甲塬和新宁县东面靠梢山一带活动。可是群众当时还没有觉悟，一来是受了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二来是还不了解革命军队的性质，一听说队伍来了，老乡们就躲进山里去了。有一次，红军来到我们村，我跟着大人到梢山里去躲避。等红军走了以后，我们回到了村里，一看都觉得很新奇，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瓮里都挑满了水，锅碗收拾得整整齐齐，吃了谁家的饭菜，连钱都放在锅盖上。第二天，又听说红军在邻村里杀了土豪劣绅，还给穷人分了东西。由于红军战士严明的纪律和处处为穷苦老百姓着想的实际行动，打消了群众的顾虑，群众由害怕到不害怕，由“钻山”到不“钻山”了。红军在群众中有了好的影响，群众认识到红军是为穷苦人办事的好人。

过了不几天，党就派来了一批做秘密工作的党员干部，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和发动工作。我们村里也来了一个叫杜苑的同志，就住在我的家里。他是来新正、新宁一带开展工作的。杜苑同志是个大学生，中等身材，白净脸，眉目清秀，待人和气，讲起革命的道理更是一套一套的，句句都说出了穷苦百姓的心里话。他每天都和村里的穷人打交道，宣传革命的道理，讲井冈山斗争的

情况，讲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红军是帮助穷人闹翻身的队伍，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引导大家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郭廷藩、郭进亭、郭存信、芦永财、雷根学等人和我，初步接受了革命的宣传，决心跟着共产党，改变吃人的旧世道。后来，杜苑同志就经常在夜里，召集我们十来个青年人开会，分析村里的群众情况，然后给我们布置任务，让我们再分头去向群众宣传革命，发动群众起来跟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作斗争。每次接受了任务，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激动，觉得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常常兴奋得夜里睡不着，鸡叫就跑出去做工作，许多时候连饭也顾不上吃，直到把任务完成。

一开始我们主要是夜晚召集苦大仇深的农民，在山沟里利用开会的方式传播革命道理。当时我们年龄都很小，不知道向群众讲些啥，怎样讲？杜苑同志就把要讲的内容一遍一遍地讲给我们听，直到我们记牢为止。可是，光记住还不行，还得能讲，敢讲，要不然，心里一慌，嘴里就卡了壳儿。一次，有个同志对老杜说：“昨晚我们找了几个穷汉子一起开会，事先想得好好的一肚子话，可是等到要讲时，心里一慌，脸上直冒汗，就把要讲的话全忘光了。这可咋办呢？”杜苑同志笑着说：“起初搞宣传，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头几次开会，常常胆怯。这没有关系，经过几次就好了。我开头也和你们一样啊，还不是硬靠锻炼出来的嘛！不过，宣传要尽快搞起来。你们晚上到山坡的白菜地里，就把白菜当成听众，对白菜讲话，多多练习几次，直到把你要向群众讲的话，讲得滚瓜烂熟了，再当着群众就能讲好了。”我们就照杜苑同志教的办法去练习，过了几天，就不胆怯了，也能讲得顺当了。经过一段的宣传工作，慢慢地就把穷人发动起来了。他们长期来埋藏在心头的阶级仇恨象干柴一样，终于被革命的火种点燃了！

在敌人的统治下开展革命工作，宣传发动群众，是一项十分

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不少同志曾经为此顽强地战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记得在一个深夜里，关中特委宣传部副部长秦善秀同志，在新正县的柴桥子村下的烂窑子里组织人开会，突然被敌人包围了。为了掩护群众和同志们突围，他一个人凭着仅有的一支手枪，顽强地阻击敌人，一直坚持到大家安全转移，最后终因弹尽而英勇牺牲。秦善秀同志的牺牲，更加激起了群众对敌人的刻骨仇恨。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坚持与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进一步把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深入地开展起来。

没隔多久，湫头堡往东的十几个村庄的穷人都暗暗地活动开了。村与村之间建立了情报网和联络点。一有什么情况，各村都互通消息，配合行动。这十几个村庄的一大片地方，以新正县的五顷园子为中心，在杜苑同志领导下，一面向周围发展，一面开展对敌斗争。那时候，湫头、寺村、湫地沟、山河等镇子里，都驻扎着国民党正规部队和民团军。我们手里还没有武器，活动还没有公开，特别是驻在湫头的敌人，离五顷园子和峴子等村子只有几里路，如果我们稍不留神，就会出问题。所以，当时的对敌斗争，主要还是靠革命的宣传，大造革命舆论，去动摇敌人的军心。杜苑同志把我们青年人叫到一起，设法弄些钱买来红绿纸，白天把标语写好，一到夜里就分头去贴。天亮后，敌人据点四周的墙上、树上，到处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敌人一见那些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地！”、“穷苦人起来闹革命！”等内容的标语，都惊慌极了，到处嚷嚷：“是不是红军夜里来过了？”……没想到这种斗争方法真管用，几张标语一贴，敌人老实多了，再不敢到处乱窜着糟害百姓了。

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打下去后，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就更加高涨了。接着，杜苑同志就把十几个村里的青年骨干首先组织起来，找来马刀、矛子和土枪，还有刘志丹同志派红军送来的几条步枪，组建了农民的武装——赤卫队。武装活动是秘密进行的。刀

矛和钢枪白天藏在梢林里，夜晚才拿出来供赤卫队员进行训练。主要训练抓土豪。大家积极性很高，很快掌握了一些军事常识，都会使刀弄枪了。经过充分准备，就打算抓土豪劣绅，以便进一步发动和组织群众。一天，村与村互相一串连，说晚上要去抓土豪。当时一得到这个消息，我们既高兴，又紧张，耐着性子等到天黑尽。我们各自带着武器，分散行动，从四面八方赶到砚子村外，一下子集合起来将近二百人！杜苑同志站在队伍前面，低声给大家分配了具体任务，宣布了纪律，要求大家去了后，只抓土豪劣绅，不准侵犯穷苦人的利益，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然后把队伍分成两路，分头向附近住有土豪的两个村子出发。这一夜，我们很顺利地斗争了两个村子里的土豪，没收了很多东西，有牛羊、粮食、银元、衣服、布匹等等；赶天亮，就把东西送到五顷园子。牛羊和粮食都分给了穷苦人，银元留作活动经费，衣服分给参加这次斗争的赤卫队员们。我也分到了两件衣服，高高兴兴地拿回家里，又把我参加革命组织和夜里去打土豪的事情一说，家里人可喜欢了。

赤卫队员们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向农村的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土豪劣绅，公开地展开了斗争。不少穷苦人分得了东西，群情振奋。通过这次斗争，穷苦大众真正感受到了组织起来的强大力量，从而坚定了跟党闹革命的信念。

进行土地革命

自从第一次打土豪斗争取得胜利以后，我们又接连组织斗争了几个土豪劣绅，群众的斗争热情更加高涨。掖头以东的十几个村庄，很快都成立了贫农团和赤卫队，斗争从隐蔽转为公开了。在这期间，党组织派我和几个同志到南梁豹子川军政干部学校学习了三个月。当时，刘惠丹同志亲自兼任军政干校的校长，非常

重视为革命培养干部。他经常给我们讲课，讲苏联十月革命，讲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讲开创陕甘苏区的条件和策略，讲军事知识。在那短短的三个月里，我们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们在军政干校学习期间，新正县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湫头原全红了，而且很快发展到山甲原、寺村原。我们从学校回来后，又和湫头、山河、寺村、湫地沟城里的百姓先后建立了关系，常派人装扮成卖柴或做买卖的人，打进敌人据点里去，侦探情况，并把写好的标语和传单带进去，交给城里的同志，一夜间就贴满全城。敌人见了如临大敌，惊悉万状。我们赤卫队员也常在夜里出去活动，在敌人的据点周围鸣枪呐喊，扰乱敌人，使敌人昼夜不得安宁。没过多久，敌人在湫头、寺村、湫地沟等处的驻军，先后弃城逃跑了。撵走了敌人，苏区一下子连成了一大片，接着就打土豪分田地，闹土地革命。

苏区里的敌军据点虽然被拔掉了，但土豪劣绅还没有被彻底打垮，因而分东西时群众都来，但分田地时却没人敢要。当时，我们年轻，性子急，见群众不敢要土地，就怨群众落后。地下党召集我们几个干部和骨干分子开会分析情况，学习井冈山闹土地革命的经验，认识农民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他们不敢要土地，这不是农民落后，而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实处，苏区还没有巩固，封建反动统治阶级在农村的反动势力还没有彻底打垮，农民怕手里的土地不牢靠，所以还不敢接受。于是，决定彻底打击土豪劣绅，大张旗鼓地宣传井冈山的斗争经验，首先把进行土地革命的舆论大造起来。

主攻方向一确定，赤卫队前面行动，群众呼啦就跟着来了。不久就把苏区的土豪劣绅全都打倒了。紧接着，我们赤卫队夜晚远程奔袭，最远跑到七八十里路外的旬邑县底庙，郭村、于家庄一带打土豪，没收东西，宣传群众，发展游击区。同时，党组织

还派我们几个干部，到旬邑县的阳坡头、职田镇一带去，就象在跟头点着火那样，在劳苦群众中点燃了革命的烈火。就这样搞了一段工作，群众运动轰轰烈烈，燎原烈火熊熊燃烧，革命斗争如火如荼，苏区发展很快，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局面一新。

一九三四年春，陕甘南梁工农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同时也建立了陕甘特委。刘志丹同志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同志担任特委书记。当年夏天，成立了正（新正）、旬（旬邑）、郃（郃县）工农革命委员会，杜苑同志任主席。当时我仅十五、六岁，也被选为革命委员会的委员。接着，又成立了新正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张邦英同志。那时的政府机关是流动的，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办公。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头次“围剿”。我们五、六个人，由杜苑同志带着，一人背个包包，白天转山村检查土地分配情况，和群众谈话，接受群众的批评意见，研究制定下一步的工作方案。到了夜晚，就转移到荒僻的山沟里，随便往那个破烂窑洞里一住，开会商量工作。实在困了就躺下睡一会儿，天亮后又出去活动。有时情势紧张，我们一夜就得转移四五个地方，几乎睡不上觉。可是白天一进村庄，群众都主动站岗放哨，烧水做饭，配合我们开展工作。当时群众对我们比亲人还亲。为什么亲呢？大家都说不出多少道理来。有一次，我问杜苑同志，他回答说：“群众为什么对党、对党的工作干部这么亲呢？就是因为我们党所进行的土地革命，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从根本上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而我们这些党培养教育出来的干部，又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这就是群众热爱党，保护党的工作干部的主要原因啊！”这一席话，打动了我的心弦，对我们的印象最为深刻了！

开始分田地时，我们不懂政策，识字的人又很少，工作起来困难真大。可是，人们的心里好象燃着一团火，浑身都是劲，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困难。我们几个人坐在炕上，讨论怎么分田

地，一夜都不睡觉。有时接连几天睡不上，大家眼睛都熬红了。一天，又搞到大半夜了，还是讨论不出一个好的方案来，杜宛同志就下命令让睡觉，谁也不准说话。好大一阵，大家都躺在炕上想办法，谁也睡不着。有一个同志装着睡觉，装了一会儿，又“噢”地一声笑出声来。他一笑，大家都忽地一下坐起来，点着灯，又讨论分田地的事情。商量的结果，决定首先发动群众和我们一起来定农村的阶级成份，成立贫农团。贫农团一成立，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土地普查，把好地和坏地都计算清楚。接着，我们和贫农团的同志一起，讨论制定了土地分配方案，按照已经定出来的阶级成份，分配土地。对地主、富农，没收他们的土地，分给比较坏的劳动份地；对中农的土地，原则上不动，但也适当地按人口多少作一些必要的调整；没收的好地全部分给贫雇农，并根据有地和没地、地多和地少的具体情况，按照人口的多少各自分得一份土地，防止绝对平均主义。这样做的结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积极性，发动和争取了中农，孤立和打击了地主、富农，使土地革命得以顺利进行。

在土地革命这一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始终站在斗争最前列的是贫农团。我们把制定出来的一套土地分配方案，连同没收的土地和东西，一律交给贫农团，由贫农团领导穷人分土地。贫农团根据党的政策，商定具体分配土地的方案。他们把木牌子写好，用绳子拉着丈量土地，然后插上木牌子。木牌子一插，地就成了穷人的了。这样一来，贫农团在群众的心目中，那权力可大啦。群众无论有什么事情，都去找贫农团，就连家庭发生纠葛也找贫农团解决。贫农团一作决定，大家就都得按决定去办。

在分田地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对党和红军的感情愈来愈深厚。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稳妥地贯彻执行了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就是打击地富、团结中农、依靠贫雇农。那时候，阶级阵线是非常分明的。在执行政策中，要毫不含

翻，坚持原则，决不徇私情。在自己的亲人或亲友中出了反动分子，就必须带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寺村镇有个恶霸土豪，外号“姚贼”，就和我们的几个同志沾亲带故。他平时住在寺村镇的炮楼上，既反动，又凶残，民愤很大。我们经过多次侦察，一天晚上突然包围了他家的村子。可是，他很狡猾，回家只打了个照面，又溜回寺村镇上了炮楼。我们就没收了他家的浮产，还带走了他的一个小儿子，迫使他不得不收敛了一下反动气焰，把许多暗藏的东西送到苏区政府来，换回了他的小儿子。打击了“姚贼”，周围的土豪劣绅害怕了，从此规矩得多了。

到了一九三四年年底，关中革命根据地已经发展到新正、新宁、赤水、淳化、耀县等地，并成立了关中苏维埃政府和关中特委，先后由杜冤、习仲勋、张策等同志负责。那时候，我在少共特委（相当于现在的团地委）工作。过了不久，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了，关中根据地和陇东根据地就连成了一片。

开展游击战争

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相结合，是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实际斗争也使我们认识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农民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为主要阵地，这便是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直至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然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以武装斗争掩护和发展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又反过来支持和保证武装斗争。从最初宣传和发动群众，到分配土地，都要配合以必要的武装斗争，才能保证各项工作顺利进展。所以，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一面着手分配土地，一面开始进行扩红（即扩大红军）和组织红军游击

队。

初搞扩红工作或是建立红军游击队，比搞赤卫队就难多了。游击队要基本脱离生产，到处配合红军主力去打游击战争，不比赤卫军一面生产，一面保卫地方苏区，一般的都不远离家门。那时候，陕甘一带的群众乡土观念比较强，有句口头语叫做“好出门不如赖在家”，老年人还说什么“金窝窝，银窝窝，不如家乡的土窝窝”。因而，动员青年出去参加游击队或红军，要做通家里老人的思想工作是比较困难的。为了尽快扩大红军，把游击队组织起来，保卫和发展苏区，支持和配合土地革命，党组织给我们党团员和干部分配了任务，分头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当时给我分了一个班的扩红任务，限十天之内完成。这就是说，每天至少要动员一个青年自愿参加红军。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我既兴奋，又觉得压力很大。白天大家都到地里去忙活儿，我们也还有很多别的工作要做，只能夜晚去串门发动。我那时年龄小，莫要说做大人的思想工作，就连要求去当红军的青年人也比我大，找人谈话可难为哩！但是，由于党象一棵参天大树，已经把根深深地扎在了陇东人民群众之中。我就凭着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工农政府的工作人员，先去找我的本家兄弟和亲戚家里的青年，向他们宣传参加红军的道理。从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讲到在中国要推翻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打倒土豪劣绅，我们穷人要翻身做主，再讲到陕甘边区的现实状况，只有去参加红军，扛起枪杆打敌人，美好的日子才能早来到。青年人容易接受革命道理，一听要去当红军都很高兴，当下表示决心要配合我一起做亲人的思想工作。不到十天，我就动员了十二个青年，把他们从新正县带到淳化县的十里堡，交给了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部队。在这十二个同志中，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为革命东征西杀，从战士成长为将军，为党为人民立下了功勋。

一九三五年初，党组织派我和另一个同志去郿县的永乐一带

开展工作，发展苏区。当时那里大多是些小游击区，这里一块，那里一块，还没有连成一片。就整个局势来说，是敌人包围着我们；而在小的游击区里，我们又包围着敌人的一些据点。在这种条件下，不搞武装斗争，不积蓄和发展武装力量，就无法开展工作，发展革命势力，扩大红色区域。我们到了永乐一带，仍然跟开发正（新正）、旬（旬邑）苏区一样，只能在夜里组织群众，开展一些秘密宣传发动工作。我们每人配发了一支短枪，五、六发子弹，子弹很缺少。敌人来了就打，敌人一走又接着开展工作。不多久，终于开发了一片新苏区，设置了永红县（郃县和旬邑县各一部分）。

在那段工作期间，我们在回漱头堰或去永乐时，都得路过旬邑县的底庙镇。有一次，了解到住在这里的民团团总姓王，家里是个中农，思想比较进步。我们觉得可以做工作，把他带的那支民团武装拉过来，壮大革命武装。我们通过关系进行争取工作，没费多少事，就把他教育过来了。过了几天，我们到他的村子里去做群众工作，会场就放在他家的院子里。他带着民团保护我们。不料泄密了，永乐镇的敌人赶来包围了村子，情况十分危急。那时，我俩的身上，除了带有手枪外，还有油印的《国际歌》和一些宣传材料，万一被敌人搜查出来，群众都要跟着受牵连。在这紧急关头，群众没有惊慌，而且齐心保护我们。有人高声喊着：“站起来！站起来！”满院的人一齐站起来，掩护着我们进窑。群众又把我们藏在粮食囤里，上面盖了些粮食。敌人闹腾了半天，也没有搜到我们。最后敌人把老王同志抓走了，关押在郃县。但敌人并没有抓到任何证据，老王同志又表现得很坚强，始终没有屈服。后来，我们和群众一起想办法，通过合法斗争的途径，不出一月就把老王同志从狱中营救出来了。老王同志一出狱，就带着他的一支民团军，和我们一起连夜赶到了漱头堰的五顷园子，参加了红军。在这之后不久，老王同志不幸在一次攻打

敌人据点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亲自出马调兵遣将，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特委从斗争的策略上考虑，让我们暂时撤出了永红县，在那里留下来继续坚持工作的同志，都转入了地下。虽然公开的活动停止了，但地下斗争仍然搞得很出色。红军游击队经常从湫头源奔袭那一带的敌人。每一次奔袭，来回两天时间。头一天夜里去，群众掩护起来，封锁消息，第二天夜里或是打击分散孤立的弱小敌人，或是打土豪没收东西，尔后连夜开到后方苏区，敌人还摸不着头脑。由于红军游击队经常出没，不断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地方反动势力也不敢公开活动。永红县群众斗争，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发展起来，夜里秘密打击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连夜送到湫头后方。这样，到了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永红县又是苏区了。

一九三四年底至一九三五年夏，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得非常快，算是兴旺时期。当时群众大都组织起来了，仅关中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就有十几支。游击队的迅速发展，不仅配合了主力红军进行武装割据，不断补充红军的兵源，而且也能独立作战了。一九三五年的八月，我在十支队当指导员。当时很多乡村全是苏区，只剩下几座孤独的县城被敌人占据着。一天夜里，我们在另一支游击队配合下，准备打旬邑县的张河镇。张河镇是旬邑县伪政府所在地，平时除了民团军驻守外，还有白军正规部队。我们白天派人化装进城去侦察，发现敌人正规部队出城活动去了，城里只剩下些民团队伍。于是我们兵分两路，一个支队围城，一个支队在城附近抓土豪劣绅。夜里，围城的部队在张河镇四周虚张声势，又是打手电筒，又是放纸炮，又是吹号，敌人以为是红军大部队围了城，惊慌失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城里枪声乱响，整整折腾了一夜，就是不敢出城门。我们十支队在城附近到处抓土豪劣绅，没收了一大批浮财。没出半夜，抓了五六个大土豪，拉了十

几匹骡马，牛驴牲畜不计其数，金银珠宝，钱粮衣布，没收得很多。我们抓紧时间组织人背畜驮，连夜运往苏区。刚离开张河镇，天下起瓢泼大雨来。雨下了半夜，路滑得象抹了油似的，东西又很多，路上很难行走。但是由于打了胜仗，没收了地主的大批东西，人们十分兴奋，劲头很大，一路上泥里水里全然不顾，天亮时分就顺利地赶到了后方。群众一听说把张河镇城附近的土豪给收拾啦，当下欢天喜地，可受鼓舞啦。

没过几天，我们游击队又去攻打张河镇。上一次，敌人吃了亏，事后连忙把正规部队都调回来驻守。但是敌人却很麻痹，认为红军刚打了土豪劣绅不几天，不会再来了。我们正是掌握了敌人的这种情绪，半夜里突然围了城。这次战斗是赤水县委书记黄子文同志指挥的，他曾在刘志丹同志的红军部队里担任过团政治委员，作战勇敢，又善于用兵。攻城一开始，敌人的火力很猛，游击队的武器差，子弹还得数着用，一时攻不上去。黄子文同志果断地命令部队撤退。我们刚撤出土桥时，敌人气势汹汹地追来了。拂晓时分，部队上山压在那畔的一条胡同路上，准备打敌人一个伏击。敌人很骄傲，只顾追，一下撞入了我们的伏击圈。眼看敌人已到了我们的面前，我们扑上去就能抓住敌人了，而敌人却还没有发觉。突然，黄子文同志大喊一声“冲啊！”打响了头一梭子。紧接着，部队一人打了一排子枪，敌人就躺下了几十个。气焰嚣张的敌人，被打了个懵头转向，顿时象炸了窝的黄蜂，满山飞花了，四下里乱撞乱逃，各自奔命。我们趁势发起一个冲锋，一阵猛冲猛打，敌人死伤惨重。这次伏击战是我们游击队打的头一次大胜仗，缴获了几十条步枪。战斗结束后，大家高兴极了，满山坡打扫战场，寻找敌人打下的子弹壳，带回来自己装药造子弹。别看那些拣来的废弹壳，战士们可把它当宝贝哩！我们用自己灵巧的双手，用木头削的工具把废弹壳弄规则，然后灌满水，用棉花塞上口，倒栽在地面上往下打，靠水的压力把撞针击成的小坑儿整

平，再装上火药，安上自己用锡铁倒出来的弹头，新的子弹就造出来了。因为在当时，红军和游击队的枪枝弹药得来十分不易，除了从敌人手里夺而外，还得靠自己动手造出一些来。张河镇战斗使用的子弹，就大多是红军自己造的。张河镇接连两仗，把赤水县的反动势力一下子打垮了，根据地又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一九三五年九月，正当陕甘革命根据地胜利发展的时候，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一次影响到了陕甘，在根据地全面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和“清党”。陕甘边县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红军营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关押起来，就连刘志丹同志也被抓了。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同志受到残酷斗争，迫害致死。杜宛等同志，就是那次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致死的。陇东苏区的广大群众，对机会主义的做法产生了极大疑虑，敌人乘机大举进攻，地主富农纷纷“反水”，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消息，使陇东苏区的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受到了极大鼓舞。当时，我们一面组织群众准备中央红军的食宿，一面跑几十里去远程迎接。中央红军对陇东根据地的军民十分热情，拿出了不少枪支弹药来支援我们的斗争。那种亲热的场面，实在令人难忘。打那以后，陕甘军民便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从胜利走向了新的胜利。

回忆营救红西路军二、三事

吴 鸿 宾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周恩来、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革命气魄，以及关心、爱护革命同志的精神，使我永远难以忘怀；他们那高大的形象仿佛仍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一九三六年年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刚解决不久，西安这座古城虽已是北风呼啸，地冻天寒的一派严冬景象。可是，在人们心里激起的那股民族抗日图存希望的暖流，却犹如灼热的岩浆沸腾、激荡。

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逼蒋联共抗日。然而流氓成性的蒋介石却玩弄各种手法，拖延时间，以采取新的对策。南京政府的亲日派何应钦，则极力主张明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阴谋借此机会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如何解决这一事变，杀蒋，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求之不得的事，那将使更大的内战爆发，为敌渔利；放蒋，纵虎归山，民愤难平，亦非善策。对此，张、杨颇有骑虎难下之感。

“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党中央正确分析了事变发展的前途，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全局出发，坚决反对新的内战，提出

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援助张、杨，我党派周恩来等同志去西安谈判。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西安为张、杨拨雾指津，使他们看清了方向，找到了正确处理事变的途径。经过我党代表团的积极工作，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使“西安事变”得以顺利解决，从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众。当时，我正在西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西安的街头巷尾，茶馆酒楼，人们把“西安事变”当作话题议论纷纭，久久不息。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派到西安解决事变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更是以敬佩的语调，绘声绘色地谈论不已。中共代表团带来了抗日的新曙光，人们受到无限鼓舞。

就在这时，一件繁重而我没有料想到的任务，党组织要我来完成。

一天，杜斌丞先生来到广济街一号住处找我。我一如往常地接待了他，彼此随便谈了几句平常话以后，我就问他的来意，他只是平静地回答说：“没啥大事，我告诉你，将有位姓张的同志来会你，有些事情跟你商议。”从他的语气里我听不出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可是，在他那神情之中却使我察觉出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急切地问他：“哪位姓张的？他是什么人？”就在这时，我一面想问个究竟，一面在记忆里搜寻我所能记起的姓张的熟人。杜先生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说：“这位同志，你不认识。其实，他倒不是位主要人物，是他要领你去见另一位朋友。”这样一来，更使我感到迷惘了。我还想再问个究竟，后来一想，象从事我这样工作的人，再追根问底就不太合适了。

杜先生离去不久，果然有人来访我，但不是一位姓张的同志，而是两位张同志：一位叫张文彬，另一位叫张子华。由于杜先生事先打了招呼，我当时并不感到突然。经过交谈，我知道了

他们是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于是，我不由想到：莫非他们带我要去见的那位朋友是——？不会的，周恩来同志肩负着党的重任，日夜为团结抗日大计操劳，会见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似无可能。就是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情我随他们到了西安办事处。

在一间不太宽敞却很洁净的房子里，有几件简单的桌椅井然有序地摆在房子四周。不一会儿，张文彬同志从另一房间陪同一位步履轻快，仪态从容，面露微笑的中年人走来。张文彬同志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周先生。”这时，一双热情、有力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来了，请坐。”他亲切而随便地指着靠窗的沙发让我坐下叙谈。这时我略感到有点紧张、慌乱，因为这是我曾预料但认为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还是免不了感到有些突然而又惊喜。

啊！这就是我久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呵！

我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在白色恐怖下，在极为秘密、隐蔽的情况下，曾会见过许多位我们党的负责同志，但都是地方上的领导人，象会见周恩来同志这样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这就是一九三六年末西安千家万户、妇孺童叟人人传颂，万人景仰的一个人——周恩来。

此刻，坐在我身边的正是举世闻名的人，他穿着一身洁净的藏青色中山装，朴素、庄重，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两道浓眉下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周恩来同志面带微笑地看着我，亲切地询问：“你在这里呆的时间很长了吗？在本地你认识回民中的一些朋友吗？”从他那略带江北口音的语言里我意会到，周恩来同志所问的是指一些有影响的回民中的上层人士。我回答说，“有一些，但都不是名气太大、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周恩来同志听了以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想一想看，也不一定非是大人物不可。”这时，我还体会不出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意思。周恩来同志又对我说：“是这样

的——”此时，他脸上显出有些焦虑的样子，说：“有这样一件事，是党很关切的一件事，你可能听说了吧？秋天，我红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处境很不好，很危急，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想想看，看有没有能和那边谈上话的人？”周恩来同志稍停片刻后，接着说：“这件事情请你和张文彬同志商量一下，在回民中找个关系可靠的人，能向那边传过我们的意思，对被围困的红军只要不伤害，对那边条件可以答应，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住这几百人的性命。”在说这一席话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的目光一直看着我，仔细地看我有何反应。我急忙回答说：“请周先生放心，我一定尽力找这方面的人。”这时，周恩来同志向张文彬同志交代说：“这件事你认真办一下。”

当我告辞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握着我的手说：“看有什么困难，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解决？请告诉张文彬同志。”

离开办事处，张文彬、张子华同志陪我回到住所以后，张文彬同志向我详细介绍了关于红西路军的情况。

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假借中央的名义，打着开辟西北根据地，打通国际……的旗号，命令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红西路军，迫使这部分同志在甘肃靖远附近渡过黄河，结果受到敌胡、马军十三个旅和地主武装的围攻、堵击。我军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一无补充，二无装备，而对拥有骑、步、炮兵的敌人，那结局是可以想象的。

张文彬同志还介绍说，红西路军过黄河后，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我军也损失很大。后来，青海马步芳的主力部队从扁都口插过来，把红军分割成几部分，使红军陷入困境。这次我们要去营救的是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的五百名红军指战员。

经过我和张文彬、张子华同志仔细商量，决定刻不容缓地找一位可靠的朋友去河西进行营救。可是，有谁可以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在送走张文彬、张子华同志以后，我反反复复地把

我在西安的一些回民关系考虑了一番，我想到一位相识，此人就是马德涵先生。他六十多岁，当过小学教员，曾在西安回教促进会工作过，住在羊市街七十二号，与我的住处相距不远。由于我们都是回民，又知道他为人正派，政治上是可以信赖的，因此我们彼此有交往。这时，他已赋闲在家，因生活困难，以卖画为生。我了解他与马家有些关系，再就是他擅长书画，同时与回民中的某些知名人士也很熟稔；他与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麟也有结识，偶有往来；与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在此仓促紧迫之时，我连夜走访了马德涵先生。开始，我还不敢把事情和盘亮出来，只是试探性地提，是我的几位朋友，在张掖被马家队伍围在里边，可否能通过马步青代为疏通一下。谁知这老汉竟满口答应下来，只说是年事已高，去张掖路上交通问题咋个解决，我见事有眉目，便说交通问题等我明日找人设法解决。

走出马德涵先生家，夜已很深，路上行人稀寥，寒风刺骨，但我却非常兴奋，恨不得马上去找张文彬同志告诉他这一情况。

翌日一早，我就把马德涵先生答允之事作了汇报。我提出由张文彬同志亲自与马先生会晤一下，经过商量，张文彬意见还是让我去见，并转告马德涵先生这是周恩来先生所托，请他只是带去个口信，说明只要不伤害被围红军，可以要枪给枪。关于去张掖交通问题，张文彬说可以解决。

当我再次去会马德涵先生时，我就把事情的真实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当他听到这是周恩来同志殷切嘱托之意时，现出极为惊讶的神情，直呆呆地注视了我好一阵子才开口说道：“啊！这怎么敢当？想不到周先生这样信赖我，我怕……”

我诚恳地说：“马先生，这事是关系到几百人生死的大事。此事成败不说，我们请您再三考虑，但愿不会为此给您带来什么麻烦。”马先生听后纵声大笑，很动感情地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马某已是花甲之年，此事不足为虑。我佩服共产

党，这次“西安事变”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计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周先生为人我非常敬佩，此次蒙周先生如此器重，莫说担些风险，就是为此拼上性命也是值得的。”老汉这一席话真是感人肺腑，令人肃然起敬。

后来，张文彬同志把此事详细地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意见：事要抓紧，最好早日动身。并且叮嘱张文彬说，马先生年岁大了，耳朵又不灵便（当时人称马德涵为马聋子），最好再找个人路上好有照顾。

谁来陪伴马德涵先生去甘州最合适呢？

事有凑巧。我的一位至交马宪民正好来西安收帐。马宪民，海源人，他父亲是做皮行生意的，结交也比较广，跟我的关系也较深。当年马宪民在天水读书时，就住在我家里，有时，他父亲来西安办事总要到我家探望。我想，如果由马宪民陪马德涵先生去甘州那是最理想不过了。

我找到马宪民说明来意后，他也颇感意外，但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他与马德涵也是熟人，互有往来。

接着我就为他二人买了去武威的飞机票。马德涵先生得知马宪民为伴同行，又可乘飞机前去，非常高兴。老汉说：“平生第一遭儿坐飞机，去凉州虎口救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哩！”

马德涵二人飞抵武威后，立即去会见马步青。由于有师生之谊，马步青接待还客气，马德涵婉转地说明来意后，马步青颇感惊异，但也未深问根底，答应可以解决，并亲自介绍马德涵先生去见其属下旅长韩起功。他二人又乘车赶赴张掖，韩见是上峰介绍而来，接待尚佳。他告诉马德涵先生说，黄番寺被围的红军已经解除了武装，对人员也未加伤害，不久前已送青海去了。

一周以后，马德涵与马宪民返回西安，由张文彬把此行结果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对马德涵先生不计年迈，远途跋涉表示感谢，并对此行结果感到满意。因为，这次张掖之

行，在营救红西路军同志工作上起了一个缓和作用，目的已经达到。

解放后，周恩来同志对马德涵先生还念念不忘，曾给陕西省委打过招呼。后来听说马德涵先生生活有些困难还汇过钱来资助，知道马先生耳聋还特意送来一个进口的助听器。

(二)

马德涵从武威返回西安几个月后，我总是担心着流散在河西、青海的那些落入敌手的红军战士的命运。

一九三七年四月，西安这座古城已是翠柳吐絮的时候了。我得知青海省主席马麟从天方朝圣回来，途经西安，并在此停留一段时间。他住在当时西安一家很象样的旅馆——桥梓口的天安栈。这家旅馆常作为一些有名望的人物来往驻意之所。随马麟同行的还有青海省府的秘书长谭克敏等人。

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这是一个建立工作渠道、搞统战关系的机会；通过马麟可以结识一些人；也许还可以通过马麟在那边安插个职位，那对我们开展工作不无裨益。我把这一想法向张文彬同志讲了，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认为马麟刚从南京回来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可能了解一些情况。另外，把马麟的工作做好了，他回到青海对我们工作也有好处，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有机会进一步摸清红西路军的情况。我们商量以后，就约请马德涵先生同我去拜访马麟。

马麟个头很高，看样子有六十岁了，留有山羊胡须，头上戴国民白帽，身穿深灰色调长袍，沉静寡言。由马德涵引见后，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我曾在天水给邓宝珊当过秘书。闲谈时马麟也谈到他曾去过天水，由此话题又谈了些天水的情况。因为是初次相见，我们只是作了一般的寒暄，为以后接近作些准备。

事后，我又同张文彬商量，打算宴请一次马麟，同时请周恩来同志参加，趁便与马麟会见。根据了解的情况，知道马麟虽为青海省主席，但并未掌握实权，他为人比较开明，我们都觉得可以安排这样的会见。

可是，在哪里会见好呢？

马麟是当时青海省主席，让他到七贤庄去会见周恩来同志不妥；如果让周恩来同志去桥梓口会见马麟，在那样环境中会对马麟的处境不利。商量的结果，还是以我和马德涵的名义请马麟吃饭，在宴会上让他们会面为好。我们决定事先暂不把周恩来同志也出席宴会的事告诉马麟。此事由张文彬向周恩来同志请示，周恩来同志表示同意，决定与马麟会见。

于是，我和马德涵就给马麟和谭克敏发了请帖，在桥梓口的天锡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酒席，叫到西羊市街马德涵先生的住所。这地方是当过县长的马子健的房子。所以要选在这里，一来环境清雅安静，二来不为外界注意，便于谈话。这一天，周恩来同志与张文彬先马麟而来。时近中午，宾主入席间，马德涵请出周恩来同志向马麟介绍说：“马主席，我向你介绍一位朋友——”他这时指了指刚刚步入室内的周恩来同志，说：“这位是周恩来先生。”马麟乍一听吃了一惊，神情有些不安，但很快又镇静下来，连忙伸出手来向直趋前来的周恩来同志说道：“啊，幸会，见到周先生太幸会了！”这时周恩来同志显得非常自然，很随便地和马麟握手致意，说：“马先生这次朝圣回来，辛苦了！”宾主寒暄过后，相继入席。席间，大家边吃边谈。起初，马麟和谭克敏还有些局促不安，等他们发现周恩来同志那样平易而豪爽、坦荡后，气氛渐渐和缓自然了。我记得当时马麟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关于抗日的一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很扼要地把我党团结抗日的一些主张向马麟作了说明，总的是希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团结则存，分裂则亡的道理。马麟听得很入神，不住地点头表示

赞同，从他的表情看，他对周恩来同志那言简意赅的见解表露出钦佩之情。谭克敏偶尔也插些问话，显得不那般拘谨，而变得轻松起来了。宴会期间，自始至终，周恩来同志从容自若，侃侃而谈。马麟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这次会见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由于事先和房东作了安排，庭院宁静，绝少干扰。

散席后，周恩来同志与马麟握手道别。当我们送客人到巷道时，看见外面围了很多人，正在悄声议论。好在这次会见聚得突然，散得快速，没有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但这件事在回坊中震动很大。事后，张文彬同志让我到马麟那里看一看有什么反映，于是我趁回民作礼拜去会马麟。礼拜毕，在一间小礼拜室里，我们打了招呼，寒暄一会儿以后，我把话题引向那次会见的事，我随便地问他：“马主席，前次吃饭，你对周先生印象怎样？”马麟听我提起这个话题，向两旁环顾了一下，稍想了想说：“啊，很好！很好！周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说到这里，他伸出大拇指，轻声地向我说道：“周先生是共产党的了不起的人材，有远见，也很健谈，我是很钦佩的。”

那次会见，在马德涵住处的群众中也引起了不寻常的反映，不少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共产党摆的“鸿门宴”，担心这下子非把马麟抓起来不可；还有的人怕闹出乱子来，出危险……。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所担心的事根本没有发生。他们所看到的是客人们友善谦恭地握手告别的情景，那些人才松了一口气。有人不胜惊奇地说：“看不出来呀，这聋老汉（指马德涵）还有这一手哩！”从此，人们对这个平日默默无闻、卖画度日的老汉再不另眼相看了。好久好久，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着这件不寻常的新闻。

（三）

宴请马麟以后，张文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我到青海

西宁去了解被俘红军的处理及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我向马麟提出想去西宁找个事做，请他给马步芳写个介绍信，马麟当时很痛快地答应说：“好，我给子香（马步芳的号）写个信。”于是当面吩咐谭克敏写了介绍信。不几天，我就带了马麟的介绍信去青海了。

到西宁以后，我住在毛顺皮毛厂我的一个亲戚家里。西宁，这个西北高原的边远城市，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显得十分萧条。我找到了古希贤（马步芳的秘书，汉中人，曾当过县长）、马霄石（马步芳儿子马继援的老师，甘肃灰县人，曾任过西宁县长），由他们把我引见给当时青海省代主席马步芳。

那天，在马步芳接见一个客人时，把我也同时接见了。因为我是他叔父马麟介绍来的，他的态度还是很客气的。

因为我曾听马德涵说过，在被俘红军中有些是文工团的团员，还有妇女和娃娃，所以在那次会见时，我特别留意那里一些人的举止，看有没有我们的人。正好，接见不久，马步芳就叫他的歌舞团表演节目，我发现这些表演歌舞的正是被俘的红西路军的一些文工团员。其中，我今天还记得的一个女演员的名字叫黄国秀，她在当时是演得很出色的一个（以后听说她的结局很惨）。对这次演出，因为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所以当时并无欣赏歌舞的心情，只是装作很有兴致的样子。

在这次接见时，由于马步芳早已得知我们在西安宴请马麟的事，因此，对于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婉言谢绝了。古希贤、马霄石对我说：“马主席说，我们这里范围小，地盘也不大，恐怕不能使吴先生有所施展，等以后再说。”对这件事，以后我从侧面听到，马步芳曾给马霄石说，“这个人很厉害，用不得！要谢绝。”

在西宁找工作的希望落空了，我又用几天工夫，通过明访暗察了解被俘红军情况。我了解到，孙玉清军长被俘到青海后已被杀害，有的干部还被关押，有一部分被俘的红军被他们改编成军

队在乐家湾训练，待遇很坏，在严冬里连帽子都没有。此外，在澡堂、饭馆，我亲眼看到一些年轻的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当了堂倌、勤杂；有的还被送到皮毛厂里当工人，看守很严，不好接近。

八月，我返回兰州，向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谢觉哉同志以极其关注的心情听完我的汇报，并告诉我：目前党组织正积极设法继续营救他们。以后我们党做了大量工作，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把失散或落入敌手的红军干部、战士营救收容，使很多人都得以重返革命岗位。

(一九八〇年九月钟政整理)

平东工委的地下斗争

张可夫

记得早在一九二五年，党的地下组织在平凉一带就开始了活动。那时候我正在上学，一位老师就是共产党员，经常在课堂上给我们讲共产党的主张、讲革命道理。以后，由于我家景不好，不能继续就学，在我十二岁的那一年，不得不离开了学校，走上社会开始给人家当店员，后来在部队当勤务，在工厂当过工人。在旧社会当店员、工人是被人瞧不起的职业，挨骂受气，日子很艰难。于是，我经常想起以前老师讲的话，盼望有一天能够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实现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了起来。全国抗日的形势迅速发展，民族图存有了希望，我感到好象这种日子就要来临了。所以，我积极参与了组织工会的工作，当上了平凉市工人救国会主席，次年三月入了党。之后，在中共平凉市委作负责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党组织又派我到边区学习。

平东工委的成立

我到边区以后，甘肃工委特派员李义祥同志，以医生为业作掩护，在平凉、华亭等地继续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工委成立前，这一带发展党员二百多人。

平凉一带地下党工委是四六年八月正式成立的。当时，华亭、平凉党员比较集中，所以，开始时叫华平工委（即中国共产党华平地方工作委员会的简称）。以后工委以平凉以东为主要活动范围，所以又改为平东工委。

组建工委的时候，我在边区陇东地区镇原县委当统战部长（那时的镇原敌我各占一半，都叫镇原县）。当时，陇东地委通知我去庆阳，由陇东地委书记李和邦同志、甘肃工委书记朱敏同志、西北局组织部干部科科长惠庆琪同志给我谈话。他们讲，王震部队要从中原突围回边区，中央指示要我们组织力量配合中原突围，迎接王震部队回边区，并要求借此机会扩大边区根据地。西北局让陇东地委、甘肃工委具体落实中央的这一指示。为此，甘肃工委决定组建陇南、海固、华平三个工委。并积极扩大根据地。他们还告诉我：为了配合各工委的工作和扩大根据地，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还抽调武装力量组织了三个大队，陇东地委和甘肃工委还抽调人力组织了三个干部队。据我记忆，当时各工委、武装大队和干部队的人员组成是这样的：陇南工委书记由孙作宾兼任，副书记是惠庆琪，武装大队司令是刘任达，副司令是马富吉，干部队队长是高健君；海固工委书记是陈致中，武装大队司令是马思义，干部队队长是赵崇德；华平工委书记兼武装大队政委是张可夫，副书记是李义祥，武装大队队长是段全才，副队长是张钧平，副政委是黄鼎，干部队队长是刘守贤。

在庆阳谈话以后，我回到镇原县城孟坝作出发准备。不日，甘肃工委委员、组织科科长陈成义同志带着武装大队和干部队来到孟坝，向我详细交代了工作任务，并移交了所带的全部人员。当时，五省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张仲良同志也来到孟坝，还给我们讲了话。在讲话中，张仲良同志认为华平一带创建根据地的基础和条件比较好。并举例说，他们当初搞革命时，人手少、条件差，枪枝不多，为了迷惑敌人还用木头做假枪。最后勉励大家说：

“你们现在有二百多党员，武装力量是八路军，又有机枪、掷弹筒等武器，工作一定可以搞好。”甘肃工委当时给我们确定的活动范围是六盘山东面，泾河川两岸，平宝公路一线（即东有麟游，南有陇南，西有海固，北有边区）。力量组织好以后，我们具体研究部署了行动方案，李义祥同志负责安排了接应武装大队的站口与向导等事宜。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就开始了活动。

九月初，我们从孟坝出发，先后经过敌镇原的惠家沟门，平凉的张家河、关家雅河，最后到达华亭关山山脉的海龙山。每到一地，都和当地的党员接关系，找来谈话，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安排扩大边区的工作，有时还发展一些党员。当时走到那里，老百姓都很拥护。他们说：“过去只听说共产党好，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见到了自己人心里就踏实了。”群众盼望着共产党来，信任共产党，党和群众之间确实是鱼水关系。这段工作，前后不到一月，虽然时间不长，但所到之处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党员和群众，为以后开展地下工作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段活动中，我们曾与敌人的地方团队相遭遇，而且也有点损失。段全才等同志被抓走，黄鼎同志牺牲了。最后鉴于王震部队已回到边区，配合突围的任务已经完成，工委决定结束活动，我们便撤回庆阳。

在庆阳，我们对这段工作进行了总结。根据当时情况，甘肃工委决定把武装大队仍归还部队建制，留了我和李义祥等几个人，转入正常的地下活动，继续坚持华平工委的工作。接着，我们以武工队的形式在伪镇原县新城一带活动，人员除我和李义祥之外，还有韩天俊、马有德、孙克禄、徐连成等同志。从当时的情况看，以武工队的形式进行活动比较适宜，人员少，活动方便，便于隐蔽。这时，我们串联群众，打击敌人，寻找关系，发展组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

随着工作的开展，力量的壮大，华平工委改为平东工委，活

动范围主要是在平凉以东，包括平凉、华亭、泾川、灵台、镇原、固原一带。以后，上面还陆续给我们派来了一些同志，除我和李文祥担任书记、副书记之外，并配备了高俞修、潘光亚、孙存弘、向景义、贾庆礼、韩天俊、张友三同志为工委委员。

当时工委的主要工作任务总起来有以下几条：一是建党，壮大组织；二是做乡（镇）、保甲工作，搞两面政权；三是做地方武装团队工作和发展武装力量；四是建设红村子；五是承担交通工作，护送出入边区的人员。

向白区扩散党的影响

工委建立的初期，在活动方式上曾存在着分歧。有人主张住在边区，指导白区地下工作。但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个意见。多数同志认为，边区虽是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在这里培训干部，搞点经济补给是必要的，但如果纯粹蹲在边区，地下工作是深入不下去的。因而大家主张到白区去，直接开展地下工作。以后，我们按大多数人的意见，离开了边区。

到了白区，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立足，如何扎根。为此，必须坚持西北局决定的以贫雇农为主的建党路线，在农村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同时，也要打入乡（镇）保甲，利用敌人政权作掩护。这两方面的工作结合起来，既能站住脚，又能扎下根，利于工作的开展。

当时，在我们发展的党员中，贫雇农占绝对优势。在农村，贫雇农最穷苦，革命要求强烈，政治上坚定可靠，一般又都忠厚老实，在群众中有威望，所以，通过他们扩大党的影响，联系群众，了解情况，地下工作才有一个好的基础。我们走到哪里都得依靠他们，吃住由他们安排，行动由他们掩护，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骨干。灵台的小村徐家，这个庄子居住集中，贫雇农力量很强，

我们在这里先后发展了三十几个党员。我们到庄里去，群众有啥话我们帮着干，群众有啥话都对我们讲，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在这里发动搞什么事情都比较顺利。当然，建党以贫雇农为主，也并不排除其他阶层中的先进分子，中农、富农中有合适的对象也发展。

但不能否认，农民群众也有自发的一面，只有经过教育引导，才能使他们走上自觉革命的道路。我们工委副书记李义祥同志，家在镇原新城，惠家沟门的李家山。他大哥哥叫李义海。这个人讲义气，能联系人，在庄子周围有威望。他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但开始时也不信任共产党。他经常说：“我不管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我就是要把伪镇原县的坏蛋打倒。”当时，他联系了一批人（其中有受苦的庄稼汉，也有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每天晚上集中起来搞演习，准备攻打镇原县城，闹得风声很大。我们去引导工作，他怎么也不听。以后伪县政府知道了，派县自卫队抓走了他的一个人，李义海为此很气恼。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他家，他采取激将的办法要我们把拉去的人替他劫夺回来。我们劝阻他，他不但不听，反说我们怕死，自己要带着手拿大刀、长矛的庄稼汉去救人。后来经好多次讲道理才把他劝下来。对此事我们通过了一些关系，花了点钱，把抓去的人给救了出来。之后，我们利用这件事，反复启发教育李义海，给他讲共产党的主张，讲党的原则和策略，使他思想上开了窍，觉悟有了提高。他懂得了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所以也积极要求入党，以后被我们接收了，在当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两面政权是利用当时敌人政权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的一种方式。按照“名为国，暗为共，化国为共，化敌为友”的方针，对敌人的基层政权渗透、分化、瓦解。对那些能够争取过来的乡（镇）、保、甲长，把他们争取过来，有的控制起来，有的接收入党。同时还动员党员去当乡（镇）、保、甲长。政权中有了我们的人，一

方面应付敌伪上层领导机关的差事，使老百姓少受损失；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身份，接触更多的人，找更多的关系开展工作。当时，动员党员去当保甲长都不愿意干。因为这个差事得常给老百姓找麻烦，都认为不是个好事情，所以，做通一个人的工作往往要费很大的事。实际上，让我们的人进入乡（镇）、保、甲，这是和敌人争政权，政治上争主动的有效措施，对党、对群众都有好处。敌人政权的内部渠道被我们控制起来、利用起来，这样对掌握情况、开展工作很方便。平凉刘家后沟的刘荣山同志当了保长后，他将按户口派款改为按家庭情况好坏评出底分，最高的三十二分，最低的一分，然后按底分多少分摊到户，做到合理负担；派兵按弟兄多少分配，这样群众就拥护。以后平凉工委在什字镇选举镇长活动中，通过工作，在所属七个保中争取了四个保的选票，使刘荣山当选为什字镇的镇长。他一当镇长就与北塬上的安定乡、盘龙镇、梨花乡的乡镇长相互配合，对国民党政府抓兵派粮的命令一直应付拖欠，这样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便于我们工作，官方与群众都说这一带是“屁红地区”。平凉四十铺当时是伪政和乡，乡长王振国，副乡长崔生科以及下面的办事人员都是地下党员，我们在这里还开了一个小杂货铺。还有平凉的潘家保，保长也是我地下党员，在这里以保的名义由地下党开办了一个纸烟铺，并另外派了一个党员具体经营。在安口窑我们还利用关系开了一个客店。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成了我们公开活动的据点。象这样以两面政权为保护，搞起的活动据点有：黄家寨、土谷堆、惠家沟门、黄土寺、小马家、刘家后沟、陈家坪等地。

当时工委比较重视宣传工作。我们这里离边区比较近，报纸（《解放日报》、《边区群众》、《陈东报》）、书刊（《论解放区战场》、《论联合政府》、《论党》、《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解放区地图等）及其他宣传材料都可以送来。有些内容，我们利用乡邮所的关系给敌人送，特别是给中上层送，还用

伪专员公署的信封往外寄我们的宣传材料。有些我们还抄下来，公开张贴或散发传阅。这样一来，社会上震动很大，好人看了受鼓舞，坏人看了很害怕。当初，反动派造谣说八路军、共产党被打得上了摩天岭了，我们的宣传品一出去，群众不再相信他们的鬼话，说八路军、共产党又回来了。我们把做宣传工作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以后，边区的《解放日报》还作了报道，题目是《无声的炸弹》。

经过一段工作，工委组织有了发展，力量不断壮大，为了便于工作，平东工委还陆续成立了一些基层组织，主要有平凉工委（主管城市工作，由向景义、张友三、韩天俊等人组成，向景义任书记）、镇固工委（由高俞修、孟致才、陈宗祥、张生荣、张元龙等人组成，高俞修任书记）、华亭工委（由李义祥、马有德、何顺义、王东元等人组成，李义祥兼管）、泾川党的工作由孙存弘、贾庆礼负责；灵台党的工作由乔培仁、吴国栋负责；崇信工委（也叫月品工委，由张可夫、李仲兴等人组成。张可夫负责），还没有一个直属工委（由张可夫兼管。下属三个区：一个是石佛区，白秀川任区委书记；一个是安口区，曹凤元任区委书记；一个是峡江区，李世清任区委书记）。平东工委还组织了一个行动队，主要是抓坏人，执行紧急保护任务，由杨希江、薛荣、耿子昌、季××、木成章等人组成，杨希江任队长。以后还把刘治华在静宁、庄浪、隆德发展的一些党员也划归我们工委。

为了提高党的干部，甘肃工委自一九四九年上半年开始办起了一个教导队，专门培训党的干部（由贺进民同志任指导员，张生强同志任队长）。教导队以学习党的建设为主要内容，也结合学习其他政治理论。我们离边区近，来去方便，送去培训的干部也比较多，先后大约有一百多人。通过学习使这批党的干部受到了教育，提高很快。

工委工作的地下特点

当时陇东十七县分属于伪第二、第三两个专员公署管辖。第二专员公署管平凉、崇信、华亭、隆德、静宁、庄浪、海原、西吉、化平、灵台；第三专员公署管固原、正宁、宁县、镇原、环县、合水、庆阳、泾川。平东工委的活动范围是这两个专员公署辖区的交叉地带。这两个专员公署都有便衣队和特务训练机构，县政府都有社会科和汇报秘书；武装力量方面有保安部队，县和乡（镇）都有警备队，还设立了许多关卡和哨所，同时，地方军阀马继援的军队也住在这里，到处活动。敌人通过这些多种渠道对我地下党进行严密的监视和疯狂的破坏。另外，从社会下层来讲，有一贯道、青红帮，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总之，情况很复杂，社会很黑暗，群众很困苦。所以，工委的工作必须适应这种社会现实，具有地下的特点。这主要是掩护身份社会化、职业化；发展党员可以变通办理；内部严禁发生横的关系。

白区工作人员的掩护身份要社会化、职业化，就是适应当时当地的情况，需要什么身份就利用什么身份，而且做啥要象啥。比如，当时敌方有一个防奸保密小组，是敌人的外围特务组织，乡（镇）长都得兼这个小组的组长。几个保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区分部，乡（镇）长都得当区分部委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党员当了乡（镇）长，也就同时允许他们兼这些职务。对担任乡（镇）保甲职务的党员，一定要保护他们的身份，不能引起敌方的怀疑。对其他白区工作人员，掩护身份可以是农民、商人、医生、教师等。不管利用什么身份，都要在装饰、言行、举动等方面符合身份。如农民身份的党员，到一个地方可以帮老百姓种地、担水、劈柴，做些杂活，倘若别人询问时，就说是走亲戚的，这样一般不会引起什么怀疑。如果以医生为掩护身份，到哪里就只能看

病，再帮着干其他活就不象了。泾川有个罗家湾，孙存弘同志就以医生为职业，在这里看病，兼开药铺。当时他化名刘中元，别人都叫他刘先生。他不管到哪里都以看病为名，联络都用暗号，做得很象。利用掩护身份如果稍不注意就可能出问题。记得当时省工委给泾川派了一个特派员郭生满，为了立足，给他租佃了些别人的地，让他专门种西瓜，但他没有注意，西瓜开园后，不管谁来吃瓜都不要钱，结果引起了伪禹都镇长的怀疑，派人来多次盘问，寻找麻烦。以后我们只好找人具结担保，才免受意外。

另外，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个适应社会环境的问题。有的村子，家家入一贯道，这种情况下，党员本人，党员家里，也要允许入一贯道。灵台这个问题就很普遍。搞地下工作的同志，到那里都要尊重群众的信仰和习惯，不能超越群众的觉悟程度。

白区发展党员可以变通办理，这是七大党章中规定的。也就是说，在白区发展党员可根据具体情况简化手续。因为当时都是单线联系，个别接头，又没有基层支部，手续复杂了不便于实行。就拿一年预备期来说，接收一个党员，一年后往往不能准时再去给办理转正手续，所以经请示上级，白区可不实行预备期的规定。发展党员只要求本人记住三条就行了：一是谁介绍的；二是入党的时间（不记民国纪年，而记一九××年）；三是当时交给的任务。

党的地下工作者互相之间还不准发生横的关系，这是一条很严格的纪律。张友三是甘肃工委派来的，一次我们两人都去泾川，一路同行，一块吃，一块住，但互相都不说是去干什么。只是解放以后，我们在一起说起那次同行的事，才知道张友三找石果，我去找孙存弘，各自都是接关系的任务。以后党员多了，来的干部也多了，不少地方出了问题，所以西北局还规定了地下工作的几条纪律。按我保存的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手抄件，内容是这样的：一、外勤、统战、地下的关系应严格分开。二、严禁

发生横的关系。三、地下各级组织不许保存党员名单、表册、会议记录以及开支账目等。四、化妆的生活言行应适应掩护身份，严禁私自携带文件及危禁物品。五、严守秘密，若非工作需要，不得向其他秘密工作人员询问或吐露党的秘密。六、严禁地下工作人员烟酒嫖赌。七、地下区以上的干部结婚要经上级组织审查批准。八、党的文件不得遗失，倘有遗失，需向上级报告，并及时注意和弥补可能引起的暴露。这些规定都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们经常向党员讲这方面的要求，要求大家严格执行纪律，所以工作上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漏洞。

灵活机动地与敌人开展斗争

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这也是党的地下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由于敌强我弱、敌明我暗，所以在斗争方式上应该灵活机动。

开始，我们武工队在镇原新城开展工作时，群众反映说，伪第三专员公署特务头子肖林派了两个人来镇原搜刮钱财，百姓都很害怕。我们武工队收缴了这两个坏家伙的枪，并且处置了他们，群众拍手称快。以后，我们对那些民愤大的坏尖子，组织群众起来斗争，给群众撑腰壮胆。伪镇原县新城镇镇长李应凯，这个人很坏，借其兄在县党部当书记长的权势，耀武扬威，坑害群众，如果谁把他稍一得罪，就要搞你个家破人亡。平凉县花所镇镇长朱连成也很有势力，横行霸道，没有人能惹得起。他们这些人和“马家”队伍勾结一起耍威风，激起了民愤。结果都被群众起来给收拾了，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们支持群众的行动，鼓舞群众的斗志。从此，各地的那些坏家伙的行动大为收敛。

另外，抓壮丁当时对群众威胁很大，有钱人家往往是不出壮丁的，抓走的都是穷苦人。以后，我们决定在他们押送壮丁的时

候，派人出去拦路打散，让抓去的人都跑掉。如什字镇一次就被我们放了五六十名被抓的壮丁。这样搞了几次后，上面知道了，逼着乡、镇追查。而乡、镇多有我们的人，便应付着写了个报告，说什么“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果不了了之。

大概在四七年后季，甘肃工委在环县的罗坝坝开了一个会，决定让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当时，从平东工委的情况看，只有十来枝枪，立即开展武装斗争条件尚不成熟。所以，工委决定先抓武器，为开展武装斗争积极创造条件。经过研究，我们部署了收缴敌人枪枝的行动。

平凉那峡镇公所，当时有八、九枝枪，我们想先把这些枪搞到手。但这个镇的地下党员侯彦明，是乡（镇）民代表会主席。工委在他家里放着枪，又经常住人，他也常去镇上开会，了解情况，做些上层工作。所以，我们收这个镇公所的枪，弄不好就会连累到他。经过研究，我们决定在侯彦明给于儿子王保娃娶媳妇的那天晚上行动。这样事情发生以后，由于他家办喜事，客来客往，一般不会怀疑到他。也正好这天晚上镇公所值班的是平凉一个大特务的外甥田××，出了事情由他承担责任，不伤害镇公所的其他好人。镇公所做饭的是个党员，我们让孙秉仑同志与该党员联系，那天晚上不要关镇公所的后门。夜深之后，我与李义祥同志组织了一些人从后门冲进去，很顺利地收了枪。接着，我们把枪转到了崇信，寄放在张么山的张登荣家中。我们总结了经验，接着又收了伪崇信赤城乡、灵台梁原镇两个乡（镇）公所的枪，这样先后共搞了二十几枝枪。有了枪，我们便分头到平凉的一些山区，在贫雇农党员中找扛过枪、打过仗的人。把枪分散在他们手里，秘密隐蔽，一有情况召集起来，统一行动。

一九四七年八月，西北野战军打宝鸡以后，敌人非常恐慌。一次我们得到消息，说崇信县自卫队有几十个人跑到铜城的一个山庄躲藏。我们利用敌人的恐慌情绪，派了五个人，由欧子昌带领

去夺枪。到了那里，他们都钻进一个窑洞里，我们将窑洞围住，用虚张声势的办法高喊：一排在上，二排左右，三排沟里。接着，我们打了几枪，甩了二枚手榴弹，使敌人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糊里糊涂缴了枪。其实，这些人多是些穷苦人，他们也不愿真心为国民党卖命。这次在铜城的山庄一下就搞到了四十多枝枪，和原来的加起来，我们编配成为一个连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当时感到就地活动不便于隐蔽，危险性很大，工委决定由李义祥同志把他们带回边区。就在这支队伍将要行动的时候，敌军马鸿宾的一个营由白水镇到老爷山进行搜寻。与此同时平凉县自卫大队长陈简斋亲自带领士兵来到四十里铺，妄图追击我这支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四十里铺乡公所的地下党员，备好酒肉款待陈简斋及其部下，并将他们留宿了一夜。就在这天夜里，我们的武装力量插过了四十铺，甩开了敌人，终于顺利地到达了边区。以后这支武装力量编入了正规军队。

与此同时，我们在保安团和平凉、华亭、泾川、崇信等县的自卫队中找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做分化瓦解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并以崇信为重点，还动员了一些党员也参加自卫队。当时的方针是打进去，站住脚，往上爬，广交朋友，等待解放。我们的人进去后，通过年香拜把子，扩大联系，达到化敌为友，掌握地方团队的目的。当时平凉县第三保安团队，下面有两个中队的队长都是我们的党员，一个是刘良玉，一个是杨松年，他们都为革命做过一定的工作。当然，在开展这一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也有过损失。敌平凉县自卫队队长段祥林，甘肃工委想通过关系去争取他。当时平东游击队的参谋阎生甲同志说他和段祥林从小深交，段的老婆也是他出钱给娶的。所以组织决定让他去做段的工作。结果段祥林知道了阎生甲的情况，为了自己往上爬，不讲什么旧情，向伪县长姚佑生告密，把阎生甲抓起来交给了伪三十八军，后被惨害。解放后，段祥林逃到长武被抓获，押回平凉给镇压

了。

工委的统战工作

两面政权和分化瓦解敌自卫队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统战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外，当时，工委的统战工作任务主要是做下层统战工作。我们先后做通了四十几个乡（镇）的工作。另外，对下层知名人士，如在伪政府干过事的旧职员，各地有学识而不得势的文人，有名望和有影响的教师、医生、商人等，都尽量地接近他们、团结他们。特别是在平凉城市工作中，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

对中上层人士，我们也积极利用关系，做争取工作。平凉伪第二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的副司令任谦，是渭源人，曾在鲁大吕军队中当过多年团长，以后到了平凉。甘肃工委掌握这个人思想比较进步，几次派人与他接头。最后一次是葛曼同志来的。由于葛曼同志对这里情况不大熟悉，感到力量单薄，做工作不方便，希望我们予以协助。我们接受任务以后，与任谦取得了联系。任谦他的副官胡汗三在二十铺先与我接头，然后把我和葛曼、张友三、柴学侃四人带进城去妥善安排了住处。这个住的地方比较隐蔽，前面是傅作义的公馆，后面是大富汉赵延年的家，周围还派了流动哨。我们和任谦在这里谈了两个晚上，谈了对共产党的认识，谈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任说：“与共产党交了很久朋友，总想搞些武装，对革命有点见面礼，才算对得起朋友。”任谦还风趣地说：“象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要不要。”我们对他的进步表示欢迎，也讲了我们的政策，接收他入了党。后来任谦的夫人知道此事，也主动找我们，要求入党，我们也接收了她。当时我们要求任谦做争取伪专员周祥初的工作（任是周的舅舅）。以后在我们收缴崇信赤城等乡（镇）枪枝时，这些乡镇长打电话请示周

样初。周答复说：“夜晚敢于在乡（镇）收缴枪枝，他们一定来人很多。切记不要轻易追击，以免造成更大损失。”这对我们就很有利。另外，经与任谦协商，我们还派韩天俊给保安司令部当卫士，让柴学侃住在旅店以保安司令部的便衣名义活动。这样有了内线，对我们很方便。任谦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有的除我们使用外，还向上级领导机关作了汇报。由于当时情况复杂，敌人以后对任谦有了觉察。马继援派兵包围了伪专员公署，搜捕任谦。结果任谦被我地下工作人员藏在伪专署伙房里，他用手指把自己的眼睛戳肿，用石头把门牙打掉，并打扮成伙夫的样子，装着抬水，从平凉北门出去了，然后便与地下党接头，送他到了边区。

崇信县伪参议长刘毓风，人都叫他“刘疯子”。这个人倒有些刚正不阿的精神，曾有几任伪县长被他搞下了台。刘毓风的犹子李风举是我地下党员。我们让李风举先把刘的两个儿子发展为党员，然后再逐渐做刘毓风的工作。一九四七年春节时，条件已经成熟，我到刘的家中，接收刘入了党。当时崇信县伪县长薛寿山，这个人没有做太多的坏事，但缺少主见，同时对刘毓风也有些害怕。所以我们通过刘毓风左右薛寿山，叫他不要过份坑害百姓，不要跟上反动派陷得太深。这样薛寿山在当地表现比较规矩，没有干什么更多的坏事。

平凉有个人，名叫李翰，曾在固原当过伪县长，为人比较主持正义，我们也接近他，影响他，这个人也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承担交通任务

平东工委活动范围紧靠边区，是白区和红区的接壤地，又位于陕甘宁的交界地带，为西兰、平宝公路的交通要冲。其他工委的人去边区，或边区的人出来，有很多都是通过这里的。所以平

东工委当时的地下交通任务比较大。工委专门设有地下交通队，由孙克录同志负责。

当时交通工作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接送与我们有关系的过往人员，有时也转送情报与文件，还要接待安排接洽工作的各方来人。当时接送人的任务比较大，一般大路口上都有秘密接头的地点，沿路都安排有吃住的地方。关家雅河是一个接头点。大湾、河坝上、来家湾、水泉子、白土湾、高岭子、小马家、四十里铺都有过往住宿的地方。

我们曾护送过的领导同志有张一悟、王新潮、和华、高健君等人。对过往的人员一般都是武装护送。从外边进边区，不要什么手续；从边区往出走，都得有通行证、身份证。身份证上盖有乡、镇公所的章子和本人的指纹印。通行证有县政府的印信。有了这两样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护送人员时也必须采用社会化、职业化的掩护身份，都是在晚上走。送信、送情报一般都有专门的渠道，一站一站往过转。工作接头的大都接应在老北山，当时负责的是贺光明同志。除这里外，各县也都有一些点。多数选在“三不管”的交叉地带。

另外，我们工委还承担了陇东地委的部分采办任务。他们派来的人一般住在侯彦明、张登荣家中。所要采办的东西，有的在平凉买，有的在西安买，东西办好后，在白水张耀祖同志铺内或别的乡下寄放，然后运往元城子。

为了适应地下交通工作的需要，工委还开展了红村子工作。所谓红村子，就是交通沿线的主要村庄都由我们控制起来，成为过往的歇脚点。这些村庄要求家家红，人人红，都比较可靠。凡我们搞的红村子，都由我们组织群众推选村长。给村里的人都有规定和要求，要大家注意来往行人，有情况及时报告村长。凡我们接送的人，要求不准打问情况，不许走露风声，注意保密。建立红村子，首先选择保长是地下党员的村子里搞，然后再逐渐

扩展。以后，镇原、平凉、崇信等地沿路都搞成一条线，这样来来往往，村村都可以住人，十分方便。有些村子个别人不大规矩，但群众怕他们坏了事对全村不利，主动起来制服他们。

为解放作准备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西安即将解放，为了配合大军解放平凉，当时甘肃工委通知我去华池县的张家桥，由孙作宾、陈成义同志与我具体商谈了平凉解放后地县干部的配备方案，并上报了西北局。正当我们筹建平凉地区党政军机构时，我军已打到咸阳。为了动员党员、动员群众为解放作准备，甘肃工委还指示我们向下发了一封信。信中讲，平凉快要解放了，党的工作应集中力量为迎接解放作准备，要求崇信县学习朝邑方式，向地下党组织起义，还要求其他县筹集粮草，准备担架，到时候组织支前。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崇信按工委指示以刘毓凤带头成立了解放委员会，刘任主席，领导各界迎接解放大军。由于县自卫中队全部被我们控制，维持了正常的秩序，保存了档案和电话，伪党、政、学都坚守岗位，听候处理。商业当天开业，市场井然。

到解放前夕，平东工委党员发展到两千多人，在活动范围之内，分布有党员的乡（镇）共四十多个。通过斗争实践的锻炼，通过教导队培训，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干部。解放初的平凉专区管辖平凉、泾川、华亭、庄浪、隆德、固原、灵台、化平八个县，除地县主要领导干部外，其他干部的配备基本上都是自己解决的。

在地下党的积极配合下，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平凉获得解放。工委成立几年来的斗争岁月，锻炼了群众，考验了党员，造就了干部，为迎接解放，为新政权的建立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虎穴往来

王 立 成

一九三五年阴历腊月间，正宁县湫头壕上一连开了四五晚上党员会，讨论关中特委的指示，决定从我们支部抽几个党员，去北京、上海、西安等敌占区搞地下工作。要求抽调的人既要忠实可靠，又要大胆灵活。

第五天晚上开会时，我站起来报了名，说：“叫我去吧！不知咱这个拉长工的老粗能行吗？”

不几日，组织上答应了我的要求，决定让我去担任地下交通。当时，我虽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但对革命，才刚刚有些认识。在这以前，连“红军”的宗旨也并不明白，只在地方上参加过几天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活动。现在组织上答应我进城搞地下工作，对我这个既未进过城，又无文化的人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听人说出去搞地下工作，比在解放区里还艰难。可是我心里想，只要党能相信我这个插牛后半截的大老粗，只要对革命有利，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心甘情愿。

由于情况紧急，我们几个人在关中特委只训练了一天，第二天就出发了。

临走时，特委书记路本同志再三叮咛我：“你这次出去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地下交通工作。要在西安城出出进进，接送党的机密信件和同志。”他双手按着我的肩膀，用信任和期待的目光久久盯着我说：“从今天起，你就要钻进敌人老窝里去了，担子是很重的。你没出过远门，又不识字，也没有搞地下工作的经

输，经常出入虎穴，可千万不能出差错呀！这不仅牵涉到你一个人的生命安全，同时关系着许多人的生命和安全，这就是革命！”他向我们仔细讲述了不少地下工作的办法和要严格遵守的纪律。

那次我们一块出去的共六个人。有关中特委书记的爱人小安，有老魏、小常、郭德林、陈盘儿和我。除了我和陈盘儿是没文化的老粗外，其他几位都是地委、县委的脱产干部。我们的打扮是：老魏和小常装扮为生意人，小安装扮成女学生，带文件，其他三个人扮做赶脚人的模样。称呼关系上：老魏当做小常的舅舅，小安当做小常的老婆。他们三人（舅舅、外甥和外甥媳）骑着驴，我们三个随后赶着驴。还不到晌午，我们就进入了敌占区。说实在的，一进入敌占区，真象走进地狱一样。远远瞅见敌人的岗楼，瞅见那些双手端着枪的恶狼似的家伙，真叫人切齿痛恨。为了避过敌人的查问，我们一直避开敌人的岗哨、城镇从小路绕道前行。

到了彬县，连着闯过了敌人的两道岗哨，每道岗哨，敌人都把我们三个骑驴的同志从驴身上拉下来，从人到驴，从头到脚，搜了又搜，问了再问。看着面前许多群众，被捆绑吊打的惨景，我们的心突突地直跳，但还是按原来的计谋哄过了敌人，路上经过敌人多次的搜查和盘问，我们的胆子才大了，心才稳定了，说话也硬气多了。

闯进了西安城，好家伙！真个是进了敌人的老窝子，街上人来人往，车上坐的，路上走的，到处可以看到端着刺刀的警察。

晚上，小常和小安住一个旅社，老魏住一个旅社，我们三个另住一个旅社。

第二天早上，老魏假装有病。小常跟小安提着点心包，跑来探“舅舅”的病。我们也按照约定的时间赶来。当时老魏躺在床上呻吟，小常和小安守护在身边喂吃喂喝，忙着煎药。我们一进

门就七嘴八舌地到处嚷着找魏掌柜的。店主人把我们领上门，我们三个就高喉咙大嗓子吵嚷起来：“魏掌柜的，我们给你受苦赶脚，怎么还不给脚钱？叫我们等到啥时候哩……”老魏一边“唉——唉”呻唤，一边喘着气说，现在手里没钱，等会儿身子好些了再出去想办法。小安和小常也口口声声哀求着：“都是出门人嘛，见谅着些，我舅有病，等会儿一定给你们想办法。”我们就这样凑到一块，商量了好一阵，约定半月后的上午八点在鼓楼、下午四点在钟楼会面，以谈生意做买卖的方式接交文件。商定后，当天夜里他们“舅甥”三个就乘火车到上海去了。

我们三个留在西安，没有事由留住，很不好对付。以后回去同特委研究，又找了一个新办法。当时郭德林的老婆有病不生育，前去西安治病，商量由我装做她娘家哥，赶了一头毛驴，驮着她混进了西安城。交押金一百二十块白元，送进广仁医院治病，我就借着这个因由找店住了下来。隔三间五去医院看一看，这就避免了店主和查店的对我的嫌疑。

头一次，按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小常扮做商人从上海送来了文件。接文件后我打扮成脚户的样儿，把文件送出了西安城。当时沿途有八个关系联络站，虽然只接上了三个站，但文件还是安全转送了回去。

这次以后，组织通知我说，小常今后不再来了，由另外一个同志接替。说那个同志住在西北大旅社，叫我去找，信号是谈生意、抽纸烟等等。

好险呀！我几次去西北大旅社找那位同志，不是正逢敌人疯狂搜查，就是店主家把着门。有时就是混进去了，也不好开口说话。之后我又去了好几次，总见店门口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商人。我发现每次他都观察着我的举动。有天下午，我一到店门口，他竟然问我是“干什么的？”听腔调是南方人，我觉察到他象知道我的底细一样，但我不明白他的意图，只好搪塞了两句，就混进行

人里走了出去。

过了三天，查店比较松了，可是我心里还是焦急万分，连夜合不上眼。后来我想，现在我身上没有文件，可以冒个险，于是就溜出来又去西北大旅社，硬着头皮向管帐先生询问。他盘问了我几句，就把我指到楼上一个房间里。

我轻轻推开门一看，不由心里猛一惊，这正是前天在店门口问我的那个青年商人呀！他忙从床上下来。我们相互说了几句客套话，他随手掏出纸烟，我们同时抽起来，我们边吸烟边天南海北地谈起生意来。涉及到政治的话，双方都有戒备。后来我问他带来什么货，他说着说着，只见他用劲吸了几口烟，突然又捏灭了烟头，站起身来，展了展身子。不一阵，他却打着火，仍接上吃那半支烟。这正好和组织上给我说的暗号一模一样。我们不禁相对地笑了。当天夜里，他就把文件交给了我。

这一回出城门，比前几次困难得多。还未到城门跟前，就有四、五个端着刺刀的卫兵，老远地象疯狗一样扑了上来。我镇定着心神，不管三七二十一，掂着一根长扁担，大摇大摆地往出走。根据前几次的经验，敌人搜暗不搜明。我早将文件装进一个又烂又脏的干粮袋里，敌人扑上来，我就首先把烂干粮口袋往他们面前一摔，敌人用刺刀拨拉了几下，在我浑身搜起来，他们看我穿得很破烂，用手摸了几处，见我神色镇静，他们把眼睛一翻，用刺刀拨着就叫我走开了。

出城不远，到处都驻扎着敌人，到处是帐篷、人马和枪炮，连路都挡住了。要是从敌人伙里通过，那简直是光着脚片过刀山。文件总是个硬头东西，它就是能千变万化，也难躲得过千搜万查。要是绕小道翻沟走，也难逃脱眼前这千万只豺狼的眼睛。当时我左思右想难得一个万全之计，就坐下来装着吃干粮。馍到嘴里嚼过来嚼过去，也嚼不下一口。正在这时，突然跑过来几个赶脚的，我急忙问他们出了啥事。那几个人悄悄地给我说：“几个官

员要拉我们扛行李呢！”我又问朝哪里去呢？他们说是朝东北方向。我想这倒是个好机会。

不一阵，果然三个穿黑衣服、戴黑眼镜的敌人，提着黑拐杖，迈着八字步走过来，他们每人手里提着个不大的包袱。这时我就把空扁担扛得高高的，直朝东北一条路上走。那几个敌人一发现，用拐杖指着我，喊道：“站住！站住！”我回头看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敌人加快步子赶上来，问我是干什么的，走哪里去。我回答说是挑货做生意的，要向东北去。三个敌人一齐把我肩上的扁担抓住，喊叫：“来来来，把这些东西担上！”说着都一齐把包袱放到我面前。我驮着这些包袱乞求着说：“长官！我靠着这根扁担受苦糊口的。”一个大个子伸手掏出手枪，对着我的头，列着架势，喊道：“你担不担！”我这才回答：“是！是！是！长官。”说着把装文件的干粮口袋塞到他们的行李里，绑在扁担上挑着就走，这样通过那蜂窝一样的敌人营房时，有的看着理也不理，有的要搜查，那几个敌人一搭腔，也就平安无事地通过了。

刚通过敌人营房不远，他们又叫我把东西挑进一个大四合院里，这里也住满了敌人的队伍，看样子是个乡公所。我把行李放下，就伸手向他们要脚钱。他们便抡起拐杖向我身上打来，嘴里骂着：“去他妈的！”我即走了出来，心里喜悦地自语着：“去你妈的吧！你们保了老子一路镖，不给脚钱也便宜不了你们这些狗东西。”

这次返回的途中，沿路未找到一个联络站，回来后连特委也找不着。翻山越岭找了好几天，才安全交了文件。

又一次，那是古历正月间，上海又来了一个学生打扮的人送文件。我拿到文件后，心里很急，想连夜出城。这天正是正月十五元宵节，街上人群熙熙攘攘，采买各种花灯，于是我也买了一个花灯笼，还买了些香表和纸炮，混在出城的老乡伙里，安全出了城。大

刚还没有交过半夜，忽然发现前面就是敌人的一个哨楼。不知楼上有多少人，光楼下的路口上就站了五、六个掂枪的哨兵，朝四周盯着。想绕道走嘛，当下摸不着路径，时间也来不及了。这时敌人已经哗啦哗啦地拉着枪栓，不住口地吆喝着：“干啥的！不许动！”我说是本村的庄稼汉，几个敌人把刺刀并成一排，猛扑了上来。我心里还没有想好对付敌人的话，忽然看见前边不远有个小庙，我随即把文件夹在黄表里面。敌人捏着手电在我浑身上下照了一遍，查问我来干啥，我说是到庙里敬神的。他们又问我为什么一个人来得这样早，我说：“好我的长官哩！你们不知道，今年我家里不兴时，死人又死牲口，想赶烧个头香，求神保佑个吉利……”

敌人看了看我当时的架势和神态，有些相信了。他们眼盯着我钻进庙里叩头烧香了，这才溜进岗楼去了。我烧完香表，溜出庙门，抽身就跑脱了。

到了三月间，这时情况更加吃紧，在大街上，在旅社里，无论什么人每天都少不了被几次查问。郭德林的老婆病好出院了，郭德林两口子都害怕，接着他们就回去了。后来我才知道，郭德林老婆娘家庄里，有不少地主、反革命逃住在西安甘肃会馆，向郭德林老婆作了不少反宣传，她害怕暴露了我同她拜认兄妹，掩护地下工作的关系，因此急忙地回去了。可是她一走，我当下就没有扎脚的凭借了。

过了不几天，有次我刚进了城，吃过早饭刚躺在旅社床上纳闷着。突然走进来一个威风凛凛的敌人，样子象个当官的。他傲慢地自我介绍说：“本人姓姜名长源，现任陕西省民政厅科长。据本市甘肃会馆有人说你来此地，特此来看看。”说着他就上床摆开大烟灯。这时我那个装文件的烂干粮口袋恰恰摆在他的眼前，他抓起来扔在一边，叫我躺下抽头一锅烟。我说咱这小摊贩不会抽这个。他皮笑肉不笑地瞅着我：“你们这些办大事的人就是客气呀……”我说做这个小生意，糊口度日就是我最大的

事。说着我接过烟葫芦，抽了他那一锅子大烟。他又笑着说：“你不要哄我，西安城里有共党，你说了我保险不坏你的事，有啥难处一定尽力帮忙……”我说，咱只谋着卖货，啥人给钱就卖给啥人，从来就不管什么国事。他很有根据似地说：“昨天西安城里还抓了几个红军探子，肯定城里还有，你能哄过我？”我说：“你能看见？哪你就是红军吗？”他又问起共党、红军来了怎么样，杀不杀人等等。我说：“上次去北面买货，听人说红军见坏人就杀……”就这样一直磨缠了半后晌，他才走了，还一直请我到他那去，有不妥当的事就找他。

我知道事情不妙，说不定敌人会马上派人来抓我。于是，我马上挑起货担就往外走，一到街上，见全城戒严，没有一个行人，满街尽是警察。他们一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面向各铺面门站着。听说是伪中央来了什么要人。我挑着货担，摇摇晃晃直朝街上往过冲。警察用刺刀指着，叫我走小巷，我装着十分乡土的样子，说我没进过城，一进小巷就会迷路，他们将我东一揪西一戳，按弄得我浑身发疼，我向前冲着走了好长一段，闯进了另一个旅店。这个店里满是敌人的军队。店主人一见我冲进来，吃惊地盯着我：“你吃了豹子胆啦！你是飞进来的吗？”我喘了口气，恳求着说：“店掌柜，外边实在走不成了，叫我多出几个钱住下吧！”店主人说：“多收几个钱我们倒能行，可这么紧的火头，出了事我们可不承担。”我点点头，把东西往地下一抛，就住了下来。其实在敌人身边倒住了个安全，连一个查店的也没见来。

由于情况吃紧，郭德林、陈盘儿相继都回解放区去了。这时只有我一个人，活动越加困难。我心里非常不安，行走带着扁担和绳子，又装扮成一个挑脚的，一天住一个店，改一次名字。

有一次，我带的文件很多，临走时，特委书记特意向我作了布置，一遍又一遍叮咛道：“老王呀，这一次带的东西又多，又非常重要，是延安发给上海的机要文件，可要慎重小心，一点出

不得岔儿！……”可是当时的西安城里形势非常紧张。旅店里，饭馆里，到处都有特务。你就是买一碗面汤喝，也有贼溜溜的眼睛偷偷监视着你，连上厕所也免不了有人注意。一天上午，我刚住进三联旅社，有一个人在院子里装聋卖傻，乱打乱闹，说他是红军，又指东道西地说这个店里还住了许多红军……，这一下子可招来了大祸。不知是敌人有意装的，还是真实情况，一霎时敌人的警察拥进来许多，不光绑押了那个疯子，还一直防守到天黑。他们逐房逐人地几次搜查，进行察言观色、审问。这一夜，旅客很少，我一个住了一个房子，敌宪兵一连搜了八次。我把文件装在满满一口袋黑馍里，和扁担一块放着。敌人用刺刀一拨干粮口袋，我就给他们拿出发了霉的馍说：“长官，你们吃干粮吗？”敌人当下把我手中的黑馍馍打落在地，又在我身上搜查了一遍。过了半夜后，搜查暂缓了下来。第二天天刚放亮，我就出去找上海来的同志。

街上的情况比往日更显得紧张。敌人押着一大群戴着手铐的“犯人”走着，说他们是从韩城县抓来的“共产党”，让在街道上盯认谁是共产党。只要那些“犯人”向谁一点头，敌人马上扑上去就抓走了。吓得人们都偷偷溜掉。为了躲避敌人的抓捕，我和上海来的同志错过了约定的时间，几天都没接上头，直到十多天后，上海第二次派人来才接交了文件。

那次上海送来的文件也比往常多。那位同志向我再三叮咛，这些文件时间性紧迫，非常机密，上海地下党有严格要求，一定要安全送到延安，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中。这些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一带到我身上，就好象千斤重担压在我的肩上，它的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千百个革命同志的生命安全问题。我心里深深地感到党和人民对我的殷切期望，我真想插上翅膀立刻飞回解放区，把文件早日交到党组织的手里。

我刚刚混出城门，一颗悬提着的心略微安静下来，忽然迎面

走来两个伪军，一个披着一件军大衣，一个手里提着个小瓶子。他们故意走向我的身边。刚一碰面，那个伪军就把瓶子摔到我脚下，瓶子当啷一响，砸了个粉碎。他随即瞪着狗眼，拉着我的胳膊，恶声恶气地喊道：“谁叫你撞了我的瓶子？这是给我们营长取的药。”另一个伪军也拉着我的胳膊，喊叫：“走！走！走！进城见营长去！”真糟！过了鬼门关，又要拉去见阎王！于是我就苦苦哀求：“长官！开个恩吧，放了我这受苦人吧！我路程远，家里又没人……”提瓶子的那个伪军向我打着手势说：“要走你就赔了走！”我看出了他们想敲榨钱的鬼心眼，不给几个恐怕脱不了身，熬的时间长了有危险。我问：“长官，这瓶子多少钱？”一个伪军说：“瓶子？还有药理，一共十块白洋，赶快掏吧！”我从口袋里先掏出两块白元。一人塞给一块。两个家伙都翻着白眼说不成，我又哀求说：“长官，开开恩吧，挑脚人嘛，一月三十天才挣几块大洋，一家人还靠着我活命哩。”两个家伙二话没说，撕开我的口袋就抢起来。他们把我浑身仅有的五块白洋掏走了，还踢了我两脚，便慌忙进城去了。

走了一阵，我看见前边有辆顺路马车。我觉着一个单人走起来不方便，就加快步子赶上了那辆马车，没费多少口舌就坐上了。刚走过一个伪乡公所门口，一个人忽地跑来爬上了车。他一爬车，我发现他屁股上露出一个枪头。他爬上车还没缓过气，就反复盘问起我来。我肯定他是个特务，就装得更加土里土气蹲靠在车边，吃着黑干粮。到了一个拐巷很多的集镇，我说到了分路的地方，顺便跳下了车，没走几步那个家伙也鬼头鬼脑地赶了上来。我加快步子，拐了几个巷道，避开那家伙的视线，混进人伙里，脱身出了镇子。

以后在西安城里扎脚实在困难，我就千方百计在街上找事由。后来跟一个小摊贩挂上了钩。这个小摊贩的名字叫任树恒，家里几口人全靠这个小摊子过活。那一向情况吃紧，进城的人很

少，他一天到晚卖不了多少东西，甚至连一根针也卖不出去。一天我向他说，我想在西安办些零碎货卖。于是就从他哪儿买了毛巾、袜子，以及针、线等一些杂货。他显得十分高兴。当时我又对他说：“这几天情况紧，我们乡下人不懂法规，队伍一盘查就没啥话好说，要是连累了你，咱俩都遭难，你得给我个护身证明才好。”他说：“这个好办。”便从箱子里找出了好多办货纳税的票证交给了我。

从这以后，我就改名任树恒，挑着杂货担活动起来。由于当时住的一家店主对我有怀疑，于是我又另找了一个小客店住了进去。新住的这家店掌柜爱抽大烟，住店客人非常少，手头的钱也不宽裕。我了解到他的这种情况，就对他说：“掌柜的，眼下我还没歇下好货，身上带钱不安全，就先存在你这儿吧。”店掌柜高兴得满口答应，从此对我很关照。敌人一来查店，全家老小一个声：“他是我们的熟客，好人啦！”就这样我躲过了敌人多次的搜查。

挑着货担子虽说掩护方便，可有时目标大。有一次，我带着重要文件往边区送，当太阳半杆子高的时候，到达了三原县，这时恰巧被十多个敌人发现了。转眼之间，敌人象一群饿狼一样，边打枪，边朝我扑来。面前不远有个堡子，我赶忙跑了进去，遇见一个老头儿，手提着粪筐，站在墙后瞅着我身后追来的敌人。他着急地问我从哪来的，我说是“北方”人，下西安办了些货。他又急切地说：“那是堡子上的黑狗，抢你来咧！”说着他把粪筐、铁铤递给我，把我肩上的货担接了过去。当敌人追进堡子时，老头子已经把我的东西藏好了，又担着两个草筐往场里走。那伙疯狗追到我身边，便急忙追问刚跑过来那个挑货担的躲到哪里去了，我说只顾抬粪，没留意。那位老头向北一指：“快些追，刚才朝北沟跑去了！”那伙黑狗朝老头指的方向跑去了。老头这时才把我领到他的家，把东西交给我，给我塞了两块馍，给我指了路，还叮咛着说：“好险呵！这些黑狗在我这堡子上杀过十几个

人咧，你得走着瞅着，千万要小心着。”自那次脱险后，那位老头的家就成了我们地下交通人员往来的一个保险站口了。

为了党的地下交通工作，我就这样紧张紧张地在敌人的巢穴里出出进进了一年，这也是对自己锻炼、考验的一年，直到“双十二事变”我才回到解放区。

(李永芳整理)

越 狱 纪 实

李 铁 轮

一九四〇年，正当我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国民党顽固派与卖国贼汪精卫里应外合，极力推行投降路线，掀起反共恶浪，制造磨擦。在这股腥风浊浪之下，甘肃的上空也出现了反共的团团黑云。这年六月六日，甘肃反动当局以查户口为名，逮捕了中共甘肃工委书记李铁轮、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西平（即罗云鹏）、青年委员惠光前（即林亦青）、秘书赵子明，以及罗云鹏的爱人樊柱英和他们一岁左右的女孩莉莉等六人。我党在甘肃的领导机关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被捕后，起初拘留在兰州城内敌伪警察局第一分局，虽经严刑拷打，但大家始终没有屈服。敌人已抓到证据的，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未暴露组织和身份，并且理直气壮地斥责国民党反共行为是违背团结抗日精神的。就这样，我们与敌人据理力争，相持数月。在此期间，曾出现过林亦青同志趁机逃跑又被抓回、赵子明同志向外写信被查出的情况。

这年中秋节的前几天，敌伪警察局声称：日机轰炸，城内不安全（实为敌人怕日机轰炸时，我们会趁机逃跑）。将我们六人转押到沈家坡拘留所。

沈家坡拘留所，位于兰州古城西南五里之遥的沈家岭山腰。它原是一个庙宇式的建筑物——王家祠堂，后来被国民党甘肃省会警察局改建为拘留所，祠堂正厅和厢房改为牢房，经常关押着普通犯百余人。一九四〇年秋，大概为了特殊需要，把三对山门

组成的前席又改建成大小两间牢房，关押政治犯。

我们六人被转移到沈家坡拘留所之后，我和张西平、惠光前及赵子明四人被关在那新改建的大间牢房里，樊桂英带着女婴儿住在女犯房间。

我们住的牢房，湿泥墙上麦芽丛生，它与外界严密隔绝。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又与敌人展开了新的斗争。

尽力麻痹敌人 不受敌人麻痹

敌人对待我们是非常冷酷而仇视的。我们被关在这潮湿而阴暗的牢房里，门上挂着沉重的大锁，地下铺些乱草，吃的是麸面糊糊，没有放风时间，不能同普通犯人接触。但我们四人由过去分押而现在变成集押，就得到交流情况的机会，也可以共同研究一些问题，情绪是愉快的。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下定决心做长期、艰苦的殊死斗争。大家共同研究确定了一个策略：坚持原则性，但不采取僵硬的表面对抗态度，尽量麻痹敌人，而不受敌人麻痹；多做看守人员的工作，争取他们瞒上不瞒下，为我们创造稍多的方便条件。这种工作多半由赵子明同志出面，因赵子明同志在兰州开豆浆铺，熟人多，交际广，而且颇有办法。

到这里的第二天深夜，发生了一个突然事件，关在厢房的几个河州（临夏）回民普通犯，他们砸开牢门，夺了警察的枪而逃走。当时吓得管理员躲在小楼上，看守人员和警察都措手不及。可惜我们事先没有准备，失掉了出狱的机会。回民越狱逃走后，管理、看守人员才出来查看，见我们安睡，没有动静，高兴地说：“幸好！这里没事。”翌晨，管理、看守人员对待犯人，如临大敌。特别是对待我们，不给开门去小便（把尿罐放在门前，要从门缝里往外小便）；吃完饭就把饭碗拿走，下次吃饭再将不曾洗过的饭碗拿来再用。因为回民暴动就是以饭碗、尿缸为武器，

重打看守、警察的。面对这样的紧张气氛，我们千方百计，力求缓和一点，但收效不大。尤其是那个管理员，特别仇视我们。三个年老些的看守人员则稍微好些。罗云鹏同志多少懂得一点黑暗社会的“行话”，用江湖套话对付他们，态度则稍缓和些。还有一个看守，自称曾在北平给南汉宸同志当过厨子，我们对他特别提高警惕，不受他的麻痹。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坏家伙。

中秋节的一场斗争

中秋节到了，国民党八战区的法官来到拘留所，带来些月饼和书籍，准备从政治上向我们进攻。我们早已预料到，敌人把我们集中关押、会采取某些软化的手法。对此，我们采取什么对策？拒绝接受送来的东西，骂他一顿，倒是简单痛快，但这样必会将局面弄得很僵，对改善拘留所的条件、准备长期斗争则是不利的。我们本着坚持原则性，尽量麻痹敌人，不受敌人麻痹的灵活策略，我们把敌人送的月饼、书籍收下，但仍坚守原则立场，首先向他们表白，我们是无畏的，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日，不能因为谁是共产党就把谁抓起来。狡黠的敌人对我们的话付之冷笑，没有和我们争论。接着，我们提出几点改善待遇的要求：第一，要吃饱饭；第二，要放风；第三，允许赵子明接见家属。这几点最低要求，敌人答应了。这场斗争，我们取得了基本胜利。这一胜利，对于后来越狱斗争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从此，我们周围的气氛开始缓和。因为沈家坡拘留所是一个普通犯人拘留所，看守人员基本上是老狱卒，吸大烟，爱小便宜，本来没有什么政治头脑。他们的那些上级表面上的客气，促使他们瞒着上级可以给我们某些方便。如放风规定半小时，管理员不在时，就可以延长时间；再加上允许赵子明接见家属，那就给我们以很大的便利；不久我们的伙食也有了改善，由原来的

麸子面改为普通面。但因看守人员从中贪污克扣，仍不够吃，又没有菜。于是赵子明家属送来馒头、咸菜和豆制品用以补助，使我们得以保持健康，没有挨饿和害病。至于敌人送来的月饼和书籍，我们对这些糖衣裹着的毒药，都是有政治抵抗力的。当时我曾写了一首打油诗：“笑里藏刀用意深，故施小惠买人心。教他枉用牢笼计，收了东西不感恩。”对于敌人送来的书籍，我们采取批判态度来对待它。不过敌人是很狡猾的，送来的东西还不是公开反共、造谣诬蔑的东西，而是一般腐蚀人们的革命意志以及宣扬国民党历史的东西（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我们估计敌人下次再来，会送来公开反共的东西。但由于我们在中秋节对那个法官表示了坚定的原则立场，使那个法官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没有再来。

利用假开明改善条件

大约半月之后，拘留所的负责人、管理员均调换了。新来的管理员，一改前管理员的做法，用伪善、假开明来迷惑我们。我们也就利用他的伪善、假开明，进一步争取改善条件。我们争取到：放风时间延长，甚至白天不锁门，由赵子明家属送些驼毛，我们捻线、织毛衣、毛袜子，由赵大嫂拿回家出售；弄些黄泥和废报纸制做儿童玩具（不倒翁），用黄泥做围棋子，管理员有时还和我们坐在一起下围棋；冬天冷了，糊门窗，生火炉（由赵子明家送来煤炭），更重要的是赵子明接见赵大嫂时可以长谈，看守人员不太严密监视了。我们规定了秘密通讯办法（把信件放在油壶或衣服缝里由赵大嫂递送），这样和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得到党的关怀和帮助，还为我们送来了衣服和钱，从此，我们在狱中不是孤立的了。与此同时，我们还利用管理员的假开明，进行一些合法活动。例如我们隔壁一间小号子，经常住着一两个受优待的

流动犯人，看样子他们原来可能是公务人员或富商。我们（主要是由赵子明以豆浆铺的老板的身分）就利用放风时和他们闲聊，了解一般社会情况，并借阅报纸。还有一个站岗警察求我们给他织一双毛袜子，他拿一块煤砖来酬劳。对看守人员和管理员，赵子明经常送些豆制品，让他们占些小便宜。他们对我们的管理、监视就比较放松些，不象初来时那样仇视和严格了。我们也装作很老实、很守法的样子，相安无事。

皖南事变后酝酿冒险

一九四一年一月廿日左右，皖南事变的消息，我们从借阅隔壁牢犯的报纸上很快就知道了。我们认为皖南事变后全国形势恶化，敌人必然加强反共措施，对我们的处境极为不利。该怎么办？我们都作了最坏的准备，练习唱国际歌，以便临刑时高唱；同时也想冒险，死里逃生。当时，林亦青首先对我谈起他的想法，“冒险越狱”。这和我想法一致。我们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由拘押我们的牢房的具体条件产生的。牢房的后壁是由关闭的四扇山门组成的，山门外就是狱外大道。警察白天在院门口站岗，夜间撤到院内，由于天冷，又常去室内烤火，有时只在牢房门口看看。因此，我们想，如能在后壁（即山门）想办法，把山门打开或开一个洞，夜间越狱逃跑是可能成功的。林亦青说：“就是有两个困难，一是樊桂英和小孩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逃走，无法带他们走；二是赵子明的家属会受连累，赵子明能否下决心和我们一起走。”我说先找老罗研究一下。我们三人研究的结果，老樊没有办法一起走，只好留下，能走一个算一个；我们对老赵采取两个办法，一是要他和我们一块走，二是请他帮助我们逃走，我们把他手脚捆绑起来，嘴塞上毛巾，当敌人查问时，就视他睡熟时，我们把他捆绑起来，塞住嘴巴，以表明他不是越狱

的同谋者。后由老罗和老赵个别谈了这个想法。老赵表示：这事可要慎重，如有把握，四人一块走，如无把握，四人都走。经过一两天的反复考虑，研究越狱办法，认为大有把握，最后下了决心：大家一起走。并选定日期是即将来临的旧历年节，利用欢度春节，守备松懈的时候越狱潜逃。

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工作

越狱的决心下了，接着进行周密的计划和准备工作。我们考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牢房的后壁打开一个洞口。牢房内没有刀锯斧子及任何铁质的东西（放风时虽捡了一点废铁丝密藏着，恐不顶用）。我们计划用铁条烧红，将木壁烙开一个尺许方形的洞。但铁条从哪里去找？当时，我们的火炉子是用青砖作底代替炉条，用泥糊起来的，但火焰旺盛，室内很暖；而管理员室内的铁炉子不好烧，冒烟易灭，室内很冷。赵子明乘机对管理员说：“我给你修改一下炉子，保证好烧。”管理员很高兴，同意让赵子明替他改修炉子。老赵借此机会暗中偷出两根炉条，这样就解决了烙烧那木板墙的工具问题。

我们考虑，在烙烧那木板墙时必然冒烟，如被看守人员发现就不好办了。为此，我们事先造出舆论，说人不洗澡，室内又放尿盆，臭味大。我们提出要求，经管理员同意从赵家拿些檀香，烧香避疫。看守人员还以为过年了我们在烧香敬神哩。我们还考虑，这木板有寸许的厚度，用炉条烙，只有夜间七点到十点亦可进行，并且估计要连续烙两夜以上，才能烙开。为了白天不露痕迹，我们事先就造舆论，说木板墙透风，冷得很。又经我们提出要求，经管理员同意，用报纸糊上木板靠近地铺的部分。夜间烙的缝隙随时糊上一层报纸盖着，不露痕迹。

我们考虑，这木板墙不宜过早地完全烙透，而且不让它在磨

外露出痕迹，同时，等到最后时刻把烙开的木板搬取下来时是会有响声的，于是我们就事先在夜间多次碰劈木柴，使看守人员习以为常，不致临时引起他们注意。

此外，我们想到，还有一个没把握的问题，就是拘留所外有没有人站岗。我们只知道警察白天在院口站岗，夜间关上院门在院内站岗。要了解这一情况，由赵子明向管理员提出：想在院外散散步是否可以？因为管理员常同邻屋里那有钱、有面子的犯人一起出去下饭馆、逛窑子，过节时，还同意让犯人在家里过夜，管理员从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一要求，居然得到管理员同意。一天夜里，赵子明跟管理员在狱外散步时看了地形，了解到除大院门口站岗外，外边再没有岗哨了。不过在我们住的半房木板墙外边还有一道一人来高的栅栏，我们决定用放风时捡到的一根绳子绑在栅栏上作为踏脚的台阶攀登过去。

我们还考虑，越狱后还需要一些钱做路费，便由赵大嫂送来一些钱，一部分除留给樊桂英外，我们每个人都带一点。

我们设想，是否请狱外党组织援助、配合问题。由于年节接近，等回信已来不及，又恐万一失密，所以，我们没有将越狱计划对赵大嫂和樊桂英明讲。我们向狱外组织写信，暗示“不辞而别”。没有要求援助配合。

关于出狱后如何走法问题。我们计划分两组，以较有社会经验和缺乏社会经验、熟悉甘肃情况和不熟悉甘肃情况的人相搭配。罗云鹏、林亦青为一组，赵子明和我一组，分途回延安。

胜利越狱及后来的不同遭遇

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原订是正月初二或初三日逃出，但因木板质硬且厚，到了初五（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才完成烙开木板的工作。这天午夜，乘管理人员饮酒作乐或熟睡之际，我们越

出半房后壁。我先出栅栏，蹲在祠堂前石狮子后边等候其他同志。此时忽有四、五人的巡逻队过路，没有发现我。巡逻队去后，林、罗、赵相继出来。我们一同向阿干镇方向走去。行约百步许，前边高处有人喝问：“干什么的？”“站住！”这时我们稍有慌张，掉头就跑，敌人开了枪，大家跑散了。我独自绕到拘留所后边，上了华林山，曾从土崖上摔下，腰部受伤，幸不严重。忍痛行走了十来天，从临洮、陇西、宝鸡到达西安，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托地下党的同志把我介绍到澄县，随着运盐商人到达陕甘宁边区。大约过了一个月左右，赵子明同志也到达延安。我们天天盼着张西平、惠光前同志在延安相会，但一直未能实现。全国解放后才得到确实消息，他们在越狱后第二天被查获，又过了几年含辛茹苦的监狱生活。惠光前同志病死狱中，张西平同志于一九四六年二月，亦即国共两党达成双十协定（其中有释放政治犯的条款）后不久，惨遭杀害。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实在令人发指！还有不幸的赵大嫂，我们越狱后她受到很大的连累。她为我们越狱做了不少工作，当时如果没有赵子明的家庭联系和赵大嫂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取得越狱的胜利的。我们越狱后，拘留所的管理员、看守人员、警察都对地进行敲诈勒索与残酷迫害。这些事一想起来，就不由得使人感到心酸，同时，也激起了我仇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

八十里地下红线

董虎山

在一九三五年二月的一天清早，我刚站岗回来，政治部的谢浩儒同志就亲自把我叫去说：“组织准备把你派到正宁县官河一带去搞党的地下工作，你愿意去吗？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刚当红军不久，又是个拉长工出身的，说心里话，叫我一个人去敌占区搞地下工作，心里总感到有些胆怯，真不愿意离开红军部队。可是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我只好服从组织分配。

接受任务后，谢浩儒同志给我介绍了官河滩上的情况，同时给我讲地下工作的原则和要求，以及活动的方式方法，还指出了地下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难题。经过几天培训后，我就出发了。

我从小就给地主拉长工，有一次，我因为有病早下工，被地主当夜赶出了门。我出来给人打了两天短工，混了几个馍，就朝东跑了一天路。路上碰见两个串乡收皮子的小商，说陕北有红军，红军爱受苦人，我一下子心里亮堂了，翻山越岭，沿途打短工、讨饭，没黑没明地赶到了保安县的一个山沟里，终于找到了盼望已久的人民军队。因此，这次出去搞地下工作，组织上仍然指示我装扮成打短工的样儿，从保安县串到了官河一带。到了这个地方不久，我就选定了最穷最苦的寺底下村落了脚，给人铡草、锄地、修庄墙，特别是我盘锅灶出了名，因此叫帮忙的人特别多，这就给我造成掩护自己、广泛地联系群众的好条件。这个庄子距官河镇很近，我一方面替别人作工，一方面探听敌人的活动情况，

组织劳苦农民向敌人开展斗争。

官河虽是个小集镇，但它地处甘肃宁县、正宁和陕西长武、邠县四交界，周围往来关系十分复杂，敌人在这里活动的派系很多，今天这一股要粮，明天那一股索款，过两日又一股来抓兵。这里的农民大部分都是大地主祥盛魁的佃户，每年粮食一打下来，几乎全部交了租子还了债，劳累一年没吃没穿，他们对地主老财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刘志丹同志曾带领红军到过这里几次，给这一带的贫苦农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当我利用干活闲谈的机会，给一些穷哥儿们讲说穷人为什么穷的道理，讲说党的政策和苏区的革命情况时，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热切地盼望着有一天自己也能起来打土豪，分田地，过上好日子。遵照党的指示，我把了解到的敌情、群情、社情和地理环境，都默默地记下来，隔一段时间，借外出做工的机会，偷偷溜进苏区，向党组织汇报。上级指示叫我首先在这里发展党员。按照当时发展地下党员的原则，都是一个一个单独发展的，差不多都是深夜里在野外举行入党宣誓，只准发展的人和被发展的人知道，规定上至父母，下至妻子儿女，都不准泄露。就这样到一九三七年，我已经发展了十几名党员。我自己也在这里成了家，扎了根，敌人也不大怀疑了，群众也更加亲近了。上级党组织决定在这里成立党支部，指定我担任支部书记，继续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到了一九四五年，地下党员已经发展到二百多人，在官河镇到山河镇这一条八十里长的敌占区建起了一条地下革命红线。

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壮大，革命斗争活动也越来越活跃了。

那时候，地下党员每三人编为一组，一般是十天开一次小组会。会上主要是学习党的政策，讨论形势，研究如何开展地下工作，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白天，党员们照常干自己的营生，有的下地干活，有的赶脚跟集，也有被敌人拉差的。总之，平时从表面看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的不同。一到晚上，情形就完全不

同了。地下党员有的在野地里开会，有的出去贴标语，有的去毁掉白天给敌人修的工事，割断敌人的电话线，整个八十里长壕到处都燃起了革命火把，群众也有了革命的方向和信心，敌人在这一带的统治势力不断遭到打击，真是八十里长壕成了另一个天地。

地下党组织还通过各种关系进行活动，经常搜集敌人的情报，并巧妙地派人装扮成担盐的、贩簸箕的把情报迅速地送出去。如在扁担背上钻个眼，把情报装进去，再把外面钉好，经过多少岗哨，一点也引不起敌人注意，一直送到西华池把情报交给上级党组织。以后，宁县的早胜、春荣、良平和陕西郃县等地下党组织搜集的情报，也由我们来转送。有时候，苏区党组织一些负责同志来检查工作，或者路经这里，我们地下党都作了掩护工作，从没有发生过意外事故。

地下党还经常领导群众抗粮、抗款、抗兵，有时采取硬抗，有时采取软顶。对于敌伪军政人员，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付方法，有的打，有的拉，有的采取又打又拉的办法，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敌人。

一九四六年冬天，伪宁县县政府派来了一个逼款子的尚队长，他带着一支手枪，还带领两个拿枪的警察，来到官河。这次摊派的款子数量大，时间紧，一般农户要交二、三十块白元，而且限五天交齐，如按期不交者就要押进城去。他们刚来三天，就捆绑吊打了五十多个群众，官河壕上不断传来受害群众的悲惨哀嚎。群众对这三个家伙恨得咬牙切齿。地下党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干掉这三个国民党的黑狗。

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异常寒冷。我和党员吕济仓、周维青等同志，带领三十多个群众拿着镢头、铁铤，带着地下党员们卖牛卖驴、卖柴卖草凑起来的几十块白元，来到了这三个坏家伙住的地方。这是官河镇北门外最坚固的一个房院，紧靠大门有一个高

楼子，他们就住在这上头。我们来到大门口时，看见窗口还有灯光，里面不断传出猜拳行令的作乐声和打人逼款的惨叫声。我们敲了一阵门，听不见里面应声。过了一会儿，一个家伙出来朝楼下撒尿，一发现我们，提起裤子就慌忙跑了进去。随即三个狗东西一齐拉着枪站在楼墙边喝问：“干什么的？”我们顺口回答：“交款的。”说着我们一齐叮叮当当敲起手里的白元。他们一听真以为在他们的严刑拷打下，群众怕得连夜交款来了。便急忙喊水开了大门，把“交款的”领上楼子来了。吕济仓几个同志一上楼子，一个挨一个往桌子上摆起白元，这个说：“我今天就交清了。”那个说：“我先交十块，明天赶黑一定交清。”三个家伙一见桌子上摆起的白花花的一堆银元，就像狗见了肉包子，啥也不顾了，把手枪放在炕头，把步枪立在地上，一齐围着桌子“叮当”“叮当”一五一十地数起白元来。就在这时，吕济仓我们几个同志一把抓起扔在炕头的手枪和立在地上的步枪，喊了声：“不许动！”接着围在楼子外边的二、三十个群众一齐拥了进来，转眼之间就把这三个家伙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刚拉出院子，群众一见那个凶恶的尚队长，肺那气炸了，三下五除二就把他活活地砸死了。那两个伪警察被我们连夜押送给红区游击队了。

第二天一早，官河镇和周围村子里一片轰动，墙上、树上贴满了红绿标语，标语的落款处都写的是八路军某师某团。群众成群结队，眉开眼笑，奔走相告，传说着：“昨晚八路军大队人马路过官河，把大路都铺满了，数也数不清！”“我们亲眼看见的，八路军扛的机关枪，还有几个骡子驮的大炮哩！”敌伪人员听到这些传说，个个胆战心惊，很长一个时期，那些自卫队、伪乡保的爪牙，再也不敢下来抓兵要款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敌人派了一班马匪军、一班自卫队，驻扎在南庄堡子里，扬言要镇守官河堡，并且向每一个保要五个兵。地下党组织立即商定，马上采取措施，展开斗争。于是派刘志明等

同志，当晚带着从敌人手里夺来的那三支长短枪，分别到敌人驻地周围的王禄、纪村等村庄张贴标语，打枪，放纸炮，并且四处扬言，说八路军要包围这股匪徒，要拔掉这颗钉子，各村庄一片紧张气氛，敌人被吓得慌了神，第二天就夹着尾巴逃回县城去了。

对于那些不为反动派死心踏地效劳，不愿与人民为敌到底的敌伪人员，我们也按照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利用他们为我们做些工作。

南庄堡子有个伪保长叫曹焕文，催粮派款很苛刻，和敌自卫队、便衣队混得很熟，是我们开展地下工作的很大障碍。当时地下党组织决定要除掉他。但我们向上级党组织请示后，认为这个人还可以设法争取利用。于是我们经过十几天的详细侦察，在四月一个灰蒙蒙的夜晚，我们悄悄埋伏在一个沟畎路旁。这是曹焕文从家里去官河镇必经之路。当他哼哼唧唧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一呼而上，包围了他。曹焕文一见我们人多势重，长枪、短枪对着他的胸口，吓得连喊：“饶命！饶命！”我们即向他讲明是八路军的游击队，并向他讲了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要他早日醒悟，暗地里为我们做些工作，立功赎罪，他满口应承下来。最后我们警告他说：“今晚本要提你的头，既然你愿意立功赎罪，那么就让你的头先寄放在你的脖子上，以后若发现你有捣鬼的事，就随时来提你的头！”从此以后，曹焕文果然老实多了，每次到县城开会回来，就把敌人活动的情况向我们报告，还有敌军的调防，伪自卫队、便衣队的活动等情况，也不断向我们汇报。同时，我们在敌占区活动用的路条、通行证也由他给我们办理，这样，他对我们开展地下斗争确实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南义镇是我们从宁县去西华池老区的必经之路，敌人在这里设了很多关卡，搜查很严，是我们通向红区的一个严重障碍。为了通行安全，为了掩护身份转送文件，我们除了拿着伪保安处的路条装扮成担盐的、挑脚的之外，同时又和南义镇伪镇长拉上了关

系，以便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安全脱险。原来南义镇的伪镇长曹佩玉，是个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老家在宫河西李家村。他虽然身为伪镇长，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也有些不满；加之南义镇地处红白两区交界的地方，他也不得不与我们拉上一点关系，将来为自己留条后路。我们详细调查分析了他的思想状况，并报请甘肃工委统战部同意之后，就由西李家村的地下党员，通过家族关系和他挂勾，然后我又直接和他见了几次面，叫他把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为我们做工作的决心写成书面材料，签了名，盖了章，交给我们作为考查他的依据。由于我们对他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很快由敌对的势力转变成可以借用的一份力量，给我们做了不少工作。一九四五年，我们一支大部队路经南义时，地下党事先通知了曹佩玉，当晚部队一到，曹佩玉巧妙地打开了寨门，暗接我军安全入镇，很快全歼了敌军一个营的兵力，取得了一次很大的胜利。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地区，“有钱买得鬼推磨”，“钱能通神”，伪地方政权的官多数也是钱买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利用这一点，在八十里地下红线上，选派一些地下党员设法当上“保长”，打进伪地方政权内部，以便更好地开展地下革命斗争。比如，在宫河一带，我们选派比较机灵、嘴巴流利的地下党员张宗义同志，去争取敌伪保长的职位。我们先给他凑了一些钱送给伪镇长，又请伪镇长吃了一次酒席，还联名告了原任保长一状，不久，原任保长果然被撤职，与此同时，一张保长委任状送到了张宗义同志手中。这样一来，宫河一带，名义上是敌人的政权，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天下。甘肃工委的负责同志可以安全来往，并且把山河镇到宫河镇这八十里地盘当作半解放区对待，地下红线越来越鲜红，革命力量越来越壮大了。

地下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更加引起了敌人的注视和仇恨。敌自卫队、便衣队白天黑夜到这里来侦察、搜剿。一九四七年古历二月间，我去合水向甘肃工委统战部汇报工作回来不久，

一天更深夜半时节，敌人突然派军队包围了我家住的庄子，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五花大绑抓到了宫河镇。

一个敌连长几次审问我的姓名、年龄和经历，接着又逼问地下党的名单、编制、活动，问谁是“头子”等等，势头确有点吓人。但从他们的口气听，对我只是怀疑、吓唬，并没有抓到我们什么真凭实据。因此，我就装成一个啥都不懂的农民模样，敌人问到地下党的情况，我只回答三个字：“不知道”。他们接连给我上了“坐飞机”、灌辣椒水等刑，我还是回答不知道。他们觉得在我身上已逼不出来什么东西，就把我押送到永乐镇胡宗南匪军的四十八旅。在那里，敌人又给我用了许多刑。当时我想，八十里地下党组织的命运全担在我的身上，要是我一言差错，地下党组织就会全被破坏，多少人就要人头落地，家破人亡；逼死我，仅仅是我一个党员的损失。于是我就拚上一条命，咬紧牙关，一口咬定，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种庄稼的农民。敌人无奈，以后又把我随军押到陕西的耀县、潼关、宜川，最后押到西安。在西安敌人采取利诱的办法，说只要我交出地下党的名单，可以把全家搬进西安，每人给一百块白元。我仍然是老主意，毫不动摇，敌人无计可施，最后又把我关进了监牢。

在监牢里，敌人日夜上刑，把我拷打得遍体鳞伤，折磨得不成人样，不多日子我身上结了厚厚一层伤疤，监狱里的难友们淌着眼泪替我一片一片地剥去。我认为敌人不久就会枪毙我的，那知到了八月间，出人意料，敌人却把我放了。释放时他们说：“你们镇上来了保状，你回去吧。”这真是日出西山，天大的奇事！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被捕以后，地下党组织对我十分关心，曾多方设法营救我，使我重新回到革命怀抱。

八十里地下党组织一直坚持战斗着，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自由幸福的新天地。

(李永芳整理)

陇东“抗总”前期的活动

龚志安

一、前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略我国东北领土。当时全国人民和爱国人士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呼吁全民族抗战的声浪不断高涨。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屈服于日寇的军事威胁，采取不抵抗主义，一味依赖“国联”调解，节节退让，直至签订了屈辱投降的“何梅协定”。这更加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和爱国人士的愤慨。在中华民族面临危机的时刻，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一九三五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要求抗日的怒吼声震撼中外。继而北平学生和爱国人士，又掀起抬棺（学生郭清被捕死于狱中）抗日游行，给予不抵抗主义者又一次迎头痛击。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我党的推动下，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怒潮，风起云涌，席卷全国，深入各个阶层，遍及每个角落。人们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严重性；认识到打内战必将导致亡国的危险性；认识到全民族抵御外侮的迫切性。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民族矛盾已上升到主要地位。日

本帝国主义乃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大敌。甘肃地处西北，东北、华北沦陷了，西北焉能偏安。只有协力抵御外敌之侵略，才能排除沉沦为殖民地人民之痛苦，绝不能苟安于一隅。

当时，甘肃人民的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促进了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总会的成立。“抗总”一成立，就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组织。

二、到东北军做上层抗日工作

一九三六年盛夏，北方局党组织派我到西北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抵西安后，由向仲华同志来接头。几经组织研究，确定要我到东北军内去做上层工作。一天，宋黎同志对我说：“事前未料到，给张（学良）一说即成了，因为没记清楚你的名子，急生一计说，叫窦志安，今后你就叫这个名字好了，记住！……”从此，我就到张学良部六十七军工作。军长王以哲将军，当面把我介绍给召集来的三个师长，分配我到一二九师师部，该部队称我为抗日救亡“顾问”。和我一同到东北军工作的其他三个同志，分到了其他各师。

六十七军的三个师分布在庆阳、白马铺、驿马关、西峰镇、泾川、平凉、固原一带，对苏区形成弧线包围圈。军部指挥部驻固原，军部留守处驻西安西木头市。他们左右前后的友邻部队还有：骑兵军、五十七军的数个师和保安队。此外，在静宁县还驻有胡宗南部的一个旅，名曰机动部队，实际是监视、配合围攻红军的（该旅偷袭固原北山城堡附近红军时，被红军歼灭。当时，六十七军撤到侧面，采取了不介入方针）。

我们在东北军活动期间，首先是了解情况，摸清特点及存在的问题，抓住要害，进行工作。该军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东北军从入关以来，连以上的军官都经过庐山训练班的轮训，深受国民

党反动派的毒害。第二、连以上都混有政工人员，团以上有政工室，进行反共活动，进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宣传，流毒很深。第三、东北军军官中一部分人员和政工人员之间矛盾重重，与政工人员对立情绪严重，甚至有的动手发生冲突。例如一二九师师部军法官刘××多次在吃饭时夺了政工人员的饭碗，还骂是吃冤枉的，诸如此类情况还不是个别现象。第四、在东北军内是一个封建家长制的军事统治集团，他们从入关以来之所以能够存在，未被蒋家王朝分化瓦解掉，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封建家长统治关系保了驾。这也是该军的特点。他们也接受了许多军阀最后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在内战中他们就会被消耗掉，或与对方两败俱伤，这正是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攻自灭的奸计。他们有的人引用韩信对刘邦的反语以自勉，感叹说：总有一日，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亡。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方向，他们在抗日救亡的十字路口上踏步，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尚在观望。当然这是总的观察，也有一些人是在向进步的道路上前进，甚至大踏步地前进。第五、在思想意识方面，对苏区存在着浓厚的歧视情绪。我刚到该军时看到，他们在军事行动上，虽然基本上已经停止大规模运动，不积极对抗红军了，但还存在赤、白两军对立的局面，间或还有局部的互击现象。在政治上他们有举棋不定的趋势。十年内战，造成的鸿沟，非一个早晨所能弥补。及时消除对立情绪，这是工作的关键。我们紧紧掌握上述特点开展工作。在团结起来，联合抗日的大旗下提高所有官兵的认识，扫除思想认识上的障碍，鼓动所有的人，把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纳入到抗日救国的轨道上来。调动一切抗日的力量，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打到东北去，收复失地。这些主张，得到东北军官兵上下的拥护，特别是得到原来就想打回老家去的一些官兵的热烈响应。

一二九师开始第一次要我给住驿马关的教导队（为连、排、班

领军前，计二百多人）做时事报告，我就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题明确地讲：联合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也是重建东北家国的希望。要打回老家去！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到底。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各族各界人民联合起来，走上抗日解放的道路，到前线去吧！报告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记得时事报告的当晚，该师六八四团一个团副，向师军法处刘处长提出不同意见说：“这样讲，今后怎么和共军作战？……”刘处长当面斩钉截铁地批评他：“胡说！”那个团副就只好停住了口，把话题转移了。

此外，六十七军参谋处主办的“东望”周刊，也成为我们宣传全面抗战的刊物。

为了扭转苏区和白区的对立情绪，把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扩大到工农商学兵各阶层中去，使抗日救亡运动遍及城乡，我们又积极建立了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总会。在广大群众中大造抗日救亡的舆论，造成抗日救亡的声势，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反动政策。

三、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总会的建立和主要活动

（一）“抗总”的建立

在这之前，只有“中华全国抗日救亡联合会甘肃分会”是抗日救亡活动的联络机构。陇东抗日救国总会成立后，该会则成为地方各族各界的抗日救国组织。性质虽是一样，但权力不同。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总会，当时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起到了调动、督促训练抗日人员的作用，可以把管辖区内的军、政、党（国民党）的机关工作人员调动训练，要他们接受抗日、民主的思想。“抗总”是联合各党各派组织抗日阵线的一个特殊权力机构。

“抗总”成立后，得到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各团队和友邻部队的普遍赞成、拥护，六十七军军部特来电表扬、嘉奖，陇东地方各县也相继成立了救国分会，如镇原、宁县、合水、正宁、环县、庆阳、泾川、固原、平凉、庄浪等县，都设立了相应的机构。同时在集镇、街道也有建立基层组织的。

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总会的主任委员是窦志安（共产党员），副主任委员是赵绍宗（东北军六十七军六八三团团团长），戎纪武（国民党庆阳专员）。委员会内设人民武装部、训练部、民众组织部、宣传部、总务部等，各部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有关人士担任部长、副部长职务，此外，委员会还聘请了顾问多人。

（二）“抗总”工作活动情况

“抗总”在东北军六十七军的积极拥护和赞助下，影响和带动了地方各族各界爱国人士和团队开展了抗日活动，扩大了社会民众的视野。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它首先是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教育群众，消除社会上苏区和白区相互对立仇视的情绪，达到各派联合抗日的目的。其具体活动有如下方面：

1. 救国会制定有抗日救亡的纲领。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宣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联合各党、各派、各人民群众团体，成立工农商学兵的联合政府，组织领导本地区民族救亡工作。改革进行内战的教育制度，充实抗日救国的教育内容，建立为抗日服务的工、商企事业，建立抗日的国防军。为了扩大影响，这个纲领印刷了数千份，寄往全国各地。

2. 救国会刻制了印信，名曰，“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总会之印”，印玺为圆形木质。

3. 救国会制定“会徽”，长方形布质、白底，上面印有彩色的工、农、商、学、兵的人像一簇，面向宣讲抗日主张的人，倾

明宣讲。凡入会的会员，每人发给一枚佩带。有些军人还把“会徽”寄给他的亲友和战友作为纪念品。

4.救国会出版会刊，开始叫“大众日刊”，以后改为“大众三日刊”。发刊词是根据抗日救国总会的纲领、宗旨由我撰写的，“大众日刊”的总编辑由我兼任。另外在救国会内部，针对思想斗争，我还写过以“生存”为题的文章。

救国会的人民武装部直辖的训练部，巡回训练各县脱产保安队和国民党训练过的反共壮丁队。

训练内容：扭转“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国策，提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党各派联合起来；揭露“言抗日者，杀无赦”的反动性和反动派屈膝投降日寇的罪恶；对过去受过蒙蔽的地方团队和各阶层人士，指明错误之所在，提高其思想认识。

我也不断地在东北军的团、营、连部队作抗日的时事报告，并到地方的脱产保安队中作报告，进行宣传活动。例如给当时住防萧金镇一带的杨干臣同志（现为省政协委员）的千余人部队，作了几次形势教育报告。此外，还给合水等县保安队作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报告。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抗日救亡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肃清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国策的流毒。当时普遍地轮训了陇东一些县的保安部队和受过反共训练的壮丁队，基本上扭转了赤、白对立的思想情绪。明确了国内战争的是非界限，增强了民族抗战的信心。

抗日救国会，举行过数次大规模的各族各界人士，包括城乡人民群众、驻军的联合游行活动，游行所呼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党各派联合起来进行抗日”、“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张、杨抗日的八项主张！”“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在声势浩大的几次有党政军参加的游行和提灯游行大会后，赤白对立的情绪，首先在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上大大

地起了变化。

四、西安事变后陇东“抗总”活动高潮的形成

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东北军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杨虎城将军，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据说这次行动就是由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亲自带领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久和警卫队抓了蒋介石的。

“双十二”事变发生后，广大群众，欢天喜地地认为中国有了新的希望，真正能够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了。对张、杨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我们立即响应、宣传。那时政治上急速变动的情况，给予我们开展抗日救国的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当时东北军对蒋介石派来的政工人员采取措施，扫清了抗日救亡工作的障碍，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大踏步地前进了！

红军将领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三同志在行军途中路过西峰镇时，还访问了陇东抗日救国总会。他们在数九寒天，衣着单薄，经过长途跋涉还不顾劳累地关心抗日救国会的工作，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使人至今铭感不忘！

在此期间，我们声援了绥东抗战，开展了收复“百灵庙”的庆祝活动，增强了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还将傅作义将军电复救国会的电文公布于群众，更加促进了赤、白两区群众热烈拥护抗日救国的主张，扩大了政治影响，使抗日救亡工作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了。

当抗日救亡工作正在步步深入发展的时候，国民党庆阳专区保安副司令刘国忠（此人是个官僚政客，吸食大烟，在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高潮中，在胶东被我解放军击毙）勾引一些不识时务，不顾抗日救亡大局的分子，企图分化瓦解抗日救国会，图谋个人私利。而对这种情况，我们揭露了阴谋分子的分裂罪行，对盲从者

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这样才使东北军的将士们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坚持参加了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反对阴谋分子的分裂捣乱，维护了救国会的威信，从而保证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顺利发展。

反动分子的一系列投机阴谋失败后，陕甘宁省委书记（苏区）李富春同志曾派左觉民同志来白区约我到苏区向李富春同志汇报工作。

我到苏区的曲子，受到李富春同志亲切的会见。会见时我详细地汇报了陇东抗教总会的工作，李富春同志听取了汇报后，对我们的活动表示满意，并指示我：将苏区半部县，即庆、环、镇、合、宁、正的抗教会统归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总会直接统一领导，统一抗日活动。这对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信任。我在曲子时，还由肖劲光同志领我参观了曲子的列宁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墙上挂有小字报，内容是写个人的生活和认识之类的诗歌、评论等文章。在参观的过程中，他给我介绍苏区的民主生活等等。在曲子住的日子里，还和陕甘宁省（苏区）的主席马锡五、保卫局长郭化若等同志见了面，交谈了工作。

在曲子听了许多领导同志的谈话，使我进一步懂得了很多革命的道理，激励自己更好地为党工作。在曲子活动数天之后，左觉农等同志又送我回白区。往返途中曾路经庆阳城，当时蔡畅同志（任白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就住在这里，她又留我住了几天。此间我曾访问过庆阳高小的抗教会，还访问过红军教导师的师长周昆、政委袁国平、政治部主任罗贵波，这些活动使我很受教益。

我离庆阳前，袁国平同志给我送了两册书，即列宁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并向我说：“愿拿步枪在东北军内换子弹，你可回去办理。”因为东北军少了枪，要连长赔偿，否则连长就撤职查办，子弹可以报为作战消耗。但子弹当时在我军是迫切需要的。

回到白区，我们积极贯彻执行了李富春同志对陇东“抗总”工作的重要指示。另外，教导师拿枪换子弹问题，我给六八三团赵绍宗团长谈过后，他慷慨地答应说：“送他们十二箱，拿枪就不换了。”据说子弹立即派人给送去了。

五、关于东北军离开西北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立即显出了他的豺狼本性，扣押了张学良，并进一步施展伎俩，拆散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防，一九三七年三月，下令调东北军出潼关。接着，固原、平凉、西峰镇一线，由蒋记嫡系部队胡宗南派兵接防。

当东北军要离开陇东时，我们以陇东各族各界抗日救国总会的名义并由我签名，撰写了欢送东北军的送别书。这个送别书是在郑州西北抗日救国会印刷的。分发给东开的所有东北军。告别书的内容，主要是要求东北军的官兵们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集体或分散，都要不忘抗日救国的宗旨，不要忘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要忘记团结工、农、商、学、兵，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不要忘记打到东北去，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

东北军离开陇东后，我在陇东一带不能继续坚持活动了，陇东“抗总”工作由康清同志接替。

我到郑州后，始知西北抗日救国会，全部撤离西安，一部分人员撤到郑州。后来我辗转到了延安。

春 满 子 午 岭

王九九生前口述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蒋介石纠集胡宗南，马步芳匪部三十多个旅，二十余万人，向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犯。

蒋介石依仗他兵多势众，装备精良，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边区全线推进，疯狂进攻，企图将我军压缩到陕北一带一举消灭；或者赶过黄河，逐出陕北，夺取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在敌我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暂时从陇东根据地，向荒无人烟的子午岭柏山里东撤，同胡马匪帮进行周旋。

(一)

初春的陇东高原，天气乍寒乍暖。那时，我正在三塬原的连坡村养病。

一天早晨，寒风刮个不停，眼看一场大雪就要降落。吃过早饭，我正在哨楼里和同志们闲谈，突然，哨兵进来报告说，西边大道上有人骑着马跑来。我和大家迅速走出门，果然见一匹马飞奔而来。

说话间，那匹马已到了我们面前。原来，骑在马上的人正是分区的通讯员小刘。他在马上向我行了个礼，急切地说：“分区首长命令你火速前去参加紧急会议！”

我问：“什么事？”

小刘顾不上详细回答，随口说道：“去就知道了！”说着，

掉转马头，双腿一夹，那马象离弦的箭一样，又向别处去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观察通讯员的神情，我估计可能有什么非常紧急的军机大事。于是，我立即去备马，提了短枪，跨上马背，飞奔前去。连坡村离分区机关所在地马家堡子只有二十来华里，不多时便到了目的地。

说是分区机关，只不过是老百姓给腾出来的几孔窑洞，除了办公，几十个人吃饭、睡觉都挤在里面。我把马拴好，进了大门，恰好碰上陈国栋司令员。陈司令员热情地和我打了招呼，说道：“进去先烤烤火，暖和暖和，人还没到齐，我到外面看看去！”

进了窑门，人已来了不少。战友相见，免不了又是一番亲热交谈。说了一会话，新正县县长郭廷璠等同志都陆续来到了。

这时，陈司令员从外面进来，和气地问道：“人都齐了吧！”

大家同声说：“齐了！”

“齐了我们就开会！”

大家都不说话了，窑内静静的。

陈司令员走到桌子跟前，把烟袋锅往桌子上一放，说道：“同志们，国民党蒋介石假‘和谈’，真反动的狰狞面目终于暴露了。他们正在调兵遣将，对我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现在，胡宗南、马步芳三十多个旅，二十余万人，已分兵几路，向边区扑来了。南线胡宗南十四万人直压延安；西线马步芳匪部和胡宗南一部共十个旅向我陇东、三边进攻；北线榆林的邓宝珊也意欲向我绥德一带进犯。蒋介石胃口大得很，这次亲自坐镇西安，看样子想把我们一口吞掉！面对几十万强敌，众寡悬殊，情况是严重的！”

说到这里，陈司令员目光炯炯，脸色显得非常严肃，拳头不住地捶击着桌子。接着又说：“大敌当前，为了保卫边区，保卫革命果实，党中央、毛主席要我们暂时放弃占领的地方，避敌之

口气，撤退到子午岭一带的稍山里去，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待时机成熟，全线反攻，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不少同志听说要撤退，忿忿地说：“难道我们辛辛苦苦打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创下的这块根据地，从此就丢给敌人了么！我们有的是人，有的是武器，为什么不打，偏要走？”赵铁娃、高士奎二同志气得脸都变青了，霍地站起来，要求道：“大家走吧，把武工队留着，在原地坚持斗争，我们和狗日的拼！”

陈司令员耐心地解释道：“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行动计划，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打败敌人，一定会胜利。现在，我们放弃这块地方，正是为了将来长久地占住这块地方。如果我们不撤退，和大于自己数十倍的敌人硬拼，把人都拼光了，还有谁去占领这块地方呢？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啊！”

这一说，大家的思想疙瘩都解开了。

陈司令员接着说：“会完后，回去赶快准备，先把老百姓转移走。部队、分区机关、县委机关、各区委，还有武工队和游击队，除留一部分坚持原地斗争外，其余都要走！家属也要随着走！”

会议结束时，宣布了行动路线，并安排：分区机关由分区警卫营担任警卫；县委机关由县保卫大队担任警卫；各区委花插着走。

陈司令员又再三强调：情况紧急，回去要做好群众和战士们的工作，给大家说明情况，要准备吃苦，说撤就撤。

(二)

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天气异常寒冷。会完后，大家都分头准备去了。

我回到住地，已是快吃下午饭的时候了。为了尽快地让老百姓转移，我们及时组织人员到各村通知，做群众的工作。吃过午饭，老百姓开始走了，他们牵着大牲畜，背着包裹行囊，扶老携幼，沿小路向东，下了南北两面的川道，进了山。到了晚上，除一部分上了年纪的老汉、老太婆和一些走不动路的小脚女人外，其余全都走光了，所有村子几乎都成了空的。

第二天凌晨，我们起床后胡乱地吃了些，给牲口拍上驮子，刚走到路口，分区大队人马也上来了，我们就随着分区机关人马，在寒冷漆黑的夜幕里，急急向东行进。

约走了一个时辰，东方开始发白。队伍也开始下川了。这道川是马栏的西川。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得见远处刁岭关一带传来的枪炮声，我三八五旅和敌第四十八旅接火了。为了使敌人按我们的战略部署运动，我们的部队发扬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作风，不顾疲劳，忍着饥饿，冒着严寒，又一刻不停歇地继续前进。

经过几天的连续行军，同志们实在太累了，有的走着走着就打起了盹，有的走着走着，就跌倒在路边。可是，有谁愿意让自己的同志掉队呢！有的同志刚跌倒，前后的同志就赶快将他摇醒扶起来，拉着一同走。

大约已是行军路上的第四天了，部队又作了一次夜行军。天将明时，来到了一个叫石底子的地方。这地方住着不多的几户人家，队伍决定就地休息一下再走。命令刚一下达，同志们就三个一群，五个一堆背靠背地呼呼睡着了。

几天没有吃过热饭，没有喝过开水，加之每天长途行军，很少休息，个个都累得精疲力竭。为了让同志们恢复一下体力，我们商量着为大家做顿热饭吃，天亮后，我们到老百姓家里买了些小麦，就放在磨子上磨起来。由于人多，哪里能顾上做面条、烙饼子。只是将小麦磨了一遍，就搅下来倒在锅里，烧起麦粥来了。大家管它

叫“麦仁饭”。

有句古语说：“饥不择食。”说实话，当人们在饿极了的时候，吃什么饭来都感到香甜可口。虽然只是些带皮的麦糝烧的稀粥，这时候却成了美餐。有个“文化”同志边吃边开玩笑道：曹操兵败赤壁，闯过华容道，脱了险境，人困马乏，饥不可忍，遂寻部下找来一位老汉给他做点饭吃。老汉用带砂的大米烧成稀粥，曹操饿极了，端起碗来狼吞虎咽，尽管粥内的砂子硌得他不敢合牙，但还边吃边问老汉烧的粥为何吃起来这样香。老汉回答说：是你饿了！现在我们吃的这麦粥，里面没有砂子，比曹操吃的那一顿粥好多了！

这个同志刚说完，一个同志又接上了话茬，说道：“你说得不对，曹操是兵败，我们可不是兵败！现在我们吃点苦，背着敌人走，说不定那一天来个反击，追得胡宗南狗日的连带砂子的粥都喝不上哩！”

顿时，大家被惹得哄然大笑。

大家正吃得香，担任警戒的部队，派人通知我们，说敌人追上来了，要我们赶快走。话音刚落，就听见后面响起了枪声。

大家都吃了个半饱，饭剩得老多，但不能再吃了，只得放下碗，恋恋不舍地上了路。

这天，不管怎么样，大家总算还吃了点热饭。尽管没有吃饱，但热饭一到肚里，浑身便热乎乎地添了劲。不多时就走了好一段路程。

队伍在高低不平，乱石崛起，荆棘丛生的山川河道里急进。正走得紧，新正县县长郭廷璠同志骑着一匹白马，从前面急驰回来，老远就喊：“老王！快通知后面的部队，刚才接电，说敌人飞机出动了，很快就到了，赶紧分散隐蔽！”说罢调转马头就又走了。

我根据这个命令，以最快的速度，向后跑去，通知部队，原

地隐蔽。在返回的路上，我听见天空嗡嗡的响声，抬头一看，一架米黄色的飞机从对面山顶低空飞来。这时，我看到前方有个土坎，跑了几步，想在那儿安全隐蔽，只听见李新荣同志急促地喊道：“老王！老王！快！快趴下！隐蔽！”

大概是敌机发现了我们，我刚趴在地上，敌机便俯冲下来，子弹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咕咕地叫着钻进地里，扬起了缕缕灰尘。

飞机飞走后，部队又继续前进。刚走了不长一段路，又听见飞机声嗡嗡地响。这回，部队一听到响声，就都自动隐蔽了。我刚钻进梢林，就听见一个战士在低声地喊：“喂！‘黑寡妇’，‘黑寡妇’，一共三架！”我抬头一望，果见三架黑得发光的敌机，贴着山顶飞了过来。

这次不比上一次。敌机在我们上空盘旋了一阵，就开始扫射。起初还没有发现目标，只是怪叫着俯冲下来，打一阵机枪，又怪叫着向高空飞去。原来这是火力侦察。这样一连数次，驮迫击炮的几匹骡子暴露了目标，被发现了。敌机缠住不走，拼命向骡子射击。骡子的缰绳被子弹打断，疯了似地在河滩里乱跑。敌机尾追不放，来回穿梭扫射。有两匹骡子终于中弹栽倒了。

敌机见骡子被打倒，还不死心，又返过来用机枪胡乱扫射。直打得我们头顶上的树枝纷纷落下。我附近一个战士负了伤。

敌机打了好大一阵，大概是油快耗尽，最后扔了几颗炸弹，飞走了。这天，敌机一连扫射轰炸了三次。天黑后才安稳了下来。

连日来，敌人拼命追赶，飞机又不停地侦察轰炸。恶劣的环境使部队得不到休息，日夜兼程，挨冻受饿。同志们的眼睛熬红了，面容显得十分消瘦。有的同志几天洗不上一回脸，胡子头发长得老长老长。有的棉衣被树枝撕得一块一块的，露出了棉花。有个战士棉衣里的棉花大部分被撕去了，冷得不行，只好将毯子

裹在身上御寒，但他仍然很乐观，一路开着玩笑。有的战士脚打起了水泡，走起路来一跛一拐地很艰难，可是谁也不愿落后。虽然生活过得很艰苦，可是没有人气馁，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度过这难关，消灭胡宗南，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三)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一月。

一月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甩开敌人的追赶，脱出险境，每日照样在不停地奔走着。后来，按照上级的指示，一直向东北方向前进。我们仍按既定作战方针拼命赶路，经过了零湾里、丁字川、上阵子、桂花堰、芦宝、大湾里，一直到了康家堰。最后，总算甩脱了敌人。这时，传来了特大喜讯。

原来，胡宗南最精锐部队王牌第四十八旅，在刁岭关和我三八五旅对了一阵后，我三八五旅遵照上级指示，向东北方向撤走了。表面上看来我军是在败退，实际上是在酝酿着一场围歼战。我三八五旅在刁岭关牵了一下敌人的牛鼻子，果然牵着了。就这样将敌人拉着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敌人以为我军败了，骄横至极，拼命在后面追赶，企图决战，消灭我三八五旅。可他哪里知道，在东北方向，我新四旅、警一旅正在那里等着他们呢！

我三八五旅将敌人拖到西华池后，我驻西华池的部队及时撤出。愚蠢的敌人见了城池，不要命地往里钻。就在敌人还立足未稳的时候，我军三个旅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一时枪声大作，炮声四起，硝烟遍地。敌人遭到如此强大的打击，立足不住，只得突围。我军将士奋勇冲杀，将敌人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经过半天激战，我军虽然只歼敌千余人，但却击毙了胡宗南第四十八旅王牌旅长何琦。

西华池一战的胜利，何琦的被击毙，这对胡宗南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我军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大振了我军的士气。对改变陇东战局，起了重大作用。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象开始时那么猖狂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也没有那么严酷了。

在康家塬住了一段时间后，上级又命令我们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九岘塬转移。这时，虽然大队敌人不敢随便追击我们了，但他们经常派出了便衣侦察，三五一群，或者十几人一队，都穿着老百姓衣服，很难辨认出来，稍不留神，就会吃大亏。他们不带长枪，个个腰里掖着短家伙，而且都是些亡命恶棍，不大好对付，往往搞得人心惶惶。面对这种情况，究竟怎么办？最后我们还是想出了办法：你搞你的便衣队，我们也搞我们的便衣队，你有你的一套办法，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办法，看谁斗过谁。

有一次我带了几个，化了装，在一个村子里住下。下午，我们几个正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了解情况，猛听见西边货郎鼓嘟嘟地响，并且听到吆喝声：“卖洋糖针线哩噢！”我们探头向外一望，只见一个货郎打扮的人，挑着担子走来。那家伙贼头贼脑，边走边向后看。老乡告诉我们：“前几天好象就是这个人，来过一趟。”

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决定将这家伙扯回屋里来。于是，我们都做好了准备。“货郎”越来越近了，眼看到了门口，我随即往外一闪，一把揪住扯了进来。货郎担嘟啦一声掉在院里。这家伙被突如其来的行动吓懵了，但毕竟是个职业特务，一进入到屋里，手立即伸到腰里去摸枪。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几个几拳就将那家伙打得躺倒在地了，同时夺下了他的“大机头”枪。

这家伙被夺了枪，立刻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了，头上的冷汗直往外冒。我用枪顶着他的脑门，问他们还再有没有人，这家伙先是支吾，后来看见不行了，只得说了实话。

第二天，我们埋伏好等着，果然有几个便衣特务中了我们的

伏击，全部被缴了械。以后，我们连连出去，连连获胜。敌人的便衣队很快就被我们制服了。

(四)

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战争，丧尽人心，蒋军貌似强大，其实外强中干。

陕北战场，在毛主席亲自指挥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接连获胜。青化砭一战，敌三十一旅全军覆没，旅长李纪云被我生擒。四月羊马河一战，敌一三五旅又被我全歼，代旅长斐宗禹也没有逃脱被活捉的命运。

敌人遭到无情的打击，只得变进攻为败退，而我军则由原来的撤退转为反攻。就整个陕甘边形势来说，出现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此时，已是古历的四月初，浩瀚的子午岭，万木吐翠，春意盎然。陕北战场胜利的消息如同和煦的春风，吹遍了陕甘宁边区。正当人们欢欣鼓舞的时候，上级又来了命令，要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打回根据地去。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个个欣喜若狂，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于是，我们旋即动手整理行装，准备启程。

那时，胡宗南在陕甘的部队虽然已由进攻转为防守，但还没有彻底败退。各处碉堡林立，敌人还在用心地把守着。要想顺利通过一个地方，还是相当困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采取夜行晓宿的办法，闯关隘、越卡子。

一天夜里，我们走到李子沟，看到对面山梁的好几处通道上都有火堆，估计是敌人设的卡子。我们就派出小部队到山梁上去侦察，回来的同志说每处大约有一个班到一个排的兵力，没有碉堡，士兵只是围坐在一堆火旁。

根据侦察的情况，我们研究了一下。如果硬要往前闯也能过去，但被敌人发觉，家属小孩很可能造成伤亡。另外，我们又摸不清附近敌人的底细，不能盲目从事。我们盘算来盘算去，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只好又派出一部分同志，去沟里择路。回来的同志说是沟壑再没有其它道路，上不去。

已是半夜光景了，如果再想不出其它办法，天明后就更不好办了。最后，大家在一起讨论了一下，决定让一个班带足手榴弹，在前面开路，监视敌人。如果一旦大队被敌人发觉，就让他吃一顿手榴弹，彻底消灭掉，硬冲过去。假若敌人麻痹，发觉不了，就别理他，只顾走咱的路。

商量已定，我们从战士中挑选了十几个年轻力壮，富有战斗经验的同志，由一个排长带领，在前面开路，我们随后跟着。上山之前，我们将一些用处不大的家什、东西都扔掉了，全部轻装。为了防止牲口叫，每个牲口的尾巴上都吊了块石头，嘴上拴了料袋子。

由于天黑，前队在离敌人三四十公尺的地方停了下来。他们展展地趴在地上，手里紧紧握着拉出弦的手榴弹，观察着敌人的动静。我们上了梁，就绕了个大弯子走了。等我们全部过完好大一阵子，后队也才绕道赶了上来。就这样，我们越过了敌人的卡子，没有被发觉。

几天以后，我们回到了离开三个多月的根据地。所到之处，敌人纷纷逃窜。唯有细咀子城里的敌人，一个一百多人的自卫队蹲着不走。他们依仗城垣碉堡坚固，企图和我们对着，负隅顽抗。

这细咀子城，三面环沟，一面靠崖，城壕坚固，城上城下有不少明碉暗堡，敌人钻在里面，我们在外面，我们稍有活动，就会被发现，马上打来冷枪。我们的部队一连攻了几次，没有成功。

敌人看我们攻不进，又伤了不少人，便更加骄横起来。我军想用迫击炮轰，但城内有老百姓，不能打炮，只得暂时先围着，另谋良策。

一天下午，我军在白沟里梁上截获了敌人一个送信的。打开一看，是寺村保安团送给细咀子自卫队的。意思是让细咀子的自卫队坚持一下，他们某月某日就将前来增援解围。截获了这封信，给我们打细咀子城提供了办法。我们将送信人暂时扣了起来，另派我们的一个同志化装，将信递进了城。

我们在信上说的那天，一部分同志扮成寺村的保安团准备进城。同时，为了防止寺村的保安团真的前来增援，预先在白沟里半山上埋伏了部队。这部分人由唐致祥同志带着。

我警一旅三团一连的全体指战员，全都换上了国民党兵士的服装，化装成敌人，连长贾文才同志也穿上了敌军的军官服，戴了大壳帽，鼻梁上又架了付黑墨眼镜，再加上他个儿大，看起来简直同国民党军官一模一样。

这一天，贾文才带领化了装的同志们，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从白沟里梁上下去，又从柏树山上 come，走了于西里，一路打着枪。我围城的部队听到枪声，立刻从金张里撤走了。

细咀子城里的敌人，听见北边梁上枪响，又见我围城的部队仓皇撤走，知道是他们的援兵到了，便大开城门，冲了出来。

这时，贾文才他们已到了敌人面前。敌人果真见是他们的部队，便跑上前去迎接。谁知敌人何队长刚伸出手，就被贾文才同志拔出枪来击毙了。

后面的敌人一看不对头，知道上了当，拼命往城里跑，可是已经晚了。我们的部队哗地一下散开，几乎同时开了枪，大部分敌人被当场消灭。

有几个敌人刚跑进城门，被城内的老百姓赶出来用脑袋报信了。后面的敌人一看无路可走，又回过头来，绕着城墙，向西南

方向拚命逃窜。我军战士在后面紧紧追赶，经过半个小时的激战，敌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战斗结束后，我们清理了战场，敌人大部被击毙，在俘虏中还有敌镇长高文珍、副镇长李清堂。

细咀子歼敌战胜利结束，从此，我们离开了三个多月的根据地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不久，陕北战场又传来蟠龙战役的胜利捷报。我人民解放军的几个纵队接连从晋西过了黄河，进入陕北，收复了不少失地。敌人招架不住，开始全线败退了。

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我西北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经过艰苦奋战，终于给了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蒋介石要在几个月内消灭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企图，终于成了一枕黄粱！

(一九八〇年六月王炳琨根据记录整理)

巧用计古井葬叛徒

周 倩

一九四七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地处陕甘宁边区前哨的宁县在我主力部队转移后陷入敌手。马匪兵到处拉夫抓差，烧杀抢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许多忠于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倒在了血泊之中，甚至一些无辜的群众也被视为“共党嫌疑”而惨遭杀害。在这形势非常紧张、斗争异常残酷的局面下，压在宁县地下党身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活动也越来越困难。当时，我担任宁县工委第二总支委员会书记，领导一个地区内的对敌斗争。

严酷的斗争考验着每一个人。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献身精神的边区人民并没有被压倒、被征服。他们象葵花向太阳一般，紧紧地围绕在党的周围，和敌人顽强地斗争着。然而，也有那么一些怀着各种目的混进革命阵营的败类和投机分子，在这关键时刻，露出了他们的原形。

叛徒李彦彪和杨云山就是这样的人。

记得这年农历八月十八日，我正端着碗吃早饭，一个陌生的人匆匆来到我家，见了我就说：“老乡，有米吗？卖给我三升。”说着趁势伸出了三个指头。看到这种情况，我已知道是自己人，便说：“米是有，但要高价钱。”来人回答：“好，现钱现货！”于是，我领他进入客窑。

在客窑里，来人告诉我：“工委地下武工队的李彦彪和杨云山叛变了，暗中勾结敌人在武舍（即今宁县春茶）狼眼洼包围了

武工队，突围中，指导员田得魁、队长王天兴重伤被俘（后遭杀害），十多支步枪和一支驳壳枪损失殆尽。同时，在此以前，工委副书记万青山同志也在活动中被敌打残，地下党组织名单亦被敌所获。因此，工委同志要我转告你，迅速做好应急准备，防止敌人可能的搜捕。”这个不幸的消息象晴天霹雳，撕裂了我的心。

万青山同志是我的老上级，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他就担任了宁县工委副书记。从此以后，我经常在会上听万青山同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部署我们的工作，并且一度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在学习上和工作上对我很有帮助。如今，这位上级和良师益友不能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了，我心里怎么能不难过呢？

来人一边擦眼泪，一边安慰我说：“周儒同志，目前形势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但现在不是掉眼泪的时候，工委要我告诉你，要迅速作好各种准备，和叛徒斗争到底，即使坐牢、杀头，也决不屈服。”

仇恨的烈火在我胸中燃烧起来。我握着来人的手说：“请你转告工委，我一定用行动来回答上级对我们的期望和关心！”

送走了来人之后，我立即派人将情况分头通知七个支部，我也立即去找东李庄的袁治庆（地下党员）同志。因为，据来人讲，袁治庆同志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知道一些情况，而且这位同志一贯表现得坚定、勇敢，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到了袁治庆家里，已是掌灯时分。袁治庆同志告诉我，叛徒认识他，但不认识我，因为，地下武工队到宫河活动过几次，是他联络的。并说：“敌人很可能一两天内就来，重点是搜捕地下党员。”

当晚，我们商定先到宫河街上打探情况，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宫河每逢三、六、九日为集。第二天恰逢集日，清早起来，

我进东门，袁治庆进西门，混在赶集的群众当中，转来转去。到了中午，发现镇公所院内有宁县自卫队庞明胜（自卫队头子）手下的士兵。我让袁治庆同志仔细打探，我自己蹲在一个卖土布的陕西人面前，装作要买布的样子，拉着话，眼睛则不时盯着镇公所。

一阵功夫之后，只见袁治庆同志神情不安地走了过来，我立即起身，装着解手的样子，来到一个僻静处。袁治庆告诉我说：“情况不好，李彦彪把我抓住了！”我忙问怎么回事。

原来，袁治庆一路溜跬到镇公所门前，正在观察里面的动静时，一只长满黑毛的大手一下把他扳了个向后转。他抬头一看，只见李彦彪狞笑着说：“你好吗？老袁！”袁治庆一看势头不妙，已落入敌人魔掌，他稍镇静了一下情绪，然后随声答道：“你好嘛，我好哈哩！”李彦彪被这不冷不热的答话刺得十分尴尬，他推了推护着那只瞎眼的墨镜，又用几分威胁的口气说：“我知道你家离我这儿不远，本来准备登门拜访，不料今日却在这儿碰上了。咱们过去都是老熟人，今儿小弟到宫河来，还想请你多多帮忙哩！怎么样？”李彦彪一面说着，一面象只独眼狼一样，眼珠滴溜溜地转动，观察着袁治庆同志的表情。袁治庆心想：来硬的吗，这家伙心毒手辣，死了我一个倒不要紧，要是地下党受到损失，可就太对不起党的培养了。于是，他来了个顺水推舟，脸上装出一副笑容，说：“老李，你是上级，你说咋办就咋办，我们这些打牛后半截子的人知道个啥。”李彦彪一听，乐了，说：“好！痛快！咱们先到镇公所去喝一杯，再商量别的事儿。”这时，袁治庆心想，得先找个脱身之机，向周儒汇报一下再说。他说：“这儿还有我的人哩，叫刘振福，我去把他叫来，不是多了一份力量吗？”李彦彪一听，高兴得嘴都合不住了，连连点头说：“放利索些，我回去等你呀！”就这样，袁治庆才暂时摆脱了敌人。

我听完袁治庆的汇报，觉得情势已很紧迫，必须尽快地干掉叛徒，不能等他动作起来。经过一阵商量之后，决定由袁治庆继续把叛徒稳住，设法将叛徒由镇公所引至武天沟畔，这是第一步。与此同时，由我前往永和找赵铁娃游击队，连夜前来捉拿。如果在鸡叫前后不见动静，就说明游击队因故不能前来，则由袁治庆负责，将叛徒秘密处死。主意已定，我们立即分手。

袁治庆同志见了李彦彪，就告诉他说，没有找见刘振福。李彦彪觉得刘振福是一般人员，也不再追究。接着话题便转到各支部书记和枪支上。袁治庆按照已定的策略，告诉李彦彪说他是一个普通党员，只和宁县第二总支委员会保持单线联系，有什么任务由第二总支委员会直接通知，联系的人是中等个儿，脸圆圆的，据说姓张，名字叫什么就不知道了。因此，支部书记一个也说不清。”李彦彪一听，脸上的横肉抽搐了两下，那一只眼不住地眨巴着，看来那家伙要恼羞成怒了。正在这时，他的帮凶杨云山也进屋来了，袁治庆一边向杨云山打招呼，一边向他们说：“虽然人找不着，这儿却有三条枪现成着哩，今天晚上咱们就去拿。”李彦彪一听，转怒为喜，杨云山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忙问：“在哪里？”袁治庆说：“就在武天沟畔上杨狗逼家里，那是个独庄子，枪埋在庄子附近，我知道地方。”李彦彪说：“要带多少人？”袁治庆说：“老李，你知道我家就在附近，要是声张出去让人知道了，我一家就完啦！”杨云山反问道：“不带人怎么行，谁去呢？”袁治庆说：“就咱三个人，掌灯时分在那里会合，走的时候，咱们分头走，不要惊动周围的人了。三条枪拿到手，也算你我的功劳。”狡猾的李彦彪这时踌躇了一阵，说：“要是出了问题怎么办？”袁治庆想了一想，斩钉截铁地回告：“如果出了问题，拿我一家担保。”李彦彪听后，一只眼看了看杨云山。杨云山点了点头。李彦彪利欲熏心，脱口说：“那好，一言为定。”袁治庆离开了镇公所，便赶忙联络袁

隋云、罗生俊、刘振福、吕积仓等人去了。

我从街上回到家里，饭也不想吃，觉也不想睡，只等天黑就去永和找赵铁娃的游击队。太阳落山了，老婆给我烙好了饼子，催促我吃晚饭。我哪里有心思吃这顿饭哩！只是勉强喝了一碗糊糊汤，便打算动身外出。这时，老婆往怀里给我塞了两个饼子。她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一直送我到门口。我回头看时，只见她用手擦眼泪，五岁的小宝宝手拉着妈妈的衣襟，好象从这沉默的气氛中看出了什么似的，情绪显得非常低落。时间紧迫，我也顾不得给爱妻幼子多说什么安慰的话儿，便匆匆上路了。从家里起程到永和，虽然只有五十来里，但一路上不能走大路，遇见村庄，只能绕道而行，加上要翻一道沟，五十里路要当六十里走，所以，尽管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我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向前疾行。到了深夜十二点左右，我才找到了支队部的周存善同志。他告诉我：赵铁娃的游击队到旬邑县野鸡红一带打土豪去了，一时无法返回。这个情况使我大失所望，看来任务只有靠实现第二套方案来完成了。于是，我匆匆辞别了周存善同志就返回。

袁治庆那天下午把人联络好，分头作了布置，又亲自勘察了一口古井。这口古井距杨狗逗家有五里路，中间要过一道小沟，非常偏僻。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袁治庆提着二斤猪肉，二斤老烧酒来到了约定地点——武天沟畔杨狗逗家里。杨狗逗是个十分贫困的农民，在我党的宣传教育下，已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杨家也就成为我地下党的联络点。而这种情况叛徒是不知道的。可这一天，杨狗逗看望他那身患重病的姐姐去了，不在家里。袁治庆一进门，杨狗逗的妈妈就神色紧张地向他说：“来了两个人，现蹲在高窑上。”袁治庆听后，心里：好！既来了就别想回去。他急忙将情况告诉了杨妈妈，要杨妈妈多刨几根大葱，多切一些洋葱。杨妈妈听了袁治庆的嘱托，对事情的发展已知十之八九，便急急忙忙地动作起来。一会儿，袁治庆走到院子里，朝高窑轻轻喊

叫：“老李，快下来，喝几杯酒，到半夜时分咱们再动手。”但李彦彪和杨云山坐在上面窑里一声不吭。袁治庆无奈，又进入窑里，招呼杨妈妈快点炒菜。过了一阵，他又一连两次向高窑喊话，但没有答话。这时菜已炒好，虽说只是猪肉炒洋芋，但由于多放了点葱花和香油，加上杨妈妈烹调技术好，倒也香味扑鼻。袁治庆见菜已炒好，不觉心生一计，他一把拉过炕头上放着的杨狗腿又宽又长的大棉袄，往身上一裹，故意用手压着腹部，微弓着腰，提脚出了窑门，来到院子当中说：“二位，菜已炒好，快点下来喝几杯，咱们还有事嘛，看你们品嘛的。”这时，一阵微风吹过，菜香扑鼻。杨云山本来嘴馋，一听要喝酒，那小子的魂水直往外淌，不由自主地动了动身子，李彦彪那家伙却仍然坐着不动。袁治庆觉得时候已经到了，便装作十分生气的样子说：“弄这号事，谁对谁还不放心吗？人说备席容易请客难，这话不假。算啦！我回去呀，我肚子疼得不行啦，这事不弄都行。”说着回到窑里，提起酒瓶转身就走。刚出门，那两个家伙已到了院当中，李彦彪上前拦住他说：“你这脾气还坏得很，我是在上面看有没有动静，咱们三个光把连西的（指什么武器都没带），要有个万一怎么办？”杨云山早已耐不住了，又见袁治庆手里提着两瓶酒，只怕他走了，连忙说：“好啦！好啦！快进窑里抿上两盅驱驱寒。”说着，推了袁治庆一把，三人又回到窑里。袁治庆表面上不高兴，可心里暗暗想到：狗东西，只要你进了网就别想逃出去。他一声招呼，两个叛徒便脱鞋上炕，杨云山背靠山墙坐在下炕边，李彦彪背靠窑壁坐在大炕里首。杨妈妈是位机灵人，客人屁股刚坐稳，她把酒菜就端了上来。袁治庆从盘子里拿起两个特意准备好的大杯子，先给李彦彪倒了一杯，又给杨云山倒了一杯，最后给自己倒了半小杯说：“老李、小杨，咱们从今天起就在一起共事了，今天给二位略备薄酒，一则预祝我们今晚挖枪的胜利，二则今后需要二位多

事关照，所以今晚要开怀痛饮，我姓袁的是个痛快人，本当‘舍命陪君子’，但可惜今晚受了点凉，生了点气，肚子疼得不行，不能奉陪到底，但愿二位不要见怪，也不要客气。我先给二位敬三杯。”杨云山那小子本来已馋涎欲滴，加上受了点冷，恨不得一口把所有的酒菜都吞下去。听了袁治庆的话，连说：“好！好！痛快，痛快。”接着一仰脖子，“吱”的一声，一大杯酒已到了肚里。李彦彪这家伙到底是土匪出身，虽然经我党耐心教育，但恶习未改，而且狡诈异常。他听了后说：“老袁，咱们既然要在一块共事，那就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有酒当然应该同喝，所以我只受你一杯。”袁治庆说：“酒满三杯方为礼嘛，你是看不起我老百姓怎么的？”这句话说得李彦彪无言可答，只好连饮三大杯。紧接着，袁治庆又连着和叛徒碰了三杯。六杯酒下肚，两个叛徒的头脑已有点发热，话也多起来。袁治庆一边给叛徒敬酒，一边用左手不时地压着腹部，并嚷着说肚子疼。不大一会儿，一个酒瓶已经精光了。两个家伙越喝越兴奋，越兴奋话越多，不停地自我吹嘘着。袁治庆又接二连三地给叛徒敬着酒。渐渐地，第二瓶酒也快完了，杨云山那小子已经醉了，背靠着山墙瘫了下去，鼻孔里发出鼾睡的声音。这时，李彦彪也满脸通红，足有八分醉意。袁治庆又倒了三杯酒递过去，李彦彪接过酒杯头一扬，又喝了个干净。霎时间，李彦彪也背靠着窑壁脚搭在炕边上斜仰起来。袁治庆见时候已经不早了，便说：“老李，你先喝着，我肚子疼得厉害，先解个手去。”边说边捂着肚子走出窑门。一到院子里，他三步并作两步，奔进了西边的烂柴窑，小声喊道：“你们这些冷棒还不动手等啥哩，天都快明了。”一声令下，从烂柴窑里面钻出来四个人，都是地下党员，一个叫刘振福，一个叫袁治云，一个叫吕积仓，一个叫罗生俊。他们一个个叉腰填膺，磨拳擦掌，恨不得立时把叛徒砸个粉碎。原来袁治庆已命这几个人在此等候多时了。

袁治庆见大家情绪很高，一挥手说：“刘振福、袁治云和我收拾‘独眼龙’，罗生俊、吕积仓负责收拾杨云山，我先进屋，把李彦彪扭起来，你们立即一拥而进。咱们这些人是死是活，就看今晚上干的怎么样了，走！”

袁治庆一声招呼，四个人踏起脚尖，紧跟在后。到了门口，袁治庆把手往下一压，四个人紧靠着山墙站住。袁治庆走进门来，李彦彪醉醺醺地说：“怎么样，肚子还疼吗？”袁治庆说：“本来就不疼哟！”说着已走到他身前。李彦彪说：“什么？”一骨碌想爬起来，但已经迟了，袁治庆两只铁钳似的大手已紧紧钳住了他的一个大姆脚指头和另一个脚脖子。李彦彪见情况不妙，大吼一声，拚命一跃，眼看就要跃起来，这时袁治庆狠劲一拉，李彦彪象一头死猪一样，一下摔了个嘴啃地。霎时间罗生俊等人一拥而进，三两下就把杨云山捆了起来，只有李彦彪还在拚命挣扎。刘振福扑上来，用膝盖狠狠压在李彦彪脊背上，两只手扭着李彦彪的一只胳膊，直扭得关节咯噎咯噎响，袁治云拿出一根皮绳，三下五除二先把两支胳膊捆在一起。李彦彪身高力大，袁治庆唯恐他逃脱，用细麻绳结结实实地把手腕扎了个紧。一切已经收拾好了，袁治庆走到李彦彪面前笑了笑说：“老李，想不到吧？”李彦彪眼镜已摔成碎片，只有镜架还斜挂在脸上，他脸红的象猪肝，嘴里喘着粗气说：“这——这一下完了，真没想到……。”袁治庆说：“不要紧，‘千将易得，一帅难求’，你都是有功劳的人嘛，今晚上把你送到赵快娃支队去，你仍然给我当领导。”说着推了一把，两个叛徒被押着上路了。出了大门，上了壕，沿着武天沟畔向西走去。杨云山已吓得不知所措，只有李彦彪边走边咕叨着：“这下完了，我想干也不可能了！”他那只贼眼还东西张望着，时刻企图逃跑。这时候已经三点多了，月亮也已西落，大地一片漆黑，雄鸡开始报晓。袁治庆让其他同志牵紧绳子，加快脚步前行。只要翻过一条小沟，马上就到达预定地点

了,为防万一,将两个人距离拉开,杨云山在前,李彦彪在后,分别押着,严防逃脱。袁治庆提着一把老镢头,跟在杨云山背后。来到了探查好的古井旁,袁治庆说:“杨云山,我看你叛变革命,意在升官发财,可惜你妈把你没生好,我倒有心成全你,送你重新投胎去。”说着一镢头砸在杨云山后脑上,只听“啊”了一声,就倒栽在井下,发出一声沉闷的轰隆声。就在这时,只听刘振福在后面低声而急促地呼叫:“快!快!”袁治庆等赶忙转身跑去,只见李彦彪已经吊在悬崖空中,刘振福死命拉着绳头不放。袁治庆跑上前去,一把解下刘振福的腰带,往李彦彪下巴上一套,刘振福再一使劲,就这样把那家伙提了上来。原来这小子听见杨云山“啊”了一声,知道情况不妙,便拼命向崖边扑去,吕积仓、刘振福被他连拉带拖,一直拖到崖边。刘振福一想不好,要是这家伙跳下崖,后患可就无穷了,他用脚死命蹬着一个土坎,才没让他跳下去。李彦彪逃跑未遂,连声不绝地哀叹。这时已到古井旁边。这家伙一看到这口古井,已知这就是葬身之地,没等袁治庆的镢头落下,他用尽全身力气,猛地一跳,挣脱了绳索,就扑到了古井那一边。相传这口古井是清朝时期,百姓为防止流寇盗贼而挖的,由于天长日久,井口足有八尺多宽,象个大漏斗。那家伙一下扑到那一边,却没有站住脚,一个倒栽葱掉下井去,顿时发出了比前更大的沉闷响声。袁治庆风趣地说:“这家伙倒自觉,省得我费力气。”这时大家感到格外劳累,身不由己地坐到了地上。稍事休息片刻,吕积仓提议尽快离开。这时,袁治庆同志若有所思地说道:“等一等,看这家伙到底是不是死了,要没死明天喊叫起来,岂不是坏了大事。”大家一听,也觉得有理。过了一阵,果然从井下传来了嘶哑的呻吟声。罗生俊是个急性人,说:“干脆挖土填井捂死这该死的家伙。”刘振福接着说:“不行,这样会暴露目标。”袁治庆沉思了一阵,突然心头一亮,急忙向坎边几只破窑洞走

去。他一连转了三个窑洞，发现里面有许多土圪塔，他急忙喊来大伙，每人抱了一个最大的，一齐投下井去，这时一阵巨大的响声，震撼了宁静的山原。从此再也没听到井里的呻吟声，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东方泛起鱼肚白，周围村子这时也传来了狗叫声，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神情自若地各回自家。

我从永和返回来，到袁治庆家里，恰好袁治庆也刚回来，他向我告诉顺利完成的情况，我心里好象抛去一块大石头，但唯恐叛徒没死，又连忙跑到那口古井边听了一阵，而没听见任何动静，就回去了。我们一连三个晚上都派人去探听情况，都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就这样，这两个无耻的叛徒还没来得及向其主子献功，便被永远埋葬在这口古井之中。我们这次处置叛徒的胜利，使地下党组织不但没遭到破坏，反而更加巩固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

(杨志明记录整理)

朱总司令率四方面军过草地

董 邦

一九三五年秋，一、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后，朱总司令留在了四方面军。那时，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一直向中央闹独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顽固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断中央劝阻，回师南下。但在中央再三责令和总司令等同志的斗争下，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逐渐认清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于是部队又重新北上。

部队行至炉霍、甘孜期间，我在保卫局当侦察科员，有较多机会见到总司令。在那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总司令崇高的革命精神，给我很深的教育，其中有些事，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一)

一九三六年春，四方面军从天全、芦山等地再次北上，部队越过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党林山，经道孚到炉霍休整。一天我执行任务回来，看见总部、政治部、后勤部、保卫局和红军大学的同志坐在草坪上听总司令讲话。

那天天气晴朗，蓝湛湛的天空没一丝浮云。总司令穿一身打了补丁的粗布灰军装，脚穿一双旧布鞋，八角帽上的五角红星闪闪发光，他正精神抖擞、声音宏亮地向大家作关于北上抗日的报告。听讲的同志们显得格外兴奋。我一下被吸引住了。

总司令激动地说：陕北红军打了不少胜仗，特别是毛主席率右路军到陕北后，红军东渡黄河，出师山西取得了重大胜利，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中央北上方针已取得伟大胜利。

刹时，草坪上卷起一阵欢呼的声浪：

“坚决执行北上方针！”

“拥护中央，团结北上！”

发自肺腑的口号声连成一片，打断了总司令的讲话。总司令始终信赖毛主席，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爱戴。

总司令等同志们静下来后，接着讲到我们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越来越深入人心，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一致拥护，并争取了国民党集团中一些爱国将领的同情，如张学良、杨虎城等。还说，我们党通过各种方式，向东北军下级官兵宣传团结抗日的政策，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终于使他们觉醒起来，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为父老乡亲报仇。……

总司令纯朴而热情的讲话，使红军指战员从迅速发展的形势中，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央北上方针的伟大意义。

在长征途中，总司令还经常用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故事，启发教育红军战士。有一次，总司令来到战士中间，问罢学习情况后，兴致勃勃地和战士们谈起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当前面临的困难。不知谁提起太平天国起义将领石达开，总司令把石达开如何率太平军与清兵作战，以及又是怎样失败的历史讲了一遍，最后乐观地说道：“蒋介石不是说我们工农红军是第二个石达开吗？他哪里晓得我们工农红军比石达开强多啦！我们不但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翻过了大雪山，还要穿过草地，到抗日最前线去哩！”总司令富有风趣的话语，给战士们增添了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最有趣的是，总司令号召红军战士画地图。要求每个战士画一幅全国地图，在地图上标出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长征，经过了

哪些省？哪些地方？现在何处？将要经过什么地方到达目的地？战士们对画地图热情很高，没有纸就拿着竹棍棍在地上练习着画，经过反复练习，最后才正式画在发给的纸上，统一交总部。

战士们从自己画出来的弯弯曲曲的线条中，重温了长征以来的革命历程，尤其是遵义会议后，我军重占遵义消灭敌人十二个团，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红军四渡赤水又调动和疲劳了敌人的部队，巧妙地甩掉敌人插入云南，从昆明城边穿过，飞越金沙江，通过彝族区，强渡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等等。这一切生动地告诉每个战士，自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毛主席为革命开辟了胜利的局面。坚持北上方针，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革命就会从胜利走向胜利。

(二)

部队在炉霍、甘孜一带体整的中心任务，是为红军穿过草地筹备粮食和御寒衣物。但这里人烟稀少，群众生活非常贫困，要筹集到足够的粮食和御寒装备是极其困难的。

那时红军战士穿的都很单薄，那里谈得上别的什么装备哩！可是草地气候变化异常，有时炎热难耐，有时又出奇的寒冷，没有必要的装备是走不出草地的。在这地广人稀的炉霍、甘孜一带，除购买牛羊毛捻线编织毛线衣外，再没别的御寒物品。

总司令号召红军战士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己动手捻线，编织毛线衣。于是干部、战士们，普遍展开了捻毛线的活动。谁能想到总司令却捻得一手好线呢！他一手拿着毛线，一手转动拔砣，捻出的线又细又匀，见到的同志没有不称赞的。有时候总司令一边捻线，一边和找他的同志谈工作，或回答请示的问题。总司令的这种模范行动深深地感动着大家。红军战士们互教互学，积极行动起来捻线编织毛线衣。

那时，我虽然经常外出执行任务，一想起总司令拿着毛线转动梭捻线的动人情景，不管有多么累，也要捻一阵线。在部队从炉霍出发前，我终于编织了一件毛线衣和一条毛线裤。

休整期间，条件虽然很困难，但在总司令的指示下，部队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进行军事训练和开展内容丰富的体育活动，如举行赛马、骑马跨越障碍、篮球运动等。

至今我还记得红军战士赛马时的热烈场面。举行赛马那天象过节一样，附近的藏民群众，特别是小伙子 and 姑娘们，三五成群地来观看。参加赛马的战士骑在马上，纵马飞奔，你追我赶，草滩上响起一阵又一阵欢呼声。回想起来，那热烈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哩！

总司令很喜欢打篮球，许多休息时间，他见战士们打球，总是热情地来参加。总司令一来，场上格外活跃，战士们分组进行比赛，都争着把总司令要在自己组里。在篮球场上，他和战士们一样跑来跑去，汗流满面。总司令只要投中一球，场地四周就爆发出一阵热烈掌声。总司令有时即使不打球，也要站在场边观看，给赛球的运动员鼓劲助威。

总司令为鼓励战士们开展体育活动，增强体质，还指示保卫局克服困难，设法买些当地老乡织的氍毹，给运动员做裤衩。有一天，我买了几卷氍毹，正抱着往回走，迎面碰着了总司令。他拿起氍毹细细看了看，问我一卷值多少钱，好买不好买，我一一回答后，总司令微笑着点了点头，并指示我给运动员做裤衩时，在裤衩的两侧夹上一条红布条，说这样既耐用又美观。

部队在总司令巨大关怀下，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和总司令在炉霍，还检阅过一次部队哩！这一切为红军穿过草地，胜利到达陕北，起了极大作用。

(三)

炉霍、甘孜一带，是藏民聚居地区。

广大贫苦藏民，在国民党反动派和教主、头人的残酷剥削压榨下，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我们红军到达后，藏民群众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态度和蔼，买卖公平，逐渐消除了由于反动派的宣传造成的恐惧心理，一些躲避到草原上的藏民群众，也陆续回到自己的家园。

在这期间，总司令经常深入到贫苦藏民中，了解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疾苦，向他们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党的民族政策以及革命道理。深受压迫的贫苦藏民，象驱散了头上的乌云，见到了太阳。他们热爱共产党，热爱解放穷苦人民的工农红军，在红军干部和战士的协助下，贫苦藏民在甘孜建立了第一个藏族人民的政权机构——波巴义德瓦人民政府，与此同时，藏民民兵队伍也诞生了。

我记得总司令在甘孜检阅过一次藏民民兵。检阅那天，灿烂的阳光照耀着大草原，接受检阅的藏民民兵，一个个体魄健壮，骑着高大的骏马，有的背着步枪，有的背着叉子枪，雄赳赳地列队通过检阅台。欢乐的藏民群众载歌载舞，在这个难得的好日子里，尽情表达他们对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深厚感情。

总司令还指示红军干部，对藏族上层人士进行工作，尽可能争取他们站在革命一边。那时我在波巴义德瓦人民政府藏民司法部长的协助下，对藏族上层人士作过几次工作。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是我代表总司令去争取一位活佛支援红军走出草地。据了解那位活佛还比较开明，我和藏民司法部长带着准备送给活佛的贵重礼物——一座缴获来的镀金马鞍，到离甘孜不到十里的喇嘛寺去。到喇嘛寺后，我们受到隆重接待。当我们以总司令的名义，把镀金马鞍赠送给活佛时，活佛一再表示感谢。随后，我根据总司令的指示，将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方针、我党的民族政策，对活佛一一作了讲解，并说明为我军顺利走出草地，早日到达抗日前线，请活佛给我军作价让些马匹和牦牛。最初，活佛以种种困难

为理由不答应，经过耐心说服，反复解释，活佛最后提出在十天之内答复我们的要求。这位活佛还讲信用，果然不到十天，便送来了六十四马，一百六十多头牦牛。另外一位活佛，为我军送来三十多顶帐篷，解决了过草地的部分装备问题。

(四)

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胜利会合后，部队便由甘孜向阿坝前进。部队越向前走越艰难。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地，除一丛丛野草和开放着一些叫不上名的野花外，许多地段就是绿得发黑的泥潭。行进中稍不注意，就有陷入泥潭被淹没的危险。

部队虽然经过休整，但恶劣的环境，变化异常的气候，粮食的缺乏，仍威胁着战士们生命。为着人民的利益时刻准备牺牲自己一切的红军战士，顽强地前进。有的战士拄着棍，喘着气，艰难地一步一步走着；有的战士相互搀扶着，把前进的脚印，留在草地上；也有不少好同志、好战士，没能够走出草地，为革命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在艰难的草地行军中，战士们常常看到总司令把自己的马，让给走不动的伤病员骑，而他自己却和战士一样，穿着草鞋，拄着棍，一步一步往前走。总司令为革命事业日夜操劳，再加上艰苦的行军，显得比过去黑瘦多了，额上又增添了皱纹。

每当总司令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时，伤病员实在不愿让总司令受更多的劳累，坚决不骑他的马。这时，总司令总是慈祥地说：“工农红军是个革命的大家庭，同志们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你为革命受了伤，生了病，应该受到同志们的照顾。”要是伤病员再不骑他的马，他就命令伤病员骑上。总司令深厚的阶级情感，使伤病员和战士们感动得流下热泪。

在行军途中，我执行收容任务时，遭到反动头人武装的意外伏击，身负重伤，同志们就轮流抬着我向前走，这给首长和同志们增添了多少困难啊！尤其是总司令亲切地安慰我，鼓励我走出草地就是胜利的情景永远铭刻在我心里。为给我治疗伤口，总司令和首长想了不少办法。那时药品极其匮乏，任何一种普通药，都极不容易寻到。在总司令和首长们的关怀下，终于从二方面军寻来一小包云南白药。小纸包里有两粒丸药和一点白色药面，大夫叮嘱两粒丸药一次服用，药面撒在伤口上。我有六个伤口，那一点药面咋能撒得到呢？多亏卫生员同志手巧，药面都用到了伤口上。寻来的那包云南白药虽然很少，但它的分量是难以估量的，它凝聚着革命队伍里深厚的阶级情谊。

总司令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为解决粮食缺乏问题，还常常带着医务人员和藏民向导，沿途寻找各种能吃的野菜。草地上能吃的野菜不多，但只要总司令一发现，如象牛耳大黄、野芹菜、野葱、灰灰菜、车前草等，就高兴地告诉跟随他的同志，在路边插个小木牌，或在石头上写上附近有种植什么野菜可以吃，为便于寻找，还在旁边画上野菜的形状。战士们一发现这样的标记，真是欣喜异常，立即分头到周围寻找。有的战士寻来一把野芹菜，有的寻来一把牛耳大黄，把寻来的野菜集中在一起，淘洗干净，架起火就煮。不一阵野菜煮熟了，有盐的加点盐，有的连盐也没有，一人舀一茶缸，津津有味地吃着。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总司令不顾自己一天天显得消瘦的身体，不顾行军劳累，为部队日夜操劳。他赤胆忠心为革命的精神，鼓舞着红军战士克服困难，走出草地，朝着阳光灿烂的陕北胜利前进！

（一九八〇年七月傅世伦整理）

王维舟在庆阳

李有义

王维舟同志早年就投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事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革命武装斗争，历任军政要职。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下，他含冤逝世。他的逝世是我党的一大损失。

在抗日战争年代，王维舟同志带领三八五旅驻防陇东地区，为保卫、建设陇东，作出了很大贡献。毛主席对王维舟同志在陇东地区的艰苦创业给予了高度评价，曾亲笔书写：“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题词赠他。庆阳人民更是爱戴王维舟同志，亲切地称他：“王善人”。至今人们还传颂着他的事迹，深深怀念着他。我是当年在王维舟旅长身边工作的警卫人员，他那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同干部、战士以及人民群众同甘苦的好作风、好品质，感染和熏陶着我们全体指战员，也形成了一段段动人的故事。今天回忆起来，多少往事浮现眼前，使人倍感亲切。

一、亲自动手建营房

三八五旅原为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改编为边区留守部队，一九三七年冬季来到庆阳换防（在这以前是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在此驻防），旅部设在庆阳城。庆城是

最近有名的“水包城”，它座落在四周壕下，两河中间，一面靠城，三面环水。特点是北边大，南边小，街道窄，住房少，城墙高。三八五旅到来后，和红军教导师一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先借老乡的房子或找些破窑洞住下，还给老百姓担水、扫院和做其它活计。可是，旅部单位大，人也多，并且在这儿住房的时间也需要长一些，因此，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部队的住宿问题。于是，就根据这里的地形动手打窑洞。旅部直属机关的干部、战士冒着刺骨的寒风，分别在皇城墙底、田家城、麻家湾等地刨土打窑。王维舟旅长除每天完成工作外，还积极参加了打窑劳动。城内外的群众听说八路军的旅长也和大家打窑洞，都十分感动。在他们看来，这真是开天辟地第一遭。于是，老乡们就主动前来帮忙，借以表达拥护人民军队、支持抗战的一片心意。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家里很穷，母亲给一家地主当佣人，我靠做点杂活糊口。我虽然年龄不大，对“革命”、“抗日”可初步懂得了些道理，也就拿上铁钎去帮部队干活。记得在1938年春季的一天，我去皇城墙底与部队一起打窑，看见一位魁梧的军人正在崖面上往下刷土，他干得可带劲啦！一会儿，他把好大的一块土鞍放下来后，便从斜坡上走了下来。这时，几个军人都说：“旅长，你累了，快歇会儿吧！”“他就是旅长？！”我惊奇地久久地看着他。过去我听人说过：旅长可不是小官。可怎么他也干活呢？你看他那面颊上滴着豆大的汗珠，和大家说说笑笑，一点架子都没有，多亲热啊！我正思索着，旅长笑咪咪地朝我走来，拉住我的手说：“小鬼，你来帮我们干活，不误你的事吗？”我说：“不误事。”旅长又问我：“你今年多大了？姓啥？叫啥名字？”我回答：“我今年十六岁了。姓李，叫李有义。”他风趣地说：“好小伙，叫有义，真是有情又有义啊！”他又问了我的家庭和生活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末了，旅长又问我：“你想当八路军吗？”我说：“我是个穷娃娃，不晓得

你们能看上吗？”“我们八路军是穷人的队伍，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回答我。我说：“你这个大官真是个好人啊！”旅长笑着说：“我们可不兴叫官，叫八路军。你要是想当八路军，就回去问你妈妈看同意吗？”我说：“太好了，我想当八路军。”在旅长的带领下，指战员们经过一个冬春的苦战，终于打出了一百多孔窑洞，解决了部队的住房问题。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我光荣地参加了八路军，先在三八五旅旅部民运科工作。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又被调到旅长身边当警卫员，直到一九四五年他离开庆阳为止。

二、发动民众齐心抗战

三八五旅在陇东驻防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各项方针政策，一面保卫边区，一面生产建设，同时积极发动民众抗战。他们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做出了重要贡献。部队刚到庆阳，王维舟同志首先组织干部、战士访贫问苦和慰问烈军属，帮助群众解决困难。同时，用多种形式，如开会、刷标语、搞文艺演唱，讲故事等，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及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旅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民众运动科，负责组织和领导工会、农会、青年会、妇女会、自卫军、儿童团的工作。王维舟旅长肩负很重的担子，要主持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又要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和各项工作，每星期都要对直属的炮兵连、工兵连、警卫连等单位检查三次，除白天操练，夜间训练，他要亲自检查外。还要时常到所属各团去检查工作。在这样繁忙的情况下，他还常常抽空或者专门到民运科检查、指导工作。在民运科成立不久的一次大会上，王旅长专门前来讲话，他说：“我们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

敢对外，这就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一定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动员起来，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共同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并且向大家报告前线战况和全国各地的形势，号召军民加强团结，保卫边区，支援前方。他的讲话博得了与会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在那时候，人们经常可以在街上看到，有一位衣着朴素，脚穿草鞋的大个子军人，对来往的男女老少亲切地问寒问暖，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民众运动。这位大个子军人就是旅长王维舟同志。在他的带动下，部队的干部、战士也纷纷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广大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民众运动科领导的有关组织，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会、自卫军、儿童团的组织生气勃勃，各项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年青的小伙子和壮年人，积极参加八路军，要求上前线。

与此同时，王维舟同志要部队救济和照顾生活贫苦的群众，大力宣传减租减息，反对高利贷剥削。每逢节日，旅长就组织大家慰问烈军属，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民众运动的开展。

一九三九年以前，庆阳县政府还属于国民党的。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我们希望和他们合作。但是，国民党县政府却主张，当地的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要由他们来领导，一切应照国民党蒋介石的旨意去办。由于伪县政府坚持这个顽固立场，王旅长亲自给他们做工作，说：“如果你的办法对抗日有利，对老百姓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反之，不仅不能照办，还要反对。这就是原则。”旅长还对伪县长说：“民众运动只能由民众运动科来领导。你们应该支持民运科的工作，不要老是想发号施令，管教人家。你们要体察民情，不要不顾群众死活。”然而，伪县政府见民众运动的领导权掌握不到他们手中，就恼羞成怒，要同我们分庭抗礼。他们成立了一个“社训队”，名义上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实际上用来对付我们。但是，城里城外的广大群众

还是照常参加民众运动，不理他们那一套。就拿庆阳城来说，民运科召集开会，群众一来，成百上千；而“社训队”召集开会，就来几个保长、甲长、镇长和一些土豪劣绅，别无人参加。因此，他们气破了肚皮，便想着招儿捣乱，破坏我们的组织。他们给我们捏造了许多罪名，什么“扰乱社会治安”、“无法无天”、“破坏抗日”，等等。他们还限制我们的自卫军搞训练，说：“这样闹下去有危险，应赶快停止。”并扬言要对我们采取措施。

有一次，庆阳县民众团体正在开会，商量组织人力去乡下开展工作。突然，伪庆城镇长带了些保安人员前来捣乱。他们狂喊乱叫，要我们赶快解散会议，否则，今天就要和我们过不去。他们的丑恶表演，激怒了与会群众，愤怒之下，同他们打了起来。这一下，把保安人员揍得滚的滚，爬的爬，狼狈逃窜；伪镇长挨了打，见势不妙，吓得跑到伪县政府，钻到伪县长的炕洞里藏了起来。后来，这个伪镇长还不服气，在伪县政府的策划下，要和我们打官司。伪县政府出面为他无理辩解，我方据理驳斥他们。王旅长亲自揭露他们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恶行，不顾人民死活的恶行，警告他们再不要这样干，否则，我们绝不容许。原来，老百姓都说，八路军对待老百姓实在善良，而对待那些当官做老爷的家伙和他们的狗腿子可不留情。

三、官兵同搞大生产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三八五旅在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旅部直属单位，在开荒种地的同时，还办起了饲养场、木匠房、铁匠房、豆腐房、“八一”商店和联合工厂等。王维舟同志不仅带头开荒种地，而且还到饲养场，联合工厂参加劳动。有时半夜，他还在联合工厂同大伙一块纺线哩！他纺的

线线又细又长，一天可以纺一斤多。

部队住庆阳的人将近两千。刚到庆阳时，按理说，生活所需，应该由群众负担。可是三八五旅的指战员深知老百姓的疾苦，他们首先向地主征，其次才向群众募捐，第二年春上就开荒种地。在开荒中，每人每天能开一、二亩，有的还开出四亩多。开出的地里种上麦子、谷子、玉米等粮食作物，还种有西红柿、水萝卜、白菜等蔬菜。一年时间，就达到了自给，有时还请当地老乡吃饭，为困难户解决困难。

在开荒种地的时候，王旅长指示部队不要影响当地老乡的种地面积。旅部直属单位大都在陡坡，深沟的地方开荒、平整土地。一九三九年春上，司令部、政治部等单位分在城北五里坡水沟里的一块名叫“乱石滩”的地上开荒。

这个“乱石滩”，真是名不虚传。大约有十亩地，遍地都是鹅卵石和碎石子，下面还埋着好些大石头。部队每天早饭后，排着队，唱着歌儿，由城里出发，步行五里来到水沟。不论是迎着漫天朝霞出发，还是披着落日余晖回营，旅长都始终和大家在一起不辞劳累，出力流汗。劳动开始后，整个水沟里到处都听见镢头和铁钎挖石头的响声。每天的午饭，都由炊事员送到地里吃。然而，情况并不顺利，五天之内，各单位就损坏了一百多把镢头，而石头还没挖出一半。

旅长要大家总结经验，研究了地形和地质，找出了镢头为什么挖不出石头的原由，发现乱石滩表面上是鹅卵石和碎石子，而在里面，由于洪水天长日久不断淤积，石头一层垫一层，埋进了不少大石头。这样，光凭镢头和铁钎是不行的，必须用另外的工具。当地老乡们听说后，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还把自己的铁棒和铁镐拿出来让我们用。我们用铁镐在大石头与土接壤处，挖开一道道缝，然后用铁棒撬，这样就好办得多了。于是，部队的铁匠专门打制了一些铁镐、铁棒，工效因此得到了提高。

劳动中，干部、战士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旅长还要我们开展比赛，看谁干得快，干得巧，平的地质量高。他见许多人光着膀子干活，就对同志们说：“小心着凉了！太热了需要脱衣服，应该一件一件地脱，不要一下就脱光，这样容易感冒。”旅长个子高，身体结实，虽已年过五十，但是遇到需要两个人抬的大石头，他常常一下子就抱走了。旅长的手上还磨出了许多泡，有时出了血他也不在乎。医生要给他包扎，他说“不用包，手掌上磨起茧就好了。”在旅长的带动下，参加平地的干部、战士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干活的情绪十分高昂。这十亩多曾被认为是开不出来的乱石滩，终于平平整整地成了一块好水地。种上的水萝卜、白菜、菠菜、黄瓜、西红柿、小葱、芫荽、茄子等，在同志们的精心培育下，长得叶绿枝壮，果实丰满。除此而外，还种有靛兰，长势很好。当地的老百姓都很佩服，说：“八路军抗日是英雄，生产是好汉。”

四、“王善人”的由来

在陇东地区曾广泛流传着“马青天”和“王善人”的许多故事。马青天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的专员马锡五同志。人们为什么要叫他“青天”呢？看过电影“刘巧儿”的人都知道，电影里那个专员就是他。现在我们就说说“王善人”的由来吧。

那是1939年6月的一天。中午饭后，我在院里溜达，旅长来到我身旁，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问：“小李子，吃过饭了吗？”我回答：“吃过了。”他对我说：“炊事员很辛苦，咱们现在没事，下河去替他们担两担水吧！”我愉快地答应了。我们从河里把水担到城墙路边休息时，忽然望见城墙下有一个妇女，还带着一个小孩在挖什么东西。王旅长每逢遇上老百姓，不论大人、小孩，总是热情地问寒问暖，问长问短。他那忠厚善良的面容上总

悬挂着笑容，人们在他面前说话，也从来不感到拘束。这一次，旅长仍放下手中的扁担，走近那位大娘，问道：“老乡，你挖啥呀？”

“唉！弄点吃的。”那位妇女说着转过身来，她见我们是军人装束，又说：“八路军是好人，只有八路军才自己担水。”我本来想说，这是我们旅长。可是，未及出口，旅长又问那位妇女：“墙壁上怎么能挖出来吃的呀？”

“就这个。”那位妇女从篮子里拿出一块白色的土块：“这种土叫‘白板土’，人饿得狠了，就拿它充饥。”旅长难过地笑了笑，说：“这东西吃不成。”他拉起那个小孩的手，接着说：“走，到我们家吃些饭去。”

“不麻烦你们了。你们真好，对我们这么穷的人还这么客气。”那位妇女感激地说。接着，她看了看自己和孩子的破烂穿着，又说：“我的家在乡里，离庆阳不远。你们有空时，请到我家去坐坐。”我问了一句：“你现在准备去哪呀？”那位妇女满面愁容地说：“得想办法找点粮去。唉！穷人天天忙着闹吃的，还是没饭吃。”“走，我们给你想办法。”旅长用自己的手巾把那个小孩嘴唇上糊的土给揩掉后，拉着他的手，继续说：“快到我家去吃饭。”

我们领着那位妇女和小孩回到了旅部。旅长把她们母子俩热情地招呼到自己的家里。随即倒了两杯水，让她们坐下喝。然后，叫我从伙房里拿几个馒头来。我给司务长说明了情由，取来八个馒头给了她们。那位妇女不晓得说什么好，只是说：“这……这……”。看来那个小孩已经很饿了，大口大口地吃下去一个馍，又拿起了一个。

这时，旅长抽起一支烟，开始了解那位妇女的家景。这位妇女是莲池地主的佃户，她丈夫史华是当地民兵营长，到延安学习去了。家里有五个孩子，四男一女，都还不小。租种地主的地，主

要靠她劳动。庄稼收割下来，交过租子后，就所剩无几了。没法子，就吃米糠和酸枣磨下的炒面；再没法子，只好采些榆树叶子和挖一点墙壁上的“白板土”吃。她们生活十分贫苦，全家人只有一床破被，穿戴烂得有时实在没法见人。

旅长听了那位妇女的诉说后，难过地看着她们，吸了一口烟，说道：“我们的政权刚建立，群众生活还很贫苦。特别是乡下的农民，缺吃少穿的困难户还很多，我们要下大功夫，逐步解决你们的困难。”然后，旅长写了一张纸条，大意是：请县政府马上给这位妇女五斗粮食和一些救济款。旅长把条子交给我，叫我领着她们去办理。最后，旅长见那个小孩穿的衫子太破烂，就把自己小孩穿的一件半新的布衫送给了他。小孩瞪大眼睛穿上了衫子，黄白的脸蛋上泛起了红光，这个只有十岁的小孩儿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那位妇女指着他：“这娃娃出世十年了，这还是头一次穿上这么好的衣裳。”她看了看我们，恳切地说：“好人，真是好人。请把你们的姓名告诉给我们，等我们有办法了，孩子大了，也好报答。”说罢，两眼睛满了泪花。旅长笑了，他对那位妇女说：“八路军对待老百姓都是这样，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记住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就是了。”那位妇女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不停地喃喃自语：“共产党……，毛主席！”

她要向旅长告辞了，我说：“我带你们到县政府领些粮去。”那位妇女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于是，我和她们母子俩一块向县政府走去。走在路上，那位妇女又问我：“请你告诉我，那个大个子八路军姓啥？叫啥名字？听口音不象本地人，他的家在哪里？”我告诉她：“他是我们八路军三八五旅的旅长。姓王，叫王维舟，四川人，是共产党早期的党员，还是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哩！”我拿出那张纸条，对她说：“王旅长写的这个条子，就是请县政府给你五斗粮食和一些救济款，帮助你克服眼下困难的。”

“哎呀！老天爷睁眼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当官的都这么善良，难道是要变好了，要变好了。”那位妇女情不自禁地连声说着：“真是善人……善人……”。

王维舟同志在陇东期间，象这样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爱护群众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人们都亲切地叫他：“王善人”。

五、“还有这么好的人”

旅长经常对干部、战士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要求同志们处处为老百姓着想，维护群众利益。因此，部队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护。

一九四二年的麦熟季节，一天，我们警卫班的战士，随着旅长去给离城不远的一户老乡收麦子。事先，我们听说这家老乡女人正害病，娃娃们都还小，就靠男人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这天，我们吃过早饭，带上镰刀和干粮、开水赶到麦地，只见老乡一个人正艰难地抢收麦子。我们几个战士上前向他说道：“老乡！我们给你帮忙来了。”老乡抬起头，擦了一把汗，喜出望外地说：“太好了！太好了！这忙真帮到象上了。八路军真知道我们的难处。”

说着，我们就干起活来，旅长和我们小伙子们，都象庄稼把式，挥着镰刀，割得干净又利索。老乡感激地说道：“八路军同志不怕吃苦，活都干得这么好。”他指了指割过的地和收下的麦子，说：“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当他得知八路军的旅长也给他帮忙来了时，非常激动，感慨地说道：“这是我们人老几辈子都没听说过的稀罕事，八路军可真好呀！”旅长边干边笑着对他说：“过去是稀罕事，可现在有了共产党、毛主席，就不稀罕了。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咱们是一家人。以后有什么难处，就来找我们。”

老乡见我们干得挺快，说道：“割慢点，别累着了。”又说：“累了，休息休息再割。”说罢，他放下镰刀就回家去了。这时，我们一个战士带的镰刀不好使，他便拿起老乡放下的镰刀用起来。可是，由于割得太快，不小心把镰刀给弄坏了。他拿起坏了的镰刀着急地对我说：“这下糟了，你看！这咋办呀？”我当时觉得，给老乡干活不小心损坏了他的镰刀，也没有什么要紧，就顺势说：“不要紧，我们给老乡说说，他不会见怪的。”这时，王旅长听了我的话，向我俩走来，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应该严格遵守，一点也不能含糊啊！”并语重心长地向我们讲革命道理：“我们无论干啥，都是为了人民。不管给谁办事，如果是损坏了人家的东西，则一定要赔。”他还说：“老百姓所以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就是因为我們全心全意地为了他们。”旅长的一席话，使我们提高了认识，那个同志愉快地准备好了赔款。

将近中午，我们在麦地旁一棵大树底下休息吃干粮。刚吃过后，老乡从家里走来了，他满面笑容地说，特意为我们做了鸡蛋、油饼，要我们快到他家进餐。我们向他解释说，刚吃过干粮，都不饿了。老乡说：“就是吃了干粮，也得去尝点儿，要不我的心里过意不去。”旅长笑着对老乡说：“你的一片心意我们领了，就不必客气了。我们都吃了干粮，少休息一会，把剩下的那块地，抓紧收割完，我们还有任务。下次再来吃你的饭。”这时，损坏老乡镰刀的那个战士，拿出赔款对老乡说：“老乡，对不起你。是我不小心把你的镰刀弄坏了，这是赔款，请你收下。”说着就把钱往老乡手里塞。老乡一推手，感动而又生气地说：“这是哪里话！你们给我干活，连我的饭都不吃，闹坏了个烂镰刀还要赔，我真想不通！”他说，赔款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收，别说是个小镰刀，就是把再大的物件弄坏了，也不能叫赔。旅长向他解释道：“损坏东西要赔，这是人民军队的纪律，我们必须遵守，

一点都不能违犯。”并要老乡收下赔款。我们都对老乡说：快收下吧！老乡，你应该协助我们执行纪律。说着，大家硬把钱放到了老乡手里，就干起了活。老乡非常感动，他看我们顶着烈日，给他割完剩下的那块麦子，望着我们喃喃说道：“没见过还有这么好的人”。

六、王旅长给老太太治“瘦瓜瓜”

王维舟同志，心里装着老百姓，处处为群众办事。一九四二年，庆城有一个老太太，患了一种很难治的病，症状是在脖子上长出了一个大瘤子，叫做“瘦瓜瓜”。由于家里贫寒，没有办法治疗，最后就来找王旅长。

这是五月的一天。早饭后，我刚打扫完旅部的院子，这位老太太拄着拐杖，脚步蹒跚地走了进来。我连忙上前去问她：“大娘，你找谁呀？”老太太说：“我找王旅长，是住在这儿吗？”我说：“对，就住在这里。你找他有啥事？”他说：“我是个病人。自己没办法治疗，能见见他吗？”我觉得连这样的事都来找旅长，旅长能忙过来吗？可是，看那老太太那副可怜的样子，我就对她说：“你先等等，我去给首长说一声。”

我走进办公室，见旅长还在专心地看地图，就说：“首长，有一位老太太找你看病，你能顾上吗？”旅长转过身来，说道：“她现在在哪？”我说：“就在院子里。”“快让进来。”说着旅长亲自出来接她。旅长把她热情地招呼到自己家里。老太太坐下后，旅长倒了一杯水，递到她的手中。然后问道：“害病多长时间了？啥子病呢？”

“时间不短了。”老太太抹去嘴角上的开水，说：“这种病叫‘瘦瓜瓜’，它和毒瓜一样，越长越大，折磨得人也越来越难受。”她把左手还在捏着的棍儿靠到炕边上，又说：“我自个无

钱，求医不到。没法子，才来找你。你不嫌我这个穷老婆子给你添麻烦吧？”

“咱们是一家人，你有什么难处就该找我们嘛！”旅长笑着对她说。

“我听说你是‘善人’，当这么大的官，没一点架子，待人脾气又好，光给人做好事。要不，我也不敢来找你。”老太太高兴地说。

王旅长注视着老太太脖子上的“瘦瓜瓜”，说：“这种病恐怕还难治呢！”又说：“老人家，你如再没有别的事，我就领你到我们的医院去看看。”“没有别的事。你看，我这把老骨头不死，害这种病，还得连累别人。”老太太说。

旅部医院设在城外马莲河北岸的麻家湾，它是三八五旅到庆阳后自己动手打土窑洞搞起来的。王旅长把老太太送到这儿，指示免费住院治疗。经大夫诊断，这个病须动难度较大的手术。由于医院条件、设备不能满足治疗的要求，医务人员就把困难向旅长作了反映。旅长也很焦急，最后说：“我们一定要把老大娘的病治好。让共产党、毛主席的阳光，真正使群众得到温暖。”

于是，旅长向延安党中央医院发了电报，说明了情况，要求帮助治疗。

中央医院接到电报后，当即回电，说：“尽快研究，妥善解决。”不久就派来了两名大夫，其中有一位还是苏联的外科大夫。最后经多方协助，终于把这位老太太的病给治好了。老太太布满皱纹的面容舒展了许多，她双眼溢出感激的泪花，对王旅长和医务人员说：“我这么个穷老婆子，你们都费了这么大的心血，治好了我的病。我真不知道怎么样报答你们呀！”以后，她逢人就说：“八路军这么爱民，老百姓一定会拥护他们。他们一定会得天下。”

慢慢地，老太太那衰老蜷曲的身躯直起来了，一双无神的眼

焕出现了活力。在地方政府的救济下，除了家里的生活得到改善外，她还穿上了一身新衣裳。和以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有一天中午，风和日丽，庆阳城窄条子的街道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随旅长外出办事，在街上又巧遇上了这位老太太，这时她已经扔掉了拐杖，满面笑容地朝我们走来，深情地望着我们，说：“快到我家吃顿饭去。”我和旅长都连忙向老人问了好。老太太接着说：“我的家，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怎么不来呢？就在西街头嘛！”

“谢谢老人家，我们真的很忙。以后有空就一定来看望你。”旅长对大娘笑着说。

我忽然想起老太太来找旅长看病时，她那副面容异常憔悴的病态，如今再看看眼前的老太太，精神焕发，充满着活力，顿时感到分外欣慰。

七、不让好人受委屈

这是一九四三年秋天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王旅长要到华池县大风川检查部队开荒种地的情况。我们早上从庆阳出发，半晌路过一个叫新堡的村子的时候，看见一位中年农民在路旁指天骂地地哭喊着。旅长看了这情景，料想这位中年农民必是受了什么委屈。于是，就跳下马来，走到他的跟前询问情由。那位中年农民抹去眼泪，伤心地说：“现在是七月份，我辛辛苦苦种了十亩地的西瓜正在成熟，可是在昨天晚上，不知被哪个坏蛋把瓜蔓拔了。我一家就指望着这些西瓜，这可怎么办呀！”说着，他又哭叫了起来。旅长走上地畔，看了看横七竖八的瓜蔓和东一摊，西一堆满地滚的那半生不熟的西瓜，也很气愤。他很同情地安慰这位中年农民，说：“老乡，不要难过了。这件事，我替你到区政府告状。”那位中年农民见这位素

不相识的大个子军人如此“仗义”，心里十分感激，连连说道：“八路军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呀！”这时旅长调转马头，我们就重新策马返回新堡区政府了。旅长找见区长，把这件事做了反映，要求马上调查清楚，严肃处理。旅长说：“老乡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庄稼，决不能让坏人糟蹋。”

一个月以后，我们从大风川返回时，旅长又一次专门到新堡区政府，询问此事调查和处理的结果。原来，拔那位中年农民西瓜蔓的，是和他同户族里的一个人，由于发生口角，那个人便怀恨在心，寻机报复。区政府查清后，让那人赔偿了全部损失，并向种西瓜的中年农民赔了情。王旅长听罢后，笑了，他说：“咱们边区政府，就是要这样，决不让一个好人受委屈。”

八、关怀同志体贴入微

三八五旅不仅同陇东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而且，在军队内部，官兵上下级，都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大家同甘共苦，充满着革命家庭的温暖。王维舟同志除了去旅部直属单位和所属各团检查工作看望大家外，还到饲养场、理发室、炊事班看望同志们并帮助干活。不论谁有了病，或有什么困难，旅长要是知道了，就一定要前去看望，问这问那，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克服各种困难。

一次，搞后勤工作的一位名叫汪银祖的同志久病卧床不起。王旅长知道后，亲自前去看望。旅长问他话，他光摇头叹气，一言不发。看上去好象有什么心事或委屈。王旅长明白了，汪银祖害的原来是“思想病”。他又走访了干部、战士，同志们告诉他，汪银祖年龄大了，找不下对象，心里烦闷。不久王旅长又一次来到汪银祖同志的住处，一进门就笑着说：“小汪，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好吗？”汪银祖见旅长说出了自己的心事，就把心里

情告诉了旅长：“我家里很穷，从小就出来参加革命。如今都快三十岁了，还连个媳妇都没有。回又回不去，在这儿又不好找对象，这事又不好意思对人讲，只好闷在心里。”旅长笑着说：“你好好工作，这件事儿包在我身上。”后来，王旅长四处托人，想方设法给汪银祖同志成了家，使他受到了很大鼓舞，工作搞得很起劲。此外，王旅长还为许多经过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而劳累成疾，身体残废的同志找了对象成了家。

长征过来的老战士、供给部长王世元同志患病后，旅长多次前去医院看望。王世元同志不幸病故，旅长参加追悼会时难过地流了泪，他说：“这个同志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几十年来踏踏实实，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确实是一个好同志。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以告慰死者。”王维舟同志热爱干部、战士，在政治上关心大家的成长，在生活上给人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因此，他深受广大指战员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九、严格要求子女

王维舟同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严格。常常给孩子们讲革命道理，教育他们从小努力学习，树立革命人生观，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孩子们上学后，旅长教育孩子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讲究礼貌，勤学好问。并要求老师对他的孩子更要严格一些。孩子有时同别人家的孩子吵了架，旅长总是严格管教自己的孩子，从不责备别人家的。别人家的孩子错了，他也只是热心地给他们讲道理。因此，王旅长的小孩尊敬老师，和同学们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学习成绩也很好。有一天早上吃饭时，旅长的一个小孩只喝了两碗米汤，而平时他总是能吃两个馒头的。旅长问他为什么不吃馒头了，孩子说，他不想吃馍，原来

为的是想多带些干粮。因为，有一个农民家的小孩家里穷，没有干粮，在学校饿得直哭。他想自己喝些米汤，把馍省下来给那个小朋友吃。旅长听说后，表扬了他的小孩，说：“有进步”。并叫他吃饱，再多带了些干粮。旅长也很注意要自己的小孩从小养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好习惯。常常是小孩吃剩下了的饭，旅长就自己吃掉，决不浪费一粒粮食。因此，孩子在他的启发下，也很注意节约。大孩子见小孩子吃剩下饭，就一声不响地端起碗吃掉。由于旅长的谆谆教育和影响，他的孩子学习进步很快。

一次，有一位老同志来旅长家，因为是第一次来，所以，他问旅长：“这个窑洞就是你的家？”旅长说：“就是。”可是旅长最小的小孩却说：“不对，不是。”那个老同志很奇怪，他问小孩：“怎么不对？”小孩答道：“我爸爸常说，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应该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别的干部和战士几个人住一个窑洞，我们一家人住一个窑洞。我爸爸是干部，妈妈和我们都是战士。都住的是公家的窑洞。”这个可爱的、当时只有几岁的孩子的认真谈吐，把那个老同志给逗得哈哈大笑起来。

(陈占功整理)

“暴刀逞一快 何惜少年头”

——追记王孝锡烈士

王千城 巩世伟 王维藩

慷慨歌太平，
从容作楚囚，
暴刀逞一快，
何惜少年头。

这是大革命时期西北早期共产党员、甘肃党组织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王孝锡烈士，在被捕时写的一首诗。它表现了一位忠贞刚毅的共产党人，在凶狠残暴的敌人面前，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和不畏牺牲的浩然正气。每当我们读起这首壮丽的诗篇时，便不禁油然而生敬意，更加深切地怀念王孝锡烈士。

(一)

王孝锡，字遂五，甘肃省宁县太昌镇人，出生于一九〇三年。他在七岁时入太昌镇小学读书，一九一八年考入平凉省立第二中学。次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与鼓舞下，他立志献身于救国救民、改造旧中国的事业。他在同学中积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孔孟之道对人们思想的腐蚀与束缚，组织同学罢课，开展对以校长胡师文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斗争。这些“越轨”行为，引起当局不满，学校竟以“带头闹

事”的罪名开除了王孝锡的学籍。不满十七岁的王孝锡失学以后，并没有在旧势力面前屈服，他翻山越岭徒步跋涉到了兰州，考入了国语讲习所。后来胡师文被撤换，他又回到平凉省立二中继续就学。在校期间，王孝锡十分珍惜宝贵的时间，刻苦学习，曾写了“金风飒至万物愁，人生韶华不可留”的诗句，用来勉励自己要发奋向上，绝不虚度年华。在那里就学期间，他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很优异。一九二三年年底，王孝锡从平凉二中毕业后即考入了西安国立西北大学。

王孝锡在国立西北大学学习期间，北京大学许多毕业生纷纷来到西安从事教育工作，其中有的是和李大钊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这时，满怀寻求真理热望的王孝锡，不久就认识了共产党员李银连^①、吕佑乾^②等同志。从此，他能够及时地看到李大钊同志主编的《新青年》和党在上海出版的《向导》、《中国青年》等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努力探求革命的真理，寻找光明的道路。同时，他在这一时期亲眼看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官僚、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封建军阀的混战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祖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国家民族危急的局面，进一步激起王孝锡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他积极投身于当时反帝、反封建、反军阀斗争的学生运动中去，参加了西安反对基督教的群众组织“非基大同盟”。他四处演讲，宣传马列主义真理，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天主教麻痹群众，阻挠革命，进行文化侵略的罪行。随着人们精神上的桎梏被砸碎，学校里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加了反对旧势力、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因而，反动当局对王孝锡恨之入骨，处心积虑地想对他加以迫害。在“非基”运动中，有一次他在西安南院门讲演时，遭到敌人逮捕。在敌人押送他的途中及在敌人牢房里，他指着敌人的鼻子，义正辞严地痛斥他们丧权辱国的暴行。反动当局的残暴行径激起西安全市

学生的愤怒，各校师生纷纷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抗暴力量。由于敌人惧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不得不将他释放。但他却直到迫使敌人认错之后，才昂然走出牢房。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屠杀我国人民，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各界罢工、罢课、罢市，各地纷纷响应，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帝高潮。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王孝锡和其他同学在西北大学带头组织成立了支援上海工人斗争的群众组织“护案援红委员会”和“英日残杀同胞雪耻会”，勇敢地投入了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他带领同学上街，开展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宣传，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在西安掀起了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高潮，在这期间，王孝锡由吕佑乾等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把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推向广大农村，西安各校进步同学利用暑假外地学生回家机会，沿途大力开展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王孝锡回家途中，在经过六个县城、五百多里的路上，组织同学们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有一天下午，走到离监军镇（今陕西永寿县城）不远的地方，他发现路上行人很多，听说这天镇上逢集，为了抓紧这个机会向人民大众作宣传，他看到同学们已经走得很疲乏了，就向别的同学说：“你们后面来，我先去给咱们找个住处。”说完就大步向前走去。他到后，在市中心立即放开喉咙向群众报告“五卅”惨案的经过，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揭露反动军阀的卖国勾当，动员群众支援上海工人、学生的爱国斗争。他慷慨激昂的情绪，明澈深刻的道理，流畅通俗的语言，使倾听讲演的群众久久不愿离去。他一直讲到天黑才结束。同学们对此极为感动，都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

王孝锡这次暑期回到宁县太昌镇，与同学任鼎昌^①在太昌小学成立了我省最早的青年社^②。参加青年社的有教师、学生及社会上的进步青年共三十多人。王孝锡亲自主持青年社的成员进行宣

誓，并响亮地提出：“改造社会”、“改造人生观”的口号。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经王孝锡和一些同学的倡导，西北大学办起了“平民学校”。它主要是帮助贫苦群众识字，向他们进行革命思想的宣传教育。这种学校的活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大半是办夜校。教师由西北大学学生担任。王孝锡一开始就参加了这一活动的组织工作。“平民学校”的举办，成为当时党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的一种好形式。

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吴佩孚派心腹刘镇华为陕甘剿匪总司令，率其部十万之众入潼关。到四月初，刘的部队已临西安城下。这时，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杨虎城进驻西安，团结陕军，依靠进步力量，抗击刘镇华部队的围攻，坚守西安孤城。在长达八个月的反围城斗争中，西北党组织为了配合北伐战争，积极组织力量，支持杨虎城的护城斗争。这年暑假，外地学生不能回家，在党组织领导下，由西安学生联合会主持，在西安省立第一中学开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暑期学校，各校师生参加者千余人。暑期学校设有社会科学班及自然科学班，主要学习人类进化史、唯物史观、马列学说，以及文学、新闻、艺术等。王孝锡和吕佑乾、黄平万、吴化之、雷晋笙等是暑期学校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当时，由于城内军民人口骤然增加，守城时间过长，粮食供应极度困难，一切可以食用的动植物、皮革制品、药材、油渣等均搜罗殆尽。后来，就捕麻雀、挖野草充饥。在这种情况下，王孝锡仍忘我地工作。

在生活非常艰苦的环境里，暑期学校的师生同甘共苦，积极开展活动，有力地支持了杨虎城部坚守西安的斗争，牵制了吴佩孚的十万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的斗争。

西安解围后，王孝锡与刘含初^⑤、李银连、吕佑乾等人在西北政治委员会^⑥会议上提出改造西北大学为中山学院，以适应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山学院首先训练了一批前方急需的政

治工作人员，派到冯玉祥部队的各军、师中去，加强了党在部队的力量。继之，又设立了农民运动班、妇女运动班等，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二)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党组织准备派王孝锡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他在向当时地方政府交涉出国旅费过程中，常与冯玉祥接触。冯玉祥十分赏识王孝锡的才能，所以不主张他立即出国。同时，苏联顾问苏格林、夫格林也建议正当用人之际，暂勿出国。当时西北革命形势和全国一样，正处于高潮，需要大量党的优秀骨干去开展工作。鉴于这种情况，王孝锡毅然放弃出国学习的机会，经党组织同意，继续留在西北坚持革命斗争。

一九二五年冬，共产党员张一悟、钱清泉、宣侠父等来甘肃，在兰州成立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特别支部大力开展了工作，在平凉等地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在兰州的挑水、理发行业中组织了工会；在皋兰、天水等地建立了农民协会。当时由于国共合作，钱清泉、宣侠父等同志受上级党的指示，参加国民党，帮助整理甘肃党务。他俩负责开办政治人员训练所，成立了青年社，党在兰州地区领导的群众革命活动迅速开展。这时，国民党在甘肃的右派头子田昆山^①一伙对此极为不满，制造磨擦，进行破坏。钱清泉、宣侠父等同志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四日，在兰州山字石皖江会馆召开全市国民党员大会，公开揭发国民党在甘肃的右派头子田昆山一伙的种种罪状。因证据确凿，田昆山一伙无法狡辩，当场受到群众的扭打并被迫交出印信、存款。这次会议重新选举了以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占绝对优势的新的临时党部。嗣后，田的党羽李世军等去西安歪曲事实电告冯玉祥，“宣侠父等在兰州诋毁时政，批判总司令(冯玉祥)作风不正。”

这时冯已受人蛊惑，即电令甘肃军务督办刘郁芬逮捕了宣侠父等共产党员，致使甘肃党务工作处于混乱状态，我党的组织也遭受损失。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为了加强甘肃党的工作，恢复和发展甘肃的革命力量，共产党员刘伯坚^⑧以在国民革命军内任职的便利条件，以国民军总政治部负责人的名义，在西北政治委员会上建议派王孝锡和胡廷桢^⑨、马凌山^⑩、保至善^⑪四人以“西北政治委员会特派甘肃省党部党务委员”的身份，到兰州整理甘肃党务。

王孝锡等同志到兰州以后，以果断的革命精神改组了国民党省党部。与此同时，改选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特别支部，由胡廷桢任书记，王孝锡任组织部长，马凌山任宣传部长。在此期间，王孝锡以其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有利地位，用甘肃政治委员会会长、甘肃省军务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青年部长及国民联军第二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长等合法身份，公开广泛地进行社会活动，积极开展革命工作。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王孝锡等同志团结国民党左派，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活动，对以田昆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使国民党右派狼狈不堪。王孝锡充分利用当时的有利时机，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和我党的主张，同时，他以青年社长身份，在青年中积极开展活动，亲自介绍冯玉洁（定西人）、窦香菊（榆中人）、王淑农（陕西华阴人）、谈仲瑜（江苏人）和焦亚男、韩玉贞、杨秀英、杨秀兰等许多青年加入了青年社。这时期青年社常以兰州女子师范学校为集合地点，在该校礼堂聚集开会，倘有秘密事情就在女教员休息室商谈。此外，还把省立第一中学的周刊作为宣传共产主义的论坛，并在五泉山邵家庄印刷出版过《妇女之声》等数种宣传妇女解放，提倡新思想运动的刊物。与此同时，还先后在宁夏、平凉、临夏等地发展了青年社组织。这一时期，革命活动蓬勃兴起，就连敌伪报刊也惊呼王孝锡等“抵甘后大肆活动，组织了CY

（共青团英文缩写），参加青年甚众，并分布甘肃临近各县，甘肃全境已布满赤色恐怖。”④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同志在北京遇难，曾经和王孝锡在西安一起进行革命活动的李银连同志也和李大钊同志一起惨遭屠杀。王孝锡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同年六月七日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二军事学校特刊上发表了《悼北京死难烈士》的诗篇：

霹雳一声，
在阴霾沉沉、妖气弥漫的北京，
现出霞光万道——
主义的鲜花，
烈士的血星，
表现在帝国主义者的发抖中。
你们的精神，
高唱在民族解放运动中；
你们的声音，
革命导师，
人类明星。
你们一面引领、一面高呼：
“枪弹是革命者的饭食，
死是革命者的归宿，
为了被压迫阶级最后的胜利。”
这是何等的悲壮啊！
你们是为党、
为国、
为全人类解放而牺牲。
这是何等的光荣！

后死者的我们，
恨不能列于诸君之林，
与贼拚命。
真羞！
真惭愧！
可是诸君的鲜血，
深注在我们的脑中。
应当怎样的努力？
前进！奋斗！杀贼！
才能完成你们未竟之功，
慰你们在天之灵。

这首义愤填膺、慷慨悲壮的诗篇发表以后，许多官兵和群众看了都流下热泪，激发起对革命的向往与同情。

六月十日，冯玉祥与汪精卫、孙科等举行了郑州会议。六月十九日，冯玉祥又与蒋介石在徐州会晤。从此，西北的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王孝锡等同志不能继续留兰州开展革命活动。六月末，冯玉祥来电调王孝锡、胡廷楨、马凌山、保至善去郑州。他们到洛阳时，得知冯玉祥已在“礼送”共产党员，刘伯坚已去汉口。王孝锡和胡廷楨到武汉请示行动方针，到武汉后，党指示他们仍回西北坚持斗争。王孝锡和胡廷楨回到宁县后不久，他们商定了在甘肃的斗争计划，由胡廷楨去临夏开展工作，王孝锡留在陕甘边境的宁县、长武、彬县一带开展工作。

(三)

一九二七年秋，王孝锡同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班的共产党员王彦圣^①、王之经^②和在冯玉祥部队慰劳宣传团开展政治工作

的共产党员任鼎昌等先后回到宁县太昌镇，在那里成立了中共彬（陕西彬县）宁（甘肃宁县）支部。王孝锡担任彬宁支部书记、王彦圣任组织委员、任鼎昌任宣传委员、王之经任青年委员。

他们以“读书会”的形式，利用太昌镇十天逢集四次的机会，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浅说》、《列宁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国际共产主义草案》，宣讲政治经济学及社会进化史。学习后大家共同讨论，互相提出问题，进行解答。在这期间，他们又整顿了一九二五年暑期组织起来的青年社，并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了青年社。在青年社里，王孝锡亲自讲课，给大家提出学习马列主义学说，宣传工农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夺取政权等任务，并给大家教唱《国际歌》、《打倒列强》等革命歌曲。青年社、读书会的活动非常活跃。

一九二六年前后，我党在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问题上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而又不知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这时，虽然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已在广州的一个刊物上登载，但由于陈独秀的封锁，党内许多同志未能看到或根本不知有此论述。加之大革命失败后，一些人看不到革命力量，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在这种情况下，王孝锡以行医作掩护，跑遍了甘肃宁县、庆阳县、陕西长武县、旬邑县和彬县的广大农村，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对农村各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作了深刻的分析。他在一篇调查中写道：“地主：……其经济在这个社会上占着最高地位。每年收入尽为不劳而获的地租利息……，比绅士虽无统治政治的特权，但经济势力可以支配政治，……有

可能时对绅士取而代之。所以，地主与绅士立于同等地位。压迫贫农。”^⑤并指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一样。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在这篇调查中，王孝锡分析了自耕农（即中农）的经济状况和对革命的态度。他指出：“自耕农：可以自耕而食，自织而衣，在经济上的外交很少，常取各扫门前雪的独立保守主义，故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之口吻。但其心理常趋向地主方面发展。故努力地发展个人经济，对于社会问题很难注意得到”。^⑥这种人对革命持中立态度，在革命洪流高涨，可以看得见曙光时，也可参加革命。

在农村，谁是真正的革命力量呢？王孝锡通过社会调查，又分析了半耕农、佃户和雇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他认为：“半耕农自己的土地很少，常有食料不足之虑，不得不乞求地主的土地，可以得生产品的一半，以补不足。常受地主的剥削，偶遇天旱水淹等灾，便一无所得。地主勒索地租，常常趋于破产，沦为纯粹的佃户。所以，他们的经济是常不足的，不保险的，甚至终年劳苦，而有衣服褴褛，食菜茹糠之苦，这一般是很有革命本质的。”^⑦“佃户：社会上最被人剥削，受苦的，莫过于佃户。”^⑧他们“土地、生产工具一无所有，完全受之于地主。听地主之指挥驱使，每年劳动的结果，分给一半与地主，仰承地主之剩余，借以维持其生活，每年所得只能维持数月。其它暇时，无资本做贩卖生涯，只有以体力劳动售卖于人，糊自己的口，得到少许工资，供养妻子。但到农暇或青黄不接之时，揭借于人，常借人一斗须加五升或六、七升的利息，待农作物收获时，得到资本收租所余以偿此债，甚至有倒仓倾圮而不足者。不如此，他日必不能再借得出。所以，佃户的生活，无一日不在忍饥受饿，穷迫困苦之中，其子孙万世，要做地主的奴隶、牛马，永无见天日之时，社会上具有革命特质正此人也。”^⑨“雇工：

农业社会之雇工。正资本主义社会之工人也，他们无家庭之可言，无幸福、娱乐之可言，只有出卖劳动力于人，维持其不死。社会上最痛苦难堪的，莫过于这一等人。工人有时在奋斗中要求增加工资，还可以成家娶妻。因为工人有广大的群众，聚集在一处，便于团结、相识，所以就有很大的力量，去向工厂主罢工，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等。而雇工便没此等团结的条件，——因为散居各处，不便联合，且无时间去联合，……他们在每天二十四小时中，就要劳动十八、九小时以上”。^④王孝锡在他写的《解决中国问题草案》一文中还说：“在这一斗争中，苦力和雇农将要有很重大的作用，……同时，我们要吸收乡村中的中农分子，使他们站到贫农方面来，这些中农也是要推翻社会制度的。”“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实行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实行革命的变革制度”。王孝锡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的上述一系列观点，他还利用各种形式，在党内和群众中进行广泛宣传，号召共产党人同“最痛苦的农友们团结起来，向万恶的社会及地主奋斗。”^⑤王孝锡通过广泛的农村调查得出的这些结论，和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右两种倾向是针锋相对的，而这些认识却十分符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正确论述。

王孝锡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能够找到革命的力量，而且善于发动农民展开斗争。当时，处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宁县，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主豪绅与官府互相勾结，对农民层层压迫勒索。县长索呈祥贪赃枉法，高捧浮派，使广大农民苦不堪言。王孝锡、王彦圣等同志在宁县发动农民揭发索呈祥的罪恶劣迹，展开了抗捐抗税斗争。在强大的农民斗争压力下，索呈祥赔偿银洋三千元，并且狼狈滚蛋。这次斗争的胜利，使革命群众更清楚地看到农友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增强了向反动势力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从而促使群众反对官僚、地主、劣绅的斗争浪潮不断高

涨，给当地伪政府以极大威胁，使伪警数月不敢下乡活动。

(四)

针对蒋介石的反革命进攻，党及时地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各地党组织发动群众举行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

“八·七”会议精神传达以后，王孝锡在宁、长、旬、彬地区积极着手组织工农武装斗争。他深入到彬县百子沟煤矿，进工棚，下煤窑，同工友们促膝谈心，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为组织工人暴动创造条件。同时，他又和旬邑县地下党的许才升等同志一起分析旬邑县的形势，为组织农民武装暴动作好准备工作。

旬邑县地处陕甘交界，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的武装力量比较薄弱。这里紧靠子午岭林区，地形复杂，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另外，贫苦农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于是，他们组织了“红枪会”，捣官府，杀劣绅，与地主土豪作斗争。最重要的是党在这里的力量比较雄厚，以许才升^①、王清碧^②等同志为领导的地下党组织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同时，陕西省委还向这里派来吕佑乾、吕凤岐^③等同志加强领导工作。他们根据这些有利条件，在陕西省委的指示下，旬邑县地下党决定举行武装暴动。

一九二八年农历三月二十日拂晓，潜伏在旬邑城内的暴动队伍先缴了警察局及守城警察的枪枝，城外由农民组织起来的“红枪会”会员，手持大刀、长矛、土枪越城而入，城内外武装暴动队伍汇合后，打进县衙，捉住了县长、警察局长以及两个粮秣委员和土豪劣绅等十几个坏家伙。武装暴动的人民群众欢欣鼓舞，当天召开了公判大会，愤怒声讨这伙吸血虫的罪行。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公判大会当即处决了这些坏蛋。

推翻了旧县政府以后，当地党组织及王孝锡等同志领导暴动

群众在县城高等小学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路军。许才升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第二路军总指挥，王彦圣任第二路军政治委员。在举行了旬邑暴动，建立起工农政权和第二路军以后，王孝锡立即前往彬县百子沟煤矿，组织煤矿工人暴动，准备建立第一路军。

旬邑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积极开展打土豪、惩劣绅、斗恶霸、分财产等活动。工农革命军第二路军在旬邑县的土桥歼灭了地主武装的一个民团，占据了民团团总袁金章的家，把粮食、衣物、家具等都分给了农民。随后又到职田镇火烧了大土豪张子宽的家。

这支农民武装力量，虽然只有二百多人，但组织纪律性强，作战非常勇敢，拿下旬邑县城后，又去攻打彬县，准备配合百子沟煤矿工人暴动。但是由于山路陡峭，贻误了战机，未能达到目的，因此转向甘肃正宁县城方向发展。

旬邑暴动惊动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急忙调来田金凯骑兵师镇压。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寡不敌众，这次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被压下去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歧、王清碧、王郎轩等七位共产党员被敌人活埋。王孝锡得知七位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写了“吊故友七人”诗四首：

其 一

挽救工农登仙阶，
努力实现苏维埃。
生平浩气终难泯，
革命史上第一页。

其 二

议案一决寒冰霜，
红军奋臂处杀场。

贪官污吏尽丧胆，
地主绅豪如亡羊。

其 三

静夜悲声隐隐扬，
丑贼送君处杀场。
枪声已息君犹哀，
烈士坑中含土亡。

其 四

一缕清风半轮月，
深山幽处暗举哀，
回忆往事肠欲断，
追悼惟有眼中血。

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了旬邑农民暴动，杀害了吕佑乾、许才升等同志以后，四处追捕王孝锡。王孝锡被迫离开了百子沟煤矿。在白色恐怖下，他继续在陕甘交界的宁、长、旬、彬一带坚持斗争，毫不气馁，并写了下边这样一首诗，表示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到底的钢铁意志：

任何力量，不能移我之心，
任何力量，不堪动我之情，
我的主义驱使我不能一刻留停，
我的责任鼓励我不能一刻安寝，
一腔热血要浇遍地球西东。

旬邑农民暴动，是继清涧暴动之后，西北又一次农民武装斗争，这次暴动虽然时间很短就失败了，但它为党后来在陕甘边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

（五）

旬邑暴动失败以后，正值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大饥荒的前一年，王孝锡又回到宁县继续开展地下活动，整顿党的组织。他在一份向上级党组织的汇报中写到：“……我自回来，立即召集王××成立临时区委，作暂时指导，待后各支整理有绪时，再进行选举正式区委。在这过渡期间，太昌区委我们三人暂编为第一支，并指导中学工作。中学有于××、王××，派王××跨团作团中书记。泾河为第二支，大学十二人^①，分作四个小组，同志分住在五村。中学同志三人系大学同志介绍者，尚未编入组织。第三支在长武，共十人，分三组。泾河南骑马沟有同志四人，暂属长支，距第一支约十里，距第二组约二里，但因隔河，预备列入第二支……”。^②王孝锡在整顿、建立地下党组织的同时，分析了宁县、长武、泾川、正宁、庆阳、合水、镇原一带的社会状况。一九二八年，这一带自“三月间以来，未落一场透雨，夏田收成比往年减少三分之二，秋禾完全无有。”“自麦收后，农民大受天旱的恐慌”^③成伙结队向地主借贷。然而，在大荒年的形势下，地主为更多勒索农民，囤粮居奇，高利盘剥。农民“以图生活，各村中自行预备土枪、刀矛等武器，每夜枪声不绝于耳。”^④王孝锡认为灾荒人祸迫使农民揭竿而起，这是发动农民进行暴动的好机会。他和王彦圣等同志商量，联系人员，着手组织宁县地区“农民游击队”，为举行大规模农民暴动准备力量。当时，在宁县地区有几股自发的农民武装，他们杀富济贫，到处活动。王孝锡分析了自发农民武装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认为对他们经过教育改造以后，可以成为革命的力量。于是，对这些自发的农民武装，做大量细致的工作，终于收编了其中的一股，这样组织起了农民自卫军。这支农民自卫军一成立，便

发展很快，最后达一千多人。

宁县地区的革命斗争，使甘肃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慌万状，宁县伪县长效维国采取挑拨离间的手段，唆使几股农民武装互相残杀，随着农民武装力量的削弱，国民党反动派从西峰调来田金凯骑兵部队，扑灭了最后一股农民武装。反动派到处捉拿王孝锡，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也发出捉拿王孝锡的通缉令。差人、衙役不时临门，骑兵、警察经常寻踪。甘肃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亲自派特务军法处处长刘泾洋带领军法官杨天枢等来陇东，他们勾结当地反动势力，搜捕王孝锡。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五日，王孝锡在太昌镇他的家中被捕。临走时他挥笔书写《别家有感》诗一首。

丑贼剪何急，皂隶临门催。
双亲堂上悲，儿女牵衣涕。
断袖出门去，天空任鸟飞。

写毕，王孝锡诀别亲人，昂首挺胸，阔步出门。当走到街坊一个面馆时，与前来要求释放他的乡亲们告别，又在墙壁上写了两首诗。

(一)

书剑深沈二十年，国事无端尚依然。
革命未成身先捕，普罗自在人世间。

(二)

慷慨歌太平，从容作楚囚。

暴刀逞一快，何惜少年头。

这些铿锵有力的诗句，充分表达出王孝锡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坚毅，也表现出他勇为革命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王孝锡被捕后，当地革命群众积极准备在押解途中进行营救。但王孝锡在宁县城只关押了两日，因准备工作没有做好，营救人员一直尾随到平凉。王孝锡被押到平凉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召开了庆祝大会，叫嚣说：“抓了西北共产党的头子，这下西北就安定了”。随后，即派部队押送王孝锡去兰州，因此，中途营救未能成功。

王孝锡被解到兰州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宣传，据当时《新秦日报》载“冯电奖甘肃省破获共党”的一则消息报道：

“兰州十八日电，刘郁芬接南京冯副^①电云，军法处长刘径洋督饬军法人员破获共党机关，并捕获要犯王孝锡一名，殊堪嘉奖，着记大功一次，以资矜式，嗣后关于共党事件务须严密侦缉，以弭隐患。”

当时，兰州监狱分为“见、善、思、迁、知、过、必、改”八个号子。由于王孝锡是重要政治犯，被押在“改”字号里。敌人梦想从王孝锡嘴里获得西北地下党组织的情况，斩尽杀绝西北的共产党员，甘肃国民党的几个党务头子亲自审问。王孝锡怒不可遏，他严厉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反对中国革命的罪恶行径。在敌人的法庭上，王孝锡面对酷刑拷打，毫无惧色，他极力宣传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对党的机密一字不吐，始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就连国民党甘肃指导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的电报中也这样说：“……近在宁县捕获在甘共×首領王孝锡一名，……绝无悔改之心。”

反动派在王孝锡嘴里得不到半点东西，就举起罪恶的屠刀决

意杀害他。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深夜，王孝锡得知敌人当夜要杀害他时，给父母写了一首诀别诗：

纵有垂天翼，
难脱今夜险，
问苍天？
何不行方便？
取飞云，
驾慧船，
搬我直到日月边，
取来烈火千万炬，
这黑暗世界，
化作全烟。
出铁笼，
看满腔热血，
洒遍地北天南。
一夕风波路三千，
把家园骨肉齐抛闪，
自古英雄多患难，
岂独我今然。
望爹娘，
休把儿挂念，
养五体，
度残年，
尚有一兄三弟，
足供欢颜，
儿去也，
莫牵连！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王孝锡在兰州市安定门外萧家坪城隍行宫庙前英勇就义，年仅二十五岁。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中国人民的自由解放，王孝锡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不畏邪恶，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释：①李银连，又名李应良，早期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毕业，与李大钊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后被派到西北大学任教，在西安积极开展党的活动，1927年4月28日和李大钊同志一起在北京遇难。

②吕佑乾，河北枣强县人，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毕业，1926年到1927年在西安省立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这期间积极开展党的活动，1928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往旬邑指导农民暴动，被敌人活埋。

③任鼎昌，字宣之，甘肃宁县人，西北大学毕业，早期共产党员。1927年春天在冯玉祥部慰劳宣传团作党的政治工作，1928年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1929年病死在兰州监狱。

④青年社，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力量，扩大影响，组织的党的外围组织。

⑤刘含初，早期共产党员，北京大学毕业，曾任中山学院院长。

⑥西北政治委员会为国共合作时期，负责西北军队宣传、党务等方面工作的权力机构。

⑦田昆山，甘肃泾川人，北京大学毕业，曾是甘肃国民党党部头子，解放前夕逃到台湾。

⑧刘伯坚，四川南充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任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后留在南方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不幸在作战中负伤被俘，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⑨胡廷斌，甘肃临夏人，我党早期共产党员，由广州派来西北开展

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回临夏开展活动，后被国民党杀害。

⑩马凌云，陕西合阳人，西北早期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在西北开展工作。

⑪保至善，甘肃崇信人，西北大学毕业，西北早期共产党员。1928年在西安被捕，同年在郑州被敌人杀害。

⑫引自国民党特务机关刊物《劲报》第三十二期。

⑬王彦孟，又名王晓时，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班学生，1926年入团，1927年在西安入党。解放后一直在陕西商县中学任负责工作，现退休。

⑭王之经，字正甫，甘肃宁县人，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班学生。1927年3月入党，后来在陕南搞兵运工作中牺牲。

⑮、⑯、⑰、⑱、⑲、⑳均引自王孝锡1927年调查的一封信材料的草稿手迹。

㉑许才升，陕西旬邑县人，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班学生，西北早期共产党员。旬邑暴动前任旬邑高等小学校长。1928年旬邑暴动中被国民党活埋。

㉒王清碧，陕西渭南人，共产党员。曾任渭南中学校长，旬邑暴动中牺牲。

㉓吕凤岐，陕西咸阳三桥人，共产党员，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旬邑暴动前是旬邑高等小学教员。

㉔中学，当时指团组织，大学，当时指党组织。

㉕、㉖、㉗引自王孝锡烈士一封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材料手迹。

㉘冯，即冯玉祥；副，指十五日。

緬懷馬錫五同志

李世俊

馬錫五同志是陝甘人民的忠誠戰士、我國司法戰線上的一面旗幟。每當我回憶起土地革命戰爭以來風起雲湧的陝甘革命鬥爭，馬錫五同志當年為黨忠誠戰鬥、關懷教育我的情景就浮現在眼前。

(一)

馬錫五同志是陝西省志丹縣（原保安縣）米家砭人，一八九八年出生於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由於家境貧寒，他在少年時代只讀了兩、三年書便失學了。後來，由於生活所迫曾給人記過帳。清貧的家庭生活和舊社會人剝削人的社會現實，使他從小就十分仇恨地主老財，幼小的心田里早就種下了推翻舊世界的種子。

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刘志丹同志在陝西領導渭華起義受挫後，很快秘密回到家鄉保安縣開展建黨和掌握武裝的革命活動。當時的偽保安縣政府就臨時設在我的家鄉劉家灣附近的永寧山。不久，偽縣長為了籠絡人心，讓志丹同志擔任了縣民團團總。志丹同志利用團總的身份，巧妙地殺掉了保安縣幾個有名的惡霸地主，大長了人民群众的志氣。志丹同志這一時期在保安縣的革命活動影響很大，許多有志於革命的青年紛紛參加他領導的革命鬥爭。就在一九三〇年，馬錫五同志也參加了志丹同志在陝甘邊領導的革命活動。在志丹等同志的領導下，馬錫五同志這一時期

在国民党军队中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参与组织陕甘边红色武装，为创建陕甘边苏区做出了很大贡献。

马锡五同志参加革命初，积极奔走于陕甘边各县，千方百计发展革命力量，秘密组织红色武装。一九三一年，我才十四岁，因家庭生活困难，便为我村的一家地主放羊。六月初的一天下午，天气很热，我正在大路边的山坡上放羊，忽然看见大路上走来一个身背长枪的人，上身穿着军装，很是魁梧，走近一看，原来是我以前就相识的马锡五同志。我很高兴，忙问他怎么能到这儿来，他说：“我刚从西面过来，准备到东面几个地方去，顺便来这里看看你父亲和你们。”我忙陪他向我家走去。他和我边走边谈，问我们这里庄稼都种上了没有，大家生活有没有困难，我一一作了回答。到家吃过晚饭后，为了安全起见，我父亲同我商量，安排马锡五同志在我家水沟掌的一个旧炭窑里住，每天由我父亲和我们弟兄几个轮流送饭。就这样，马锡五同志在我家这窑沟里秘密住了三、四天。这期间，马锡五同志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他对我说：“我们这一时期主要在彬县等地搞兵运工作，兵运工作的目的，就是争取武装，掌握枪杆子。”他说：“现在的社会，是官府、豪绅勾结外强，欺压穷人的社会。不砸烂这个旧社会，建设起一个新社会，穷人的痛苦就无法解除。所以，我们现时的任务是开展兵运，抓枪杆子。只要有了枪杆子，我们就能对付地主老财；没有枪杆子，我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他还说：“同时，我们还要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动民众起来抗粮抗款，打土豪分田地给农民。这样，民众才能拥护我们，革命才能发展起来。”听了这些道理，我好象眼前亮了许多，忙问他：“我们村的穷人也很多，什么时候闹抗粮抗款呢？”他笑着说：“发动农民抗粮抗款，要在敌人控制力量薄弱的地区先搞。你们刘家湾，离敌人县政府（当时驻水宁山）很近，现在还不行。以后革命力量大了，就要闹起来。”

马锡五同志这次到我家，虽然只住了三、四天就走了，但是，他给我讲的那些革命的道理，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马锡五同志的教诲，使我第一次知道了“革命”这个词的意义，初步懂得了闹革命就是要打倒地主老财，解救贫苦民众。在马锡五同志的启发引导下，我于一九三四年夏天参加了我们村的赤卫军。这年秋季，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已建立了华池、靖边、保安、甘泉、安塞、富县、旬邑、淳化、耀县、庆阳、合水等十多个县份的广大解放区和游击区，并在华池县的南梁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习仲勋同志任政府主席。这时，在洛河川中上游的保安县和甘泉县相连的地方，也新成立了甘洛县苏维埃政府，我的家乡刘家湾划属甘洛县第一区。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由于国民党进攻陇东苏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从南梁迁到甘洛县下寺湾。这年五月，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在李家岔会师后，在刘志丹同志指挥下，连续消灭了杨家园子等地的敌人，旋即挥师南下，连克安定、延长、延川、安塞等数座县城，出现了陕甘根据地和红军大发展的大好局面。我们甘洛县第一区赤卫军大队根据区委指示，也抓住这一战机，在这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包围了伪保安县政府的临时驻地永宁山。第二天，保安县城的敌军营部派出了援军，又被红军在半路击溃，永宁山的敌人更加惊慌失措，我即带领一区赤卫军大队于这天晚上赶跑了山上的敌人，解放了永宁山。

解放永宁山的当晚，我们立即查封了山上所有的粮食、衣物和其他物资，并连夜派人报告了一区政府。第二天上午，区政府干部陪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后勤工作干部杨玉亭等几十名同志来到了山上。我们即向杨玉亭等同志清点移交了一切缴获，并协助他们于当日运走了一部分物资。这天下午，当时已担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的马锡五同志，也来到了永宁山。他一见到我

就高兴地说：“世俊同志，你们赤卫队很勇敢，这次行动搞得很好。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向你们祝贺！”我汇报了这次行动的基本情况，马锡五同志对我说：“永宁山这里按你们已经安排好的工作抓紧搞，我待一会儿还要到县川去。”稍停片刻之后，他思谋着说：“你们赤卫队要注意两件事：一是不要延误农时，组织大伙把庄稼种好；二是赤卫队要抓紧时间进行训练，准备接受新的任务。”马锡五同志走后，我马上集合赤卫队员开会，传达了他对赤卫队工作的指示，全大队随即按上级的指示开展了紧张的生产和训练活动。

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刘志丹等同志的领导下，红军已解放了陕甘边和陕北近二十个县份，使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联成了一片，胜利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这月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甘洛县下寺湾（今属甘泉县）的河滩上，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庆祝大会。红二十六军的部分部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及政治保卫队，甘洛县各区赤卫队，及延安、富县几个邻近区的赤卫队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庆祝大会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根据地的形势发展很快、很好。最近，我们的一支兄弟部队要到陕甘苏区来，我们要积极做好迎接他们的一切准备工作。接着，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粮食部长马锡五同志讲话。马锡五同志在讲了形势问题后，接着重点讲了粮食工作。他说：“现在，我们根据地军民要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习仲勋同志讲了，我们的兄弟部队要来。这样，粮食工作就更显得重要。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兄弟部队一到，我们就需要比现在还多的粮食。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向农民要更多的粮食，咋办呢？我的意见，今后打下地主、土豪劣绅的粮食，都要节约使用，要保管好这些粮食，防止霉烂，使兄弟部队来我们这里后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我们粮食的主要来源还只是打土豪、打地主，所以，大

家要十分注意节约粮食；同时，还要争取多种、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马锡五同志讲完后，我们甘洛县第一区区委书记王英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种好庄稼，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个兄弟部队要来。过了不久，到今年八月，红二十五军果然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的带领下，转战陕南、陇东来到了陕北苏区，有好多部队还在我们甘洛县一区的永宁山附近宿了营。这时，我已担任甘洛县一区政府主席，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仅我们一区就送了十多头猪、一百多只羊等许多慰劳品。

红二十五军在陕北苏区永坪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合编后的红十五军团，立即在劳山战役中歼灭敌东北军一个师，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

(二)

中央红军在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下到达陕北后，在道座铺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接着很快对尾追中央红军的敌人发起了直罗镇战役，歼灭敌一〇九师，重创黑水寺的敌一〇七师，稳定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央把大本营设在西北举行了一次奠基礼。从一九三六年初开始，红军连续举行了东征和西征。通过西征，又解放了曲子、环县、定边、盐池、惠安堡、预旺堡等地，将陕甘革命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同时，成立了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省政府机关随军西征进驻在环县河连湾。马锡五等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干部参加陕甘宁省政府工作，都随军西征到河连湾。李富春同志任新设的陕甘宁省委书记、马锡五同志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肖劲光同志任省军区司令员。这年九月，我从甘洛县

一区到河连湾又见到了马锡五同志。马锡五同志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来了，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有许多工作要我们做。可是，你是个放羊娃出身，文化程度太低了，这不行。你要在工作中努力学习文化，好好锻炼自己。这样，才能更好地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听了马锡五同志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我心中暗暗下了攻克文化关的决心。返回工作岗位后，我就边工作、边挤时间学文化。两年后，组织上又调我到边区党校学习。就这样，我这个参加革命前没有进过一天学堂门的放羊娃，也在革命工作中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

西安事变后，我党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取消，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马锡五同志任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副专员。一九三九年秋季，我边区军民赶走了庆阳县城的顽固派，庆环分区领导机关随后也由曲子迁到庆阳，改称陇东分区，马文瑞同志任陇东地委书记，马锡五同志任陇东分区专员。从一九三六年起，一直到抗战结束以后，马锡五同志一直在陇东做地方领导工作。他模范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为巩固红军西征成果和建设陇东抗战后方基地，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实际工作。

一九四〇年初冬，我由陕甘宁边区粮食局调到陇东分区专员公署负责粮食工作。我和同时调动的一位同志从延安走到庆阳，已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初了。我们刚到专署机关报了到，马锡五同志便招呼我们到他的办公室谈话。马锡五同志热情地对我们说：“你们来了好嘛，给我们分区的工作增加了力量。现在陇东分区的粮食工作还存在一些困难。粮食工作人员少，力量也比较单薄，正需要我们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我忙说：“我们要依靠党政领导，努力做好工作。也希望马专员今后多指导。”马锡五同志听了，笑着说：“你们是年青人，有干劲，不要怕困难，工作中的困难肯定是有的，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注意总结经验，事情总

是会办好的。”谈完话后，马锡五同志又特别嘱咐专署的粮食干部向我们介绍当时分区的粮食工作情况。

那时，正是边区粮食最困难的时期。陇东分区是全边区的主要产粮地区之一，不仅要供给分区各级机关、单位和驻军三八五旅的口粮，还要从华池、合水向延安调一部分粮食，供应中央机关。分区公仓粮食的来源，除了我们在集市上收购为数不多的一点和机关、部队开始自产的一点外，主要还是依靠征收救国公粮。那时候，由于抗战，党对地主的政策已经改为减租减息，但都要缴纳救国公粮。征收救国公粮的办法，基本上就是后来实行的农业统一累进税的征收办法，也就是土地越多、收入越多的农户，承担的公粮任务也就越大。这样，地富户每人负担的公粮自然要比贫苦农民户多出许多。我到这里工作时，正值一九四〇年度征粮入库大忙时节。为了掌握入库情况，我到庆阳县西川的十五里铺，东川的石家湾子和塬上的白马粮点帮助收了一个多月的公粮，同时了解了一下面上的入库情况。我发现入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贫苦农民应缴的公粮基本上都入库了，但地富户总是推拖不缴。由于地富户拖欠的公粮数量都较大，有的粮仓、粮点出现了入不敷出的情况，影响了部队的供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回专署专门向马锡五同志作了汇报。我说：“部队急需军粮，但大多数地富户一直拖欠不缴，真急死人！”马锡五同志听了我的汇报，笑着说：“怎么样，泄气了吧？不要泄气，泄气没有用，要想办法。”我说：“办法我们也想了，就是每天去催。但他们总是借故推拖，有时候连门都叫不开，叫开了门，还找不见当家人。”马锡五同志听了后，深思了一会儿说：“你们看能不能这样，对那些故意拖欠公粮、数量又较大的地主户，你们可以让部队来打粮的同志直接上门去装公粮，然后留个收据给他们，你们再凭收据补办手续。”听了马锡五同志给我们出的这个点子，我很高兴。汇报回来后，我们就选择庆阳城附近的一户故意

拖欠公粮的大地主，用这种办法试了一下，果然有效。这样一来，其他地主户也就不敢拖欠了，加快了我们的征粮进度。

我在陇东专署工作近两年时间。这期间，马锡五同志和我们机关干部经常在一起工作、学习和生活，在他身上所体现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优秀品质，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印象。

善于联系群众，忠诚地为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这是马锡五同志最突出的一个特点。马锡五同志在专署机关干部会议上，在我们汇报、讨论工作问题时，曾多次向我们讲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利益的道理。他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所以，我们脑子里要时常记住群众的疾苦，注意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关心群众的利益。如果忘记了群众，办事违背群众利益，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意义。”他不仅要求机关干部注意联系群众，他本身就是专署机关干部联系群众的模范。那几年，他除了经常到各县、区向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外，还常到庆阳县城附近找群众谈话。到附近去时，他常一个人随身带一件生产工具，到那里一边帮农民干活，一边聊天。这样，他在庆阳县城附近的西河湾、五里铺、崆山湾等处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农民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群众都愿意找他谈。我们机关的同志就经常看到一个个的农民群众来找马锡五同志，向他反映情况和问题，把他看作自己的知心朋友。时至今日，一提起“马专员”，这里的老年人还纷纷交口称赞。

马锡五同志对机关干部是非常关心爱护的。当时的陇东专署机关，干部不上百人，大多数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每天天麻亮，他就起床叫醒大家，带我们上早操、跑步，组织大家锻炼身体。他常对我们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这是革命的本钱。青年人要从早锻炼。不要以为现在身体好，将来身体不好了，要锻炼就迟了。”当时，边区经济很困难，我们机关的同志冬天都睡冷床。记得冬季有一天晚上，马锡五同志到我们四个人

住的一间宿舍来，问我们晚上睡觉冷不冷，我们都说不冷。他听后笑着说：“不冷？是不是晚上都当‘团长’呀！”大家都笑了。他又对我们说：“现在我们有困难，冬天睡不上热炕，是苦一些。革命就是一件艰苦的事。我们现在吃一点苦，就是为了将来更多的人不受苦。现在的苦，是为了将来的甜。”和我们谈了一会儿，临走时，马锡五同志还特别关照我们把麦草再铺厚点，大家听了心里觉得热呼呼的。一九四一年，边区银行陇东分行行长得了病，几个月时间过去了，还没治好。马锡五同志知道后，把这个同志的病常挂在心上，一有空就去探望。一天傍晚，马锡五同志叫我同他一块去看望这位同志，见病情没有好转，他很着急，回到专署机关马上派人去三八五旅请军医来诊治。

马锡五同志不仅善于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而且对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的任务、维护党的正确原则，都是非常坚决的。一九四三年初冬，我在合水县人民政府工作时，曾到新堡区南庄一带（现庆阳县南庄公社）搞了一段土地普查工作。这项工作基本结束后，我到新堡区政府去交谈普查情况，正好碰上了从延安开会回来的马锡五同志。我向马锡五同志汇报了普查工作情况后，又谈了自己在农村这一段的见闻。那时，整风运动已发展到农村了。由于康生大搞“抢救”运动，农村整风运动出现了一些偏向。我去过的有些村庄，仅所谓的“三青团”、“兰衣社”、“CC派”就搞出了几十个人，涉及的面很广，农村已有点人心不安了。听到这些情况，马锡五同志严肃地说：“整风是干什么的？是在干部中进行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这是总的目的。当然，对混进来的坏人也要清除，但这是极少数。农村整风，基本上也要以教育为主，对伪乡、镇长以上的人员，他们知道的要讲出来；但对下面的一般人员、一般农民，集中那么多干啥？涉及面广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都不利。凡是一般农民群众，都要放回去！”接着，马锡五同志又找来新

堡区委书记，要他对农村整风工作检查一遍，不要把那么多人搞起来，弄得草木皆兵。一般农民群众都要放回去。从新堡了解到农村整风中的这些情况以后，马锡五同志回专署没几天又到各县去检查整风情况。听说他到曲子县时，县城附近一个十口之家的农民家庭，就有五、六口人被搞成有问题的了。马锡五同志知道后生气地说：“你们这真是胡日鬼！那有一户人家有这么多有问题的？”当时，曲子县委、县政府搞了坦白运动，没有问题的干部只剩下三、四个人了。马锡五同志严肃、耐心地对领导运动的县长说：“你们在干部中搞了这么多人，都是坏人？现在好人只剩下三、四个人了。你这个县长能坐得住吗？这么多干部都成有问题的人了，你们今后还怎么开展工作呀？”马锡五同志批评后，曲子县对当时审查的干部进行了复查甄别，结果绝大多数干部都没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们在陇东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回忆起这段情况，大家都深深感到马锡五同志不仅对完成党的任务在态度和行动上坚决的，而且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能够坚持正确的原则，在维护党的正确原则上更是坚定不移的，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本色。

(三)

一九四三年三月，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同志兼任了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开始从事司法工作。在这期间，他亲自调查审理了陇东有名的“刘巧儿”婚姻案，创造了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被陇东人民赞誉为“马青天”。

“刘巧儿”婚姻案发生在一九四三年。陇东华池县温台区农民封彦贵，曾于一九二八年将女儿封芝琴（小名胖儿）许与张湾农民张金才次子张柏为妻。到一九四二年五月，封彦贵见女儿已长大，于是一面要求与张家解除婚约，一面又将胖儿以法币二千

四百元、硬币四十八元暗许城壕张宪芝之子为妻。此事被张金才得知告发，华池县政府判决撤销后一次婚约。到一九四三年二月，经他人介绍，胖儿与张柏见了面，胖儿即表示愿与张柏结婚。但同年三月，封彦贵又以法币八千元、硬币二十元、骡马四匹，将胖儿许与庆阳县新堡区朱寿昌为妻。张金才得悉后，即纠集二十多人，于三月十三日夜从封家把胖儿抢回与张柏成婚。封彦贵控告到县，县司法处未经周密调查，以“抢亲罪”判处张柏与胖儿婚姻无效、张金才徒刑六个月。这样的判决，封、张两家不服，附近群众也不满意。时值马锡五同志赴华池县巡视工作，封胖儿在路边拦路告了状。

马锡五同志受理此案后，他首先在区、乡干部和当地群众中调查了实际情况和舆论趋向，又派平时与胖儿接近的人与胖儿谈了话，再亲自征求胖儿的意见，胖儿表示：“死也要与张柏结婚。”基本掌握案情后，马锡五同志在县司法处同志的协助下举行了公开审理。马锡五同志除向有关人员审明全部案情及各自要求外，还征求了到场群众的意见。最后，陇东分庭重新判决如下：张柏与胖儿双方自愿结婚，其婚姻准予有效；张金才黑夜纠众抢亲，对地方治安及社会秩序妨碍极大，科处以徒刑，其他附合者，批评教育；封彦贵以女儿为财物，反复出售，科处劳役，以示警戒。这样的判决，入情入理，非常恰当，群众听后十分高兴。胜诉者胖儿、张柏更是皆大欢喜。就连受罚者，也表示接受判决，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后来，边区文艺工作者以此事为素材编写了鼓词《刘巧儿团圆》和剧本《刘巧儿告状》，以后又改编成评剧《刘巧儿》，全国解放后还拍成电影上映。

马锡五同志在兼任陇东分庭庭长期间，还调查审理了曲子县所谓苏发云三兄弟“谋财杀人案”，释放了错押的苏发云三兄弟，惩办了真正的杀人犯杜老五。以后，合水县五区六乡又有两起土地纠纷案，县判不服，上告分庭，马锡五同志派分庭推事石

金山同志深入实地调查，伴以调解，合理地处理了这两起土地纠纷案。从此，陇东人民便称颂马锡五同志为“马青天”。通过这几起案件的恰当审理，在边区的司法战线上形成了有名的“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它的特点：一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不轻信呈状，而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案情的全面的、具体的情况，分清是非，量罪定罪；二是在坚持法律原则的前提下，对一般民事案件进行合理的调解，把判决和调解结合起来；三是审判方法是座谈式而不是坐堂式的，诉讼手续简便易行，便于群众。“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形成，到一九四四年在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推广后，使解放区的司法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马锡五同志这时已成为解放区人民司法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一九四六年，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上，马锡五同志被选为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这年八月，我也从合水县调到边区高等法院书记处行政管理科工作。那时，边区高等法院设在延安南门外的白家沟，沟里面是监狱，监狱归高等法院领导。马锡五同志在高等法院工作很繁重，但他十分重视对罪犯的教育和改造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法院工作人员中有些同志对监犯教育不重视，在教育方法上也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马锡五同志在全院干部会议和管教人员会议上，多次讲了监犯的教育问题。他循循善诱地对我们说：“教育犯人首先要认识犯人，要认识到犯人也是人。既然是人，他能变坏成为犯人，也就有可能变好成为一个新人。坏人、犯罪的人，在他娘刚生下他的时候也并不是坏的，而是以后逐渐变坏的。所以，我们教育犯人的目的，就是通过下功夫做工作，促使他们改恶从善，变成一个新人。这就需要从政治上关心他们，教育和改造他们，在生活上注意他们的饮食和卫生。首先，是要把他们当人看待，不虐待，使他们有信心

变好。”在马锡五同志的领导下，高等法院的管教工作有了很大改进。法院经常组织犯人学习有关材料，认识形势，特别是帮助他们剖析各自犯罪的根源，组织他们讨论自己为什么会犯罪，从而促进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同时，法院还协助监狱改进了饮食和环境卫生。马锡五同志还常去监狱的号子里检查卫生状况，使监狱的卫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马锡五同志还提出：“犯人有两只手，可以组织他们参加生产，这样不仅可以在劳动中改造他们自己，还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按照马锡五同志的意见，法院还把一般犯人组织起来，在自家沟口的滩地上开了几十亩荒地，种上了各种菜蔬。还办起了豆腐坊、粉坊，喂了好多猪，并组织了二、三十名犯人纺线。马锡五同志一有空，也和法院工作人员一起参加生产。这样，法院不仅做到了菜和付食品基本自给，还通过生产促进了犯人的改造。在马锡五同志的领导下，由于法院采取了正确的管教方法，在监犯人大多数都得到了很有效的教育改造。后来，这些犯人在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后，基本上都能遵守法纪，很少有“二进宫”（重新犯法）的。

马锡五同志不仅自己模范地遵守和执行法纪，而且对破坏法纪的现象也是不容忍的。记得一九四一年秋季，当时驻在庆阳县城附近的一个大单位的管理员，到粮食仓库打粮的时候未拿手续，遭到拒付。于是，他就无理地把仓库员捆来专署找专员马锡五同志，要马锡五同志处罚这位仓库员。我当时恰好在马锡五同志的办公室，马锡五同志问明情况后，十分生气。他严肃地批评这位管理员说：“你这个人真是目无法纪！仓库员是组织派去的，他犯了什么法，你有什么权利随便捆人？你把他捆着送来，我不收！要送你就送到你们单位首长那里去！”这位管理员挨了批评，出门不远就把仓库员悄悄放开了。

(四)

全国解放后，马锡五同志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院长，并兼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一九五四年，马锡五同志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一九五九年，马锡五同志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这十多年中，马锡五同志虽然在大区和中央机关工作，但他仍然十分关心陕甘革命老区的工作。一九六一年九月，马锡五同志来陕、甘检查法院工作时，曾到庆阳县住了三天。那几年，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马锡五同志来庆阳时，我正好在庆阳县代理县委书记。马锡五同志一见到我就问：“这几年庆阳群众挨饿了吧？”我回答说：“就是。”马锡五同志心情沉重地说：“这是我们工作没做好。战争年代那么困难，这里都没有缺过粮。最近，党中央已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只要我们按照中央的方针努力工作，领导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这期间，马锡五同志在去环县时，还在环城北面的二十里沟口和群众一起劳动，收割了一下午糜子。临离开庆阳时，马锡五同志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离开陇东近二十年了，很想和老区人民在一块多待几天。”他还说：“我这次很有可能是辞路来了。你们还年青，要继续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这里是老区，你们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好作风坚持下来，发扬光大，扎扎实实地把老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好。”可是，真没有想到，马锡五同志对我的这番谈话竟成了永别之言！半年之后，一九六二年四月十日，为革命奋斗了三十多年的马锡五同志，在北京与世长辞了。

马锡五同志生前参加过组织陕甘边红色武装和创建陕甘宁苏

区的斗争，从事过近二十年的人民司法工作。马锡五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卓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党的高度评价和人民的爱戴。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多次亲切接见和表扬过马锡五同志，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还亲自参加了在北京嘉兴寺举行的马锡五同志公祭大会。马锡五同志逝世的第二天，敬爱的董必武同志沉痛挥毫，写下了高度评价马锡五同志革命一生的挽诗：

“昨日惊闻噩耗传，法官顿失一英贤，
民刑案理三千卷，风雨舟回十二年。
未及病床谈片语，只瞻遗体痛长眠，
边区惠爱人思念，道马青天不置焉。”

马锡五同志逝世已经十八年了。他如果能在九泉之下，看到我国逐步健全法制、大步迈向四化建设的今天，该有多么欣慰啊！

(李含福整理)

高健君同志在陇右地下党活动的片断

毛 得 功

高健君同志是甘肃榆中县人，1937年8月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政协主席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在林彪、“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的残酷迫害下，他不幸于1969年3月含冤逝世。

解放前夕，在从事陇右地下党革命活动中，在较长时间里我与高健君同志一起工作，他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的革命形象深深刻印在我的脑子里，令人永远怀念。

建立陇渭支部

甘南民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搜捕参加起义暴动的民众，三河一带（黄河、白龙江、洮河）一片白色恐怖。为了保存力量，我们陇渭地区参加甘南民变的部分同志，分散隐蔽起来，转入了地下活动。

一九四六年后半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业已拉开序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高健君（化名方刚）等同志到临洮、岷县一带找寻我们，以便取得联系，建立地下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迎接大西北的解放。他和牙含章（化名马尔沙）、万良才（化名杨重义）等同志几经周折，从岷县到渭源，先后找到了郭化如（甘南民变时我任团长，郭任副团长）、杨友柏（甘南民变时任营长）

等同志，从他们那里得知我从隆德回到了陇西，住在县城渭河北面顿家门马家大山一户姓顿的群众家里。于是，一九四七年正月的一天，高健君和牙含章、万良才、郭化如、杨友柏等同志，打扮成当地老百姓的样子，先后来到我住的马家大山顿自仁的家里。相互介绍以后，知道高健君同志是党组织派来和我们联系的，我非常高兴，表示热烈欢迎。高健君同志在这里住了四、五天。我们向高健君同志报告了甘南民变后的一些情况，高健君同志向我们介绍了陇东边区的情况，研究成立了中共陇渭支部。把我这个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我是在平凉由刘余生介绍入党的），并吸收郭化如、杨友柏同志为正式党员（因为有甘南民变的思想基础和现实表现）。高健君同志和大家商量，选郭化如同志任支部书记，高健君、万良才、牙含章、杨友柏和我为支部委员。支部进行了分工：高健君、郭化如包武山县，万良才和我包通渭县，牙含章、杨友柏包陇西、渭源、会川三县。主要任务：一是首先在参加甘南民变的人中逐步发展党员，有步骤地建立地下党组织；二是组织地下武装，夺取敌人武器，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与此同时，和开明士绅交朋友，开展统战工作。党支部成立后，我们把甘南民变中缴获的二十多支步枪、几支手枪、银元五、六百个，还有一些大烟、子弹等，都向组织上交了，作为开展地下斗争的武器和活动经费，并由万良才和杨友柏同志负责管理。从此，我们就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展活动了。

发展党的组织

高健君同志在发展陇右地下党工作中，是有很大贡献的。他认真执行党的组织路线，注意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陇右一带参加过甘南民变的人较多，这部分人对国民党蒋马匪帮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强烈不满，奋起反抗，后遭到镇压，因而他们对国民党

反动派有着深刻的仇恨，对共产党则是日夜盼望。我们首先在这一部分人中选择、发展党员，这就有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高健君同志帮助我们总结甘南民变的经验教训，说明没有党的领导，要取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要取得翻身解放也是不可能的。他用活生生的现实，对党员和发展对象进行思想教育。对于发展的党员，都要经过支部集体比较严格的审查：看他的思想坚定不坚定，对党忠诚不忠诚；并根据不同情况，确定预备期，有三个月的，有四个月的，也有半年的。少数历史比较复杂的预备期一年。在预备期内，对发展对象给他们交任务，了解国民党在当地的活动的情况，土豪劣绅的情况，有时吸收他们参加夺取敌人的武装等活动，进行考验。预备党员任务完成得好，表现好，就及时转为正式党员。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严格要求只发展纵的关系，不搞横的关系，新建支部一般不超过十人。当时还规定，参加过国民党军统、中统、CC、复兴社的人以及一贯道的点传师和坛主等五种人不能发展为共产党员。发展对象在入党前，必须向组织谈清本人历史上是否参加过反动组织，社会关系及家庭情况，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等，入党时要进行永不叛党的宣誓。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经过高健君同志和其他地下党负责人的艰苦努力，陇右地下党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党员质量也比较好。陇渭支部成立之后半年多时间，我们先后在武山、甘谷、通渭、陇西、漳县、渭源、会川、临洮、临夏等县，又新建立了数十个支部，党员发展到几百人。在这一时期，上级党组织还先后给陇右地下党派来了十多个干部帮助工作。如邓品珊同志派来后，打入蒋云台部队的骑兵中，任陇右地下党一个支部的书记，开展秘密工作。后来，在解放武山县时，这支骑兵部队全部起义，参加了王震同志率领的西进人民解放军。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一九四七年八月，中共甘肃

省工委批准在陇渭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陇右工委，由高健君同志任工委书记，万良才同志任副书记，郭化如同志任军事部长，毛得功同志任组织部长，杨友柏同志任组织部副部长。从此，陇右地下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入城市，由在农民中发展党员逐步转为在中学生、教员中发展党员。

组 织 地 下 武 装

高健君同志和地下党其他负责同志，帮助我们总结甘南民变抓枪杆子的经验，高健君同志引用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话说：“没有枪杆子，就不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他的启发鼓舞下，我们重新拿起武器，积极地组织地下武装，向蒋马匪帮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四七年六月，国民党一个连到漳县盐井镇抓兵，并住在那里。我们听到消息，进行了详细侦察，商量决定搞掉这个抓兵连，夺取他们的枪支。由郭化如同志带领各支部选定的一部分同志，化装成帮人收麦的“麦客子”，在逢集的一天进了盐井镇。选择好时机，乘敌不备，一举将抓兵连歼灭。这次战斗由于事前周密侦察，部署得力，打的非常干净利索，缴获敌人二十多支步枪，短枪两支，冲锋枪两支，子弹三千余发，打死了几名班长和士兵，活捉了全部连排长，还释放了数十名壮丁。事后，敌人连我们的一点线索也没找到。这次行动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影响很大，当时岷县专区的一个伪专员和漳县的伪县长都被撤了职。首战告捷，高健君同志很高兴。过了两个月，他和我一起到陇东边区西华池的二将川、刘家坪，向省工委和陇东分区汇报陇右地下党发展和武装斗争情况，省工委孙作宾，陇东分区张仲良等负责同志，表扬了陇右地下党的工作。

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陇右地下武装斗争有了很大发

展。我们先后在通渭、甘谷交界处的安远镇，陇西、武山交界处的四十里铺，临洮洮惠渠，榆中水家坡等地，进行了六次大的活动。在武山的一次活动中，缴了伪县长苏天民的枪。在陇西、渭源、武山等县，我们还打掉了几个民愤很大的国民党特务。到临解放时，陇右地下武装已拥有一百多支步枪，五十支手枪和两挺机枪。

一九四九年七月，解放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大西北挺进，盘踞在甘肃的蒋马匪帮望风逃窜。陇右工委根据上级指示，一方面发动党员组织游击队，阻击蒋马匪帮，一方面作陇西、渭源等县伪自卫队的工作，争取他们起义投诚。由于有了原来的工作基础，一开始，游击队就迅速组织了二百多人，后来发展到八九百人。当王震部队到达天水时，我们已经解放了渭源、陇西、武山、甘谷等四个县，建立了人民政权，为人民解放军顺利西进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开明绅士的支持

高健君同志在领导我们积极开展地下武装斗争的同时，还组织我们向比较开明的绅士作统战工作，和他们交朋友，争取他们对地下党活动的支持。当时，省工委根据陇右一带的形势，指示我们地下党先不要公开，公开了站不住脚，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让他们骂去，陇东边区离我们远，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不便支援，要靠我们自己筹集。一九四七年，我们靠甘南事变中余下的银元、大烟，还有夺取敌人枪支时得到的物资，开展活动。一九四八年，我们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加强对城镇绅士作工作，了解他们的情况，并通过他们了解国民党的情况，争取开明绅士对我们的支持。陇西县伪商务会长苟绍武，我们和他拉上关系后，对我们的活动比较同情，捐了一支步枪，

两支手枪和一些钱，还给我们反映他了解到的一些国民党员的情况。

他是优秀共产党员

高健君同志在开展陇右地下党的工作中，我亲身感到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热爱我们的党，热爱人民群众，热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热爱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陇右地下党工作期间，他经常给我们讲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的光辉思想和优良作风，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他常说，“只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我们就一定能取得胜利”，使我们深受教育和鼓舞。

高健君同志对党的事业非常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自觉遵守党的纪律，事事带头，严格要求自己。为了陇右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他不避艰险，不怕困难，爬山涉水，埋头苦干，工作中从来不叫苦。他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处事谨慎。他待人态度和蔼诚恳，不爱多说话，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让人，批评错误很严肃。他很注意团结同志，有了事情互相商量，互相尊重，反对背后互相议论，说长道短，要求大家团结得象亲兄弟一样。

高健君同志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他廉洁奉公，生活俭朴。我和他到陇东边区向省工委汇报工作时，组织上发现他穿的衣服很破旧，要给他发件新的，他坚持不要。从边区汇报回来，一个同志宰了只鸡，热情地招待我们。高健君同志见了后说，“群众生活这样苦，我们不能特殊了。”打土豪取得的钱财，他从来不私自多占多用，还帮助我们订立了使用制度，带头执行。逢年过节，他见我们谁家有困难，就建议给予补助，可他从来不提自己的困难。他对吃的住的方面也很不讲究，要求和大家一样，有什么吃什么，有炒面吃炒面，有酸浆水就吃酸浆水。住的

地方只要可靠保密，那怕是看园子的小土房也毫不在乎。一次，高健君同志到兰州雷滩河口秘密联系找人谈话，结果联系人因故没去，他就在靠山的一个防空洞里住了一夜，这一夜差点把他冻僵，第二天太阳出来后，他才能慢慢走出来。

高健君同志被迫害致死了，他在陇右地下党工作的功绩和他的优秀品德是永存的。

英雄虎胆斗顽敌 鲜血浇灌自由花

——回忆郭化如同志

杨友柏

郭化如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甘肃陇右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发展、壮大党在陇右地区的革命力量，为甘肃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战斗的一生，他的英雄业绩是永垂不朽的！

疾邪恶举旗闹革命

郭化如同志于一九一〇年出生在甘肃武山县郭家庄的一个中农家庭，小时读了几年私塾，后在家以务农为生，农闲时赶着毛驴兼搞一点短途运输，以补济生活。在旧社会，由于“三座大山”的压榨，尽管郭化如同志整天辛勤劳动，但家境仍日趋贫困。一九三三年，他不得不进入旧军队另谋生路。他曾任过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间，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甘肃，播下了革命火种，也提高了他对革命、对红军的认识。他想：为什么红军官兵一律平等，而国民党军队当官的却随便打骂士兵？为什么红军不杀害、虐待俘虏，而国民党军队却与之相反？为什么共产党爱穷人，而国民党却压榨、欺侮穷苦百姓？经过对一系列问题的对比认识，使他从

心底产生了对旧军队、旧世界的厌恶、憎恨，极度渴望新世界的到来。一九四〇年，他巧妙地搞到敌人的一支手枪，不久就离开了旧军队。同年八、九月间，在宁定县（今广河县）趁黑夜又夺得了敌人接兵部队的一支驳壳枪。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和杨友柏、祁耀贤、谢益三、贾永寿、常淡娃、贾重虎、常玉山等八人，在陇（西）渭（源）之间的居义乡（今渭源县路园公社）以结拜弟兄为名，搞了个以反对国民党为目的的小组织。通过这个组织，帮助教育附近一带的青年秘密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不给国民党当壮丁。为了便于活动，联系群众，郭化如同志在渭源县居义乡双轮磨村开办了一个砖瓦厂，以烧砖瓦为掩护，对来往的群众和朋友进行秘密串联活动，聚集革命力量。一九四二年冬季，临洮一带的部分农民，在王仲甲的领导下，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抗拒抓壮丁的农民运动。郭化如和毛荣三（即毛得功）等同志看到点燃革命烈火的时机已成熟，于是，组织群众，积极准备响应。化如同志多次亲自找王仲甲联系，最后终于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找到了王仲甲，共同商定了在陇西、渭源地区组织农民暴动计划。此后，一九四三年二月，在陇渭之间的渭河流域，一支农民暴动队伍组织起来了。这支队伍即为甘南民变组织中的第二路第二团，由毛荣三任团长、郭化如任副团长。起义部队得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活动于临洮、渭源、陇西、岷县、漳县、武山、武都等地区。

以王仲甲为领导的这次声势浩大的十万武装的农民运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惊恐。斗争坚持了一年之久，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群众缺乏武器弹药，加之组织涣散，领导缺乏经验，遂于一九四三年失败。

在暴动失利的情况下，郭化如、毛荣三等同志决定，埋藏留下的枪支转入地下活动，同时积极寻找党组织。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为了寻找进边区的线索，郭化如和毛荣三同志曾

几次分头到过陕西的耀县、甘肃的平凉等地，但因种种原因而未如愿。一九四六年冬，党组织派高健君等同志到临洮、陇西、岷县、渭源一带寻找当年甘南民变的骨干成员，开展革命活动，郭化如同志才找到了日夜盼望的党。后来，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一九四七年二月成立了陇渭支部，一九四七年八月成立了陇右工委，郭化如同志担任工委委员、军事部长。

郭化如同志身材魁梧，性格沉着，少言寡语。夏天，穿一双草鞋，身着粗布衣衫，或披宽大的白羊毛褥子外衣；冬天，头戴羊毛编织的棉帽，腰系一条粗布带，完全是一身脚户打扮。郭化如同志有胆有识，英勇斗争。在陇右地下斗争中，凡是危险性大的任务，他总是争着承担。有时当同志们在争着完成某项任务相持不下时，他总是站出来说：“不要争了，我去最合适。”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条件下，他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积极完成党所分配的任务；在对敌斗争中身先士卒，行动果敢，充分显示了领导武装斗争的卓越才能。

盐井镇智歼接兵连

一九四七年古历五月，我们得知漳县盐井镇驻有敌接收壮丁的一个连队，约四十余人，全带有仿24式新步枪。党支部会议研究决定夺取敌人的这批武器，装备我游击队，事前的侦察任务交给郭化如同志完成。化如同志接受任务后，和我装扮成做生意的小商人，挑着担子以卖茶叶、水烟、大麻等物为掩护，前往盐井镇进行侦察。

这个接兵连住在盐井镇背街一个地主的大院内。院内有东西对称的两座厢房，大门口有一堵八字屏风墙；门外有高高的台

阶，门内一侧有一座小楼，在院外很难详细观察到内情。为了掌握敌人的全部情况，必须想尽一切办法进入院内作实地侦察。逢巧，这时正赶上端午节。这一天，郭化如同志挑了一担刚上市的新鲜水萝卜，来到盐井镇敌人住地去卖。他边走，一边喊叫：“卖水萝卜！”行至敌人所住的门口附近，他将肩上的担子缓缓搁在地上，转眼工夫，对面走来两个敌军官，一面问价，一面就拿起水萝卜吃了起来。此时，站在大门口的另一个伪军官向他招手，要把萝卜担进院子去。化如同志不由得喜在心头，但他仍毫不露声色，慢慢挑起沉重的担子，稳步朝院内走去。他走进庭院，顺手将担子放下，在和敌人协商价格的同时，化如用敏锐的目光观察东西厢房敌人驻扎的情况和墙壁上倒挂着的崭新枪支。不多时，又从后院走来一个身穿破旧军衣、满身油泥的人，郭化如同志一眼便看出他是个伙夫。为了进一步查明后院情况，他心生一计，顺手拿起两个水萝卜说：“班长，吃个水萝卜吧。”那伙夫一边接过萝卜，一边说：“我没有零钱呀！”“不要紧，自家种的嘛！”接着又向那人说：“班长，有水没有？给我喝口。”那伙夫笑嘻嘻地说：“有的是。你跟我来！”化如撇下担子，紧跟伙夫来到了伙房，他眼盯着锅台，取了一个碗从水桶里舀了满满一碗水，边喝边探问道：“你们吃饭的人多，这么大的锅呀！”那个没头脑的家伙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一个班去陇西了，这里现有二十七、八个人。”又说：“还有五十五个壮丁哩！全住在西边大房子里。”郭化如同志听完后转身走出伙房，又到院内把东西厢房的情况重新观察了一遍，将全部情况一一记在心上。等他回到前院，半担萝卜早已不见了。虽说只收了几毛钱，但这担萝卜的“利”还是够大的了。

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后，化如和我将情况详细向陇右工委作了汇报，经工委研究，确定趁盐井镇逢集的机会，由郭化如同志负责，从各支部抽调精干地下游击队员三十余人，执行夺枪任务。

化如同志根据工委的决定，向参与夺枪斗争的队员传达了工委指示，作了动员，他说：“我们这次要化装成商人，分组出发，完成任务后集中隐蔽而归，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战斗要沉着勇敢，以勇猛迅速的行动杀伤敌人，严防错伤壮丁。”动员后，将队员编成三个战斗小组，每组十二人，一组由郭化如任组长，二组由我任组长，三组由夏尚忠任组长。动员会后，郭化如同志又召集组长，作了具体的行动部署：以组长脱下草帽为行动信号；二、三组到达目的地后住街上小店，一组到目的地后不进街，到街西口附近的田野地边分散待命；行动开始时间为下午六时，行动前组长在街西口接头。此外，并对行动时集合的道路以及完成任务后转移的路线都一一作了详尽的安排。

经过充分的准备，一天晚上，游击队员们有的挑着担子，有的背着背篓，陆续向盐井镇走去。一路上游击队员们风尘仆仆，火速行军八十里，第二天下午二时许，各组先后到达该镇。赶集的群众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市场上显得十分热闹。

游击队员到达盐井镇后，按部署进行活动。郭化如同志和我同去敌人住地观察了一下情况，发现敌人门口设有持枪哨兵，附近的敌情也没有大的变化。我回到小店安排好队员的休息，然后走上街去，这时大约已是下午四点多钟。在街上忽然听赶集的群众传说，今天有部队由陇西要来盐井。对此紧急情况，我找到郭化如和夏尚忠进行了分析研究。当时化如果断地说：“提前下手！抓紧时间搞掉这部分敌人。”我们一致同意化如同志的意见。于是在指定的地点分头集合各组队员，开始行动。

敌人住在背街，一般行人不多，因此游击队只得分散向那里行进。郭化如同志头戴一顶破旧草帽，肩上搭着一条麻袋，我身挑一付担子，同郭化如同志一同前进。到了敌人住地门口，郭化如同志看到时机已到，便甩掉草帽和肩上的麻袋，一个箭步窜上了台阶，一把抓住敌哨兵肩上的步枪，喊了一声“缴枪不杀！”

敌哨兵企图负隅顽抗，郭化如同志迅速从腰中摸出手枪，结束了他的狗命。当化如对付门卫哨兵的这一瞬间，三十多位游击队员个个猛虎般地跃入院内，冲入东西厢房，和敢于顽抗的敌人展开厮杀。接着，郭化如同志又飞快地跳上那座小楼，用枪紧紧压住楼上的四个伪军官，那些饭桶只好乖乖地缴出了房内的所有枪支弹药。这次夺枪战斗，只用了不到一小时时间就结束了，共击毙敌人三个，击伤一人，缴获长短枪二十一支，子弹三千余发。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带领壮丁迅速离开盐井镇向南山撤退，郭化如同志带一组队员作后卫掩护。不多时大家就登上了山坡。

盐井镇北的漳河对岸就是漳县县城。城内住着敌自卫队两个中队，约三百余人。他们在听见游击队的枪声后，乱做一团，仓皇失措，紧闭城门不敢出来。游击队上山后，他们才站在城墙上观望。游击队到了半山腰，选好地形，布置警戒，稍事休息。下午八时左右，郭化如同志召集壮丁讲话，鼓励他们同保甲长作斗争，不要给国民党当炮灰，讲话后让其各自回家。有的壮丁恳切要求加入游击队，不想回家，化如同志向他们讲清了道理，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夜幕降临，山间显得格外幽静，游击健儿在夜色的掩护下，向陇渭地区运动。

盐井镇的开敌斗争，陇右工委领导同志感到十分满意，对郭化如同志和参加的游击队员给予了表扬。

水家坡巧夺敌伪枪

在盐井镇开敌后的第二年秋天，即一九四八年八、九月间，陇右工委指示郭化如和游击队员龙德海，去榆中水家坡侦察国民党铁路护警和当地乡公所武装。化如同志接受任务后装扮成麦客子，连日兼程来到目的地，经过详细调查，很快掌握了敌人住宿、武器装备等情况。工委根据侦察到的情况，又部署了一次夺

取敌伪武器的行动；决定抽调精明能干的游击队员三十多名，分为两组，携带短枪，由郭化如和毛荣三、肖焕章等同志率领，连用三个夜晚隐蔽行军，赶路二百四十余里抵达水家坡。

游击队员到达水家坡后，按预定计划，一组由郭化如和我率领，隐蔽在该镇下街口庙内，夺取铁路护警武装；二组由毛荣三、肖焕章率领，隐蔽在上街口附近一座瓦窑内，夺取伪乡公所武装。两组派人联络，待天亮后以脱帽摇摆为信号开始行动。

拂晓，铁路护警队撤了房顶上的哨兵，又把哨设在门口，敞开了大门。这时化如同志指示通信员贾福堂通知二组开始行动，并命令一组队员出发。敌人设在门口的哨兵，身穿破大衣，肩上挎着步枪，双手插在衣袖里，没精打采地来回走动。郭化如同志闪电般地靠近敌哨兵，举起他结实、有力的大手，朝敌人颈部猛击一拳，打翻在地，迅速将枪缴获到手。霎时间，游击队员们手持短枪闯入敌人住房，化如同志大喊一声：“不准动！缴枪不杀！”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惊慌失措，那挂在墙上的枪支，他们连摸也没顾得上摸，就被我们全部缴获了。游击队员徐振武打趣地说：“嗨！你们睡得挺美，枪我们全部带走了，再不留收条！”我和高健君同志攻进另一个院子，这个院子是敌人的指挥部，全住着带“长”字的家伙，我们一冲进去，就死死压住了熟睡的敌人，活捉了段长，缴获了他的护身手枪。与此同时，毛荣三和肖焕章带领的二组同志们，同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了伪乡公所。

水家坡这次的夺枪斗争只用了半个小时，在军事部长郭化如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胜利，计打死敌人二个，打伤一人，缴获长短枪二十二支、子弹一千余发，除此而外，还焚烧了伪乡公所的全部文书档案。战斗的枪声和焚烧档案的火光冲天，霎时招来了许多的观众，他们有的看热闹，有的探听消息。郭化如同志审时度势，毅然出现在群众之中，他站在伪乡公所的门口，向

直场的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号召乡亲们联合起来抗兵抗粮，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听了化如同志简短的宣传，周围的基本群众暗自拍手称快。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翘着拇指低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宣传结束，游击队携带缴获的枪支弹药迅速撤退。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向西面马衔山方向行走了二十里，天黑后即调转方向连夜向东南的渭源方向行进。次日，临洮、定西、榆中等县的敌人慌忙赶到水家坡，一部分敌人追到马衔山区，甚至追到临洮、洮沙一带，当然只能是徒劳一场。

四十铺缴获滑竿队

一九四七年，上级党组织提出，为了搞好地下党的通讯联络，需要搞到一部电台，任务交陇右工委完成。工委决定把调查和夺取电台的任务交给郭化如同志。郭化如同志了解情况后，得知武山县所属的鸳鸯镇住着国民党修陇海铁路的测绘队机关，设有一部电台。后来郭化如同志又打扮成农民模样，三次到鸳鸯镇，将敌人架设电台的地方、机关人数以及枪支弹药、住宿房舍和粮棚等，又一一作了详细的调查。九月下旬，陇右工委决定立即行动，夺取敌人的电台，抽调游击队员25名，携带短枪，编为三个战斗小组，化装为小商贩，由郭化如、毛荣三、马福昌分别负责带领前往。当游击队行至陇西、武山交界处的鸭儿峡，突然遇到十多名敌伪警察，以全副武装护送着八付滑竿，其中除一付滑竿上躺着一个象肥猪似的胖家伙外，其他七付都抬着用黄油布裹着的东西。这些护警和滑竿从游击队员身边走过，向西而去。敌人过后，郭化如和毛荣三、马福昌共同分析了敌情，估计所抬的可能是伪币。当时，地下党的经费正发生困难，遂决定改变行动计划，先夺取这股敌人的武器和伪币，然后再夺敌人的电台。经过大伙商议，由郭化如同志挑选五名队员，作为突击组尾追敌

人，其他队员由毛荣三、马福昌同志带领，鱼贯跟随前进。到了下午二时许，郭化如同志带领的突击队追至陇西东四十里铺东街口。此时敌人刚进中街，在座北向南的一家小店休息，店内主人正在忙碌招待这批来客，店门口站着两个带枪的卫兵。郭化如和突击队员马俊民首先靠近这家小店，趁敌不备掏出手枪，对准那门卫“叭叭”地打了几枪，敌门卫应声倒地。接着，郭化如同志一个箭步跃入店内，随手又是两枪，又是两个敌人命丧黄泉，这时全部游击队员都进入店内，敌兵个个心惊胆战，面如土色，乖乖举手缴械投降，只有一个顽固的家伙死不缴枪，与我游击队员常玉山扭抱在一起就地翻滚。化如同志眼明手快，举枪对准顽敌头部一枪，立刻结束了顽抗者的狗命。经过二十多分钟，战斗胜利地结束了。毙敌4人，伤敌3人，缴获长枪8支、短枪1支、子弹900多发。郭化如同志命令游击队员很快收拾缴获的武器弹药，让差夫抬着滑竿跟随游击队员淌过渭河，上了北山。进入山区后，作了短暂休息。打开滑竿上的包裹，全是铁路路警用的衣物，没有伪币。化如同志对抬滑竿的苦力工人作了宣传解释工作，让各自回家，对所获衣物作了处理，游击队员携带缴获的武器，继续向深山行进，隐蔽撤退到了安全地区。

陇西城斩除“猪骨头”

这件事还是陇右工委成立以前的事了。

陇西有一个国民党职业便衣特务队长，此人姓朱，是全县有名的大坏蛋，群众愤恨地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猪骨头”。“猪骨头”凶狠毒辣，无恶不作，有的无辜良民被他陷害入狱，有的穷苦百姓被他搞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1943年至1946年期间，“猪骨头”受其主子之命，到处密布罗网，疯狂追捕参加过农民暴动的领导人毛荣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郭化如同志很早就想

除掉这个坏蛋，但只知其名，并未见过这个人。

事情说来也凑巧，一九四五年冬季的一天，郭化如同志由武山去陇西的途中，到了陇西东四十里铺，进一小店休息，只见那炕上躺着一个面色焦黑、有气无力的人。他面前放着的小炕桌上，摆满了店主人送来的浓茶、鸡蛋、煎油饼和高级香烟。那家伙苦皱着眉头一声不吭，一个劲地吸着烟。郭化如同志对那人睨视了一眼，认定他不是个好人，就随便坐在门口的长凳上，一边喝茶，一边继续观察动静。一会儿，店主人又忙着给那人续茶，并且显得十分殷勤地说：“朱队长，快吃吧！鸡蛋和油饼都快要凉了。”那家伙仍旧躺在那儿随口“嗯！”了一声，又继续抽着烟。郭化如同志一听店主称他为“朱队长”，暗自思索：莫非此人就是那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猪骨头”？为了弄个明白，他端起茶碗上前搭讪说：“先生，请喝茶！”那坏蛋象死猪般地仍旧卧着，只是应了声“我有。”郭化如同志佯装若无其事，就近坐了下来喝茶。稍停片刻，那个坏蛋有气无力地问郭化如：“你是哪里人啊？干什么的？到哪里去？”郭化如同志神态自若地回答说：“甘谷县人，脚户，驮短脚去陇西的，牲口前边赶走了”。那坏蛋听了郭化如同志的回答，懒洋洋地坐了起来，端起茶碗，边喝边说：“好吧！喝了咱们一块走。”待那人吃喝完毕，两人一同上了路。一路上，郭化如同志迈着稳健的步子向前行走，那人不时地翻着射眼瞅着他。化如同志心想：此人到底是谁？随即问道：“先生你在啥地方干事情？”“哦！我在陇西县政府干事情。”

“你老家是哪里人？”化如又问。

“我是陇西人，家住城里西街。”那人回答后，接着又说：“你们下苦人，走这一路要小心，提防碰上了毛荣三！”

郭化如同志听了不由得一喜，觉得狐狸开始露出尾巴了，于是反问他：“毛荣三是做啥的人？”

“是横行乡里的造反头子呀！他手下的人可多得很。”

“那对我们下苦人没关系？”

“哼！你的毛驴他也拉哩！”

“我的毛驴还没一个瘦猪大，他是看不上的。”郭化如微笑着回答。

两人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地拉呱，不觉得同行十五华里路程，随后就分头走了。这一路，郭化如同志将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打量得一清二楚，连他的猪窝（家）都弄了个明白。后经调查证实，他正是“猪骨头”。

到了这年年底，毛荣三同志从平凉回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要我们设法除掉敌特邹凤生。经毛荣三、郭化如和我三人商议，议定在1946年正月十五晚上，趁群众闹社火的机会进城，分头斩除邹凤生和“猪骨头”两个特务。经分工，收拾“猪骨头”的任务由郭化如同志负责。

春节期间，郭化如同志在陇渭山区隐蔽，过了个愉快的春节。到了正月十三日晚，他带领谢益三、李牙才二同志由渭源山区来到陇西城北十华里处的顿清杰同志的家里，在正月十四日和十五日化装进城，对城内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得知在十六日晚上城郊有十二家社火要进城在伪县政府演出。郭化如同谢、李二同志商量，决定在正月十六日晚上趁耍社火的机会执行除害任务。十五日下午，三人隐蔽在城关北门附近一个姓梁的家里，当晚混在一家社火人群中进了城，对“猪骨头”办公的地点、住宿的院宅都进行了最后的一次侦察。一切准备就绪。次日晚上，郭化如、谢益三、李牙才三人准备好武器，压足子弹，随同玩社火的群众一直到了伪县政府的大院内。这时，有八、九家社火队汇聚一起，有五、六个伪县府的办事人员忙于接待，但不见“猪骨头”露面。郭化如三人绕场寻找，终不见面，于是直奔西街住地。到门口后，郭化如同志安排谢益三跟他入院，由李牙才在门口观察

敌情。郭、谢进入院内，听见“猪骨头”和他的妻子正在吵架，化如大声问道：“老朱在家吗？”“猪骨头”听见院子里有人问话，顺声应道：“谁呀！”并揭开门帘伸出头来朝外观看。在此当儿，化如和益三手持二把盒子，已站在“猪骨头”面前。化如说：“朱队长，认得我吗？”“猪骨头”一看如此局面，不由得直打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化如同志继续义正词严地说道：

“‘猪骨头’，你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穷苦人，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今天，我代表人民和受害的群众来惩办你”。随着枪声，“猪骨头”的脑袋开了花，血浆四溅。屋里的那个女人，顿时跪下求饶。谢益三对那女人说：“与你无干！不用害怕，今后应该找个好人去谋生。”说完化如同志带领谢、李二人就及时撤走了。当时陇西各城门均有敌人哨兵把守，然而郭化如等三同志却以悠然无事的神态，大摇大摆地出了陇西城北门向渭源山区转移了。

当夜伪县政府得知特务队长“猪骨头”被人打死，惊悉万状，乱如麻团，慌慌张张地关闭了城门，宣布戒严。顿时，大街小巷密布岗哨，四处搜捕，玩社火的群众都成了搜查对象，直到次日下午才搜查完毕。整整十八个小时未开城门，但是，敌人连一个带枪的人都没有找到，群众说：“真是天降的神兵，为民除害。”

马力坡诛灭害人虫

武山县有个叫宋虎臣的人，曾是国民党便衣特务，后来在县自卫队当了班长。此人经常残害百姓，谋算他人，干了不少坏事，群众一提起他，无不切齿痛恨。他是伪政权的一条凶恶的看门狗，到处抓人，苛榨百姓，很得主子的赏识。一九四一年春季，宋虎臣伙同武山县洛门镇的大流氓康俊康，捏造罪名诬陷毛荣三同志。伪法院竟将毛荣三同志逮捕入狱。此后，宋虎臣还搜

捕我地下工作人员车来保、徐振武同志。一九四八年春季，郭化如同志率领我地下游击队，在武山西乡三旦河一带活动。不料被坏人向伪政府告密，宋虎臣带自卫队赶来追捕。郭化如同志考虑到游击队所住群众家里的安全，在宋虎臣一伙进村前一小时就主动撤退了。

鉴于宋虎臣死心踏地为反动派效劳的种种罪行，除掉这个害人虫已势在必行。郭化如同志及时地向工委提出了这一问题，经工委研究决定予以斩除。一天，郭化如同志再次带领游击小分队来到西乡马力坡进行活动，住在地下党员赵西武同志家中。游击队有意暴露目标，诱惑敌人自投罗网。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宋虎臣又带两个班，仓皇赶来。这条害人虫，一到马力坡就张牙舞爪地要乡公所“查报匪情”，但他们气势汹汹地忙乱了一阵后并无结果。次日夜晚，宋虎臣又偷偷摸摸地窜到马力坡街北头一华里外的桥头家里鬼混。他俩已鬼混多年，恶习成性，女的亦常给敌人通风报信，颇有民愤。这天晚上十点左右，郭化如同志得知宋虎臣的去向，立即派游击队员在主要街道、路口监视敌人动静，独自一人前往宋虎臣那个桥头家执行任务。郭化如进入院内，透过窗户悄悄看到，宋虎臣正躺在大烟灯旁，那个女人躺在对面给他烧大烟，两个坏蛋眉来眼去，又说又笑，不知谈论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事。此时，郭化如同志突然闯入房内，一步跃上炕台，厉声问道：“宋虎臣！你这次干什么来了？你要寻找的就是我，你能干什么！今天，我代表受害的老百姓来惩办你这个大坏蛋！”郭化如同志铿锵的言词，吓得宋虎臣摆着屁股直打哆嗦，连连叩头求饶，霎时间枪声响起，这只害人虫即一命呜呼去见阎王了。

诛灭了宋虎臣，郭化如同志即带领小分队按计划安全转移了。住在马力坡街上的敌人，听见枪声乱作一团。宋虎臣被打死后，两个班的人员连夜逃遁了。此后，这一部分敌人再也不敢轻

易来侵扰我游击队了。

为人民献身求解放

郭化如同志在入党时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必要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党的事业。”化如同志在革命的征途上，把自己的誓言变为实际行动。陇右党的同志们经常活动在渭河上游，涉渡渭水极为频繁。无论是盛夏河水暴涨，或严冬冰寒刺骨，许多次当同志们需要淌过渭河时，郭化如同志总是一马当先跳下水去，把同志们一个个背过河去。一九四八年，敌人多次对我地下党员进行搜捕，同志们的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在此困难的时刻，郭化如同志把工委领导人和同志们的安全常挂心头，并采取了周密细致的保卫措施。一九四八年十月水家坡夺枪后，敌人搜捕异常紧张，郭化如同志亲自保护着高建君和万良才等同志，一夜转移了三个地方，弄得敌人到处扑空，毫无办法。

郭化如同志在地下斗争期间，总是如饥似渴地努力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学习方法上，他善于把革命的理论 and 斗争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革命的理论指导现实的革命斗争。一九四一年，我在会川找到了武进波同志从延安“抗大”秘密带来的一本毛主席论游击战术的油印小册子，郭化如同志看到后真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反复学习，认真领会精神实质。他在陇右工委担任军事部长期间，常用毛主席的军事理论指导游击队的活动，屡次运用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速战速决的战术，狠狠地打击敌人，使敌人在游击队面前显得软弱无能，疲于奔命。由于他在斗争中领导得力，沉着勇敢，并能身先士卒，所以取得了对敌斗争的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郭化如同志自从一九四一年参加农民革命运动起，经常活动

在渭河流域的上游、崑山南麓的漳县、岷县、陇西、渭源、甘谷、临洮、康乐等地区，他在斗争中一心想着革命，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艰难险阻面前，临危不惧，视死如归。1949年春夏之际，化如同志率领游击队活动在漳县、陇西和武山交界的华岭山区，四月十一日与敌遭遇，战斗异常激烈，相持八小时之久。因敌众我寡，加之地形对我非常不利，在敌人众兵逼近的情况下，化如同志仍然镇定自若。为了同志们安全，这时，他向侯三同志说：“你带全体队员迅速转移，我来掩护！”面对这种情况，侯三同志怎能忍心离去呢？正在迟疑的时候，化如同志接着说，“这是命令，立即执行！”侯三同志只好带领队员转移。在游击队转移过程中，郭化如同志真不愧是虎胆英雄，他猛烈地阻击敌人，使敌人始终不敢靠近阵地前沿。然而，就在这激烈的战斗中，郭化如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为党的事业，为甘肃人民的自由、解放他洒尽了最后一滴鲜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陇右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党员、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人们无不为之悲恸、默哀。

郭化如同志在我党陇右地下斗争中，一贯保持和发扬我党的优良作风，他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勇于承担重担，克服困难，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大公无私，他的英雄形象和高贵品质，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扶眉战役中的罗局截击战

高锦纯 刘懋功 左 爱 姚知一

解放战争时期，扶眉战役是西北野战军向大西北进军的首要战役，罗局截击战是这一战役的关键性的战斗。这一战役的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胡宗南军队在西安地区的主力被我军歼灭，“蒋家王朝”在这个地区的政权被我摧垮，二马（马步芳、马鸿逵）的反动势力陷于孤立境地，从而使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为迅速解放兰州，加速解放大西北的作战步伐创造了有利条件。扶眉战役的罗局镇截击战，是二兵团第四军打的，是一个重要的胜利战斗，这个胜利是彭德怀司令员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在他亲自部署，英明指挥下取得的，也是我军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的结果；当然，与兵团、军党委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也是分不开的。今天回忆起罗局截击战时，当年我军英勇作战的情景，仍历历在目。特别是彭总对扶眉战役精心运筹、英明指挥的形象，仍在我们脑际萦回，使人十分感念！

（一）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部（下简称胡军）已被我西北野战军打得难以招架，不得不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撤出西安，退居凤翔、宝鸡、

五丈原地区，妄图在川、陕、甘边地带阻挡我军向西南进军。但是这一打算却使二马盘踞的陇东、陇南暴露在我军的威胁之下，因此二马向蒋介石连连叫苦不迭。当时正是我二、四野战军南下，我十八、十九兵团尚未离晋西渡黄河入陕之际，蒋介石认为有机可乘，命令胡宗南同二马联合作战，重据西安，控制关中，迟滞我军解放大西北，并东出河南牵制我二、四野战军南下。当时，伪陕西省政府人员已由汉中返回宝鸡南的益门镇，随时准备随军接收西安。这样，胡宗南原来的计划被打乱了，他虽然不满，但又不得不应付蒋介石的命令，勉强照顾二马的面子。因此，在胡马各怀鬼胎和二马同床异梦的情况下，他们勉强达成协议：胡宗南出四个军沿陇海线推进，二马各出两个军沿西兰公路推进，先夺咸阳，后取西安。

五月中旬，胡宗南的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由裴昌会指挥出动了伪十八兵团的三个军（即三十八军、九十军、六十五军），还有宝鸡指挥所直接指挥的一一九军和两个骑兵团，共约九万余人，分别由渭水两侧向武功、扶风、眉县、周至之线推进。

马继援的陇南兵团出动两个军（即八十二军和一二九军）、马鸿逵的陇东兵团出动两个军（即十一军和一二八军），先后沿西兰公路向乾县、礼泉推进。七月初，马步芳的骑八旅直扑咸阳时，被我十八兵团先头部队当头一棒打回去以后，马家军队就龟缩水寿、崔木镇地区。这时，一一九军见势不妙，立即由兴平的马嵬坡退回武功、扶风地区。胡、马相互形成犄角之势，表面上虎视眈眈，气势汹汹，实际上是虚张声势，随时准备逃跑。

我们第四军三个师（十、十一、十二师）在兵团建制内，于七月初完成掩护十八、十九兵团西渡黄河集结任务后，根据西北野战军总部（下简称总部）咸阳作战会议精神和兵团指示，把部队由泾阳推进到礼泉城西和城南乡村，隐蔽待命。在待命中，指战员们对面前的两大敌人，先打哪个，后打哪个？还是双管齐下？纷纷

议论和猜测，尤其来自陕甘宁边区的子弟兵，盼望先打马军的思想非常强烈，因为马军对边区人民为害最深，群众对他们的仇恨也最大，所以我军指战员要求复仇之心最切。但是，总部的作战意图却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不是“先打马军，后打胡军”，而是“错马打胡，先胡后马”，兵团部给我们四军的任务是：首先攻占益店镇，尔后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切断陇海路，阻击敌人向宝鸡撤退，以便配合主力歼敌于渭水以北地区。为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就对干部和战士首先进行先打胡军的思想动员，通过动员和讨论，使大家领会了总部的作战意图，认识到先打胡军，后打二马，“错马打胡”是个具有英明远见的战役方针。当时我十八、十九兵团参战，西北野战军已处优势，对胡、马两军，无论从哪一个下手，考虑的中心问题，不是能不能吃掉他们，而是能不能抓住他们。如果先打二马，那就要先对付敌人的优势骑兵部队，而在永寿、崔木镇一带开阔地带是很难猎住他们的，即使得手也没什么油水；相反，如果先打胡军就比较容易猎获，而且油水也多。这样就可先吃肥肉，后啃骨头，不然，就可能是抓住芝麻，丢掉西瓜。我军对这个英明远见的战役意图的领会，又进一步对执行截击作战任务的重要性加深了理解。这对胜利完成截击战斗任务，保证战役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

(二)

在战役开始的前夕，我军待命出发的部队，满怀激情地等待着命令。没过几天，驻在礼泉县言村的兵团部通知我们去开会，我们准时参加了兵团首长许光达、王世泰主持的军事会议，会上，我们知道了这次战役的作战计划是：我十九兵团附骑二旅推进到仪井镇、乾县至口头镇之线，对付二马敌军，保证主力部队右侧的安全；我十八兵团附一兵团七军，除两个师守备西安外，主力沿咸

(阳) 风(翔) 公路和陇海铁路向武功、杏林镇、午井镇敌军进攻；我一兵团(欠七军)由户县沿渭水南岸向周至、眉县敌军进攻，策应渭水北岸我军作战，尔后进占益门镇，断宝鸡敌军南逃退路；我二兵团的三军向扶风敌军进攻，六军进攻青化镇以南之敌军，四军夺取罗局镇，堵住敌人退路。根据战斗命令，我们四军必须于七月十一日夜晚接近敌人，十二日拂晓以主力攻占益店镇，夺取罗局镇，攻占眉县车站，迎头堵住敌人，以期配合主力部队全部歼灭胡宗南的部队。怎样完成这个战斗任务呢？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迎头截住敌人，二是如何堵住敌人的退路。这两步能否完成，是决定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反复考虑如果截不住敌人，敌人逃掉，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要想迎头截住敌人，就得在仲夏昼长夜短的情况下，一夜完成一百四十华里急行军任务。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能是提前出发，争取时间，否则就不能按期到达指定地点而贻误战机。但是，解决这个矛盾又会出现另一个矛盾，就是大部队白昼行军同隐蔽行动的矛盾。这个难题又促使我们动脑筋、想办法，提出派警戒部队封锁岔路口的办法。这个意见被兵团首长批准后，我们返回部队给各师下达作战任务和开展政治动员工作。我军主攻部队以十一师为第一梯队，十师为第二梯队，从礼泉城西和城南出发，采用两条平行路线齐头并进，经临平北侧、天渡镇，经过法门寺(寺内、寺南有敌骑活动)，又经青化镇向益店镇、罗局镇攻击前进，得手后即插断陇海路占领眉县车站。十二师在主攻部队右翼取道并肩前进，保证主力部队右侧安全，待主力向敌展开进攻时，以一部分部队向岐山方向之敌警戒，其余为军的预备队。

掌握战机，时间观念非常重要，我军在预定出发时间前，已完成了战斗动员和行军准备。十一日下午四时准时出发，三个师各自沿着自己预定路线，在群众的引导下前进。部队一出发就是

急行军的速度。连队指挥员按照道路情况，随时变换队形，时走时跑，千方百计争取时间向前赶。当太阳还挂在西方天边的时候，我们回头观察后续部队跟进的情况，只见飞扬的尘土伴随着漫长的队伍，一眼望不见尽头，浩浩荡荡奔向战场。入夜，新月下只能看见近处的人影，战友们“刷刷”的脚步声就成为唯一的联络讯号，大家自觉地跟上队伍。当十师三十团先头部队到益店镇附近时，抓到敌人一个游动哨兵，从他口中得知镇内守敌情况和敌人使用的口令，我们从镇子西侧顺利通过。当十一师三十一团先头营从益店镇东边通过时，突然被寨中守敌发现，我前卫营连队指挥员非常机警，没有采取强攻，而是设法智取，他们冒充敌军，骗使敌人相信而打开寨门迎接，我军一拥而入，未响一枪就迫使敌人一个连缴械。随后，我占领益店镇的连队，又未耗一弹就俘获了路经益店的敌人一个新兵连。在此之前，十二师在越过漆水河时，又消灭了敌军骑兵侦察队。我军在接敌运动中消灭了敌人的警戒部队和侦察部队，使敌人失去了耳目，难以判断我军行动，这对保证我军顺利行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

益店镇是我军通往预定作战地区的门户。七月十二日三时，这个门户被我们打开后，我军就有了用武之地，就可以在广阔的正面展开兵力进行机动作战。这时，十师鉴于十一师因处置益店敌情暂停前进的情况，同时又计算距铁路线的距离还有四十多华里，离天亮仅有三个小时，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他们未拘于二梯队的任务和位置，果断地一往直前，主动同十一师共同担负了一梯队的任务。十师主力以罗局镇为目标，命令二十八团从主力右侧取道以眉县车站为目标。十一师看到十师直奔罗局镇，就从十师左翼以小寨为目标，三支部队齐头并进，两个主力师并肩作战。走

在十师最前面的一支轻装部队，象离弦的利箭一样朝着目标飞去，这就是负有“尖刀”任务的三十团前卫营和十师指挥所人员，这一措施对及时查明敌情和地形，掌握战斗主动权起了很好的作用。当十师部队急驰赶路时，在前进路上又遇到了一道较大的障碍，刚发洪水的沔河拦住了部队，战士们来不及寻找桥梁就涉水强渡，由于水深、浪急、岸陡，大家用绑带结成长练斜横两岸，然后手挽手拉着长练渡过沔河。花了不少力气才克服了这一障碍，但也给部队带来了好处，好象在沙漠里遇到了甘泉，大家可以痛饮一顿，即使污浊的河水，也感到分外香甜。因为在关中平原的盛夏天气坐在家里都会汗流浹背，可以想见长途行军的战士身上，要失去多少水分需要补充啊！战士们口干舌燥，唇裂喉痛，浑身无力，这时补充水分就成为第一需要啦。在黎明前，经过一夜的急行军使大家极度疲劳，当向罗局镇壕上行进爬坡时，两腿象灌了铅似的沉重，睡意阵阵催人寻梦，指挥员虽然不断发出“跟上！跟上！”的口令，然而大家多么盼望能就地休息一会，恢复一下体力呵！

突然从罗局镇方向传来了枪声，这是我们先头部队同敌方警戒部队打响了。枪声顿时驱散了人们的睡意和疲劳，战士们精神抖擞，准备迎接战斗。这时天已蒙蒙亮，视界开阔，十师先头营刚爬上坡就同北营村敌警戒部队遭遇，敌人还没有弄清情况，就被我军一个冲锋击溃。当我军追击到南堡子壕边时，又发现敌六十五军前卫部队沿铁路两侧撤退，十师三个团的三个先头营就立即主动向敌人先后发起冲锋，从壕边三处地段扑向川里，分别朝敌军行军纵队的头部、腰部、尾部一齐猛击，如洪卷沙，势不可挡，一小时的激战就全歼退却的敌人前卫团，俘虏一千三百余人。这时，十一师也向小寨敌三十八军侧卫部队进攻，十二师除一个团归十师指挥向蔡家坡、魏镇方向警戒，保障主攻部队右翼安全外，其余隐蔽在康家沟军指挥所附近待命。我军七月十二日

拂晓突然在罗马、眉县车站等地出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敌六十五军撤退的前卫团。敌人晕头转向，根本没有预料到我军如此神速地出现在他们的后方，截断了他们逃往宝鸡的退路，因而惊慌失措，不得不缩回于家堡、李家堰等地区。我军乘机调整部署，构筑工事，准备阻击敌六十五军、三十八军突围逃窜。十师控制的地段正是陇海路西安至宝鸡段的咽喉部分，这里北倚高原，南临渭水，横宽一千二百多米，师主力部队控制堰边的南堡子、高家、刘家堰等高地，在川里以一个营占领眉县车站，另一个营坚守车站以东的一座铁路桥梁。十师在这里构成纵深配备。我军一个师堵在这里，敌人插翅也难飞过。

当我军完成第一步截击任务，部队正要松了一口气的时候，总部接到我军截断陇海路、占领眉县车站的捷报，立即向全军人员发来贺勉电令，鼓励我军再战再捷。军首长也及时对十师表彰鼓励，同时又强调完成第二步阻击战的重要性，并提出“不让一个敌人通过”的战斗口号。十师抓住这个机会，立即向部队传达并作新的动员，激励全体指战员信心更足、决心更大地完成阻击任务。有些连队还表示同阵地共存亡、寸步不让的决心。但是，敌人这时也开始向我军拼命反扑，妄图冲出一条退路逃走，他们象汹涌恶浪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向我十师阵地冲击，而我军一次又一次地击退敌人。敌军每冲击一次都在我军阵地前面留下不少尸体。就这样我与敌激战终日，共击退敌军九次进攻，其中最凶险的一次是在当天下午三时左右，敌六十五军集中炮火和大量兵力向我三十团三营所在的堰边高地进攻，同时又向我二十九团坚守铁路桥梁的二营进攻，企图孤注一掷，打开逃窜的缺口。我军指战员深知，如果让敌人逃走，我们就会前功尽弃。在战斗紧急的情况下，三十团使用了预备队，甚至师政委也组织了警卫、通讯人员共同去支援连队。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十一师三十一团奉军部命令及时赶到，在十师统一指挥下，他们从三营左侧向敌人

侧背出击，配合十师三十团同敌军经过一场恶战，终于击退敌人。这时，在渭河南岸的敌九十军和逃来的两个骑兵团，只是隔岸观火，不敢北渡支援，最后狼狈逃往宝鸡的益门镇。当战斗进行到下午六时左右，由于我六军对敌三十八军痛击，一兵团沿渭水南岸打了上来，从正面进攻的十八兵团枪炮声也越来越近，敌军这时才放弃了从我军阵地突围的妄想，而纷纷涉渭河逃命。在我军两门山炮火力的猛烈拦击下，敌军伤亡惨重，河边尸体枕藉，河中尸体纵横漂流，敌军中开始出现混乱。这时，我军十师、十一师乘机发起总攻，配合六军、二军等兄弟部队将敌人压在渭河北岸一举歼灭。渭水逃往南岸的敌人，象一群群的落水鸡，又一个个的当了俘虏。战斗至晚八时左右结束，我军共俘敌军五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物资。整个战役中，胡宗南的四个军大部被歼，共歼四万四千余人，其中俘敌三万一千余人。

在这次阻击战中，三十团三营和二十九团二营的阵地首当其冲，敌人冲击最凶，两个营打得最坚决，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了阻击任务，西北野战军总部根据军的报告，分别授予这两个营以“英雄营”的光荣称号。他们出色的战绩，在这个光荣称号面前是当之无愧的！

罗局战斗接近胜利时，十二师按照军的命令，分两路向宝鸡进发。一个团当日占领蔡家坡，主力部队当日占领岐山县城，次日占领凤翔城（两城敌人在我军接近时已闻风逃跑），十二师于十四日二时左右就解放了宝鸡市。由于我十二师进军神速，敌人仓促应战，又仓惶逃跑，宝鸡、虢镇、蔡家坡等地工厂和铁路均免于破坏，只是敌人撤退时炸毁了渭河桥，天亮后我军通过渭河便桥渡河追击敌人，后来二军又接着追击，残敌退逃至秦岭以南，从此，秦岭以北广大关中地区再无敌军的踪迹了。这次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兰州，继而向青、宁、新进军揭开了序幕。

在扶眉战役结束后，我军向凤翔陈村镇地区集结，彭总去宝

鸡途中，特意到公路边三十团宿营地看望战士们，表扬了他们在罗局战斗中顽强机智的战斗作风，同时又号召大家立新功。后来，三十团没有辜负彭总的希望，在兰州战役中又立了功，荣获总部“能攻能守的英雄团”的光荣称号。

今天，我们在进行“四化”建设的时候，回忆罗局战役，缅怀为人民立下战功而却遭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彭总，默念在扶眉战场牺牲的烈士们，我们就要不惜自己的一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这就是我们对扶眉战役烈士们的纪念和告慰。

（附记：这个材料在整理前，曾走访了原四军主要领导人张仲良同志、原十师负责人张午同志、十一师负责人张伯达同志、二十九团负责人王荣等同志。）

（1980年6月脱稿）

一个难忘的冬春

沈 甸 之

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期躲在峨嵋山上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蒋介石，却很快下山来“摘桃子”，夺取人民胜利果实。他除了亲自调动、指挥几百万军队对我东北、华北、华东老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之外，同时对我华中、华南新根据地也以重兵进攻。一九四六年一月至六月，我中原解放军就被国民党以三十多万大军重重围困在大别山西部地区。我军六万多人被五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在东西长不到二百里、南北宽只有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长期缺吃少穿，无医无药，甚至连盐都吃不上，指战员的体质和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蒋介石预定在六月二十六日对我发动总攻，妄图把我军一举就地歼灭。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中原局作出了我军除留一部在当地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主力全部分几路向不同方向作主动战略转移的英明决定。六月二十六日，敌人的进攻刚开始，我军各部就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并分别于六月三十日晚和七月一日上午顺利突出敌人重围。原预订留在该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的部队，也迅速地转到外线作战，避开了敌人的重重合围。至此，国民党武汉行营六月二十六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吹嘘的“未来二十四小时内将发生惊人奇迹”的牛皮，已完全成了泡影。

下边是在我军突出敌人重围后，从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七年五月，我在鄂西北武当山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中所经历的主要情况。

在群众中深深扎根

当时我所在的一纵二旅五团，是作为纵队的后围部队，于七月一日上午突破敌人“钢铁封锁线”的。敌人在平汉铁路沿线用碉堡、战壕、装甲列车、飞机构筑了这条封锁线，妄图阻止我军突围。当我们摆脱敌人的追堵，从房县、兴山以西地区向东折转到保康地区时，已是寒风萧瑟的晚秋了。

十月四日下午，纵队参谋长张才干同志在保康县金斗乡的一个山村里召集二旅各团领导干部开会，传达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即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三个月总结》。这个党内重要指示，详细地总结了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全国内战爆发以来三个月战争的一系列经验，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今后的作战方针和任务，指出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克服一个时期的困难之后必然能取得胜利的光辉前景。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全部正规军，一共一百九十几个旅。“过去三个月内，已被我军歼灭二十五个旅。”“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任务，是再歼灭敌军的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蒋军的进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复失地。”并说，“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继续过去三个月歼敌二十五个旅的伟大战绩，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这时张参谋长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向我们说：“毛主席在这里还表扬了我们哩！”毛主席说：“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已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这些都极大地援助了和正在继续援助着老解放区的作战，”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张参谋长还传达了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同志的指示，说，“毛主席命令我军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再歼灭敌军二十五个旅，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也就是说再有一百天左右的时间，到明年春

暖花开的时候，全国的形势就会大不一样了，我们这里的情况也就好转了。我们一定要克服困难，顽强作战，钳制更多的敌人，继续援助老解放区打更多更大的胜仗，歼灭更多的敌人。”王司令员的这段讲话，更增添了全体指战员的必胜信心。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接受了带一个连和部分地方干部单独活动，在保康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在我接受上述任务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就来到一个叫庙子堰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是保康县的黄化乡、永峰乡交界的地方。两乡相互毗邻，它的南面是山峦重叠，郁郁葱葱的千家老林，北边有一条由保康到南漳的大马路把两乡连接起来，中间有一条岷峪河由西向东，注入龙潭河，经南漳东入襄江。这里形势险要，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部队在山堰口处稍休息了一会，看完了地形，布好了警戒之后，就进入附近一户姓姜的家里住下。房东一家人并不害怕我们，而且还很热情地接待和照顾我们，附近的群众，闻讯后也主动来看望我们，向我们问寒问暖，特别是有一位叫姜纯德的，对我们更加亲近。开始我对这种情景感到有些纳闷。我想：这里是我军从未到过的新区，群众也都是初次见到我们，可是为什么会在他们中间出现如此情况呢？后来通过同他们的亲切交谈，我才知道：在十年以前，贺龙同志所领导的第二方面军长征时曾路过这个地方，而姜纯德本人也就是在长征中负伤掉队的红军干部。姜纯德同志是本地人，他的家就在庙子堰附近。他对当地的情况非常了解，当他知道我们将要在这里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游击根据地的决定之后，表示十分高兴，并向我们提供了很多对后来工作很有参考价值的情况和意见。除此之外，他们还向我讲了很多在群众中广为传颂的、有关我军在突围后的行军路上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护群众、保护群众利益的生动事迹。同时也异常愤怒地向我们控诉了在我军后边进行追击的国民党军队奸

裡糟掠，无恶不作的种种罪行。他们都称赞我军是“真正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骂国民党军队是地地道道的“官匪”。这些情况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它是我军在行军路上所播下的种子生长出的可喜的幼苗，也是我们在这里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于是，我们就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抓紧敌人还没有调转头来对付我们这些分散活动部队的大好时机，积极开展工作，使这些可喜的幼苗在群众中深深扎根、成长壮大和开花结果。当时，我们主要是抓了一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广泛开展宣传工作，向各阶层群众宣传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揭露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在胜利后重建家园的迫切愿望，一意孤行，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说明我党在国内争取和平民主的根本方针和政策；表示我军在这个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同人民一起反对内战，实行民主改革的坚强决心，并以严格执行纪律，爱护群众利益的实际行动，使群众进一步认识我军真正是人民的军队。二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永峰乡乡长张逸仙和当地在野派头目万书筠以及保甲长、红带大爷等上层人物站在我军方面，力争早日建立民主自治政权，团结群众，同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三是向地主、富农和富商们募捐土布、棉花和征收少量商业税，解决部队的冬衣和零用钱问题。

为了做好对张逸仙、万书筠的争取工作，我曾和他们多次接触和谈判。和张逸仙的第一次谈判，是在我们到达永峰乡后的第二天晚上。当天下午，我带部队来到他家住下，家里的人都没有逃避，只有他一个人躲到别处去了。我就给他写信，晓以大义，约他出来见面。下午他回信表示，愿在当天晚上，在他的一个佃户家里和我会见。这一次接触的结果是成功的。我除向他讲了我党我军的主张、政策，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揭露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罪行，表明我们在这里建立游击根据地，反对内战，实行民主改革的决心之外，还向他提出了以下三条：一、乡

公所不得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报告有关我军活动的情报，不得建立监督我军行动的情报组织；二、我军要吃饭，要向较富裕的农户借用粮食，乡公所不得以任何借口进行干涉阻挠；三、冬天快到了，战士们身上还只有一套破旧不堪的单衣，我军要向地主、富农和富商们募捐为战士解决寒衣的棉花和布匹，乡公所不得进行阻挠和破坏。他对以上三条都一一表示同意，并称赞我军“真正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对他提出的一些疑虑和问题，我也一一向他作了耐心解释和答复。后来又经我和孔晓春同志同他多次谈判，他终于表示同意我们在水峰乡建立民主自治政府的主张，并推荐由他的大儿子出任副乡长。十月二十一日，他又主动交出了原乡公所的枪支、印信和档案材料。这时万书筠也表示愿意参加民主自治乡政府和担任副乡长职务，于是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民主自治政府便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下午在有各保保长、保国民代表和部分当地群众参加的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由孔晓春同志担任乡长。在这次大会上，我们宣讲了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宣布除每保征收四十石包谷作为公粮分散储存在群众家里之外，其余一切苛捐杂税一律免除。会后还出了布告，以便使广大群众都知道已有了自己的民主自治政府。人民群众也确实是把这个政府看成是自己的政府，有不少群众纷纷到这个政府告状，申诉他们长期积压在心底的冤屈。孔晓春同志也经常带领武工队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帮助群众解决了不少多年没有解决的诉讼案件，深得群众赞许。大部分保甲长、红帮大爷也都站到我军一边，特别是白风坪的白振武保长，更是始终如一地和我们站在一起。在敌军大兵压境，对我们进行疯狂“清乡”、“扫荡”时，他虽也派代表出去应付敌人，但他本人却始终不和敌人见面。在水峰乡的影响之下，黄化乡的民主自治政府也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宣告成立，由李浩同志担任乡长。和这两个乡相邻近的南漳县的长坪、明阳、歇马、马良、板桥等乡，虽未成立

民主自治政府，但那里的大部分保长、甲长也都能积极帮助我们办事。所以当敌军主力于一九四六年底前后又从房县、兴山一带调转头来对待我们时，我们已在这里有了一个不大的游击根据地了。

为了解决部队的棉衣问题，我们共向三十多户征募对象发出了请他们为战士捐赠寒衣的信件。除向他们讲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揭露蒋介石的罪行之外，还讲了我军战士所需解决寒衣的急迫性，信中还有诗：“秋风起兮恨衣单，入夜更深倍觉寒。壮士虽负不屈志，岂能敌得凛冽天！”这封信的收效很好，凡是收到信件的家户都有捐献，少的是三两匹，多的十匹、八匹，一般都超过了我们所提的数目，最多的一户达到三十多匹。结果不仅解决了近百人的棉衣问题，而且棉被、鞋袜，也得到了解决。为了解决部队的零用菜金问题，我们还派人在各通商路口设了税卡，征收过路商业税，由于我们的税率低，态度好，商人们还比较乐意输捐。在部队的吃饭、穿衣和用钱问题解决之后，战士们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就更少了，即使是有个别战士违犯纪律，无偿地用了群众的油盐、蔬菜和打草鞋的麻绳之类的东西，我们也有钱按价赔偿了。这样我们和群众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在群众中的根子也越来越扎得深了。后来敌人重兵压境，对我们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清剿”、“扫荡”，但是他们要想把这个根子拔掉，是万万不可能了。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

毛主席说：“军队必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又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毛主席的这段

话，是从我军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这些真理又在我们的这段斗争实践中得到再次证实。

在一九四七年一月末的一天夜里，我们从千家老林大山北边悬崖脚下的孙家砭出发，去袭击敌军设在曾家湾后山上的一个军士哨，主要是想消灭这个班，缴获一些子弹。因为当时我们的子弹太少了，每支步枪只有三至五发子弹，每挺轻机枪的子弹还不足五十发。可是当我们来到距敌人驻地只有四里路的地方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敌人已在黄昏前离开该地回保康县城去了。这时我们只好顺原路往回走，天亮时来到一个叫莲花瓣的山头周围的几户老乡家里休息。我住的那家房东姓邹，在房后的山头上放了两名哨兵。可是我们却万万没有想到，驻扎在距我们原来住地孙家砭约三十五里的歇马河的敌人却会连夜来奔袭我们。敌人在孙家砭扑了个空，又沿着我们出发的路线跟踪来了。由于我们的哨兵麻痹失职，敌人已来到我住房跟前。当时，我仍在和房东邹大爷一家人谈家常。可是胆怯的敌人并没有敢堵我住的房门，而只是在房后大声喊叫：“弟兄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打！”几挺机枪同时打响了。我连忙起身右手提枪，左手拿着大衣向外走。刚到左边屋角，就碰到两个敌人：一个端着闪闪发光的刺刀高喊：“缴枪不杀！”另一个正在更换机枪弹夹。我飞速上前一脚把敌人机枪踢翻之后，转身就向后跑，敌人打了一枪没有打着。在我一纵身跳到高约四、五米的崖坎下边去之后，敌人又一个手榴弹扔在我身边爆炸，但没有把我炸伤，只是气浪把帽子吹到下边树丛上去了，我爬起身来跑了几步抓住帽子向头上一戴继续往山下跑去。我的警卫员小刘同志在我的后边被俘，我的望远镜和文件包也挂在墙上未来得及带出。在我们摆脱敌人连续多天的跟踪追击之后，有一天晚上我们又在离莲花瓣只有四里路的一个小村子里住下，我的老房东邹大爷得知后就连夜前来看我。我们这次相会，虽然只是第二次见面，但相互间的感情，却如同生死

与共的战友，心情都十分激动。我含着满眶热泪问他一家受惊受害的情况，他老泪纵横地向我哭诉了我的战友们牺牲被俘情况。后边他又讲到关于我的望远镜的事。他说：“你的一件宝物，在你们军队里叫千里眼的，还没有丢，没有被‘国军’们搜去，是我的儿媳妇在‘国军’进屋搜查时，从墙上把它取下来塞进抱孩子的怀里藏起来的。后来她怕搜身，又把它扔到床底下，‘国军’问她扔的是何时，她说是小孩的鞋子，他们就没有再到床下搜查。这样才好不容易把它保住了”。他又接着说：“我知道它对你们很有用处，我本想把它给你带来，可是我怕在路上遇到坏人，没有敢带。你什么时候得空时到我家去一趟，我把它给你拿出来”。四天之后，我第二次来到他家，他们一家人对我非常热情，并很快地把望远镜取了出来还我。我说：“我太感谢你们一家人对我们的爱护了，可是没有别的东西来报答你们”。这时我从身上取出我当时仅有的一个大头银元，接着说：“我身上只有这样一件东西了，就用它留给你们的这个小孙女作个纪念吧！”我双手把它递给邹老太太。老人家满怀激情地说：“看你已是廿七、八岁的人了！成年累月地为老百姓受苦受累，现在还没有成家。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让我这个孙女儿给你作个干女儿吧！”我说：“那可太好了！”并随即把小女孩从她奶奶膝前拉过来搂在怀里，房里的人也都约而同地笑了起来。这时邹老太太又指着我的双脚说：“看你的脚都破成这个样子了！我已经打好了格襪，想叫儿媳妇给你做双鞋子，可是不知道你的脚大小。今天你把脚底样留下，过上十天八天，你就来拿吧！”后来我们转移到别的战场作战，没有来得及再去看望他们，鞋子也没有拿到，可是他们一家人对我们的深情厚意，却使我永世难忘。

在这次受敌袭击之后，跟随我跑出的只有一个排，另两个排在连干部的带领下跑到另一个方向去了。敌人也分作两路，对我们进行跟踪追击。后来知道，我们的这两个排，在当天晚上冒雪来

到千家老林大山里的冯甲长家里，他把他们送到山林深处的一户老乡家里荫蔽休息，他刚回到家，追击的敌兵也来到他的家里。因为这时我们的部队所留下的脚印已被新雪湮没，敌人已失掉了追击的踪迹，再加上山陡路滑，天气又冷，士兵已累得疲惫不堪，不想继续追击了。机警的冯甲长就乘机把敌兵迎进家去，为他们生火取暖。他借上山取柴的机会，把我军留下的脚印完全消除干净。随后他又打着灯笼，到处大声呼喊：“对面张家！你们看到新四军了没有呀！要看到了赶快来我家向国军报告！”用这样的办法，把敌情告诉了我们在山上隐蔽的同志，要他们快快转移。这样敌人也就越发无法继续追击了。

国民党总是把它自己的军队称为“国军”，而把我们的军队叫做“共匪”，可是在群众的眼睛中，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群众总是把我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把国民党军队看作地地道道的盗匪，是残害人民的野兽。武当山地区的群众，都管老虎叫“老巴子”，而这时他们就用这一称呼来作为对国民党军队的代称。在敌人进行“清乡”、“扫荡”时，群众为了掩护我们和使他们自己免受敌人突如其来的袭击，就在各个重要山头 and 要道路口设立监视哨，在发现敌人时，就彼此之间一问一答地大声问喊：“噢！”“哎！”“老巴子来了！”“到哪了？”“到×××了！”就这样一山传一山、一站传一站地很快传遍了整个地区，群众就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躲避，我们也可以随时了解敌军情况和考虑决定我们的行动计划。

敌人在其所惯用的跟踪追击、远程奔袭、分路合围、清乡搜查、放火烧山等办法完全失败之后，一九四七年四月，又想起了一个新的花招，就是以重赏诱人上钩。他们声称，谁要能活捉到我，赏大洋五千元，谁要是能把我打死，把人头交去，赏大洋三千元。但是敌人的利诱却丝毫动摇不了群众对我们的一片丹心。群众不仅不肯加害于我们，而且还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护我们，使

我们化危为安，转败为胜。一九四七年五月六日凌晨三点多钟，我刚吃过早饭正要准备出发，哨兵向我报告说：“有一个老乡非要亲自见你不可！”我就让哨兵请他进来。他一见到我，就一把拉住我的手问：“大队长！你认识我吧？”他这一下可把我问愣住了，我虽和群众接触很多，认识不少人，可是我怎么能记得住那么多呢？因而我只好回答说：“好象是见过面，但我记不清楚了。”他说：“我可认识你呀！你给我们讲过话。我姓张，是龟坪的。”他又问道：“你说我是来干什么的？”我看他腰扎麻绳，还斜插一把砍柴刀。因而说：“你不是去砍柴吗？”他说：“不是！我是来给‘国军’当探子来的，乡长带‘国军’一个连从后边包抄你们，乡队副带六十多人，已到了龟坪，离这里只有三里路。他叫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还在。你们要快些离开这里。”我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说：“我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你快回去报告，就说我们昨晚是住在这里，今天早晨刚走。他要问向什么方向走的？你就说是向东北方向走了。”我把他送走之后，就带部队立即出发，向东北方走了一段之后，左转弯下山到对面大山上去了，使敌人扑了一个空。第二天拂晓，我们就把住在龟坪的明阳乡乡保队副队长带的六十多人团团围在一个小四合院里。因为在这六十多人中，其中四十多人是被敌人强迫来为他们助威壮胆的群众。经我们喊话之后，这些人就带着长矛、大刀、土枪、棍棒等从敌群里分化了出来。接着，带枪的乡保队员也陆续交械投降。只剩下一个姓张的乡队副躲在楼上不肯下来。这时，我就派一个战士在楼下生火熏烟。同时我警告那个乡队副说：“你下来不下来？如还不下来投降，我就把你烧死在里边！”这时他才推开窗子把手枪扔了出来，并下楼投降了。据很多群众告发，这个家伙是一条地头蛇。他原来是个保长，因为反共有功，被敌人提拔为乡保队副。这个家伙曾在一天之内杀害我们六位同志。他采用的办法是：把我们的同志捆在一条大长凳上，先以皮鞭毒打，然后把大

木杠子插在腰下，向下猛撬，硬把脑袋拔掉后再把尸体扔到无底的山涧里去。我们为了替被害同志报仇，为当地群众除害，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判他的死刑，就地执行。这样做后，群众拍手称快。群众之所以能够真心实意地拥护我们，除了我们能和他们打成一片，使他们把我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之外，他们还对我们寄以更大的希望。在千家老林的西垭地方，住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姓王的老人。因为他是红帮老大，又有一点学问，待人也比较厚道，很受附近群众的尊重，所以人们都称呼他“王大爷”。有一天，他让乡长孔晓春同志代他向我问好，并约我抽空到他家里坐坐，意思就是要和我在一块谈谈家常。我也答应要去看他，可是一直没有去成。有一天早晨天刚亮，我们冒雨行军路过他家门口时，我想顺便去看看他。经我扣门之后，从门缝里露出老人的面孔。我问：“你就是王大爷吧？我姓沈！你托孔乡长给我带的口信他已告诉了我。我也早就想来看看你老人家，可是一直没有得空。今天我们经过这里，想顺便来看看你。”可是这位老人仍紧紧地抓住门不肯打开。他含着眼泪说：“大队长，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也早想请你得空到我家来坐坐，咱们好好在一块叙叙家常。可是今天不行啊！因为国军有一连人就住在山下刘保长家里，离这儿只有二里多路。他们为了逼刘保长交出你们的人，昨晚把他吊起来整整打了一夜，在我们这里都能听得到呀！我今天实在对不起你们呀！因为如果他们知道了，我们一家人就会没命了。”我问：“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走了？你老人家能去看看吗？”他点头表示同意，还把门打开迎我们进去，并立即让儿媳为我们准备早饭，随后他就带我们的一位侦察员下山去了。当他们回来时，我们已吃过早饭。并得知敌人仍住在山下刘保长家里。临走向他握手告别时，他捉了一只大白母鸡递给我。我接过后说：“王大爷！你的心意我们领了，可是这鸡我绝不能收”，随即把鸡放跑了。这时他的儿媳又拿过来十个煮熟的鸡

蛋和一个用包谷面做的大饼，要他老人转交给我。我说：“这个我可以收下！王大爷，我实在太感谢你们一家人对我的帮助了。”这时，他老人家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泪流满面地对我说，古人云：“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得民心则得天下”呀！你们是得民心的呀！我们老百姓的心都是向着你们的呀！将来天下一一定是你们的呀！可是，现在你们太苦了，听说你们的大军已经到河南了，你们要快些派人去和他们联系呀！大军来了，你们就不再遭这个孽了。我们老百姓也有出头之日了！我们在等着你们呀！”老人的这些贵如金石的语言和滴滴热泪，使我的心象海潮一样激荡起来。但是，我还是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以颤抖的声音回答老人：“王大爷！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和希望！在革命胜利之后，我一定要再来看望你老人家！”我们离开他家已经走得很远了，可是他仍在蒙蒙的细雨中朝着我们的背影瞭望了很久很久！

一个团结战斗的坚强堡垒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我们队伍内部的坚强团结，就是我们在鄂西北保康、南漳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中能够战胜强敌，克服种种困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我们这支不大的队伍，真可称得上是一个上下一致、齐心协力、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顽强不屈的战斗集体，是领导当地数十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战斗的一个坚强的堡垒。

我们的这个战斗集体，开始是由一个步兵连、团部的一部分同志和几位地方干部同志组成，大约近百人。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康家山战斗之后，这个连被纵队副司令员刘昌义同志带走了。因为我和当地群众的关系比较密切，情况也比较熟悉，所以他仍叫我带少数人继续在该地坚持斗争。不久，我们团的团长江贤玉

同志带的部队也来这里和我们会合，我们两个带的人加在一起，共有四十二人，可是敌人专门用来对付我们这些人的兵力，已达三个正规团、两个县保安大队和几个乡保队，甚至保康县的县长也亲自出战，配合敌正规军对我们进行“清乡”、“扫荡”。因此，二月中至五月初，是我们在这个地区斗争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敌人不仅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城镇驻兵，而且在我们活动的地区里，也安上了许多钉子，如同是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时期，日本人安在我们根据地内部的据点一样。敌军早出晚归，每天把部队撤开，逐山逐沟地进行“清剿”、“搜捕”。他们认为哪里可疑，就向那里打枪打炮和进行讹诈狂叫：“我已经看见你了，你还不出来！”叫罢之后，又是一阵枪炮，如此反复多次之后，才又转向别的地方如法炮制。如他们发现那个山林里曾有我们隐蔽时留下的痕迹，就放火把它烧掉。如发现那个老乡家里住过我们的部队就要杀人烧房，杀一儆百。他们为了把群众和我军分开或怕群众向我们通报情况，就把全村的男人都集中到一两间房子里锁起来长达数日之久。如在白风坪的张家塘，我们就从两个房子里放出了几十名被敌人锁了三天三夜的群众。即使这样，敌人仍无法切断我们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我们内部上下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完全团结一致。领导对全体同志的安全和健康非常关心，下级对领导也非常尊重和支持，大家都是生死与共、患难相处、亲密无间的忠诚战友。领导干部为了使部队不受损失，为了使同志们身体健康，减少非战斗减员，除了呕心沥血地想尽一切办法，巧妙地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和避开敌人分路合围之外，还尽量作到使部队夜晚能在群众家里住宿，并能在每天都能吃上两次热饭。为此，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我们都是每天凌晨三时前起身吃饭，尔后在拂晓前走出去二、三十里路之外，进入山沟里或半山间的树林里隐蔽休息。不管敌人怎样打枪打炮，狂吼乱叫，只要他们不走到自己跟前，我们都置若罔闻，不予理睬。等到下午

五时左右，敌人“清乡”搜山部队回巢之后，我们才走出树林，到附近的老乡家里，请他们帮助我们做点饭吃，并派出侦察员四出打听消息。待天黑人静之后，我们再出发走出二、三十里路之外去寻找新的宿营地址。到达驻地之后，由我自己或让别的同志到房东屋后窗上轻轻敲几下，当里边问“是谁？”时，我们就说：“我姓沈！”房东就很快起来披上衣服，先把狗子关起来，然后再开门迎我们进屋休息，为我们烧火取暖，大家就抓一把稻草或包谷叶铺在地上，躺在火的周围睡上三、四个小时，第二天三点钟前后，房东给我们做些饭吃了之后，又开始了新的旅程。但有时由于敌情不明，一时不能确定到底该向哪个方向行动，我们又过于疲劳，而且房东又真心实意地愿意留我们继续呆在他家里休息时，白天也住在老乡家里休息和学习，警戒也完全靠群众担任。但这样的次数不多，主要是怕一旦被敌人发现，会给部队和群众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为了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和分路合围，我们常常需要在一夜之间走几十里路，通过敌人强迫老百姓在要道路口上设置的几道、十几道哨卡。为了不致走漏消息，为了防止放哨的群众惊慌失措大喊大叫，鸣锣放炮，就由江团长和我亲自走在前面静悄悄地从背后接近放哨的人，突然把他抱住，堵上嘴巴，然后在火光的照耀下，使他们看到我们的面孔，让他认清是自己人，而后再向他们问明情况，并请他们跟随我们一起行动，到新的隐蔽地方休息，和我们一起吃干粮、喝冷水。当我们向新的地方转移时，再向他们表示歉意，放他们回去和家人团聚。我们就是这样日夜不停地在这块南不过数十里，东西不到百里的土地上，和敌人周旋，做捉迷藏的游戏，敌人想消灭我们，但却找不到我们，而我们要想打击敌人，随时都可以打到，想打就打，不想打就走，非常主动。

在我们这支由四十二人组成的战斗集体中，有团长江贤玉同志等二十四位老红军。他们是我们这支队伍里的中坚，是我们学

习的榜样，特别使我难忘的是“老班长”王天祥同志。他是川北人，从小给地主放猪、放牛、种田、抬滑竿，一九三三年参加红军当重机枪射手，在长征路上当了班长、排长。红军一九三七年陕北整编时，组织上要他当司务长，但他认为自己不认识字，不会记帐，就主动要求领导让他当炊事班长，直到一九四七年我们在保康、南漳坚持游击战争时，他仍担任着这一光荣的职务。所以我们团的同志，甚至旅的首长，都非常亲切地称呼他：“老班长”。到一九四七年春，他已经是四十六岁了，又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走起路来非常吃力，特别是上山爬坡时，他更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就是这样，他不仅一直跟着部队，而且还照常为大家做饭做菜。记得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我们的处境也比以前更加恶劣了。这时我想劝说他，要他暂时离开部队到可靠的群众家里隐蔽休息几天。于是我就对他说：“老王呀！近来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如过去了，我想给你找一个可靠的群众家里隐蔽休息几天，好了之后再归队。如果我们要离开这里，我一定派人找你回来。”我的话音未落，他就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说：“副团长！我知道你的好意！可是请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也要跟上部队，什么时候我这一口气一断，向路边上一倒，你有时就向我身上扔几撮土，如果没有时间，你就走你的，我绝不连累部队，使部队为我受损失！”他的这几句话使我很受感动，我眼含热泪向他说：“我的‘老班长’！你真是我的好同志呀！我怎么也舍不得把你丢下呀！只要你有这样的决心，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从此以后，不管我们怎样紧张、疲劳，他从未掉过一次队。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转移到豫皖苏地区后，他被选为二级功臣光荣地参加了庆功大会。

胜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从我们接受到保康、南漳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任务之后，

毛主席指示的“三个月内外”和王树声司令员讲的“一百天左右”、“春暖花开的时候”等词句，一直深深地铭刻在我们每个同志的心里，特别是毛主席的指示成为鼓舞我们以无比的毅力去克服困难，战胜强敌的巨大动力。大家都在盼望着“春暖花开的时候”早日到来。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有些同志就有些急躁情绪，他们都在注意看树梢的变化，想从那里得到一些春天来临的信息。其实大家也都清楚地知道这是无用的，因为季节的更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尤其是我们这个地区，敌我形势的改变，更需要靠我们的主观努力去争取。如果我们能在自己活动的地区，积极作战，打击敌人，牵制更多的敌人，就有利于我老解放区在三个月时间内打更多更大的胜仗，争取早日完成歼灭敌人二十五个旅的作战任务，我们这里的形势就会转变得快些，否则就会慢些。正如后来毛主席所说的那样“到国民党区域作战争取胜利的关键：第一是在善于捕捉战机，勇敢坚决，多打胜仗；第二是在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获得利益，站在我军方面。只要这两点做到了，我们就胜利了。”我们所在的鄂西北地区是国民党的后方，毛主席的这些话，根据我们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除了坚决执行争取群众的政策，使广大群众和大部分上层代表人物都能站在我军方面之外，还竭尽一切努力，捕捉战机，打了一些不大的胜仗。如在一九四七年三月，敌人的正规部队在保康县保安大队、乡保队等反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疯狂向我发动进攻。他们一旦发现我军行迹，就拼命跟踪追击。有一次，敌人整整追了我们一天，部队已很疲劳了，可是我们仍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绕了几十里路，并由我和江贤玉同志扮成敌军军官，闯过敌人的岗哨，给住在长岭对口店金斗乡的敌乡保队以突然袭击。虽然这次战斗只消灭敌人十几个人，但在精神上对敌人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充分显示了我军机动灵活，顽强作战的强大威力。五月五日拂晓，我们又用很巧妙的办法把驻在长坪村据点里的敌

南漳保安队的一个排诱了出来，牵到我们设置的伏击圈内一举歼灭；之后，我们又在长坪村东南的马槽堰设伏，消灭了来和南漳县保安大队会合“清剿”的保康县保安队的一个中队，打死和俘虏了县大队长及其部属数十人。前后两次共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而我无一伤亡。五月七日拂晓，我们又在龟坪消灭了明阳乡保队副及其部下数十人。这时我第二野战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在开封以东陇海铁路沿线对敌进行反击。蒋介石为了堵击我第二野战军南下，在五月十日前后，便把原来在我们活动地区和我们纠缠的敌宋瑞柯的整编第六十六师的三个团抽走了，剩下的县保安队、乡保队自知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都纷纷跑回县城里去，或躲到离开我们很远的地方去了。在我们活动的地区范围内，已经没有敢于公开带枪和我们对抗的敌人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不需要起五更睡半夜，钻到树林里隐蔽了。我们又可以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在这里大大小小的山路上走来走去了。我们地处鄂西山区，春天到来的时间是要稍晚一点，但这时已是五月初的时候了。杏花、桃花虽然早已随风飘落，而满山遍野的野玫瑰、杜鹃花、珍珠梅、白刺梅等却正在争艳怒放，并在路旁随风向我们频频点头祝贺，路旁和附近山坡上的劳动的群众，也在向我们热情问候，或遥遥招手致意。以上这些都不禁使我们由衷地欢呼：胜利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抗大”精神永放光芒

刘 焯 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向我华北、华东疯狂进犯，妄图以武力并吞全中国，我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一向采取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一触即溃，一退千里；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指引下，英勇地挺进敌后，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就在这样的时刻，我和全国各地许多青年学生一样，投身于抗日救亡的革命浪潮之中，先在太原，后转晋东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我在太原时，曾在国民师范礼堂听过中共代表周小舟同志的报告，他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也介绍了延安。延安，这革命的圣地，抗日的指挥中心，它早就是我向往的地方。在晋东南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怀着一颗火热的追求真理的心情，经过辗转奔波，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到达渴望已久的延安。

当时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举世闻名的、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新型学校，是全国各地立志于抗日救亡的广大知识青年向往的学校。和我一同进入延安的一批知识青年，被编入“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学习。在我们入校后，还继续有从东北、华北、华东沦陷区、战区 and 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大批知识青年进入“抗大”。这些知识青年，从外表上看，身穿各种服装：有穿长袍马褂的，有穿学生装的，有穿短便服的；男青

年有戴礼帽的，女青年有穿高跟鞋的。青年们虽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穿着各色各样的服装，但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理：不甘当亡国奴；又看透了国民党的腐朽无能；于是他们不远千里，来革命圣地延安找共产党，寻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学习抗日救亡的本领。我们这些青年一踏进“抗大”校门，每个人立即脱掉旧服，换上崭新的灰军装，接受各项军事政治教育，精神异常振奋。同学们对接触到的一切，都有一种异常亲切、新颖的感觉，仿佛到了一个新天地。

进“抗大”后，首先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学校领导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我们的副校长罗瑞卿同志、教育长许光达同志、大队长刘忠同志、二队队长洪学智同志等，他们都是红军中身经百战，长征过来的优秀指挥员和政工人员。但也和我们同学们一样，同吃一锅饭，同住土窑洞，同样都是穿一套灰制服，总之生活上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还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们身上穿的是褪了色的、打了补丁的旧制服，脚上穿的是自己打的草鞋；而同学们身上穿的是崭新的灰制服，脚上穿的是新布鞋。平时他们和同学们谈起话来，谦虚和蔼，热情洋溢。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抗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地铭刻在同学们的心里，它是我们入校后最生动、最富有教育意义的一课。许多同学向这些首长们和英雄们学习打草鞋、补旧衣，并以此为荣。当同学们穿上用自己双手打的草鞋时，心情特别激动，仿佛自己也分享到红军的一分荣誉，也仿佛增强了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毅力。

我们“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都住在清凉山南半坡自己挖的窑洞里，真乃是“前人挖洞我来住，我挖窑洞迎新人。”人越来越多，洞也越挖越多。很长一面山坡都挖成了窑洞。有的地方甚至挖了二层三层洞。每到夜间，灯光射出洞口，就象一片野营营地，十分壮观。同学们有时开小组会，有时复习功课，有时聚在洞口

唱歌。我们每个队都有同学们推选的文艺干事。我们队学习的和自编的节目有二、三十个，现在我还能记起的有：游击队歌、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上起刺刀来、延安颂、五月鲜花、热血、巨浪、‘九一八’小调、大路歌、救亡进行曲、流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船夫曲、兄妹开荒、送郎当红军、运盐记、放下你的鞭子、鸡毛信等。这些节目多是在星期六晚上，以大队为单位开文艺晚会时演出的。它一来为活跃生活，因为同学们都是单身汉，周末组织集体文娱活动，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二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因为演唱的都是抗日救亡歌曲。

清凉山对面，是久已闻名的延安宝塔山，宝塔高耸雄伟。电影工作者、诗人常将宝塔山和宝塔，作为革命圣地延安的伟大象征来歌颂。我们多次到那里作军事演习。站在宝塔山上，鸟瞰延安全景，那座落在西山底下的马列学院，西南角文化沟里的中央党校，西北角的陕北公学，延河北侧的女子大学，我们东邻的鲁迅艺术学校等，都是为抗日革命事业培养各种人才而设的。各院校同学平时都忙于学习，相互很少见面，只有遇到重大节日或召开动员大会时，各校就都集合到一起来了。在每次大会召开之前，各队同学陆续进入会场，“嗵嗵队”此起彼伏，歌声此起彼伏，二重唱、三重唱交织在一起，它给人一种革命巨浪滚滚向前的感觉，也充分体现了“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革命校风。

清凉山与宝塔山之间，有延河水流过，河水清澈见底，同学们每天早上上过早操回来，就都带上洗脸盆、手巾到河边洗脸，星期天到河边洗衣服，夏天还到深水处洗澡，那里就成了极好的天然游泳池了。

“抗大”的全体是“抗日军政大学”，是为抗日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其教育目的与内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着重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同时也向同学

们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教育。因此，主要内容概括地说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主要讲党的路线斗争史和新形势下的任务；武装斗争主要讲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统一战线主要讲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独立自主的政策和领导权问题。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以及中共党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等，都是重要的教材。同时也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

为了迅速培养出大量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毛主席还亲自给“抗大”同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我们也曾多次听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们给我们作的政治、军事报告。

通过学习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掌握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许多同学在“抗大”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懂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应走向何方，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真理；有的参加了共产党。他们下决心，首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而英勇奋斗！最终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妄图把党内、军内、政府内的革命老干部统统打倒，胡说什么新民主主义时期参加革命的都是民主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主派就都成了走资派，都成了革命对象，真是荒谬绝伦，反动透顶！

清凉山下原有一片空地，经过教职员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修起了一排排简易工棚，这就是“抗大”同学们的教室。建筑材料都是同学们到山里伐木、就地打土坯盖起来的。同学们还利用碎木料作了各种样式的小凳子。有方凳、圆凳、长凳等。因木料缺乏，同学们没有课桌，只有教师上课时面前摆一张没有油漆的桌子，同学们坐在小凳子上，大腿就当桌子用。当时“抗大”还没

有大礼堂，在延安也只有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有个不大的礼堂，是专供党中央使用的。学校作大报告、开大会都是在露天，遇到太阳暴晒或雨天时，师生们就戴上草帽听报告。生活是比较艰苦的，但同学们想到自己是为抗日救亡而学时，心情都十分愉快，从没有听到过一个人叫苦。这种精神是何等可贵啊！

陕甘宁边区由于自然条件较差，人口又突然增长，给人民生活带来更大的困难。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开展了震动中外的大生产运动，我们“抗大”同学也积极参加了。一次我们在清凉山的后山里开荒，队长突然告诉我们：毛主席、周副主席来我们这里了。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欢呼声迎接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向同学们频频招手致意，还接过镢头和同学们挖了一阵才离开，给我们以极大的鼓舞！即使过去从未参加过农业劳动的同学，也都挽起袖子，抡起三角镢不停地挖，手上打起泡，汗水浸透衣，也不肯休息。我还记得有个名叫“解放”的女同学，一口东北口音，身体粗壮，干活泼辣，性格爽朗，头上留个和男同学一样的小平头，同学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假小子”。她爱说笑，也很滑稽，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对她说：“你的名字不象个女同志的名字，倒象个男的名字。”她立即反驳说：“光你们男同志能解放我们东北吗？你真是个旧脑筋。”还没等对方再说话，她自己先呵呵地笑了起来。据说“解放”同志的父亲参加了东北“抗联”，母亲和弟弟都留在家中，当时她与家中音信不通，她把强烈的对敌仇恨，转化为力量，干活泼辣，一般中等男劳力，开始每天开荒五分，她也开五分，后来我们增长到六分，她也开六分，毫不示弱。当然少数男同学还有每天开七、八分的，个别大力士每天能开一亩多。但“解放”同学比起其他女同学来，就算是“冒尖”的了。通过开荒种地，我们“抗大”同学自力更生解决了一部分口粮（有人说是解决了三个月口粮），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

“抗大”同学除开荒种地自给一部分粮食外，还要纺纱织布，自己解决一部分穿衣问题。当时我听过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也带头纺过纱。我校参加纺纱的多数是体质较弱的男女同学。论起纺纱来我并不外行，我幼年时在家跟母亲学过纺纱。我家在河北省产棉区，农村妇女和许多男子都会纺纱，尤其到冬天农闲季节，邻近几户合伙挖一个长方形地窖子，上面用木料和高粱杆搭起棚，再压上约半尺厚的土，靠一边留个仅仅能上下一个人的方口，斜搭个梯子供人上下。冬天在窖子里纺纱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窖子里避风保温，里面虽不生火也比露天暖和得多，节省燃料；二是节省灯油，如人们分散在各户纺纱，各户都得点一盏灯，而一个窖子里点上两盏灯挂起来，就能解决十几辆纺车的照明问题；三是人多在一起纺纱，谈家常、讲故事，谈谈笑笑，不感到乏困，又多出活。我幼年时就在窖子里伴母亲纺过纱。我队同学产棉区的少，多数不会纺纱。纺纱虽是简单劳动，但不会纺左右手就配合不起来，不是常断线，就是粗细不匀。有的同学急得满头大汗，还纺不出合格纱来，在这项劳动上，我还当过一阵小师傅哩！

我的母校“抗大”，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日救亡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在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今天在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奋战“四化”的过程中，继承“抗大”精神，继承“抗大”同学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定立场，继承“抗大”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继承“抗大”同学和教职员亲密团结，同甘共苦的精神仍是非常必要的。邓小平同志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中指出：“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让我们“抗大”老同志和新的青年一代在党的号召下，为“四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上共同前进吧！

参加大生产情景点滴

金 种 华

一九四一年，蒋介石国民党开始对我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饿死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根据地人民。党中央、毛主席及时采取英明的对策，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我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干部、战士在工农群众的协助下，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织织布，并搞其他工农业生产等。在这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是模范，创造出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周总理纺线线，永远为人民所歌颂称赞。我各抗日根据地军民高度发扬了艰苦创业的精神，很快实现了丰衣足食，彻底挫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对我解放区的经济封锁。

一九四四年，我在陕甘宁边区富（鄯）县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参加大生产的情景，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段经历。

做好准备

三五八旅于一九四三年由晋绥移驻陕甘宁边区富县张村驿区王家角一带，旅部住王家角，三个团配置在周围机动位置，一面加强边区防务，一面准备开荒生产。全旅的窑洞已于一九四三年打好，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窑洞里有公家统一制做的桌凳，有我们自己用柳条编的床，上面铺些青草、谷草或干野草等，睡上柔软舒适。旅部还盖了一座大礼堂。

一九四四年春开始开荒。“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开荒最主要的工具要算镢头了，每个同志都要有一把好用的镢头。旅供给部（后称后勤部）早已为大家准备了足够的、质量高的镢头。同志们精心选择挺直、粗细合适的柳树或青冈树枝干，修制成镢头把，打磨得又光又滑，反复试用，直到称心满意为止。

动手开荒前，开了动员大会。旅首长讲明了开荒生产的重大意义，希望大家鼓足干劲、增强信心，并强调开荒种地要讲求实效，保证质量。同志们摩拳擦掌，积极准备投入战斗。

开 荒 播 种

王家角在葫芦河川北山坡，过河上南山二、三里（以后延展到四、五里处）就是我们旅部的开荒地区。班组和个人都分了地块，接着都在各自的地块上干了起来。开荒阶段共六个星期，大约是从三月初到四月半左右。谷雨节前，我们清晨上地，中午在地头吃饭，傍晚收工。陕北气候，昼夜温差较大，早春的清晨，寒气逼人，离开棉袄是不行的。劳动一阵，热得汗流浹背，就要脱去棉衣，甚至打赤膊了。午饭主食是小米面窝窝头，吃饭时大家架起干柴火，把窝窝头烤得外黄里嫩，好吃极了。饭罢稍事休息，就又干起来。傍晚收工时，我们总是去附近山沟的树林里，每人砍一根三五十斤重的好干柴，扛回去交给伙房作燃料。

开荒的第一天，我满怀信心地和大队一起上山开荒。我想：头一仗一定要打好。一到垦荒地点就抡起镢头干起来了，午饭后休息一下，又接着干起来，直到收工。干了一天腰酸腿软，手也磨起了泡。然而开的地经丈量只开有一分三厘。唉！怎么只开了这么点儿地呢？难道我出力不够吗？回营房总结经验中，同志们说我开的地并不算太少，是中下等，可不能泄气，并指出，是不是没

握紧扁头把，这样既费力，又容易打泡，建议我改正一下试试看。第二天我照着做了，果然有进步，上了二分。以后逐日陆续增加，二分多、三分、三分多、四分……最高纪录是六分四厘，全期共开地十三亩多。这个成绩，比起被称赞为“赛过牛”的政治部黄同志来，可就差远了。黄同志一天能挖地一亩多哩，全期开荒三十多亩。

荒地大体有三种：草墩地、梢林地、蒿子地。草墩地里，隔不远的地方就有个草墩，草墩圆形，大的直径一尺左右，根很深，这家伙相当顽固，我四、五瓢头，甚至七、八瓢头才能刨起一个。梢林地里生长着稀疏的灌木，其中大些的也较难对付。蒿子地里只有不密的细蒿草，土质松散，最好开。我那最高纪录六分四，就是开蒿子地取得的。

领导上很注意劳逸结合，规定星期日休息。可是多数同志总在星期日上午加班开荒，下午在家洗衣服，或做些其他工作，或休息。

要播种了，没有老乡的帮助是不行的。当时播种，只能用原始的撒种法。撒种子就成了关键环节，干这种活老乡是行家，撒得又快又匀，只有撒得均匀，庄稼才能全苗，才能获得好收成。当时我们请老乡当老师教会一批同志。播种时，撒种子的同志在前面撒，后面的同志横排成行，用榔头打碎土块，把种子埋在土里。我们贯彻因地制宜原则，在新开的荒地上全都种了糜子，这是当地稳产高产的粮食品种之一。糜子米俗称黄米，比谷子米（小米）粒大、色黄，做成的小米饭香甜可口。

美丽富饶的山区

这一带山区，景色秀丽，资源丰富，人口稀少。

葫芦河两岸，岗峦起伏，是个黄土丘陵地带，大片山地坡度

不大，土质肥沃。不少山丘上灌木丛生，山丹丹花星布其间，万绿丛中几点红，煞是好看。山沟及其坡沿，林木荫翳，桦树、杨树、青冈树最多。还有成片的漆树林。川边、河畔则多柳树、榆树。

有一天，我和三、四个同志到北山察看荒地，突然发现了没有主户的杏树林，多数成行，集中在山间平地上，有些则散植在山坡，共有数百株。这时正值杏熟，黄红的杏子累累枝头；熟透了的，在地上落了一层。我们高兴极了，先选尝了十来棵树上的杏子。这些杏子个大肉厚，滋味甜香，每棵树上摘尝一个就吃足了。当时我们派人拿来筐篓，装满拾回，给家里同志们吃。

这里动物资源也很丰富，兽类有野羊、野猪、狐、兔等；鸟类除野鸡、斑鸠、啄木鸟等以外，还有许多我不知道名字的禽鸟。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上山加班开荒。开了一阵，疲劳了，背靠一棵大树坐着休息。忽见飞来一只极其美丽的鸟，栖息在低枝上，它吸引住了我。我目不转睛地观赏着它。这只鸟一尺多长，通身黄色为主，红冠红嘴，有一尺长彩带似的尾羽。尾羽末端是光彩夺目的红、兰斑纹。不一会儿，它发现了我，就展翅翩然飞去。我当时认为（现在也还这样认为）：所谓凤凰，也许就是古人把这种鸟加以美化而成的吧！

在我们祖国，有很多这样美丽富饶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开发哩！

饶有风趣的钓鱼、捉蟹

葫芦河里有很多小鱼，多是二寸多，三寸多长的，最大的也不过四寸，成群地游来游去。我们干看着，没法捕捞。一次，我们请教一位十四、五岁的当地青年，他教给我们一个新奇巧妙的

钓鱼法，用不着敲针作钓钩，一杆能钓到几条鱼。河岸湿土里有的是蚯蚓，挖出来作鱼饵，用一条长线，在一端一尺多长的一段线上，每隔一寸左右系牢一节蚯蚓，拴个浮标，把线的另一端绑在木杆上，就成了一根钓鱼竿了。投入水中，不一会儿，浮标下沉，把鱼杆一提，就能钓上四、五条，以至七、八条鱼。原来，当拴着蚯蚓的线绳甩进水中之后，鱼儿争着吞食，提钓杆时，鱼儿还没来得及把蚯蚓吞到肚里，只衔在嘴里，就被带上来了。一串鱼饵可用三、四次，因为一次只是让鱼儿们尝尝味道，并没让它们吃掉。我们常利用一个午休时间钓半脸盆活鱼，五、六个人就有一顿鲜美的鱼羹了。当然，这种钓法只适用于鱼小而多的情况，钓大鱼就会徒劳无功，一无所得。

更有意思的是捉螃蟹。葫芦河一般有齐腰深的流水，但许多河段近岸却有很宽的浅水滩，水不及膝，河底遍布大大小小的石块。这些石块周围的缝隙，是螃蟹们潜居之所。螃蟹以鱼、虾及其它水虫为食。捉蟹时，我们轻轻地将石头搬移，螃蟹就趁着浑水迅速横行逃走。可是它刚刚逃出混水圈，就被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使用大拇指和食指、中指捏住蟹壳两侧，手到擒拿，很有把握。纵使一块石头下有两三个螃蟹，也会逐一被捉，很少跑掉。我们也常是利用午休时间去捉螃蟹，一次可捉四、五十只，足够五六个人美餐一顿了。

丰收的喜悦

秋收季节到了，庄稼大部分长得很好，穗大粒饱，一片金黄，随风摆动。同志们在欢笑歌唱声中，紧张、愉快地收割、打碾，那种高兴劲儿至今想起犹在眼前。

我们不但种粮，而且种菜，除土豆、白菜、萝卜外，还有当时稀有的西红柿。同时还大量养猪、养菜牛等。大生产运动带来

了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收获之后，黄灿灿，香喷喷的黄米饭，大家尽量享用。菜不但有猪肉、青菜，而且有土豆烧牛肉和味道更鲜美、营养更丰富的西红柿墩牛肉。同志们一个个吃的身体壮实，精神饱满，干每一项革命工作生龙活虎，锐不可挡。

在大生产的同时，特别是在秋收前后，部队进行大练兵，战术、技术大为提高。

我们的文化生活也十分活跃，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来演出《兄妹开荒》、《歌唱刘志丹》、《抓壮丁》等。我们自己除大唱革命歌曲外，还排演了《逼上梁山》等剧目。

蒋介石国民党不是想要困死、饿死我们吗？我们就是这样使他们大失所望，无可奈何。

一九四五年秋，三五八旅参加了爷台山战斗，蒋介石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我边区军民彻底粉碎了。不久，于八月十五日，日寇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三五八旅挥师山西，继续战斗于晋西北等地。

艰苦而愉快的生活

——忆寨子湾开荒

赵 寿 轩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寇向我根据地进攻。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他们提出：“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的反动口号，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调动几十万大军对我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其他解放区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军队和人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在这种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还要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这真是对我们人民军队的严峻考验。

在这种饥寒交加、死亡威胁的境况下，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抱着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雄心壮志，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在解放区迅速掀起了军民大生产的热潮。部队、机关、学校、人民群众一齐行动，向荒山僻壤进军，开荒种田，生产自救。我当时在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政治处当组织干事。我们团的基础是贺龙同志在洪湖一把菜刀闹革命时组织起来的一支农民部队，经过长征到达北方抗日前线，在抗日战争中是一二〇师的主力部队之一，一九四一年从抗日前线调到延安，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生产自救”、“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的号召，进驻葫芦河沿岸的寨子湾，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一九四三年秋，我们的开荒生活开始了。部队一面由团首长带领各营干部和有关人员上山勘察土地，研究生产计划，一面打窑洞，修营房，做工具，准备粮食，首先解决好吃、住、用的问题。第一年的开荒任务是人均二十亩，为了不误农时，赶在春播前把地开出、整好，一九四四年春节刚一过，各营和团直属队就干了起来。这时天气尚冷，地冻未消，镢头刨下去，一刨一个印，震得双臂酸疼，有时刮起北风来还冻得人脸如针刺，双手麻木，但是困难吓不倒久经锻炼的人民军队。干部、战士个个精神抖擞，象参加一次重大战役一样，争先恐后，向荒山秃岭开战，每个人都为完成万亩开荒任务而付出最大的力量。我们政治处开荒地点在寨子湾东南部的一个山梁上。山上是一大片比较平缓的山坡和一些小山岭，处长满荆棘、蒿草及其它杂树杂草，挖起来很不容易。万事开头难。虽然我们这些战士都经过打仗的锻炼，但起初开荒时，有一部分同志却十分吃力。累得腰疼腿酸。有的走路连步子也拉不开，上床睡觉还要用手把腿朝上翘；许多人手上打了血泡，泡破了，血顺着镢把朝下流，同志们怕找卫生员耽擱时间，就抓一撮干土按上，咬着牙继续干。大约经过一个多星期，大家对开荒劳动都习惯了，腰腿不疼了，手上的泡变成了茧子，抡起镢头浑身是劲，开荒效率大大提高。开始几天一个人每天只能挖二三分地，后来可以挖一亩左右，涌现出了不少开荒英雄。三营十连的通讯员王福友，就是当时有名的“气死牛”，当时他只有十八岁，长得英俊结实，使一把六、七寸宽的大镢头，一干起来长时间不歇气，有时还起早贪黑，他除完成通讯员的工作外，一天还要挖二、三亩地，每天评比都在全团数第一。谁要问他为什么这样大的干劲，他总是简单地回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粉碎敌人封锁嘛！”的确是这样，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一把锄头一枝枪，生产自救保卫党中央”。正因为大家心里有这个想法和愿望，把自己的吃苦同战胜敌人、解放人民联系起来，才在开荒中不怕苦累，并且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困难，当时，吃的窝窝头，大家却觉得又香又甜，晚上没有灯，就点燃松明子照亮，吸烟的人没有烟，就用废纸卷起酸枣叶子当烟抽；热天、雨天没有草帽戴，就剥下桦树皮自己做。甚至，有的同志用的饭盒，穿的麻鞋底也是桦树皮做的。虽然我们的装备极差，但斗志十分旺盛。记得在一九四五年，国民党反动派向边区进攻，占领我南线要地峽台山，我军奉命参加反击战，部队路过延安时，穿过繁华的新市场，喊着“一、二、三、四”，唱着抗战歌曲，精神抖擞，人人充满自豪。据说毛主席知道这一情况后，赞许我们指战员的这种革命精神，并说：“艰苦奋斗是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色！”

尽管当时开荒生活非常艰苦，干部、战士却很乐观，山洼里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劳动中，有的同志挖累了，其他同志就喊叫“加油！”，给他鼓劲；那个同志挖得快，完成任务后帮助了别人，大家就将他的事迹编成顺口溜等小节目说唱。中间休息时，有的唱歌，有的唱家乡小调，有的还唱京剧、河北梆子、秦腔……等，唱得好的同志，受到大家的喝采，唱完一个大家就喊欢迎“再来一个”。除此之外，讲故事讨论问题、摔跤、赶兔子、捉鸟等等，都成为休息时间大家活动的好形式。中午炊事员送来棒子面窝窝头，大伙儿就拾起一堆挖下来的箱子，用火点着，把窝窝头扔进去，拿长棍子来回拨转，等烤得焦黄时拨出来，打掉上面的灰，大口大口地吃起来，真比现在吃大米、白面还香。大家有时吃着窝头，就着碱菜，有时也憧憬全国解放后的美好生活。这个说：“等解放了俺们山东，回到家乡，美美地吃一顿煎饼卷大葱”，那个讲“等解放了北平，咱们大家好好地到烧饼铺里吃烧饼”。这些欲望是多么纯朴啊！到了星期天，生活更有趣。有的学写字，有的搞卫生，有的三三两两到山沟里砍柴把，有的找野

生党参，挖来熬水喝，滋补身体。青年人最感兴趣的是找蜂蜜和套野鸡。找蜂蜜的办法是，用桦树皮卷成手指粗的筒筒，在野花丛中捉几只蜜蜂，装到筒筒里，用拇指堵着，然后跟着采花回巢的蜜蜂跑，蜜蜂飞得快，一会儿不见了，就把筒里的蜜蜂放出一个，再跟着跑，这样一个一个地放，一直跟着跑，就可以找到蜂巢。找到蜂巢后，用一根长棍子扎上一把干草，点着火伸向蜂巢，把蜂巢外面的蜜蜂熏跑，然后把蜂巢割下来，拿回去熬蜜吃。有时遇到大的蜂巢，可以熬二、三十斤蜜。套野鸡的办法是，用四寸多长的木叉叉马尾做的套子，锁上食，找野鸡多的地方下上，给周围撒些粮食，人躲在隐蔽的地方看着，只要野鸡一吃食，听到一声“扑楞”，就套住了。在开荒中，我们不但学会了猎取动物和捕捉虫鸟的本领，而且吃到了许多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有不少同志就是在开荒时从“老广”（广东籍的同志）那里学会捕蛇和烹饪蛇肉吃的。

我们在寨子湾搞生产自给将近两年时间，人均开荒二十多亩，全部种的糜子。一九四四年开荒第一年粮食就实现半自给，到一九四五年达到了自给有余。粮食多了，各个伙食单位都养了猪，养了鸡，养了鸭，有的还养了狗，大家吃得饱，吃得好，逢年过节还吃“十大碗”。在搞好生产的同时，还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苦练杀敌本领。干部、战士个个红光满面，身强力壮。

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锻炼了干部战士，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同时，干部、战士一道劳动，亲如兄弟，大大改善了官兵关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我们部队奉命下山，又生龙活虎般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延安保卫战中的武工队

贾俊英

一九四七年春，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他们在各个战场上的惨重失败，纠集二十三万兵力重点进攻我陕甘宁边区，派其嫡系胡宗南匪部疯狂地进犯我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分析了当时军事形势，本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方针，作出了“放弃延安，歼灭敌人于延安”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很通俗地说：“守延安，没延安；离延安，有延安。”“打破些坛坛罐罐，收复延安以后再置”。就是遵照这一精神，中央在敌人进犯之前，作了战略撤退的应急计划。

钳制敌军

一九四七年春节过后，彭德怀将军的一支部队，部署在牛武至甘泉的登麓山和茶坊的西山一带，并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使来犯之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挫败其锐气的目的。当时，我以甘泉县贫农团团长兼保安科副科长的身份和部队作战参谋王克诚同志，踏访了牛武到榆林桥一带的防御体系群。王克诚同志指着那防御工事，称赞说：“咱们只要有二个团的兵力，就可以抗击敌人二个军，达到消耗敌人、有利于我战略转移的目的。”在这条保卫延安的外围战线上，从三月二日开始，经过四个昼夜的边战边退，就消灭敌人二十九军的二千余人。完成阻击任务后，奉朱总司令从延安来的电

令，部队从牛武撤退到甘泉，我武工队也连夜移居甘泉的登麓山、凤凰山一带。这时，茶坊由我四个团防守，敌军进到叶武沟拿直到清泉一带，距茶坊仅四十华里。三月八日，我军在登麓山又和敌人打响了。正当战斗打得激烈的时候，领导带我去四〇八团，向作战参谋介绍我说：“这是贾俊英同志，他和延安武工队联系多，最熟悉延安周围的地形，你们要在他的带领下，顺着安全道路逐步撤回延安，把敌人引到北边去，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好消灭他们。”登麓山、凤凰山的战斗，打了三天两夜，部队在第三天拂晓从劳山一带悄悄地撤回延安。与此同时，我带领武工队从邓山走捷径也到了延安。

我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略要地完成阻击国民党反动军队进占延安的消耗战后，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全部撤出了延安，我党中央及人民解放军总部撤出延安后，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而且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利用“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的优越条件，开展了“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战斗。

三月十八日晚，我们完成了延安的联络任务准备返回甘泉，途经杨家岭时，毛主席、周副主席正准备撤离这里，一支驮着文件箱的骑兵队伍鱼贯前行着。毛主席见到我们关切地说：“听说你们在富县、甘泉的阻击战打得很好，消灭了几千敌人，拖住了敌人前进的步子，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按计划撤退了。现在我们主动把延安让出去，让敌人高兴高兴吧！打烂一些坛坛罐罐也没关系，我们还会回来的。”毛主席还说：“现在，我和总理也要游击去了，你们回甘泉后也要出点力气很好保卫延安啊！”毛主席的话给我们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久住过延安的人，真是不愿撤离延安啊！当我们离开延安时，同志们看到道路两旁的田野、河水、山岭，感到无限的亲切，不

忍离去。那城墙和石崖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要把蒋胡匪帮埋藏在延安！”的大幅标语，仍静静地贴在那里，大家一步一回头地渐渐撤离了延安。

我们武工队一行十五人，从洛平川经蛇盘山到了下寺湾，在这里与县长惠光弟等人见了面。我们便一道去柳河渠湾找西北工作委员会王耀华、霍苏及张裕民等同志，向西北工委汇报了各方面的情况，并请示以后开展对敌斗争的方针等。王耀华同志在分析整个形势后，指示说：“现在，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很英明，敌人有几十万军队，有飞机、大炮和坦克，气焰非常嚣张，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的两万余人。我们守延安，就会背上包袱；我们放弃延安，敌人就把包袱背上了。延安放弃后，我们各级党政机关的任务，就是就地活动，就地打游击，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组织小批武装，随时偷袭敌人，使他们到处挨打，不得安宁，十分疲劳，十分缺粮，然后，我们找机会分割歼灭，他们就到倒霉的时候了。”通过王耀华同志的谈话，我们对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西北战场的战略部署就理解得更深刻了。

敌人进入延安后，非常狂妄骄傲，除烧杀抢劫外，还派出特务刺探我军情报，进行破坏活动。他们在甘泉县做的第一件坏事，就是大肆逮捕我党政军工作人员家属，禁闭起来作为“人质”，妄图迫使我党政军工作人员背叛投降。他们先后将惠光弟和我及一些同志的家属四十多人抓走。但是，敌人的算盘打错了，他们的反革命行为，引起了全县干部和群众的革命义愤，更增强了大家向反动派斗争的勇气和力量。县上很快扩大了武工队，由原来的十五人增加到四十四人，派叶清义任队长，李义任指导员，樊凤翔任材料员，由我以县委常委名义，负责领导。武工队扩大后，王耀华同志多次勉励我说：“因为敌人抓走了你的家属，你和敌人有直接的深仇大恨，要坚定立场，坚持斗争，勇敢地担当重任，为保卫延安贡献力量。”

武工队扩大不久，一天，我与三个同志在王家坪向联络员贺光有同志了解了敌情，在返回柳罗驿时，碰上敌特分子封玉山，他逼着羊倌贺有声将碧县公安局代牧的羊群赶给敌军。贺有声看见我们三人走来，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向我们诉说：“他抢拉了牛羊，逼我赶送，叫我怎么给领导交待？”并悄悄示意说：附近再没有敌人，你们赶快收拾掉他，帮我解围吧！我们三人穿的便衣，是老百姓装束，在封玉山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猛然掏出手枪，当场击毙了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接着，我们让贺有声把羊赶到马老庄去放牧，那里匪军不敢去，因为我们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比较安全。

见 贺 老 总

转眼，敌人进入边区已三个月了。七月的甘泉，田野里的包谷长得蛮高，一个个的玉米棒上挂着红色的缨子，平川、山坡上的青纱帐成为我武工队活动的天然屏障。

敌人进入边区后，还乡团、反动地主也陆续回到甘泉，敌伪政府为了征粮要款，欺压剥削人民，利用还乡团建立了反动的伪乡保组织，气焰十分嚣张。一天，我们武工队活动在志丹县境内，据侦察人员说，甘泉伪保公所有机枪二挺，步枪四十余支，危害地方，人民痛恨，要求派武工队去解除武装。经过我和保安大队、游击中队共同研究破敌方案后，组织了一百二十余人，利用青纱帐作掩护，从王李家湾经潘家角坨，夜袭伪保公所。战斗结果，俘虏伪警二人，缴获机枪二挺，步枪三十一支，子弹一万三千多发。第二天当我们在安家坪休整时，敌人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性的袭击，我武工队据险固守，张占山率游击队全部人员打外援，在内外夹击下，敌人被打得丢盔弃甲，仓惶逃跑了。

经过两次战斗，我们考虑到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不能

再和敌人硬碰，夜晚又转移到桑树塘。这晚，王耀华同志也在那里，我们向他汇报了连日来作战情况，耀华同志向我们说：“敌人现在很嚣张，我们的战术是避而不打，要打吆，一打就走，让敌人摸不着虚实，把他们置于迷雾之中，使敌人天天担惊受怕。毛主席说过，蘑菇战术，把他们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他们。要使他们知道，老区的人民武装是不好惹的。”最后，他又十分关心地问我家属情况，是否有出来的希望？我说：“现在还没法营救，只有专心一意闹革命，打敌人，只要那一天把敌人赶出边区，家属不就自然得到解放了吗？”他点头赞许我的乐观精神。

武工队连连袭击敌人都取得了胜利，因而远近出了名。于是，狼心狗肺的敌人便组织特务分子，化装成群众，探听我们行动的来龙去脉，四处搜索我们经常出没活动的地点，寻找机会，作一网打尽的美梦；我部也为了保存战斗力量，天天做防地的转移，居无定地，食无定时，甚至一天三转移也是经常的现象，所以，敌人虽多次组织偷袭都扑了空。一次，我们在高家哨用刺刀捅死了给敌人搜集情报的特务分子贾根，打击了敌特活动的气焰。一天午夜，我们来到了新庄河，但我们行动的消息，被敌人侦探康全有知道了。康全有认为我们初来乍到，想给我们以冷不防，来个拂晓偷营。然而，他的计划，又被我们所掌握。于是，我们便来了个针锋相对，把武工队先拉到庄子外围，布置了“空城计”，准备将敌人装在口袋里再消灭。天刚发亮，敌人果然就摸进了村子，康全有见到村内空空无人，大吃一惊，知道中计，立即下令向外撤兵。这时，我军乘机截击，敌人被装进了口袋里，经过英勇机智的战斗，结果只有康全有带着一个爪牙狼狽逃窜，其余四十余人全部被歼。缴获长枪四十一支，这样给新吸收的游击队员补充了武器。

这年九月，当我由甘泉率领武工队到麻子街时，恰好遇见了贺龙和习仲勋同志到这里来部署工作。我因为病体初愈，头发长得

很长，再加上因家属长期被扣留，心情有些闷郁。贺老总一见我就说：“你怎么把头发留得这么长？”我回答说：“病刚好就来了，还没顾得上剃哪！”贺老总看出了我的心事又说：“看你的情况，不光是有病，恐怕还有着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呢？过去看见你又说又笑，而今，问一句，你答一句，不问你就不吭声了，精神面貌不好呀！”我回答说：“报告首长，你完全看对了，我一家大小都被敌人抓去坐监狱了，已经拷打过多次，逼着向我老婆要枪、要我，还假借我老婆的名字寄过十多封假信，逼我上钩。我哪能背叛党、背叛革命呢？我只有一个打算，就是和敌人拼到底，以胜利换取家属的团圆，决不委曲求全，投降敌人。”贺老总说：“你斗志很坚强，这很好，你放心，顶多二年，少则一年，我们就会收复延安，那时，你和老婆孩子就可能相会了。”贺老总还鼓励我说：“你还年青，好好干，有出息，有前途，这次保卫延安的战斗，要争取多消灭些敌人。”

贺老总环顾我周围的武工队战士，手指着大家背着背包问我：“大家鼓鼓囊囊地背着些什么呢？”我笑着回答：“这是剥的敌人的皮子（伪军军衣），有时我们还有用场呢！”他又说：“你们背上那么多东西行军太吃力了。”我说：“现在多受点苦没关系，等到打起仗来，只要有机会用上它，打仗就松得多了。”习仲勋同志听了很高兴地说：“看这个老贾，敦敦厚厚的，打起敌人来，心眼还满多哩！过去我知道你有一股子冒险劲儿，战斗的实践给你增加了智慧，以后要多想点问题，细心些才好。”当晚，两位首长留我们大家一道吃了小米晚饭。次日，首长们南下，我们又向延安行进。

欢 度 新 年

经过两天行军，步行一百余里，夜宿盘龙，恰巧遇见联络员刘

三刚从延安返回。他说：“延安今天唱戏，附近敌军都到延安看戏去了，现在，少陵寺（距延安五华里）只住些伪保警，你们满可以吃掉它，为地方除害。”这个消息，正合我们的胃口。一俟晚饭吃过，全体战士，都换上了伪军服装，装成巡逻队，一直开到伪保长等一伙坏家伙正在喝酒的饭馆里，假说找保长到乡公所有事商量。伪保长小心从命，跟到乡公所前就被我们迅速解除了伪警枪枝。时过午夜，我队转入豆腐川毛家堡子住宿，而这时联络员刘三又来找我们，并问：“为什么不杀伪保长？”我说：“伪保长的罪恶我们不清楚，暂时留他一条命，以后看他在地方上的表现好坏再定，你可以告诉他，他的脑瓜子长得半不半，要由他自己作主。”以后，我们了解到伪保长第二天才去报告伪军，一方面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防止敌人及时追击我们，让我们安全转移，不受损失。果然，敌人闻讯后，派了一个团追到徐家寨东山，但结果还是扑空了，只是放了一阵空枪，就回去报功说完全歼灭了我们。事实上，它是撒了个弥天大谎。我们从这一天开始，在徐家寨只留了一个后卫班，其余的人利用整体机会，在大庄河、王家泉及麦台子等地，分散帮助群众在田野上抢收大秋作物。

不久，在甘泉附近，县委惠居良书记，召集祁新、惠光弟、刘生元及我等人参加的会议，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布置今后的工作任务。会上我说：“到秋收为止，我们已经拔掉了潘家河坨敌人的钉子，赶走了虎皮秃和下寺湾的敌人，王家坪的敌人也准备逃走，只要我们再加一把劲，拔掉石门的钉子，我们的压力就可减少，也就比较安全了。”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希望迅速去办。会后，我和张占山大队长、一大队王尚义政委，共同研究了战斗方案，决定由张占山和王尚义同志率领一大队主攻，我率武工队在魏家沟一带打王家坪的敌人，防其增援。在九月二十八日，进攻的战斗在石门打响了，王家坪的敌人果然派兵来增援，

这时我武工队给予迎头痛击。敌人知道我有准备，没敢交锋，就败退到买卖塔去了。石门虽有碉堡和土围之险可守，但因我主攻战士英勇奋战，猛攻猛打，敌人因久等援军不到，又听到魏家沟枪声紧急，所以就放弃石门逃走了。这次战斗，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敌人凭险防守，我部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牺牲二人，负伤五人。

新年就要到了，武工队全体同志，半年来转战各地，除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外，还随时随地和饥饿严寒作斗争，还有十一位同志没有换上棉衣。当时有的同志说：“快过新年了，咱们也该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来年再战！”有的同志提议：“咱们应当想些办法，叫那‘运输大队长’送些过年的慰问品来，咱们也该痛痛快快地过个年呀！”大家听了称赞这个办法，并说：咱们不能向地方要，咱们的弟兄太苦了，许多村镇，经过敌人多次践踏，烧杀洗劫，变得荒凉冷落，房门窗板都被敌人烧了，粮食抢光了，房子烧掉了，街道两旁长满了蒿草，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向群众要，而应当给群众解决困难。有的同志并说：“咱们要多方面调查研究，只要找到胡匪的后勤，还怕没有过年过节的物资吗？”因此，我们派出了几个战士从四面八方掌握敌情，准备夺取过年的物资。一天，从劳山送来消息说，敌人的一个运输连要过劳山，有二十六匹牲口驮着物资和十三辆胶皮大车拉着吃穿用品。消息送来，大家十分高兴地说：真的敌人给我们“拜年”来了，我们要“礼遇”来客。于是，我们组织全体战士，并由地方民兵配合，利用斜坡转弯的险要地形，事先埋伏，一举巧袭成功，夺得了全部物资。其中有大批的面粉、清油、猪肉、粉条及食糖、纸烟，还有不少棉衣。我们将这些物资全部用牲口驮到县委所在地进行了分配。有了这些物资，县委及政府有关部门和游击队、武工队、民兵、家属与当地群众都过了个丰盛的阳历年，十一个战士都换上了新棉衣。春耕快开始了，我们将夺得的三十

多匹牲口由县贫农团研究，都分配给受灾最严重的农民群众，支援了春耕生产。

追 歼 逃 敌

敌我双方经过十个月战斗力的较量，敌人在政治、军事及作战士气方面都走上了下坡路。住在甘泉的敌人，起初是一派凶神恶煞的样子，现在夹起了尾巴，威风扫地，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来。他们听见风吹树叶响，就当是中了埋伏；听见了鞭炮声，就当是机关枪在发射；出城抢粮碰见一堆蒿草，就认为是埋伏的人民解放军。在他们的心目中，好象陕甘宁边区的每块石头都会飞起来打他们；好象每个山头、每个山洞都张着大口要吃掉他们；好象人民解放军、游击队、武工队随时都可以从地缝里钻出来收拾他们，陕甘宁边区简直是草木皆兵，危险可怕极了！

经县委研究，我们利用敌人的这种心惊胆战，害怕人民解放军的心理状态，制订了一个政治宣传战的方案，终于达到了迫使敌人从甘泉败退的目的。

我们组织了些人，油印了成百上千的传单，上面写的是：彭总率领大军要收复延安，不日到达甘泉，指示县、区、乡政府，准备小米一百石，担架三百付和柴草等物资，还要大锅一百三十口，其中在南峪沟集中三十口，杨家砭八十口，关家沟二十口。总部设关家沟，限三至五天集中起来，要限期解放甘泉，进军延安。

传单一撒出，四乡震惊，城内骚动，敌人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先是一个排借口去延安求援，于农历正月二十二日逃窜，接着，伪保警及政府人员也因援兵无望，在二十三日晚悄悄地溜走了。敌人撤走后，城内又成了人民的天下，我地下同志惠光荣等首先出来维持秩序，并派人出城联系我人民

政府及人民武装进城。并且打开牢门，放出了四十多户军工家属。有关同志立即拿出许多面粉送给家属，组织大家烙馍做饭，吃饱喝好，然后都回家过团圆生活去了。

二十四日，我回甘泉途中，在石门碰见我的老婆李文华带着两个孩子。她们受尽了苦难，那疲乏不堪的样子真使我肝胆欲裂。但是，又看到她们获得了自由，我又感到难得的团圆和幸福，真是悲喜交加。我们不约而同地呼喊出：“莫想到我们又团圆了！”李文华对我说：“坐了九个月监狱，真是度日如年啊！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等待你们来解放，真没想到，你们没有动一刀、响一枪，从城外送来了几张传单，说彭总的十几万大军已经到了虎皮秃，要解放甘泉，包围延安，就把胆小如鼠的敌人吓跑了。”当即，我找了两头牲口，派人把他们母子送到王家湾去了。

二十四日这一天，游击队即进城维持治安，恢复秩序，清理枪支弹药及医疗器械等。我带了八人在伪党部及政府清理了敌伪档案，接着派武工队挖开城门，清除地雷，并派人动员群众回城，安家立业，安定生活，恢复了甘泉的政治秩序。

为了防止敌人再度进犯甘泉，我们在县委领导下，研究了武力部署，由我率领武工队去劳山及涇堰山一带驻守，监视从延安来犯之敌；独立营及游击队一、三大队去门家湾消灭从甘泉逃出的伪保安队。独立营和游击队经过一天的战斗，敌二人被打死，八十多人投降，其余顽固分子在富县的茶房、焦桃等地又被我埋伏的游击队迎头痛击，消灭了一大部分。接着，由我和李仲堂同志率领游击队继续尾追，直赶到阳泉、蛇家坑及赵巴寺一带全歼残敌四百多人，敌伪队长贺俊只身逃跑，但仍被我黑水寺的民兵抓获了。

踏 破 深 雪

这时，敌二十九军刘戡率部进驻宜川、瓦子街一带。我军方

面，彭总率领的大军准备围歼这支匪军，暂住牛武。一天，彭总派周兴同志来雷家沟对我说：“大军已集中安寨、牛武一带，准备消灭刘戡部，你和武工队熟悉这一带地形，彭总要你带几个人给大军带路。”恰好，这时大雪从天而降，不断头的白雪，从白天下到黑夜，又从黑夜下到白天，下个没完没了，雷家沟的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十双草鞋，我和九个战士穿上，踏着吱吱作响的厚雪，上了山坡又转入山沟，翻了一山过一岭，经过两天和风雪搏斗到了牛武。见了彭总，我把县上的介绍信递给他。彭总连忙为我们清扫身上的积雪，连声说：“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并叫通讯员为我们打水洗脸，准备吃饭。吃饭时，我们向彭总汇报进行宣传战、收复甘泉的情况后，他笑着说：“你们的几片纸、几张传单，就吓跑了敌人，这是保卫延安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你们用字作子弹取胜，省了我用真枪实弹打他们，真是太好了！”接着，彭总谈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延安会变成胡宗南的沉重包袱，而这个包袱会把他们压死，现在经过去年九里山的战斗，他们已经充分领会到这个道理了，敌人想丢掉这个包袱，已经来不及了。”彭总把我们领到军事地图旁，指着延安以南的线路说：“敌人看起来想放弃延安，从南路逃跑，它只有两条退路，一条是顺咸榆公路从牛武经洛川到咸阳，另一条是绕道宜川到潼关。别的道路是没有的，而我们已集中大军，形成一个钳形的包围圈，争取在宜川、瓦子街一带，全歼刘戡二十九军。把这一带筑成铜墙铁壁，堵死他们的退路，胡宗南就成瓮中之鳖，只待我们着手擒拿了。”彭总笑着继续说：“多少年来，蒋介石的队伍总是由我们指挥的，由不了他。刘戡这个坏蛋，除非他自杀，如果活捉住他，我要叫他的狗眼把陕北的厉害看一看，陕北不是好来的地方，陕北的土包子是不好惹的。”

彭总继续指着地图说：“这一仗很重要，我们进攻的路线，都被大雪覆盖了，白茫茫一片。山区本来都是羊肠小道，平常没

雪都不好走，现在所有的道路都被雪压了，你们要发挥智慧，在大雪中找出一条前进取胜的道路来。”经过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最后决定，由我们十人分成九组，我和白居易两同志一组负责从燕窝掌到虎头梁一路，其他八人各一路，每人带五、六十个战士，各拿绳子、棍杖等，分头向劳山、宜川、瓦子街一带踏出九条前进的道路，供解放军发动总攻击时行进。我们奋战了一天一夜就完成了这项探索道路的任务。在这个地区端掉敌人的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

我们的各部队，从山头直到沟沟岔岔的地方，都集中待命出发，攻击队后面的各个山沟里，挤满了成千成百的游击队、武工队、担架队，还有准备回家的老乡，真是人山人海。

雪后天晴，战机已到，彭总一声令下，我大军分九路前进，战斗先后在瓦子街、宜川等地打响了，大炮、机关枪、步枪的射击声和前进的口号声、喊杀声音响成一片。经过三天三夜的战斗，我军收复了宜川、瓦子街等地，刘戡本人和九十师师长严明等均被击毙，这次战斗消灭敌人二万八千多人。

从一九四七年冬，我西北野战军完成新式整军运动后，提高了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和部队的战斗力，一九四八年三月我野战军就转入延安外线的战略进攻，继宜川大捷消灭敌人五个旅之后，又在四月初发动了西府及陇东两个战役，截断了敌人退却的西兰公路，从此把敌人在陕北战场上的机动兵力，都诱引到延安一地，被我们全部包围了。

这次战役一结束，彭总一面命令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向延安城边追击溃散的敌人，一面命令插入延安南部的一个纵队，修筑工事，在咸榆公路上的劳山、甘泉、宜川等地死死卡住敌人的后路，不让敌人从延安逃跑。

把胡匪军埋葬在延安的战斗胜利了。四月二十二日，我西北野战军实现了毛主席的伟大预言，收复了延安，延安古城又飘展

着红旗。经过一年又一个月敌我双方力量的较量，最后以我西北野战军胜利收复了延安，蒋胡匪帮在陕甘宁边区遭到灭顶之灾而告终。

(1980年7月李 亨整理)

绥德游击队活动片断

乔 兴 和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纠集二十三万兵力，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当时，西北战场上我军只有二万多人。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号召边区军民“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主动放弃延安，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在这期间，党中央、毛主席一直留在陕北，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直接指挥西北战场的战斗。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延安，消灭胡宗南反动派，西北局和绥德地委决定，各级党政机关干部都要坚持当地斗争，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依靠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展开“磨菇战”，把敌人磨得精疲力尽，然后再去消灭。我当时在绥德县任副县长，在敌人进攻时，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形势，绥德、吴堡二个县的游击队合并，任务是保卫边区的胜利果实，保护边区的人民群众，钳制敌人的力量，带领群众打击敌人、消灭敌人，配合解放军开展对敌斗争。组织上决定让我担任这支游击队的副政委，当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但全体游击队员，不怕苦，不怕死，机智灵活，勇敢战斗，情绪高涨，使我增强了必胜的信念。

游击队成立后，利用当地的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经常埋地雷、挖堑壕、捉“舌头”、摸岗哨，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弄得敌人惊慌失措，不得安宁，白天不敢走小路，晚上根本不敢出来。敌人大队人马出动，我们就隐蔽起来；小股敌人出来，我们

就设法吃掉它。有一次群众报告说，在高家堰底沟来了一股敌人。游击队长马万里同志带了几个侦察员前去侦察，原来是胡宗南的抢粮队，他们赶了一大群骡马，还有一个排护送。对这一群强盗是打，还是不打？我们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研究，认为高家堰底沟离绥德县城不到三十里，城里驻着一个多师的敌人，如果打，敌人必然要增援，敌强我弱怕要吃亏；但大家又感到，胡匪一进边区，烧杀掠夺，奸淫妇女，确实把人民害苦了，一定要狠狠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研究制定了既不打草惊蛇，又要消灭敌人，保住粮食的作战方案。当时游击队正开中午饭，大伙一听说要打仗，个个磨拳擦掌，高兴得饭也顾不上吃了。出发前，进行了战斗动员，大家情绪相当高，纷纷表示决心，要坚决消灭敌人，为陕北人民出气。按照研究的方案，大家很快地静悄悄地进入了阵地，居高临下，包围了敌人。只听冲锋号一响，到处是一片杀声，游击队来了个雪花盖顶，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抢粮的敌人吓得晕头转向，稀里糊涂当了俘虏。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整个行动只用了三、四十分钟时间，一枪未响就结束了战斗。接着很快把抢去的粮食重新归还给了群众。这次战斗之后，人民把游击队叫“神军”、“飞兵”。敌人一听说“神军”、“飞兵”都心惊胆战；当地的坏人怕“神军”、“飞兵”和他们算帐，也不敢干坏事了。

游击队除了平时和敌人“磨菇”，拖住敌人，使之不便行动外，还经常配合大部队消灭敌人。绥德东门外无定河上有一座九个洞子的大石桥。桥身桥面都是大石块、石板砌的，非常坚固，行人出入县城必须经过这座桥。一天，我军前总来了一份电报，为了阻止敌人援助榆林战区，要求游击队将这座桥炸掉。我们接受任务后，请了几个石匠，深更半夜由游击队掩护，打算将桥破坏，搞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前总又来电催促尽快设法毁桥。时间相当紧迫，又没有炸药，在敌人眼皮下行动，困难确实大。我们

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和依靠群众，就能战胜困难。于是，我们召开了个“诸葛亮会”，请大家都来出谋划策，有的队员提出利用敌人飞机上扔下来未爆发的炸弹炸桥，这倒是个好主意，但不知怎样引爆。这时有的同志提出用电话机的干电池引爆可能成功。于是大家到处找炸弹，后来终于找到了一颗一千五百磅的未爆炸弹。趁着夜色，我们小心翼翼地把炸弹塞入事先挖好的石洞里，然后将导线一直引到半山腰。队长下令后，一个队员迅速播动电话机柄，“轰”的一声，大桥被炸毁了。大桥炸断后，我们连夜召集无定河沿岸二、三十里川区村干部会，会上研究决定了三条：一、立即将渡河小船划向离绥德三十里外的大会坪，隐蔽在山沟里，防止敌人用船渡河；二、动员群众很快把吃、穿、用的东西分散藏起来，敌人即使来了，也无法生活，群众少受损失；三、川区男劳力全部转移，以免敌人抓伏修桥。干部会开完后，大家分头连夜到各村作动员，群众听说是游击队让他们这样做，很快按照布置的意思做了准备。随后，青壮男劳力全部进了山区。群众工作搞好后，游击队也撤离绥德。后来，听侦察员说，在我们毁桥的第二天，敌人的大部队进驻了绥德城，其中有一个旅计划当天晚上从绥德出发，第二天一早赶到米脂，第三天要到达榆林，增援固守榆林之敌。但由于大桥炸毁，这个旅全部被挡在无定河南边。敌人找不到渡船，找不到劳力，只好靠自己的工兵搭桥。费了很大的力气，到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才搭好了一座便桥，人马勉强可以通过，汽车、辐重都没有过成，拖延了援榆之敌十一、二个小时。

沙家店战斗后的十天，贺龙同志去清涧路过绥德。到了无定河边，他派人找到我和地委书记张邦英同志。我们请贺老总进城吃过饭再走，贺龙同志说他要在第二天天明前赶到清涧，没有时间进城了。他让我们在河边坐下，张邦英同志简要地汇报了工作情况，贺龙同志表示满意，一边抽烟，一边赞扬绥德的干部对敌斗

争比较坚决，他说：“那么多的干部，只有一个副区长投敌，说明绥德的干部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指挥军民战胜敌人的。”他鼓励我们要继续发扬这个好传统。我向贺龙同志汇报了游击队活动的情况，贺老总对我们白天帮助农民种庄稼，晚上到处活动打击敌人的做法很感兴趣，他高兴地说：

“你们这样做很好，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游击队和老百姓本是一家人嘛！你们这样搞了，人民就支持你们，我们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当我汇报到我们接到前总的电报，如何想办法炸毁无定河桥时，贺老总说：“炸得好！炸得好！”我说：“虽然桥炸断了，拖延了敌人十几个小时行军时间，但遗憾的是并没有把敌人完全挡住。”贺龙同志笑着说：“老乔，这个帐不是这么个算法。在战场上，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力量，不要说十几个小时，有时一个战斗就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内决定胜负。”贺龙同志环视了我们在场的几位同志，继续说：“你们把增援的敌人阻挡了十几个小时是很了不起的。这对我们攻打榆林的部队支持是很大的。解放榆林，你们是有功劳的。”贺龙同志进一步勉励我们要保持发扬游击队的成绩，依靠群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为消灭胡宗南匪帮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贺龙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说：“请你们给群众说清楚，为了战胜敌人，我们把无定河大桥炸了，这是革命的需要，我想人民群众也会想通的。将来消灭了蒋介石，我们在这里再好好修一座大桥。”说完，他笑呵呵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告辞。他乘坐的汽车向清涧方向驶去，走了老远，贺龙同志还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

在敌人重点进攻的日子里，绥德、吴堡游击队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指示，紧密配合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部署，迫使敌人始终不能在绥德长期立足。1948年春天，阳光洒满了陕北大地，四月，人民解放军胜利收复延安，彻底粉碎了蒋胡匪帮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

陕甘苏区的红色堡垒——南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从一九三三年冬到一九三五年春，南梁曾是陕甘红军的根据地和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曾在这里领导了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我国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数十年来，刘志丹等同志开创南梁根据地的英雄业绩和南梁政府为革命所建立的不朽功勋，一直在陇东和西北人民中间广泛传颂，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根据当年曾参加过开创南梁根据地的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和有关历史资料，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记了南梁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斗争历程，以资纪念革命先烈，学习和发扬革命传统。

(一)

南梁，位于甘肃陇东华池县（原属庆阳县）、合水县和陕北志丹县（原保安县）、甘泉县边界的桥山山脉中段。因为这里的中心山梁上，有一座当地群众于清朝末年修筑的堡子——南梁堡，而得名南梁。现在，人们通常说的南梁，包括甘肃庆阳地区华池县南梁、林镇公社境内的白马庙川、玉皇庙川、林镇川、豹子川、大风川和二将川方圆几百里的子午岭林区地带。

相传，在数百年以前，南梁是一个山青水秀，人丁兴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清同治年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挑起了回、汉民族的互相仇杀，使这里的人民惨遭杀戮，

流离失所，“十仅存一”，农田荒芜，旷无人烟，逐渐变成了一个榆林茂密，野兽出没之地。事后，这里的一些幸存者回到了故乡，重新营建自己的家园。陕北横山、榆林等地的一些贫苦农民，也先后逃难落脚到了地广人稀的南梁，谋求生计。可是，在那种暗无天日的社会里，那里有穷人的活路？除南梁当地十二、三户趁火打劫的土豪恶霸，随意霸占大片山林和良田为己有，剥削佃户、雇工外，远在二百多里外的庆阳“八大家”的韩子高、李子良两家大地主，也把魔爪伸进了南梁，霸占了南梁几道川的绝大部分良田和几百里梢山，用“驴打滚”的地租、高利贷，残酷盘剥穷苦农民。据当地一些老年人回忆，当时居住在南梁的二百九十五户人家中，就有一百九十八户是这两家和当地地主的佃户。这里约二万六千多亩良田，被十几家地主霸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而二百八十多户农民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三十左右。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要交极高的租粮。仅租一头牛，往往要出租子一石五斗至两石二斗（每斗约折合五十斤）。灾荒年月，借粮、借钱都是借一加三的利息，到期无法偿还，利上再滚利。同时，官府、军阀、民团和当地的排头、堡子头、民团头，也随意向农民深捐深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且，土匪蜂起，兵灾不断。这种土豪劣绅的残酷压榨，官、兵、匪祸的纷来沓至，更加深了本来就走投无路的南梁人民的苦难，因而在他们心头开始孕育着翻身解放的革命思想。

一九二七年冬，清涧起义失败后转战陕甘边界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在谢子长、唐谢、闫揆要、雷恩钧等同志带领下，曾到达南梁地区的豹子川一带活动，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陕、甘两省大旱，颗粒无收，饿殍遍野。陕北爆发了由我党陕北特委发动的轰轰烈烈的饥民斗争。这场斗争，很快也被及到了南梁地区，饥民杨培胜等人，奋起反抗，在南梁、太白一带组织饥民“吃大户”，开仓分

粮，并拉起了一支饥民武装。一九三〇年前后，刘志丹同志多次来到南梁一带，积极团结改造这支饥民武装，并对南梁的地理、民情和政治、经济及其阶级状况，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在此之前，刘志丹同志就从渭华起义和陕甘地区多次兵变的失败教训中体验到，要发展革命武装斗争，必须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建立一块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了选择一块合适的地点，他走遍了陕甘边界的桥山山脉。经过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南梁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具备发展武装割据的条件，是一块理想的革命根据地，因为：

这里地处陕、甘两省四县边界的偏僻山区，是反动统治的间隙和薄弱地区，有利于革命力量乘机发展；

这里的土地大量集中在地主手里，劳动人民深受压迫、剥削，广大农民有着强烈的土地要求和革命愿望，有建立根据地的群众基础；

这里地广人稀，有粮有草，有利于屯军养马，养精蓄锐；

这里有几百里大梢山，山大沟深，森林蔽日，有险可依，回旋余地很大，有利于机动作战，开展游击战争……。

当时，刘志丹同志曾高兴地说：“南梁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有山、有川、有梢林，又是两省边界，敌人统治困难，咱们活动方便。只要在这里建立起了根据地，再步步向外扩展，就能把红旗插遍西北。”

(二)

为了开创南梁根据地，刘志丹同志以极大的毅力和决心，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工作和复杂的斗争。一九三〇年前后，刘志丹就派霍维德等同志，以“皮货商”（当地群众叫“皮客”）的身份为掩护，到南梁一带串连贫苦农民，传播革命真理，进行密秘

的革命活动。一九三〇年九月，刘志丹同志率领我党掌握的保安县民团，采取将计就计的战术，消灭了驻南梁南端太白镇的谭世林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即黄毓麟民团）两个连。接着，又在南梁林棉庙消灭了黄营的三连。从此，开始了开辟南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一九三一年春，刘志丹在盘踞平凉的陈国璋军阀部队搞兵运工作时，又派人去南梁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联络当地的农民武装，建立革命队伍，七月，他离开平凉来到南梁，着手整顿扩大了南梁的农民武装，建立了一支有三百人的南梁游击队，并派人同在黄河边上反抗官府收税的商販武装取得了联系。九月，杨琪同志带领的商販队（因这支队伍的主要首领叫师储杰，亦称“师大队”）和闫红彦，黄子文，吴岱峰，杨仲远等同志带领的晋西游击队，一起来到了南梁，与刘志丹的南梁游击队会合。在甘肃搞兵运工作的谢子长同志，也由陕西省委派到了南梁，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领导陕甘边的革命武装斗争。陕甘边游击队很快扩大到了一千余人。在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率领下，游击队消灭了南梁境内的慕园堡、金家湾民团和南梁周围的土匪武装，开展铲除恶霸，打富济贫的活动，并一举歼灭了陈国璋军阀部队的两个连，出师告捷，声威大震。当地的贫苦农民，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

一杆杆红旗一杆杆枪，
刘志丹的队伍到南梁。
长枪短枪与拐子枪，
咱们的游击队势力壮……

这期间，全国经历了许多重大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反而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

争。根据这种形势，一九三一年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这时，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正确主张，遭到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杜衡的干扰、破坏，强令这支队伍离开了南梁，南下渭北平原，开辟所谓“城市苏区”。一九三二年二月，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后任总指挥），转战陕甘两省的合水、正宁、宁县和旬邑、耀县、宜君等广大地区。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敌人却越打越多，苏区地盘越打越小，屡遭挫折。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刘志丹同志曾多次提出北上南梁，都遭到了杜衡的粗暴阻挠。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在宜君县杨家店，陕甘游击队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红二十六军只有这个主力团），由王世泰同志任团长。当时杜衡兼任军、师、团三级政委，极力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妄加“右倾机会主义”、“稍山主义”、“逃跑主义”等罪名，擅自决定撤掉了谢子长、刘志丹同志的职务，并逼迫谢子长同志离开了陕甘红军。一九三三年六月，杜衡欺骗和强迫红二十六军放弃唯一的落脚点照金根据地，南下终南山，在兰田县张家坪遭强敌包围，苦战月余，终因孤军深入，敌众我寡，而毁掉了我党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在地下党的掩护下突出重围，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周折，才返回了照金根据地。杜衡却当了可耻的叛徒。

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阻挠、破坏下，刘志丹同志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愿望虽未能实现，在南梁会合并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也被断送了。但是，刘志丹等同志开辟南梁根据地的初期活动，却在这里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后来建立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人们也从失败的教训中清楚地看到，建立南梁根

根据地，开展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游击战争，是发展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唯一出路。

(三)

一九三三年八月，刘志丹同志返回照金根据地后，陕甘边特委根据他的提议，开始进行了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工作和进军南梁的准备工作，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恢复后，由杨森同志任师长。照金、耀县、淳化、旬邑等地的游击队编为红三团，由王世泰同志任团长；渭北游击队编为红四团，由赵国卿同志任团长；王太吉同志率领起义的骑兵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这支队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指挥部，由王太吉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一九三三年十月，刘志丹同志率军北上正宁、宁县、合水，一路上横扫陕甘边界的反动武装，顺利到达华池（当时属庆阳县），第二次开辟了南梁根据地。从此，以南梁为中心，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就以烈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了。

红军回到南梁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师委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实行军事斗争与地方工作同时进行的方针，建立和扩大陕甘苏区。

在军事斗争方面，按照逐步把南梁根据地同关中、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的方针，建立了陕北、陕甘、关中三路游击队。除在此之前红二十六军已派强世济、杨仲远、白雪山等同志去陕北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外，这时又派出张仲良、王安民等同志组成了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领导关中地区的游击战争，由杨琪同志任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开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南梁地处陕北游击区和关中游击区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刘志丹同志直接领导了陕甘边界的军事斗争，协助杨琪等同志建立了合水、保安、

庆阳（包括今华池县）三支游击队，组建了小河沟、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东华池五个赤卫军大队。红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很快肃清了南梁周围的军阀、民团、土匪武装，并在陇东地区发动了攻势。一九三四年二月，刘志丹率领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奔袭高家砭，一举歼灭了张廷芝的一个营，又在崖窰歼敌一个骑兵连。接着迅速出击，挥戈西向，消灭了元城、李梁子两地的谭世林民团军。之后，又挥师南下，经合水抵达西华池，抓住有利战机，在这里歼灭了尾追之敌的两个营和一个机炮连。回南梁稍加休整后，红军又南下消灭了郜县槐树庄之敌。在半个月连续作战，打了六个胜仗，消灭了大批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物资，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我军越战越强。三月间，井岳秀、张廷之、谭世林、蒋云台等陕、甘军阀部队，分九路发动了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红军和游击队采取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战术，在运动中有力地打击了进犯南梁的敌军，很快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六月，刘志丹同志回南梁任陕甘边军委主席，指挥红军主力和各路游击队配合作战，消灭了田家涧等地主武装，拔掉了谭世林民团军在刘堡子、五蛟等地的据点，连续出击，屡战屡胜。这时，陕北的游击战争也迅猛发展。八月，谢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陕甘边特委在南梁的闫洼子，召开了有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上推谢子长同志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后，红二十六军三团由谢子长、王世泰同志率领北上陕北，同陕北游击队配合作战，使陕北根据地有了很大发展。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游击队，拔掉了敌人的成百个据点，摧毁了敌人的保甲制度，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迅速扩大了陕甘苏区。

在武装扩展根据地的同时，为建立巩固的南梁根据地和配合军事斗争，陕甘边特委决定由习仲勋、张策、蔡子伟、吴岱峰等

同志，专门负责领导陕甘边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一九三三年冬，在南梁成立了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吴岱峰同志任主任，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筹款，支援红军。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一九三四年二月初，在南梁的小河沟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了桥山中段的第一个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主席，白天章、牛永清为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秣、肃反、文化等委员会。由雇农张步清任土地委员长，雇农张庭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庭任财政委员长，胡志录任粮秣委员长，雇农赫文明任肃反委员长，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兼革命委员会政治秘书长（即秘书长）。南梁堡东腰峁一座有四孔窑洞的庄子作为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地点，领导和办理南梁及陕甘地区地方工作的有关事宜。习仲勋等同志，几乎走遍了南梁几道川的家家户户，紧紧依靠当地的贫雇农，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牛羊，分粮食，使土地革命蓬勃发展了起来。在此基础上，从贫苦农民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开始建立了党的乡村组织，相继组织起了工会（当时把雇农也称为工人，农村中的“工会”实际是雇农组织）、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并逐步建立了南梁地区的乡、村苏维埃政权，使南梁根据地不断得到了巩固，成为陕甘边根据地一个坚强的革命堡垒。同时，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群众工作也逐步向南梁四周的地区扩展，积极配合了革命武装斗争。广大群众和红军生死相依，血肉相连，纷纷参军参战，不断扩充了红军。这样，到一九三四年秋天，在以南梁为中心，东至安塞县瓦子川，西至华池县柔远川（当时属庆阳县），北至靖边县白豹川（今属吴旗县），南至合水县太白、固城川的广大地区内，建成了一块纵横一百六、七十里的比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工会、农会、贫农团、赤卫队等组织相继成立，在有些群众条件较好的地方还建立了乡、村苏维埃。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建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

(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南梁的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据史料记载，这次代表大会是选择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日子召开的，前后开了七天。荔园堡的一座关帝庙，作为大会的会场。十一月一日（农历九月二十五日），从陕甘边贫苦农民、游击队、赤卫军和红二十六军选出的一百多名代表，欢聚一堂。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黄子文、张策、吴岱峰、杨森等同志，以普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刘志丹同志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蔡子伟同志为大会起草了关于土地、粮食、财政等决议案和其他重要文件。会上，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黄子文等同志还向代表们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抗日运动的形势和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情况，并分别作了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报告和讲话。许多代表听着刘志丹等同志讲的“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推翻三座大山，劳苦大众坐天下”等革命道理，听着关于巩固、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大政方针，高兴得热泪盈眶，连声说道：“好！好！”他们怀着翻身作主人的喜悦心情，和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一起，认真商讨了有关陕甘边根据地的许多重大问题，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接着，代表们充分酝酿、讨论了有关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事宜和人选，推举出了自己满意的代表候选人。第六天，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民主选举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闫洼子村苏维埃代表武海潮，因为不识字，请刘志丹同志为自己代笔写选票。当武海潮提出先写上刘志丹的名字时，他很诚恳地

说：“先写你最满意的同志吧！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同志。”直到武海潮把自己要选的其他人都提完了，再三坚持要写上刘志丹时，他才在最后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经过投票选举，选出习仲勋同志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雇农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兼政府军事委员长，雇农李生华任土地委员长，雇农张庭贤任劳动委员长，杨玉庭同志任财政委员长，胡志录同志任粮秣委员长，雇农赫文明任肃反委员长，惠之俊同志任工农检查委员长，蔡子伟同志任文化委员长，张景文同志任妇女委员长，张文华同志任秘书长。在会上还成立了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由雇农朱志清任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在选举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同时，还成立了华池、赤安两个县。华池县辖原庆阳县北部和合水县一部红色区域，由贾生秀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赤安县辖原保安县和靖边县红色区域，由边金山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同志代表陕甘边特委，把一颗用红布包裹着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四方大印，授给了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从此，陕甘边界的苏维埃政权诞生了。

十一月七日，南梁地区晴空万里，红日高照。在荔园堡河西的川台上，举行了庆祝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从陕甘边根据地四面八方前来参加庆祝大会的贫苦农民，红军指战员，庆阳、合水、保安、靖边、安塞五路游击队和十八个赤卫军大队，还有游击区赶来的群众，人山人海，欢欣鼓舞。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志丹、习仲勋同志和工农兵各界代表先后讲话。当宣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时，三千余人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铲除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劳苦大众坐天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经久不息。接着，举行了阅兵式。在一杆杆迎风飘扬的红旗下，红军骑兵战士、五路游击队、

十八个赤卫军大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过阅兵台，精神抖擞，英姿矫健，步枪、大刀、红缨枪，银光闪闪，显示了人民子弟兵不可战胜的英雄气概。在偏僻荒凉的陕甘边山区，人们头一回见到了这么威武雄壮的阵势。从四面八方来的群众，会后又把这种革命的兴旺景象传向了四面八方，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远，南梁就越有名气了。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驻地搬到了距荔园堡十多里路的南梁堡寨子湾（今华池县林镇公社四合台大队老庄寨生产队境内）。因此群众习惯性地称为“南梁政府”。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也随之搬到了寨子湾。这里，几座大山梁相交，周围是遮天蔽日的大森林，地势险峻，进退相得。政府和军委，分别驻在半山腰两处旧庄的窑洞里办公，只有一个排的兵力的政治保卫队（由郭锡山同志任队长）担任警卫。虽然政府和军委驻地在寨子湾，但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并不经常住在这里，他们经常在人民群众中间生活、工作，同南梁人民同甘苦，共命运，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至今，在南梁一带还流传着他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许多动人故事。

（五）

南梁政府成立后，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关心群众生活，都有明确的规定。南梁和广大陕甘边根据地，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进一步组建南梁地区的区、乡、村苏维埃政权，整顿加强工会、农会、贫农团、赤卫军的同时，又成立了青年、妇女、儿童团等组织。一九三四年冬，又先后成立了庆北县、安塞县、甘洛县。根据地各县，还选举成立了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工

会、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和青年、妇女、儿童等组织也先后建立了起来。在全面建政的基础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各县、区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每村都有一个土地委员。他们带领群众斗争地主、恶霸，烧毁地契、债约，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房屋（窑洞）和其他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川台地按人分配，每人可分十亩左右；山地按户划块块，能种多少分给多少；对家在苏区的所有红军战士，都保证分给一份土地；对家在苏区的白军士兵，暂不给他们分地，留下一份，暂作公田。这样，在陕甘边十几个县的广大农村，燃起了土地革命的熊熊烈火。

为了培养革命的骨干力量，陕甘边特委、军委和政府，在南梁开办了军政学校（当地群众称为“红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习仲勋同志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校址先设在荔园堡，后迁至豹子川里的张家岔。开设的政治课程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议等；军事课有，制式教练、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还有文化、群众工作等课程。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年春，先后共开办了三期训练班，培训了从陕甘边农村和军队中派来的三百多名军政干部。学员毕业以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工作。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为重要的骨干力量，有的成长为很有才干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

在南梁和陕甘边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也开始发展了起来，习仲勋同志非常关心文化教育工作，亲自发动群众办学校。在荔园堡的转咀子，办起了陕甘边的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由从西安投奔南梁根据地的女知识分子张景文（南梁政府妇女委员，后遭王明“左”倾肃反路线诬陷，被杀害）和贺建德担任教师，动员了六、七十名贫苦农民的子弟上了学。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各乡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

学，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发展革命教育事业。同时，陕甘边特委还创办了不定期的油印刊物《红色西北》，经常刊登特委、政府的文件，宣传和教育群众。南梁政府颁发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和禁止赌博活动、戒除鸦片等法规；还依靠工、农、青、妇等组织，在根据地开展了“六劝”（劝不迷信、劝不赌博、劝不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人剪辫子、劝戒鸦片烟）活动，引导人民群众破除陋俗恶习，移风易俗；并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努力把根据地建设成为革命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文明的典范。当地群众高兴地唱道：“婆姨女子脚放开，长头发剪成了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的势力大无边。”

为了促进边区的经济建设和贸易事业发展，陕甘边银行发行了用布印的货币（当时群众称为“苏票”）。制币厂设在南梁的油坊沟，只有三名工人，完全靠手工刻板，印在布上后又刷上桐油。布币的票面精致，美观耐用，分为一角、二角、五角和一元四种。开始，有部分群众（尤其是游击区的群众），对使用“苏票”交易有疑虑，边区银行的工作人员每逢荔园堡集日，就背上打土豪筹集的银元去赶集，与部分保存“苏票”有顾虑的群众进行兑换，一元布币兑换一块银元。因此，在当时国民党的钞票时时贬值的情况下，边区的布币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信誉。同时，由于边区政府对白区商人采取了争取、欢迎的政策，坚决保护他们的利益，因而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荔园堡集日，除南梁根据地方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外，许多白区的客商也来进行公平交易，熙熙攘攘，很是热闹。习仲勋、蔡子伟等同志还经常利用荔园堡集日，登上荔园堡的戏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随着贸易事业的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日益稳定和繁荣起来。

南梁政府成立后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南梁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建设的发展，使这里成了一个人们所向往的地方。当时，穷苦农民纷纷投奔南梁，一些追求真理的

有志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了南梁，就连当时还身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妇女，也唱出了“长枪短枪马拐枪，跟上哥哥上南梁”的革命心声。一九三五年春，南梁一带的人口由革命前的二百九十多户增加到一千多户，六千多人。南梁，以它强烈的感召力，号召和动员了人民大众起来闹翻身，求解放。一九三四年冬到一九三五年春，边区开展的“扩红”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到处是投奔南梁当红军、父母送儿当红军、妻子送郎当红军的动人情景，红军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了起来。许多贫苦农民自愿参加游击队，赤卫队，使革命武装力量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九三五年春，以华池、合水等县游击队为主，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由刘景范同志任团长，与此同时，关中游击队改编为红一团，由张仲良同志任团长。至此，红二十六军有了红一、二、三、四团和抗日义勇军两千余人的兵力。各县游击队扩大到三千多人，赤卫军增加到五千多人。广大根据地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六)

一九三五年春天，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陕甘宁晋绥数十万兵力，发动了对陕甘、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八十六师集结榆林、三边一线，高桂滋的八十四师集结绥德、延安一线，重点进攻我陕北根据地，马鸿逵部集结陇东的环县、庆阳、合水一线，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六十一师集结宁县、正宁一线，杨虎城部集结关中一线，重点进攻我陕甘边苏区。根据地四周重兵压境，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农历三月十三日，分三路进犯陕甘边根据地的马鸿逵匪军和陇东地区的反动武装，经庆阳、悦乐北窜，占领了华池县柔远城子一带，逼近南梁。这时，集结在二将川的红军部队、游击队和赤卫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

术，凭借老爷岭的有利地形，迷惑、打击敌人，将进犯之敌阻击在老爷岭以西地区。“围剿”和反“围剿”的战斗，在南梁西、南一带激烈地进行着。

在此之前，刘志丹同志就去陕北根据地同谢子长（此时已身负重伤，不久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逝世）等同志商谈反“围剿”的问题。一九三五年二月初，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原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了统一两个根据地党政军领导问题和反“围剿”的作战方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的工作；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两支革命武装（一九三四年冬陕北游击队已改编为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这次会后，刘志丹同志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和调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的命令。因此，陕甘边红军和游击队，与进犯之敌经过月余英勇战斗后，于四月上旬主动撤离了南梁地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亦随之迁到了洛河川的下寺湾。四月十一日，马匪军占领南梁，烧杀掳掠，无恶不作。马匪帮妄图彻底摧毁南梁根据地，疯狂地搜山、烧山、炮击山，每到一地，就挖战壕，修碉堡，并将荔园堡、小河川、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民房全部烧毁，窑洞全被破坏，赶走了牲畜牛羊，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将这些地方的群众全部迁到了二将川、白马庙川一带，妄图切断红军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红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同时，敌人四处张贴告示，悬赏白银三千元、马三匹，缉拿南梁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副主席贾生秀同志；同时，残酷拷打群众，企图弄清我游击队、赤卫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南梁人民英勇不屈，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和红军坚壁武器弹药及军需物资。并积极配合游击队、赤卫军，不断打击、骚扰敌人，弄得敌人惊恐万状，一夜数惊。

四月下旬，红二十六军主力到达陕北。五月一日，红二十六

军和红二十七军在安定县（今子长县）李家岔会师。之后，在玉家湾会议上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这两支红军，在刘志丹同志指挥下，抓住有利战机，先后歼灭了杨家园子等地的敌人，随即挥师南下，横扫顽敌，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和保安六座县城，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瓦窑堡，西达环县，广大地区连成了一片，这时的根据地发展到了三十多个县，红军和游击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九月，南梁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此后，以南梁为中心建立起来的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一九三六年，由南梁建立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从洛河川又迁到了陇东环县河连湾，改名为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由李富春同志任省政府主席。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了新的胜利。

今天，回顾南梁根据地和南梁政府为革命所建立的历史功绩，追忆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创建南梁根据地艰苦曲折的战斗历程，对于我们学习和发扬革命传统、坚定不移实现四个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我们要学习革命先烈为实现革命理想百折不挠、英勇献身的斗争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武政东 高文 巩世锋整理）

封面设计：郭宝林
封面题字：马贞书
责任编辑：尤明智
孙得仁

陇原星火

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兰州庆阳路234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125 字数190,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书号：11406·31 定价：0.70元